

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苏)普·季·雅科夫列娃著

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苏〕普·季·雅科夫列娃著

贝璋衡译

本书为内部参考用的，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原文出处及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年·北京

П. Т. Яковлева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689 ГОДА
Изд.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8

内部读物

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苏〕普·季·雅科夫列娃著
贝璋衡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3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7 1/4, 200千字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27 定价：0.73元

序 言

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1958年出版于莫斯科。它是苏联出版的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一本专著。其中叙述了十七世纪中俄两国早期关系的历史和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两国使团在尼布楚举行谈判，划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情况。

本书作者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在书中竭力美化沙俄政府的殖民扩张政策，为老沙皇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辩解，对中俄关系的早期历史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和篡改。

作者在书中胡说，黑龙江流域从来不属于任何国家，而是俄国人在十七世纪新发现的土地，首先开发了它。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黑龙江流域历来属于中国。这是历史常识。远的不说，早在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唐朝就在黑龙江流域设有行政机构。十五世纪初，中国明朝在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都指挥使司、卫、所等各级行政机构几百个。十七世纪上半叶，满族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中国清朝继续对这一地区行使管辖，设官镇守，征兵收税。这些事实，不仅中国史书有大量记载，就连本书作者引用的俄国档案材料，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本书中作者就明明写着：当沙俄入侵者窜到黑龙江流域，强迫当地居民向沙皇缴纳贡赋时，当地的达呼尔人酋长就曾明确地告诉他们，“‘博格德皇帝’（指清朝皇帝）的人已经向他们征收过毛皮实物税了”（见本书22页）。可见，在沙俄殖民主义者入侵黑龙江流域以前，这块土地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容篡改的历

史事实。

作者还在书中颠倒黑白地指责中国军队对黑龙江地区进行了“军事远征”，是“绝对的侵略”，并大加渲染尼布楚条约是在“清政府对俄罗斯使节团施加军事压力的情况下缔结的”。

首先，如上所述，早在八世纪，中国就在黑龙江地区行使了有效的管辖。而那时俄罗斯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是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沙皇俄国的一小撮殖民主义者才万里迢迢，从欧洲跑到亚洲，窜到黑龙江流域来。所以进行了“军事远征”的不是别人，正是沙俄自己。

其次，在十七世纪下半叶中俄两国在黑龙江地区的几次冲突，是由于沙俄殖民主义的入侵所引起的。沙俄入侵者所到之处，用武力强迫当地中国居民缴纳贡赋，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干下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中国各族人民和清军一起对入侵者进行坚决抵抗，是理所当然的，是正义的自卫行动。正是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和反侵略战争的节节胜利，以及俄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各种困难，才迫使沙皇政府坐下来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如果把中国人民对入侵者的抵抗，称之为“绝对的侵略”，那岂不是完全颠倒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性质吗！

第三，所谓尼布楚条约是俄国在中国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签订的。这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事实上，在尼布楚谈判期间，中俄双方所带兵力大体相当。至于双方所带卫队，那是根据协议，其数量是相等的，而且都不带作战武器，所以，根本谈不上中国对俄国“施加军事压力”。确凿的事实倒是清朝政府由于当时需要应付国内事务，稳定北部边界，宁可割让尼布楚，也想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至于俄国使团后来同意归还雅克萨，这是在订约之前早已在俄国政府给其使团的秘密训令中规定了的，是沙皇的既定方针（见本书139、149、153页）。正象作者在书中不得不承认的那样，俄国使团

在谈判桌上所同意的，不过是“在他们所奉的敕令中是预先规定了：即放弃阿尔巴津，讨论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及沿斯塔诺夫山脉以至于海为界的问题”（见本书 182 页）。由此可见，尽管中国让了一些地方，但谈判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条约基本上反映了两国政府的主张，符合双方的利益。对于这一点，就连本书作者也不能完全否认，她在本书结论里写道：“俄罗斯同中国的尼布楚条约是按照平等原则签订的”，“是互利的”（见本书 214 页）。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它明确规定了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订约以后，大约一个半世纪之久，中俄两国政府都承认并基本上遵守了这条边界线，保持了边界的和平与安宁。

这本书里还有其他许多荒谬的论点和歪曲的叙述，需要详细地、深入地进行批判。这些谬论并不仅仅是作者的个人观点，它继承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帝俄时代的殖民主义历史观点。而今天，社会帝国主义者则更加发挥了这些观点，为其侵略和扩张主义政策服务。尽管如此，但书中引用的某些具体史料，对我们研究十七世纪早期中俄关系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庆 思

1973 年 10 月 15 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俄中关系的起源	11
第一节 俄罗斯向太平洋沿岸的伸展	
沙皇政府对东西伯利亚的政策	11
十七世纪阿穆尔河流域的居民	14
俄罗斯对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的开发	40
十七世纪达呼尔地区的俄罗斯移民	51
俄罗斯与蒙古诸汗国的关系	73
第二节 俄罗斯同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发生	83
初期派往中国的俄罗斯使节团	93
十七世纪的俄中贸易	115
1683—1689年满洲军队和俄罗斯哥萨克 在阿穆尔地区的冲突	118
第二章 尼布楚条约的酝酿和签订	131
第一节 使节会议的准备,双方使节团的人员、 权限和所奉的训令	131
俄罗斯使节团	131
柯罗文对使节会议的准备活动	141
清朝的使节团	156
中国使节 1688年从北京的出发	160
第二节 俄中两国在尼布楚的谈判	166
1689年8月12日使节们的第一次会议	166

1689年8月13日使节们的第二次会议,使节谈判的 破裂和尼布楚的被围,通信的谈判	171
1689年8月27日使节们的第三次会议	189
第三节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条约的内容和 历史意义	193
结论	213
附录一 中俄尼布楚条约	216
附录二 费·阿·柯罗文通行证	219
附录三 费·阿·柯罗文等使节全权证书	221
参考书目	223
俄汉译名对照表	229

前 言

本书的基本任务在于阐明第一个俄中条约的历史先决条件以及这个条约的内容和性质。关于初期的俄中关系这一重要课题，直到现在无论在中国或苏联都还没有专门的论著，所以急需研究这个问题是非常明显的。由于缺乏以原始档案为根据来分析尼布楚条约的专门著作，以致关于条约内容以及俄中开始发生关系时期的整个历史产生了矛盾的而且往往是不正确的解释。

革命前的研究者，包括对俄国与东方各国的交往史写过概述性著作的尤泽弗维奇^①、特鲁谢维奇^②和姆·伊·文纽科夫^③在内，都不重视尼布楚条约，而仅限于单纯把事件列举出来。从米勒开始，某些历史家在谈到1689年条约时指责俄国使节团把阿穆尔河^④让给了中国，对俄国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做了否定的评价^⑤。

在苏维埃时代，历史家库尔茨^⑥毫无根据地贬低尼布楚条约

① 格·尤泽弗维奇：《俄国同东方的政治和贸易条约》，莫斯科1869年版，第234—236页。

② 赫·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前俄国同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莫斯科1882年版，第29—33页。

③ 姆·伊·文纽科夫：《俄国同中国签订的旧条约和新条约》，圣彼得堡1863年版，第1—10页。

④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

⑤ 参看格·米勒在《……每月论文集》中发表的文章，1757年第7、8、9、10号；弗·普·瓦西利叶夫：《中国的发现》，圣彼得堡1900年版，第68页；恩·弗·丘涅尔：《远东各国近代史》，第3卷，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者）1910年版，第23—29页；尤·巴尔捷涅夫：《阿尔巴津的英雄们……》，《俄罗斯文献》，1899年，第2号。

⑥ 勃·格·库尔茨：《十六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俄中关系》，哈尔科夫1929年版，第50—55页。

的意义,硬说:“实际上条约并未实行。国界在事实上并未划清,因此重新发生误会;……莫斯科政府对自由贸易的远大希望始终只是希望,因为第一,中国人不认为同俄国进行贸易是重要的,第二,他们根本不允许外国人到他们那里去自由贸易。”^①

在萨文的概论性的《沙俄和苏联同中国的相互关系》一书中,重复了旧日对耶稣会教士的恭维,仿佛是他们第一个俄中条约的缔结中起了主要作用。萨文对尼布楚条约没有做广泛的注释。^②

1940年德国传教士瓦尔特·福克斯在北平发表过一篇很慎重的论文,这篇论文具有一定的意义。^③作者注意到,在欧洲、中国和日本对尼布楚条约的内容都非常关心,所以他决定把这个条约已有的满文、中文、日文、俄文、法文、德文、英文以及荷兰文各种版本加以系统的整理和研究。^④福克斯的结论归纳起来是这样的:

1. 尼布楚条约的种种欧洲版本,都根据张诚^⑤从拉丁文翻译的法文本,即大家都知道的迪·哈尔德版本。^⑥福克斯认为,张诚的翻译以及从而派生的一切译本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准确性。

2. 所有中文、满文和日文的版本也不是以原本为根据,而是

① 勃·格·库尔茨:《十六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俄中关系》,哈尔科夫1929年版,第50—55页。

② 弗·普·萨文:《沙俄和苏联同中国的相互关系》,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

③ 瓦尔特·福克斯:《对1689年俄中尼布楚条约文本的考证》,载辅仁大学东方研究学报《中国文献》,亨利·维琪,北平,1939—1940年,第4卷,第546—593页。

④ 福克斯,论文同前,第547—548、569—571页。

⑤ 法国来华的传教士,曾在尼布楚谈判中充任清方的译员。——译者

⑥ 耶稣会教士迪·哈尔德:《中华帝国和中国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附各该地区全图和分图以及西藏、朝鲜全图和分图)》(法文版),第4卷,1736年,第147—161页。

以译本为根据的，因此它们也含有许多错误和重大分歧。

3. 北平的档案库中没有 1689 年条约的原本，所以难以判明条约的确实内容。因此福克斯声明说，他不知道尼布楚条约的档案材料。^①

福克斯的结论证明，如果不引用保存了满文和拉丁文原本的俄罗斯档案材料，就不可能稍稍充分地研究俄中两国的关系史和判明第一个俄中条约的确实内容。

对俄中关系发展的开始阶段的研究所以复杂，首先是由于关于这个问题缺乏发表过的中国文件。^②目前仍不清楚中国的档案馆里是否保存有这种文件。至于俄国方面的材料，那末在苏联的档案馆里是保存有很多很多的。

本书是以分析苏联档案馆里保存的，几乎未曾研究过的原始文件和材料为基础，来研究促使俄中发生关系的一般先决条件以及尼布楚条约的酝酿和签订经过的初次尝试。作者没有可能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库的材料，自知本书的缺点在于史料根据带有某种程度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但作者认为俄国档案材料为具体地、基本上正确地阐明尼布楚条约的酝酿和签订经过提供了可能性。

在写作过程中利用了莫斯科的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和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的档案；还引用了列宁格勒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第一届西伯利亚委员会的材料。外交事务衙门（十七世纪主管俄国对外政策的机关）的文件对这一问题有巨大的意义。外交事务衙门的档案中有“俄中关系”档案或称“中国事务”档案。为这些材料做主要补充的，有管理整

^① 福克斯，论文同前，第 547 页。

^② 《故宫俄文史料》（北平 1936 年版）中只有两个十七世纪的文件（第 1,4 号），（实际上该书中的第 1—5 号各件都是十七世纪的，不过只有第 1 件是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前的。——译者）

个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文件（“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西伯利亚各地（雅库次克，伊尔库次克，尼布楚）将军衙门的案卷（第 1177、1121、1142 号档案）。在上述中央和地方机关的公文来往中，有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和俄国在阿穆尔地区殖民的详细资料。

应当指出，必须引用俄国的档案文件来研究俄中关系的思想绝不是新出现的。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班蒂什·卡敏斯基就进行过巨大的工作来介绍俄中关系史方面的档案材料，他所著的《1619—1792 年俄中两国间的外交文件汇编》^①，是介绍所有发往中国的俄国使节团的文件内容和所有从中国发来的公文内容的一本宝贵而简明的参考书。

历史著作中也引用过记述初期派往中国的各次俄国使节团（伊凡·彼特林、费多尔·贝科夫、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尼古拉·斯帕法里^②各使节团）的档案材料。

阿尔先耶夫出版过尼古拉·斯帕法里出使报告的全文^③；在不同时期的出版物中，先后发表过关于彼特林和贝科夫使节团的文件。^④但是有关签订第一个俄中条约的柯罗文使节团的文件从来还没有发表过。本书中广泛利用了费·阿·柯罗文的出使报告（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10 册）、使节团的日记（同前，第 13 册）以及费·阿·柯罗文将军行轅的案卷（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第 1121 号档案）。

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档案中所保存的文件，对于尼布楚条约

① 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1619—1792 年俄中两国间的外交文件汇编》，喀山 1882 年版，第 6—66 页。

② 我国过去史书上的译法为“尼果赖”。——译者

③ 《俄罗斯地理学会会刊》，1882 年，第 10 卷，第 1 期。

④ 彼特林的出使报告载于《西伯利亚公报》1812 年第 2 期。又参阅斯列兹涅夫斯基《关于人们知道不多的和完全不知道的文献的介绍》，圣彼得堡 1874 年版。贝科夫的出使报告载于《俄罗斯人民的传说》，第 2 卷，圣彼得堡 1849 年版。

签订前俄中贸易的规模和性质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具体资料，这些文件过去在历史著作中是未曾利用的，对这些文件的研究使我们首次有可能阐明 1657 年佩尔菲利耶夫使节团前往中国的经过和 1668 年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庞大商队前往中国的经过。

为了说明中国使节团及其权能和所奉的训令，本书除引用耶稣会教士张诚的日记以外，还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关于 1681—1689 年康熙军队在阿穆尔河作战以及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日志^①的译文。这是十八世纪初就由俄国人翻译过来的，现在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的《俄中关系》档案中(第 K-2 号, 1682 年)。这个文件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康熙皇帝对他的军事领袖和使臣的训令。这个日志的某些片段曾经发表过。^②

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缮本室里(在列宁格勒)有十八世纪初绘制的阿穆尔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平面图，熟悉这些图对于写作本书具有重要的意义。那里还保存有两本很有趣味和很有价值的手抄书籍，一本是《中国志十四章》(《乌斯丘格手稿汇编》，第 45 号)，一本是《中国历史》。前者是十八世纪初用半多角字体^③写的，用了五十五张厚纸。它是在 1783 年从大乌斯丘格城的大主教图书馆转移到科学院的。从内容来看，这本书描述的是清朝皇帝康熙统治时期的中国。作者是一个耶稣会教士，对十七世纪后半期中国历史的全部叙述都是以歌颂清朝皇帝的笔调来处理的。由于这本书包括有许多关于北京和康熙的详情细节，所以在以批判态度对待它的同时，还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第二本值得注意的缮本书是《中国历史》。它的内容是尼古拉·斯帕法里对中国的记述。

① 指《平定罗刹方略》。——译者

② 《俄罗斯文献》，1899 年，第 2 期。

③ 即行书体。——译者

这本书有一百四十张纸，都是用很工整的字体写的，并有大量的脚注和引文，这些脚注和引文显然是一位中国通，即中文译员伊拉里昂·罗素新所做，是他对尼古拉·斯帕法里的记述的批评。^①

本书还利用了《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补编》中所发表的文件。关于叶洛菲·哈巴罗夫 1649 年和 1651 年远征阿穆尔河的文件令人感到很大兴趣，这些文件为说明俄国在阿穆尔地区的政策提供了可能性。^②瓦西里·波亚尔科夫对于他的远征队航行到阿穆尔河的报告也是令人感到很大兴趣的。这个文件是对阿穆尔地区的自然界和居民最早的、而且非常详细的记述，因此波亚尔科夫的报告被当作了第一章中关于十七世纪达呼尔地区的自然界和居民那一小节的基础。^③

这些文献汇编里载有叶洛菲·哈巴罗夫向雅库次克将军所做关于 1641—1652 年俄国哥萨克在阿穆尔河的活动报告，还载有俄国哥萨克谢尔盖·安德列耶夫及其部下对于阿穆尔地区和中国的报告，这些报告证明了中国的满洲人统治者对俄国人的作战准备。^④其中还有叶洛菲·哈巴罗夫一个可贵的报告，他说“达呼尔地区除黑麦以外产粮很多”^⑤。

从阿尔巴津^⑥总管奥努夫里·斯捷潘诺夫和尼布楚将军伊拉里昂·托尔布津向雅库次克所做关于 1655 年满洲军队在阿穆尔

① 关于罗素新及其在中国的活动，我是以罗素新的亲笔传记为根据的，这个传记保存在列宁格勒的科学院档案馆里（第 3 号档案，目录 1，第 202 件，第 38 张）。罗素新证明，尼古拉·斯帕法里不仅不懂中文，而且对中国没有正确的概念。斯帕法里赞扬耶稣会教士们，而罗素新说耶稣会教士只是“用谄媚的手段取得了”某些中国人的信任，大多数中国人则要求把耶稣会教士从中国驱逐出去。

② 《历史文献》，第 4 卷，圣彼得堡，第 31 号，第 67—76 页。

③ 《历史文献补编》，第 3 卷，圣彼得堡，第 12 号，第 50—60 页。

④ 同上，第 103 号，第 371 页。

⑤ 同上，第 103 号，第 372 页。

⑥ 阿尔巴津即雅克萨。——译者

河进攻俄国库马罗夫斯克堡^①以及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②遵照满洲皇帝命令从阿穆尔河移居嫩江的报告中,判明了很重要的事实。这一事件的目击者斯捷潘诺夫明确地报告了这次迁移的经过是怎样的,他说:“……博格德皇帝^③的王爵沙尔呼达纵火焚烧和彻底破坏了他们的财物和帐篷……”^④尼布楚将军托尔布津报告说,达呼尔地区的俄国军职人员不足以抵御康熙的军队和蒙古人,但另一方面又有非纳贡的鄂温克人到尼布楚来,请求允许他们加入俄罗斯国籍。^⑤

来自雅库次克关于满洲军队围困阿尔巴津以及阿尔巴津的哥萨克出征根河的报告是值得注意的。根河那里居住着被强迫从阿穆尔河移去的达呼尔人,出征就是根据他们的请求而组织的。以尼基福尔·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首的三百名哥萨克答应去帮助达呼尔人,不过他们出征的结果没有下文。但这些文件对于判明阿穆尔河的达呼尔人和俄国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⑥

俄国传教士团成员卡法洛夫(帕拉吉)发表过俄文的《中国的〈圣武记〉一书摘要》(即关于清朝武功的记述),这本书是中国历史家魏源所著,对十七世纪中国的满洲八旗军的性质、数额和武装提供了很宝贵的资料。^⑦

魏源指出,俄国属地扩展到阿穆尔河,而中国任何人对阿穆尔河各部落的情况一无所知,“仿佛他们是居住在天边似的”,阿穆尔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4卷,第8号,第26—31页;第31号,第83—85页;第53号,第145页;第116号,第272页;第133号,第320—327页。

② 久契尔人(дючер)即女真族人。——译者

③ 博格德(Богд)蒙语,“神圣”、“至高无上”之意。博格德皇帝和博格德汗是对清朝皇帝的称号。——译者

④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31号,第82页。

⑤ 同上,第327页。

⑥ 同上,第6卷,第22号,第153页。

⑦ 卡法洛夫(帕拉吉):《中国的〈圣武记〉一书摘要》,北京1907年版。

河的索伦人和达呼尔人部落“不属于满洲部落”，达呼尔人和索伦人是在清朝时代(即康熙年代)被征服的。

魏源还说，满洲人的清朝蓄意在蒙古实行分裂整个地区的政策，以“削弱蒙古人的力量”。^①

* * *

为了正确理解十七世纪俄中发生关系的条件和性质，必须同时注意俄中两国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

列宁断定十七世纪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②，这个时期的实质他认为就是全俄市场的形成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国家经济大大发展的结果。俄国的征服西伯利亚是与俄国经济的发达和全俄市场的形成有直接关联的。列宁认为，俄国的征服西伯利亚是争夺经济领土。^③十七世纪俄国在欧洲实行着积极的对外政策，为了收复被瑞典、波兰和土耳其侵占的土地和打通海上出路而进行着斗争。在当时，这是俄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在远东，俄国努力争取同自己最大的邻邦中国保持持久的和平和相互的贸易。在十七世纪，和平和同俄国的贸易对于中国同样也是必要的。

按照马克思的论断，中国一直到十九世纪还是封建国家，所以它的居民只能有限度地同欧洲的资产阶级国家进行贸易。马克思在1858年写道，“……一般说来，人们过高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④十七世纪中叶，中国被套上了清朝的沉重枷锁，清朝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是与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格格不入的。

① 卡法洛夫(帕拉吉)：《中国的〈圣武记〉一书摘要》，北京1907年版。

②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在这个版本里，“新时期”是译为“近代”的。——译者)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04—605页。

恩格斯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清朝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与中国人民毫无关系的，战争只是由皇帝的军队去进行，而中国“……人民静观事变……”。^①

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领袖的主观见解和政策，对俄国同中国建立相互关系的过程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无论俄国的沙皇和外交家们或是清朝的皇帝及其大臣们，都是实行本国封建阶级的对外政策的纲领的，这就给两国政府的这些或那些对外政策的步骤打上了阶级局限性的烙印。不顾这种政策的致命后果而力图保证狭隘的、自私的阶级利益的倾向，在俄中发生关系的初期不止一次成为中国同俄国交往的障碍。中国皇帝康熙对俄国的政策是这方面的实例之一。康熙对俄罗斯国家的力量、性质和国际意义没有现实的概念。他力图以武力扩展自己的帝国，力图通过征服邻邦领土，包括俄国在阿穆尔河和东西伯利亚的领地在内来增加自己的臣民的数量。

康熙皇帝的对外政策使得用条约把两个邻邦的和平关系固定起来的工作遇到一些困难和麻烦，但这种政策并未能阻止两国的接近过程的实现，这种过程是由历史所决定的。

俄中两国外交关系的开端问题与俄国在阿穆尔地区的殖民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本书不能尽量充分而深刻地分析俄国在东西伯利亚殖民的整个复杂过程，但是对阿穆尔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的殖民事实也做了一般的概述，因为这些事实足以说明签订第一个俄中条约的经过。东西伯利亚以及阿穆尔地区在十七世纪的归入俄国版图，是农民开发这些人烟稀少的地区的结果。俄国人的建立农业、渔猎等业、各种手工业以及商业，标志着阿穆尔地区的生产力的大大向前发展。东西伯利亚的俄国农业移民对当地居民没有西欧殖民者固有的那种傲慢、轻视和仇恨的态度；俄国人不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1页。

杀西伯利亚的部落，不摧毁他们的经济，而是与他们进行经济和文化的接触。

俄国的殖民加速了本地居民（土著）的氏族关系的瓦解，促使游牧部落转向定居和从事农业。俄国在阿穆尔地区殖民的特点就在于此。

清政府同俄国争夺阿穆尔河是在这个边区已经归入俄国版图时开始的，因此清政府以武力夺取阿穆尔河是对俄国的侵略。

清政府在所侵占的阿穆尔地区以强暴手段摧毁农业，驱逐居民，把广阔的边区变成空旷地带，借以把满洲，特别是中国，同俄国的影响隔离开来。俄国对这些地区的退让不仅决定于清朝在阿穆尔地区的军事力量的优势，渴望同中国建立持久的和平和贸易关系也并非不是重要的原因。

为争阿穆尔河而发生的冲突是短时期的，而且是地方性的，后来就缔结了关于和平和贸易的尼布楚条约，以这个条约为基础，俄中关系在二百年间是和平的关系，是日益繁荣的、相互有利的贸易关系。这个条约对于两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意义。

第一章 俄中关系的起源

第一节 俄罗斯向太平洋沿岸的伸展 沙皇政府对东西伯利亚的政策

俄国和中国之间持久的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建立，只是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俄中两国的属地在阿穆尔地区接近起来，因而有必要调整不断发展的关系之后，在实际上才成为可能的。

俄罗斯对西伯利亚广大地区的开发，是一个极其特殊而复杂的过程。俄罗斯在十六世纪末占有西西伯利亚以后，总算是完成了对那些鞑靼汗国的长期的顽强斗争，这些汗国阻碍了俄罗斯的发展为时已经太久了。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殖民运动，其特点首先在于没有使用强大武力就把居民稀少的广大地区归并于强盛起来的俄罗斯国家。谢·弗·巴赫鲁申在他论述西伯利亚殖民史的著作中早已指出，在开发西伯利亚各地区的事业中，越向东去，政府的主动性所起作用越小，而民间自主的殖民活动所具意义越大。

在整个西伯利亚从乌拉尔山脉直到阿穆尔河和太平洋的开发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几小队哥萨克新土地发现者和务农的移民，他们以惊人的顽强精神在西伯利亚的广大幅员上向前推进，克服了层层困难。伟大的俄罗斯思想家和革命家赫尔岑把西伯利亚归并于俄罗斯称做几乎没有流血的征服。关于俄罗斯人开发西伯利亚的英勇精神，他写道：“一些哥萨克人和几百个无家可归的庄稼汉心甘情愿冒着风险越过了海洋般的冰天雪地，凡在一小伙疲倦的人们定居下来的地方，在被大自然遗忘的冰冻草原上，生活

就沸腾起来，原野到处是耕地和畜群，从彼尔姆直到太平洋都是这样……”^①

沙皇的行政机关也继移民之后来到西伯利亚，城市建立起来了；沙皇的将军们^②率领着军职人员^③的部队屯驻在这些城市里，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定居在这些城市里。于是不久前还是半荒无人烟的土地变成了封建俄罗斯国家的一些完全宜于生活的地区。

劳动居民——农民、哥萨克人、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即使远在西伯利亚，还是遭遇到以沙皇政府、将军、官吏、商人和僧侣为代表的封建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西伯利亚各部族，即西伯利亚土著（正式的名称是“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外国人”），则遭受到封建俄罗斯国家的民族压迫。被俄罗斯征服的西伯利亚各部落的上层分子，与基本群众比起来是享有特权的。

新的俄罗斯城市和城堡出现的历史，证明了十七世纪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的迅速的不停的推进。

在十七世纪前半期，开始建立了下列城堡：托姆斯克（1604）、叶尼塞斯克（1617）、库兹涅茨克（1618）、马克夫斯克堡（1618），建成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1628）、雷宾斯克堡（1628）、伊利姆斯克（1630）、坎斯克堡和乌斯季库特斯克堡。

1631年在安加拉河的支流靠近帕东急滩建立了勃腊次克堡。1632年，哥萨克的百人长别克托夫在勒拿河中游建立了雅库次克，这座城在1642年大加扩充，很快变成西伯利亚的大城市。从这时起，雅库次克就成为俄罗斯部队前往阿穆尔河一带和鄂霍次

① 亚·伊·赫尔岑：《警钟》，1859年1月1日，第32期。

② 这些将军（воевода）总揽所辖地区的军政大权，是该地区的最高长官。
——译者

③ 军职人员（служилые люди），指十五至十七世纪在俄罗斯国家服兵役的人，他们通常都在服役的条件下领有土地。军职人员大部分是小贵族地主，也包括火枪兵、炮兵、部分哥萨克军人等。

克海的主要根据地。

俄罗斯对外贝加尔地区、鄂霍次克海沿岸和阿穆尔河流域的殖民,无论在具体实行上或在历史意义上,其性质都与对整个西伯利亚的殖民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区别。沙皇政府对东西伯利亚的政策实质上跟对西西伯利亚一样,首先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俄罗斯在十七世纪在东西伯利亚的殖民是利用西伯利亚的城市和城堡来实行的。西伯利亚的将军和总管^①们根据沙皇的“尽量为君主谋取利益”的训令,派遣了军职人员的队伍去“探查新土地,使更多的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外国人归附于君主的最高统治之下。”^②这些通常都是人数不多的一队队勇于进取的哥萨克和义勇兵,即“志愿人员”,他们从塔拉、秋明、托波尔斯克、托木斯克、叶尼塞斯克、雅库次克等城市被派遣出去,在几十年之间,使分布在从鄂毕河到叶尼塞河,从叶尼塞河到勒拿河,更从勒拿河直到贝加尔湖、阿穆尔河、鄂霍次克海以及太平洋沿岸这一大片地区的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诸部落都归顺了俄罗斯。

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城市和城堡的建设仍继续进行着。

1648年在贝加尔湖附近建成了巴尔古津堡,1651年建立伊尔库次克;1652年建成了巴拉干斯克堡,1654年阿仿纳西·帕什科夫在石勒喀河的支流建立了尼布楚^③。从1658年起,尼布楚成为独立的将军辖区的中心和俄罗斯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施加影响的主要根据地。于是所有在阿穆尔河流域和外贝加尔地区建立的城堡,如库马尔斯克堡(1652)、土古尔斯克堡(1653)、阿尔巴津堡(1654)、捷列姆宾斯克堡(1659)、色楞格斯克堡(1666)、上结雅

① 总管(приказчик)是将军属下的地方官。——译者

② 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25卷(这是许多张纸连接成长条卷起来的,只写一面。——译者),第1、2张。

③ 俄文名称是“涅尔琴斯克”。——译者

堡(1678)、多伦斯克堡以及许许多多新垦地、过冬地、自由村和乡村,都以尼布楚为中心了。

俄罗斯的军职人员在西伯利亚的迅速推进中有时遇到了当地居民的反抗。

但是,西伯利亚诸部落自愿合并于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现象则是更带典型性质的,因为俄罗斯国家能够保护人数不多的当地居民抵抗蒙古和满洲诸汗的侵袭。

十七世纪阿穆尔河流域的居民

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合并于俄罗斯以前的历史,也跟整个东西伯利亚的历史一样,直到目前还研究得很不够。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资料还没有充分加以系统的整理。关于这个边区过去时代的文字记载保存得不多。不过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材料,仍然使我们可以把阿穆尔地区诸部落在俄罗斯哥萨克到达他们那里以前的生活描绘出一幅有几分概括性的、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图景。在我们的研究中,关于俄罗斯以前时期的阿穆尔河沿岸居民的资料,其主要来源是瓦·波亚尔科夫、叶·哈巴罗夫、奥·斯捷潘诺夫以及在1653年以前,即在阿穆尔河沿岸一部分居民被清朝军队以武力驱往满洲以前到过阿穆尔河的其他俄罗斯人的报道。

关于阿穆尔河及其富源的最初资料,俄罗斯人是在于1636年从居住在勒拿河支流阿尔丹河一带的鄂温克人那里获得的。

1636年,托木斯克的哥萨克在阿尔丹河上建成了布塔尔斯克堡(距阿尔丹河口一百俄里),这个堡的总管托木斯克的大贵族之子^①德米特里·科培洛夫初次向鄂温克人的拉拉吉尔各氏族索取毛皮实物税,并扣留一个名叫托姆可尼的酋长为质。这个酋长报告

^① 地方小贵族的称号。——译者

俄罗斯人说，靠海^①地方有个契尔科尔河，两岸住有许多种庄稼的定居人民。托姆可尼还说，这条河附近有山，山中出产银子。这个酋长及其亲属肯定说，他们自己不止一次到那里去过，一切都是亲眼看见的。根据这个消息，总管科培洛夫于1638年派托姆斯克的哥萨克五十人长伊凡·尤里之子—莫斯科维京率领一支由三十名哥萨克组成的队伍从布塔尔斯克堡前往这个海和契尔科尔河，并命令他们切实探查这条河附近有无银矿，能否使当地居民归顺俄罗斯。^②

伊凡·莫斯科维京的队伍从布塔尔斯克堡出发沿着水路去寻觅新土地和银矿。哥萨克们乘平底大木船沿马亚河向上游航行到较小的尤多马河之后，就抛弃沉重的大木船，建造了两只轻便的平底小木船，乘着它们沿尤多马河航行到它的上游。最后连小木船也只得放弃。哥萨克们征服了朱格朱尔山脉的山隘，好不容易才到达乌利亚河。从乌利亚河就又乘小船顺流而下了。

1639年，哥萨克们在离乌利亚河注入鄂霍次克海不远的地方建立了过冬地，以便在冬季里勘测地势，建造航海用的船只。伊凡·莫斯科维京把十名哥萨克留在过冬地，自己率领另外二十名哥萨克乘小船出海向北航行，然后进入奥霍塔河口。在这里，哥萨克们在冬天到春天这段期间曾努力使鄂温克人归附于俄罗斯，但没有成功。1639年春天，莫斯科维京的队伍，除与鄂温克人作战牺牲的九名哥萨克外，全部乘坐冬天所造的两艘船重新出海，这次是从乌利亚河口贴近海岸向南航行。俄罗斯人到达了尼福赫人^③居住的珊塔尔群岛，看到群岛上“炊烟四起”，但未敢下船登岸，因为岛上居民众多，而哥萨克们“为饥饿所迫，已开始以草充饥

① 指鄂霍次克海。——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即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以下同。——译者），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25卷，第2、9张。

③ 尼福赫人（нивхи）即费雅喀人。——译者

了。^①哥萨克们由于饥饿的缘故，不久就不得不离开珊塔尔群岛向后转弯，进入最近一条小河的河口。在这里，他们捉住几个鄂温克人，从他们口中获悉，过了珊塔尔群岛就是阿穆尔河入海之处，沿阿穆尔河居住着那脱吉人，他们是定居在村落中的。据鄂温克人说，那脱吉人也有俄罗斯人所住的那种木头小房子，但他们自己不种庄稼。^②

鄂温克人又告诉哥萨克们，在阿穆尔河沿岸比那脱吉人更靠上游的地方“居住着许多定居的和游牧的通古斯人，他们以捕貂为业，但没有耕地”。^③更往前走，在那座银矿山所在的地方，“沿契尔科尔河居住着许多定居的人民，他们耕种田地，饲养各种牲畜，使用弓和矛作战”。^④

两个在阿穆尔地区居民那里做过俘虏的鄂温克妇女报告说，常有大船载着商人从海上沿着阿穆尔河到开采白银的矿山来跟居民进行贸易。^⑤鄂温克人不知这些船只是属于什么国家的。

莫斯科维京的队伍在鄂温克人那里过了冬，向他们征收了四百八十张貂皮的贡赋，于是循着原路启程回去。1640年，莫斯科维京在韦尔霍连斯克堡呈交了所征收的貂皮，并出示鄂温克人作为服饰用的三个银环以及一口铜锅，证明阿穆尔地区有银矿和铜矿。

伊凡·莫斯科维京部队的托木斯克哥萨克，是到达鄂霍次克海沿岸和出现于太平洋上的第一批俄罗斯人和第一批欧洲人。

这次远征是十七世纪俄罗斯人在亚洲东部的地理发现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25卷，第2、9张。

② 同上，第10张。

③ 同上，第11张。

④ 同上。

⑤ 同上。

俄罗斯人遇到了从事狩猎的鄂温克人部落，这些部落不隶属于任何国家，并在俄罗斯人最初试图使他们归顺时进行了抵抗。军职人员在战胜了这种抵抗之后，就向鄂温克人的一些部落或以武力或以和平手段征收毛皮实物税。

伊凡·莫斯科维京探险队所搜集的资料后来证实是可靠的。1689年，费奥多尔·柯罗文^①将军驻尼布楚时曾派一支特别的军职人员队伍在拉甫连季·涅伊捷尔(涅伊德加尔特)率领下前往发现过银矿的地点，命令他们取回样品。涅伊捷尔完成了使命，他报告柯罗文说，银矿在额尔古纳河上游左方的地区被找到，那里有达呼尔地区^②的鄂温克人游牧站。涅伊捷尔特别提到，银矿蕴藏在大石头山中，那里有许多旧日的冶炼场，“显然以前这个银矿曾由某些外国人冶炼过。”^③

后来著名历史学家格·弗·米勒曾在额尔古纳河两岸发现并亲自考察了一些筑有工事的小古城和土墙的遗迹。在额尔古纳河两条支流根河和豪利河之间只有一座山，米勒在这座山的脚下看到了三百俄丈方圆的古代四角形防御工事遗迹——一人高的土墙和壕沟；土墙里是城堡，城堡中从前有木料的建筑物，也是四角形的。

此外，米勒还察看过额尔古纳河上游山地里的四个类似的防御工事。米勒注意到这里山岭虽然很多，但它们都有专门的名称，这表明有人们不知道的某种民族在这个地区长时间居住过。他认为，额尔古纳河和鄂嫩河^④之间以及石勒喀河沿岸有许多多坟丘，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在上述这些地方，米勒还看到古代的银矿场和铜矿场。^⑤

① 旧译费要多罗、费岳多罗。——译者

② 俄罗斯人对黑龙江沿岸地区的称呼。——译者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616张。

④ 昔称斡难河。——译者

⑤ 格·弗·米勒：《西伯利亚史》，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版，第513、519页。

其后的消息也证实莫斯科维京关于阿穆尔地区有居民的报告是可靠的。

最初，莫斯科维京探险队远征的结果并没有引起西伯利亚当局的注意。但在1645年，托木斯克来了一位新的将军奥西普·伊凡诺维奇·谢尔巴迪亲王，他对伊凡·莫斯科维京的远征大感兴趣。将军搜集了关于这次远征的详细材料以后，曾向伊凡·莫斯科维京征询意见，问他如果需要派新的探险队去征服富于银矿和耕地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军队的数量和装备应该怎样。^①将军也注意到探险队可能采取的路线。

莫斯科维京提出了征服阿穆尔地区的十分详尽的计划。他认为实行这个计划至少需要一千名军职人员和同样数目的义勇兵（志愿人员），应当发给他们长火绳枪，每人半普特^②火药和铅弹。

他认为要有所成就，必须给军队配备十尊二普特重的速射小炮（以便在通过连水陆路^③时能够徒手把它们搬运过去）和建造船只用的必需品以及缆绳、渔具。军队应有旗帜和军鼓，用以威吓阿穆尔地区的居民。^④

莫斯科维京认为军队应当集中于叶尼塞斯克，因为那里有通向阿穆尔河沿岸各地的最便利的道路。^⑤但是莫斯科维京的建议没有实现。相距遥远的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将军们对寻觅新土地这一类的行动彼此很少互相配合。有时这是地方行政长官竞争的表现，因为沙皇恩赐只赏给最勤劳的将军。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莫斯科维京计划的实现。等到他在莫斯科知名的时候，以瓦西里·波亚尔科夫为首的雅库次克军职人员的阿穆尔河探险队已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25卷，第14—15张。

② 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

③ 两道隔开的水路之间可以把船只拖过去的陆地。——译者

④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25卷，第17—18张。

⑤ 同上，第18张。

经组成了。波亚尔科夫是富于进取心的雅库次克将军彼得·柯罗文所派，他利用了伊凡·莫斯科维京及其同行诸人关于旅行结果的报告。同时叶尼塞斯克的哥萨克马克西姆·佩尔菲利耶夫也向雅库次克将军报告了关于阿穆尔河的消息，他曾到贝加尔湖去打猎，对阿穆尔河上游的情况知道得很多。

1643年7月，瓦西里·波亚尔科夫率同一百三十二名哥萨克和志愿人员乘坐划桨的船只动身去征服居住在阿穆尔地区的部落。探险队装备有一些火绳枪、一尊炮、一百枚圆形炮弹以及十六普特火药和铅弹。^①波亚尔科夫奉有将军的训令，其中说明他的远征目的是向阿穆尔地区居民征收毛皮实物税和寻觅银矿、铅矿和铜矿。

波亚尔科夫沿着勒拿河、阿尔丹河、乌楚尔河、戈诺姆河（这条河有四十二处急流和二十二处浅滩）以及纽叶姆卡河航行，到了纽叶姆卡河，俄罗斯人就只好在那里过冬了。1644年春天，波亚尔科夫翻过斯塔诺夫山脉^②，经过勃良塔河到结雅河^③，然后顺流而下。根据波亚尔科夫的报告，勃良塔河两岸几乎没有人烟，只有它的河口附近才居住着养鹿的鄂温克人。^④结雅河另外一些支流的沿岸有极少数从事畜牧的鄂温克居民。^⑤巨大的乌姆列坎河差不多也是渺无人烟的，只有它的河口居住着鄂温克人和以酋长多普狄乌尔为首的一族种田的达呼尔人。达呼尔人殷勤地接待了俄罗斯人，并供给他们食品。

探险队留在这里过冬。为了保证过冬的食粮，波亚尔科夫派他的一部分人在叶菲姆·彼得罗夫率领下到居住在谢利姆巴河口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12号，第50—60页。

② 即外兴安岭，旧称石头山或石大兴安岭。——译者

③ 旧称精奇里江。——译者

④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12号，第51页。

⑤ 同上。

附近的达呼尔人那里去。

达呼尔人的酋长多西依和科尔帕亲自出来迎接俄罗斯人，供给他们四十筐燕麦粒，但是不愿让他们进入自己的设防小城莫尔吉基吉奇。可是俄罗斯人在察看该城时悄悄地进入了城里，因而在那里受到“许多骑马的和徒步的兀鲁思^①人的袭击”。达呼尔人打伤了十个俄罗斯人，把彼得罗夫的队伍赶出了自己的城堡。由于叶菲姆·彼得罗夫的这一错误，波亚尔科夫的部队整整饿了一个冬天，结果死掉四十人，幸存者甚至不得不以死者的尸体充饥。^②春天，波亚尔科夫开始沿着结雅河航行，路过拥有耕地的高勾丽人^③和达呼尔人的村落。俄罗斯人探听到阿穆尔河沿岸“生长六种谷物：大麦、燕麦、黍类、荞麦、豌豆、大麻，而且……生长蔬菜、黄瓜、罂粟、蚕豆、大蒜、苹果、梨、核桃……”^④

当俄罗斯人抵达松花江河口时，他们的先遣侦察队被久契尔人所消灭。但波亚尔科夫仍然越过了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的地区抵达阿穆尔河河口。接着俄罗斯人又经由鄂霍次克海航抵乌利亚河，并在乌利亚河河口度过他们的第三个冬天。为了返回雅库次克，波亚尔科夫决定找一条比到阿穆尔河来时更便利的道路。波亚尔科夫从乌利亚河按照莫斯科维京的队伍先前走过的道路航行，即沿着乌利亚河航行到它的上游，然后翻越斯塔诺夫山脉，通过连水陆路而达马亚河。然后再沿着马亚河、阿尔丹河和勒拿河航行。

1646年夏天，波亚尔科夫返抵雅库次克，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被俄罗斯人称为达呼尔地区的阿穆尔地区的初次可靠材料。照他的意见，俄罗斯用三百人的兵力就可以轻易地征服达呼

① 来源于蒙古语，在这里指氏族部落占有的地区。——译者

②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12号，第54页。

③ 高勾丽人(горун)即朝鲜人。——译者

④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55页。

尔地区。波亚尔科夫力称有占领这个富饶边区的必要，他说：“这将使君主获得很多利益，因为那些地方有人居住，盛产谷物和貂皮，有大量的各种野兽，生长许多谷物，河中鱼产丰富，君主的军队在那个地区绝不会有缺粮之虞”^①。俄罗斯人最注意的是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是否宜于发展俄国的农业，为的是使东西伯利亚摆脱经常的饥饿的威胁。波亚尔科夫带来的消息引起了西伯利亚许多俄罗斯居民对产粮区的强烈兴趣。

继波亚尔科夫之后，一支由七十名志愿人员组成的队伍在叶罗菲·哈巴罗夫率领下于1649年从雅库次克出发前往阿穆尔河。乌斯丘格农民出身的哈巴罗夫从家乡来到西伯利亚之后，已经发过几次财了。波亚尔科夫发现达呼尔地区之后，哈巴罗夫就带着与其同样老练而大胆的人们急忙赶到阿穆尔河去寻求新的幸福。

雅库次克将军德·弗兰茨别科夫按照沙皇训示他本人的精神给了哈巴罗夫一道命令。命令中指示哈巴罗夫这样来向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征收毛皮实物税：要使俄罗斯在阿穆尔河的权力成为持久的和固定的，但又不致成为缴纳毛皮实物税的新臣民的沉重负担，以免吓得他们不敢接近俄罗斯。指示中还建议不以武力，而用怀柔手段号召阿穆尔河居民归顺俄罗斯。^②

考虑到波亚尔科夫所经路线的困难，哈巴罗夫沿着另一条道路向达呼尔地区航行，这就是夏天取道勒拿河、奥廖克马河、土基尔河，冬天乘雪橇经连水陆路抵达阿穆尔河的支流乌尔卡河；1650年哈巴罗夫沿乌尔卡河抵达阿穆尔河，并开始努力以武力征服达呼尔地区的诸酋长国，使之缴纳毛皮实物税。不久发现粮食和弹药不足了。哈巴罗夫把队伍交给奥努夫里伊·斯捷潘诺夫指挥，自己则启程回雅库次克去补充新的力量，于1651年带了一百十七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12号，第57页。

② 同上，第102号，第359—371页。

名志愿人员到达呼尔地区来。哈巴罗夫率领这支队伍继续征服阿穆尔地区,并占据了达呼尔的一些居民点。

哈巴罗夫在达呼尔的一座小城阿尔巴津筑好防御工事之后,就开始向达呼尔人、久契尔人和阿禅人^①征收毛皮实物税。

1651年哈巴罗夫到达达呼尔的一座小城托尔琴时,达呼尔的酋长托尔察和屠伦察向他声称,“博格德皇帝”的人已经向他们征收过毛皮实物税了,但现在达呼尔人将向俄罗斯沙皇缴纳毛皮实物税,他们说:“我们是达呼尔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有我们的氏族以及依附我们生活的人们,一千多张弓,我们大家现在都将服从和听命于你们的君主,我们自己也将缴纳毛皮实物税……”^②

1652年,阿穆尔河中游的达呼尔人向哈巴罗夫缴纳了毛皮实物税,^③沿谢烈姆扎河居住的达呼尔人和鄂温克人没有进行抵抗就从1646年开始向俄罗斯人缴纳毛皮实物税。^④1652年,达呼尔人的酋长屠伦察派遣使者到俄罗斯哥萨克部队的长官切奇金那里去,重申他以前所做他的兀鲁思的全体居民都要缴纳毛皮实物税的诺言。^⑤

但在其他若干地方,哈巴罗夫的部队同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发生了冲突。

例如,1652年,沿阿穆尔河居住的久契尔人拿起了武器迎击哈巴罗夫的队伍。被俘的久契尔人对哈巴罗夫说,他们的氏族不愿缴纳毛皮实物税,并将作战。^⑥

① 阿禅人(ачан)又称阿枪人,即赫哲族人。——译者

②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102号,第363页。

③ 同上,第101号,第356—359页。

④ 同上,第94号,第345—346页。弗·奥戈罗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海参崴1927年版,第36页。

⑤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12—1号,第50—56页。

⑥ 同上,第101号,第358—359页。

一个从松花江擒来的久契尔人向哈巴罗夫供说：中花江（即松花江）集结有大量军队来对付俄罗斯人，其中有许多“博格德的人”^①和久契尔人^②。准备斗争的久契尔人到满洲去求救。满洲军队开到阿穆尔河的消息不久证实了。配备有火绳枪和铜炮的大批满洲军队出其不意地进攻了俄罗斯人。这批军队是满洲总督乌楚尔瓦^③派到阿穆尔河来的，并命令俘虏俄罗斯人。哈巴罗夫击退了满洲人的进攻，但被迫从松花江口退回阿穆尔河，并派急使前往莫斯科报功和求援。哈巴罗夫写信给雅库次克的将军说，要长久占有阿穆尔河，必须派六千名俄罗斯哥萨克到这里来。在与满洲人发生冲突以后，哈巴罗夫沿阿穆尔河向上游航行，在呼玛尔河口建立了库马尔斯克堡，以便在那里等待援军。其实一支相当数量的援军已经派出：由切奇金率领的俄罗斯人新队伍于1652年从雅库次克抵达阿穆尔河，但不料这支队伍与哈巴罗夫途中相左，所以当哈巴罗夫修建库马尔斯克堡的时候，切奇金却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经过战斗抵达了阿穆尔河河口。这支队伍于1653年在土古尔河畔建立了城堡，在那里一面设防，一面向雅库次克请援。

根据波亚尔科夫、哈巴罗夫及其同伴波利亚科夫的报告，十七世纪前半期的阿穆尔河流域居住着许许多多部落：鄂温克人、那乃人、布里亚特人、达呼尔人、久契尔人、那脱吉人和尼福赫人。

所有这些部落在俄罗斯人来到之前占据着如下的地区：蒙古的畜牧和打猎部落居住在鄂嫩河沿岸地区以及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的上游；从事畜牧和打猎的鄂温克人居住在石勒喀河的整个流域，并在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两河之间游牧，直到两河的会合

① 即清朝的人。——译者

②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102号，第365—367页。

③ 在我国与此有关的记载中查不到这个人名，《平定罗刹方略》的记载是：“顺治九年（1652年），驻守宁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击之”，乌楚尔瓦是否即海色，待考。——译者

处；达呼尔人居住的地区是从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会合处起沿阿穆尔河左岸的沿河阶地，和到结雅河注入处为止的阿穆尔河盆地以及结雅河下游；沿着阿穆尔河直到松花江为止，邻接着达呼尔人居住的是久契尔人；往下邻接久契尔人沿阿穆尔河居住的是那乃人；邻接那乃人居住的是尼福赫人。^①

波亚尔科夫的探险队，哈巴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的哥萨克，注意到在语言和风俗上鄂温克人、蒙古人和达呼尔人一方面跟久契尔人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他们各自之间也有很大差别。俄罗斯人同时也注意到达呼尔人的语言与蒙古方言的相似点以及鄂温克部落和满洲部落语言上的某些相似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在生活方式和职业上的重大差别也被注意到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所有部落，在十七世纪中叶还保留着氏族制度，虽然它已经陷于解体。到十七世纪中叶，氏族关系解体程度最大的是务农的定居部落：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

根据波亚尔科夫和哈巴罗夫的资料，达呼尔人的整个地区分为十六个小酋长国，分别集聚在较大酋长国的周围。^②在石勒喀河附近，俄罗斯人首先熟识了达呼尔人的三个酋长国，酋长是拉夫卡依，希林格伊和吉尔杰加。拉夫卡依的酋长国比另外两个酋长国大，而且较强。拉夫卡依在阿穆尔河沿岸有五座环绕有壕沟和土墙的小城；小城周围是达呼尔人的兀鲁思，每一兀鲁思有几座帐篷。

这个酋长国境内特别宜于耕种田地，有良好的牧场。人口不

^① 勃·奥·多尔基赫：《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民族的迁徙》，载于《苏联人种志》1952年第3期，第80页。

^②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12号，第50—60页；第95号，第346—347页。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海参崴1927年版，第12—15页。

多，男丁将近三百人。^①五座设防的小城每一座都由拉夫卡依的助手——“小”酋长，即他的儿子和侄子，统领着。与拉夫卡依酋长国最邻近的两个酋长希林格伊和吉尔杰加，各自只有一座人口不多的小城。这两个酋长与拉夫卡依订有军事同盟，并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依附于他的地位。沿着阿穆尔河中游以及中游以下的狭长河谷地带，绵亘着另外九个达呼尔酋长的极小领地，九个达呼尔酋长是：达萨乌尔、楚伦察、古依古达尔、奥尔盖美兹、洛托吉依、班布拉依、叶玛尔达、善加孟、温达依。在这些酋长国的中心地区也有设防的小城，并有塔楼和城门，有时没有城门，而有地道出入口。

三个小酋长，即古依古达尔、奥尔盖美兹和洛托吉依，合起来只有一千左右臣民。^②

在与这十二个达呼尔小酋长国还有相当距离的地方，即乌姆列坎河河口，夹在鄂温克人的一些氏族中间有一个特殊的酋长国，酋长为多普狄乌尔，这个“酋长国”一共只有十五个男子。

结雅河左岸还有酋长麦尔基希和酋长坚谢科的两个小小的达呼尔酋长国，他们的臣民当中一共只有一百左右男子。沿阿穆尔河下行，过了结雅河畔的这两个酋长国，还有达呼尔人的四个氏族（族长是别布拉，多西依，图尔昌，叶热古尔）与布里亚特人的一些氏族混居在一起，这四个氏族的男丁数目共为四十五人。其中小酋长多西依是人数最多的一族之长，被认为是“最优秀的”^③，其他几个小酋长都臣属于他。在达呼尔人居住区与久契尔人各部落交界的地方，居住着达呼尔的人数不多的高勾丽人氏族，男丁数目总共不到二百人。

① 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15页。《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12号，第50—60页；第95号，第346—347页。

② 同上。

③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12号，第50—60页。

久契尔人也有自己的酋长国和设防小城，小城周围分布着兀鲁思。所不同的只是达呼尔人居住的兀鲁思小些，而久契尔人的居住地区较大，“……每处有六十和六十多座帐篷”。^①

根据波亚尔科夫和哈巴罗夫的记述可以断定，久契尔人和达呼尔人大致处于同样的发展水平：他们的氏族关系已在解体，酋长的统治权成为世袭的，财产上有了不平等；懂得利用屈服的同族人和俘虏的劳动了。

如果把波亚尔科夫和哈巴罗夫关于十七世纪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所有酋长国的居民人数拿来同他们所占据的从石勒喀河直到乌苏里江这块地区的广大面积比较一下，那末这块地方的人口密度在俄罗斯人到来以前显然是很小的。同时，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也占人口的少数。大多数居民属于鄂温克人的各部落。

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看到的达呼尔部落和久契尔部落的农业技术，在那里已有悠久传统。

根据波亚尔科夫、哈巴罗夫和波利亚科夫的报告，^②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是用公牛驾着长柄的木犁耕田；耕种地段的面积不大，“……使用公牛不慌不忙地耕种，与俄罗斯人不同”。^③收割庄稼用小镰刀，庄稼保存在帐篷和地窖里。达呼尔人不会制造铁器。他们用粮食和毛皮向从中国运来铁器的蒙古人换取小镰刀。^④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只种“六种不同的作物：大麦、燕麦、黍类、大麻、荞麦、豌豆”^⑤，也就是（与黑麦、小麦比起来）只需要花费较少劳动

① 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17页。

②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12号，第56—60页。

③ 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27—33页。

④ 同上。

⑤ 《历史文献补编》，第4卷，第12号，第57页。

的作物。

弗·伊·顺科夫在分析俄罗斯最初一些阿穆尔河考察者的报道时十分公正地认为，“阿穆尔地区的农业在普及程度和技术水平上都大大落后于俄罗斯农业”^①。俄罗斯人想在阿穆尔河找到“大量耕地”的希望，证明不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十七世纪时，阿穆尔地区有着大量适于耕种的土地，但是已经开垦的耕地很少，而且都是一些面积较小的地段，分散在各处，彼此往往相隔很远。^②

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是用牧场的青草来饲养有角牲畜的。根据波利亚科夫的上述记载，可以明了，在俄罗斯人到来以前，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还不懂得割干草和储备过冬的饲料。

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自己的畜牧业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以粮食为交换品，向邻近的鄂温克人，布里亚特人和满洲人购买牲畜。^③除农业和畜牧业以外，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还从事于打猎和捕鱼。

俄罗斯人把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的方法同自己的方法加以对比之后，立刻发现他们的方法的原始性，因为“……他们每天从自己的帐篷出去打猎，用弓箭射击野兽，不会用其他方法”。^④

同俄罗斯人的农业、畜牧业以及其他行业相比，阿穆尔河沿岸居民（包括达呼尔人及久契尔人在内）的同样行业显然具有较原始的性质。同蒙古人、鄂温克人、布里亚特人的游牧（养鹿、畜牧）部落和属于古亚细亚系（那乃人、尼福赫人等等）的阿穆尔河渔业部

① 弗·伊·顺科夫：《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农业史纲》，莫斯科 1956 年版，第 23 页。

② 《历史文献补编》，第 3 卷，第 260 页。

③ 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 34 页。

④ 同上，第 36 页。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地区的俄罗斯猎人用特殊的鹿柵或柵栏，在其中设置放着食饵的陷阱，用猎狗来追捕，因此俄罗斯人打猎的收获无比丰富。

落相比，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的农业部落当然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

俄罗斯人从一开始深入到阿穆尔地区就非常关心这个地区居民的政治制度和国籍问题。波亚尔科夫询问了阿穆尔河沿岸居住着哪些民族，他们是否向什么人缴纳贡赋，对此达呼尔的酋长多普狄乌尔报告说，达呼尔人居住在结雅河和阿穆尔河一带，心目中只有他们各自的酋长国，跟他们相邻的是久契尔人，久契尔人有“自己的语言”，与达呼尔人的语言不同。据他说，这种部落耕种田地，他们没有银、铅、铜和丝绸，但是从博尔博依汗那里有种种金属品和丝制品运来。博尔博依汗居住在一座用圆木桩造的木城中，四周环绕着高高的土墙，“心目中只有其自己的汗国”。关于这个汗的情况，多普狄乌尔说，那是个“伟大的人”，统治着许多人，以武力强迫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向他缴纳贡赋，有时一年两次，有时一年三次。博尔博依汗的军队以弓为武器，甚至还有枪炮。达呼尔酋长肯定说，从乌姆列坎河（结雅河的支流）河口骑马前往博尔博依汗的木城，一个半月可到。这些资料后来也得到其他达呼尔人的证实。

可见，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在俄罗斯人来到阿穆尔河以前并没有臣属于任何一个邻近的国家。

多普狄乌尔关于心目中只有“汗国”的博尔博依酋长以及他的木城的详细报道，不能说指的是中国皇帝和北京城。^①多普狄乌尔提供的材料倒是符合于后来鄂温克酋长根忒木尔所说他统治着阿穆尔地区许多种田人的情况。

不妨假定，酋长多普狄乌尔向波亚尔科夫所讲的就是鄂温克人的酋长，他那座环绕着高大土墙的木城是位于额尔古纳河畔。伊凡·莫斯科维京早就从鄂温克人那里知道了这个存在于“银矿和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12号，第52页。

石山”附近的汗国，其后俄罗斯人除了发现熔炼银矿的许多遗迹以外，还发现了这座城及其周围土墙的遗迹。

可能是鄂温克人的诸酋长中有一个向阿穆尔河的农业居民征收贡赋，同时又用银器和用他的人从满洲商人那里买来的绸缎布匹同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进行居间贸易。

清朝皇帝向阿穆尔地区的进攻，是从十七世纪中叶，即俄罗斯人已在那里定居下来之后，才开始的。

因此，到十七世纪中叶，过去既不隶属于中国也不隶属于俄罗斯的、人数不多而零落分散的阿穆尔河各部落，现在成为两个强大国家的征服对象了。达呼尔人、鄂温克人、布里亚特人和久契尔人的一部分部落试图找个摆脱困境的出路，因而答应加入俄罗斯国籍，向沙皇的国库缴纳了毛皮实物税，另一部分部落，特别是松花江的久契尔人，因为哥萨克和志愿人员的粗野行为而对俄罗斯人发生了反感，所以对哥萨克队伍的活动进行了抵抗，并同满洲人结成了联盟。在这个地区中人数最多的鄂温克人的部落群归附了俄罗斯。

清政府对俄罗斯人征服与满洲毗连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并且定居下来的消息大为不安，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对抗俄罗斯人，并把他们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排挤出去和侵占这块地方。

清政府开始向满洲调集军队，修建城堡，以应付即将到来的与俄罗斯争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斗争。修建的军事要塞有：墨尔根，^①齐齐哈尔和宁古塔，后来又有阿穆尔河岸上的瑷珲。^②满洲人甚至采取了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强迫带到帝国内地去的手段。

在 1653 到 1655 年间，满洲军队遵照清政府命令强制农业居

^① 今嫩江县。——译者

^② 关于十七世纪后半期修筑墨尔根、齐齐哈尔之事，中国历史学家魏源曾有记载。参看弗·普·瓦西利耶夫所著：《中国文选第一卷注释》中的《帝国的来源》，圣彼得堡 1896 年版，第 112、117—131 页。

民，即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从阿穆尔河移往满洲居住。^①

1656年，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向尼布楚报告说，他从隐藏在森林中的“为数不多的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那里获悉，“……博格德皇帝下令把外国的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从阿穆尔河和松花江河口移往博格德自己的领土瑚尔哈河^②，（即移往松花江上游）……博格德皇帝的将军沙尔呼达^③纵火焚烧和彻底毁坏了他们的财物和帐篷”。^④清政府强制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从阿穆尔河迁移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想使俄罗斯人失去当地的食粮供应，利用饥饿的威胁迫使他们撤离阿穆尔河沿岸地区。

在迁移时，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的农业遭到满洲人的劫掠和破坏，田园荒芜无人过问，村镇被摧毁。后来，俄罗斯移民把那里的农业复兴起来，并把它发展到更高的新阶段。

清朝军队在开始迁移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时，利用了在这些部落中还相当牢固的旧的氏族关系：满洲人捉住部落的贵族，借以迫使整个部落遵照清朝将军们的命令迁移。

满洲当局把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分别安置在满洲北部和松花江支流的嫩江河谷地区。尽管某一部分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逃避了迁移，仍然留在阿穆尔河并隶属于俄罗斯人，但清人终究在短期内做到迁走了颇大数量的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有资料表明，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在1656、1669、1670年向俄罗斯人缴纳过毛皮实物税。^⑤留在阿穆尔河的鄂温克人、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向哥萨克们说明了俄罗斯人忽然见不到达呼尔人居住区及其居民的原因。^⑥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4卷，第31号，第80—83页。

② 现在的牡丹江下游的旧称。——译者

③ 沙尔呼达是宁古塔都统，见《平定罗刹方略》。——译者

④ 《历史文献补编》，第4卷，第31号，第80—83页。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
《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23页。

⑤ 《历史文献补编》，第4卷，第80—83页。

⑥ 同上。

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的迁移，给阿穆尔河沿岸的俄罗斯哥萨克造成了食粮供应的困难，特别是在俄罗斯人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田地耕种到够用程度的第一个夏天。

如果认为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迁往满洲的事实是对俄罗斯人的征服的抗议，那是绝对不正确的。

通常当地居民，甚至流动性最大的居民，即从事于游牧和畜牧的居民，也不会自愿地离开自己的故土。尤其难以想象定居于阿穆尔地区的农业居民会自愿离去。人所共知，这种居民是好像用最牢固的枷锁钉在土地上的。

这次移民是清政府用来制止俄罗斯人征服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一个军事手段，这个手段对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的经济和命运发生了致命的影响。

满洲人的清朝发动对俄罗斯的斗争来夺取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绝不是企图自己向这块地方移民和殖民。完全相反，它是想使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成为一片荒漠之地，以便与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对满洲和中国居民的影响隔绝开来。

为了澄清与十七世纪俄罗斯和清帝国对阿穆尔地区的领土争论有关的各种问题，俄罗斯档案中现存关于鄂温克的氏族酋长根忒木尔的历史材料是令人颇感兴趣的。这些材料证实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不属于清帝国的结论。此外，这些文件还重新阐明了清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关于根忒木尔氏族的国籍的长期争论的实质。

很久以来历史家们就关心清政府为什么在十七世纪几乎整个后半期内坚持不懈地要求俄罗斯把根忒木尔酋长及其氏族交给中国。^①关于这一点清廷代表解释说，根忒木尔是中国的博格德汗的

^① 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外交文件汇编》，喀山 1882 年版，第 14—18、21—23、28、45、51 页；赫·特鲁谢维奇：《俄国同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莫斯科 1882 年版，第 21—23、26—29 页。

臣民，得到汗的信赖和宠爱，担任着高级官职，但后来背叛了中国，从嫩江逃往俄罗斯领域的石勒喀河。关于清廷渴望俄罗斯交出根忒木尔的原因，某些俄罗斯历史学家除了采取清朝外交官的这种官方说法以外，还补充了这样的推测，即清政府顾虑根忒木尔是否会向俄罗斯泄露帝国的国家和军事机密。^①此外也必须提到，根忒木尔和他的整个氏族都很认真地以最上等的貂皮缴纳毛皮实物税，因此俄罗斯人非常重视这样能干的猎人，不愿把根忒木尔交给中国。其实，从下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根忒木尔的历史是远更复杂的。

根忒木尔酋长本人在1683年回答叶尼塞斯克将军对他过去历史的询问时说，过去，即入俄罗斯国籍以前，他“没有因缴纳毛皮实物税而隶属于任何人，他没有向任何人缴纳过毛皮实物税，他，根忒木尔，在这以前居住在伟大的石勒喀河沿岸的达呼尔地区，他统治着许多达呼尔种田人，那些达呼尔人向他，根忒木尔，缴纳毛皮实物税，为他，根忒木尔，耕种田地，由于根忒木尔人少，中国的博格德汗夺去了他的那些种田人”。^②这个事件的发生不会早于1653年。与清人发生冲突后，根忒木尔就求助于俄罗斯人了。

关于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号召他加入俄罗斯国籍的问题，根忒木尔的回答是，三十年前，即1653—1654年^③由叶尼塞斯克的哥萨克十人长库兹玛·费奥多罗夫号召他加入俄罗斯国籍的，从那时起他就按时缴纳毛皮实物税，直到伊拉里昂·托尔布津将军因

① 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版，第14—18、21—23、28、45、51页；赫·特鲁谢维奇：《俄国同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莫斯科1882年版，第21—23、26—29页。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1355卷，第1部分，第61张。

③ 但尼布楚将军达尼拉·阿尔申斯基的一份报告中说，根忒木尔是在1667年加入俄罗斯国籍的（参看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的尼布楚档案，第3号）。

他年老免除他缴纳为止。^①

奉命陪着年老的酋长根忒木尔前往莫斯科的尼布楚老居民伊格纳季·米洛万诺夫说，“在很多年以前，那时达呼尔的城堡还不属于大君主，军职人员就已经从贝加尔湖的巴尔古津堡前往达呼尔地区的涅尔查河^②，到他，根忒木尔酋长的兀鲁思那里去征收貂皮贡赋了。他，根忒木尔并没有人质就自愿地把自己的以及他的氏族和全体兀鲁思人的貂皮贡赋，每人五张、三张、二张、一张不等，送往贝加尔湖畔的巴尔古津堡，缴给那些军职人员。他的氏族和兀鲁思人共约五百人”。^③米洛万诺夫接着又说，阿法纳西·帕什科夫将军率领军职人员的部队从叶尼塞斯克来到达呼尔地区建立了尼布楚堡，并开始向附近的“……心目中只有其自己那块小天地，而不向大君主缴纳毛皮实物税”的部落征收毛皮实物税。那时，根忒木尔酋长“和他的全体兀鲁思人对君主的战士一点没有抗拒，并且加入了大君主的国籍，开始自愿地缴纳毛皮实物税。从那时（1654—1655年——作者）起到今天（1683年——作者）为止，每年都把毛皮实物税全部缴清，毫不玩忽”。^④“去年他叩求施行洗礼，并且受了洗，他受洗时的见证人是伊凡·伏拉索夫将军”。^⑤

从这些材料可以得出结论，在俄罗斯人伸入阿穆尔地区以前，酋长根忒木尔不仅统辖着打猎的鄂温克部落，而且统辖着定居的达呼尔居民。根忒木尔率直地指出，他的领地是在“伟大的石勒喀河流域的达呼尔地区”，这就是说，直接说来就在阿穆尔地区。后来中国的博格德汗从根忒木尔手中夺去了他的定居臣民，即“达呼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1355卷，第1部分，第59—61张。

② 涅尔查河（Нерца, р.）即尼布楚河。——译者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1355卷，第1部分，第133张。

④ 同上，第133—137张。

⑤ 同上，第64张。

尔的种田人”。既然当波亚尔科夫到达阿穆尔河的时候，那里还不存在清朝的政权，那末多半可以认为，正是清朝在 1653—1655 年间强迫居民从阿穆尔河迁往嫩江，从而使根忒木尔失去了他的达呼尔臣民。根忒木尔本人欢迎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的出现，力求与俄罗斯人友好相处。在阿穆尔河居民迁往嫩江以后，根忒木尔以及他的氏族和兀鲁思就不听命于清朝皇帝了。他返回阿穆尔河上游和石勒喀河沿岸的自己的领地。

伊格纳季·米洛万诺夫所说，早在达呼尔地区属于俄罗斯之前，即在 1650—1655 年以前，军职人员的部队就已经从巴尔古津堡到石勒喀河流域去寻找新的纳贡者，是值得注意的。那时涅尔查河地区是根忒木尔酋长的兀鲁思，他不愿同俄罗斯人发生纠纷。他自愿地向俄罗斯人缴纳了貂皮贡赋。在清朝把一部分阿穆尔河居民移往满洲(1653—1655 年)和俄罗斯建立了尼布楚堡(1654 年)以后，根忒木尔酋长不能再保持独立了，因而承认自己是向俄罗斯缴纳贡赋的臣民。从米洛万诺夫的报告来看，这是尼布楚建成以后不久的事，也就是说，最早也在 1655 年，根忒木尔本人说加入俄罗斯国籍就是在这个时候。^①

但在 1667 年以前，根忒木尔作为一个游牧者，显然同他那些被移往嫩江的臣民也没有断绝联系；很可能他也竭力同中国当局发生纠纷，并且被认为也是中国的臣民。在清朝皇帝命令根忒木尔率同他的军队在库马尔斯克堡附近对俄罗斯人作战后，双重国籍就变成不可能的了。根忒木尔选择了关系比较亲密的一方，

^① 根忒木尔肯定说，他是在 1655 年前后加入俄罗斯国籍的(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 1355 卷，第 1 部分，第 59—61 张)。尼布楚将军达尼拉·阿尔申斯基在他 1670 年写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说，根忒木尔是在 1667 年，即他的前任伊拉里昂·托尔布津时期，加入俄罗斯国籍的(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即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以下同。——译者]，尼布楚档案，第 3 号和中国事务档案，第 3 号，第 15 张)。阿尔申斯基可能是凭着记忆或是根据军职人员所说而提供这项资料的。

于 1667 年完全离开嫩江，公开与清朝永远断绝了关系。

清政府对根忒木尔加入俄罗斯国籍一事的不满，清当局屡次以武力、狡计和慷慨诺言吸引根忒木尔到自己方面来的企图，证明北京方面承认阿穆尔地区的巨大权利是属于根忒木尔的，因而顾虑他对被驱往满洲的阿穆尔河居民的影响。^①因此，清当局不仅在他投奔俄罗斯的初期，而且直到尼布楚条约缔结之前，始终要求俄罗斯人交出根忒木尔和他的氏族。^②即使根忒木尔向俄罗斯泄露了清帝国的某些秘密情报，可是在他作为俄罗斯臣民过了几十年之后，时间本身就使这些秘密失去意义了。如果根忒木尔只因为是一个优秀猎人而值得清朝注意他，那末他们不会在 1682 年当他已经是一个老头子时还要求把他交出来。这样一种意见的正确性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即根忒木尔所以引起清政府的注意，首先是因为沙皇俄国和清帝国在十七世纪后半期的斗争是由阿穆尔河一带的土地所引起，而他是这些土地的领主。

为了提出对达呼尔地区的要求，清廷外交代表团在 1689 年甚至提出了这样一点作为理由：那些地方的酋长们“现在还在”中国生活着。俄罗斯人拒绝了这个要求，声称不能根据背叛分子来确定土地的所有权，这种分子在俄国也是不乏其人的。

如果尼布楚条约关于划分国土的条件决定于这些地区过去占有者的权利，那末俄罗斯当然有充分理由要求承认阿穆尔河是属于它的，因为这些地区的过去占有者已经成为自愿听命于俄罗斯的臣民。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清廷外交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不再提起根忒木尔。^③沙皇俄国方面在由阿穆尔地区所引起

① 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外交文件汇编》，第 14—18 页、21—23 页、45—51 页；赫·特鲁谢维奇：《俄国同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第 21—23 页、26—29 页。

② 同上。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 1355 卷，第 1 部分，第 61 张。

的爭论中并没有做利用根忒木尔會长的尝试。

但是，为了把当地的贵族和缴纳贡賦的新臣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俄罗斯政府在根忒木尔事件发生以后对他和他的氏族给予了十分特殊的待遇。作为特殊的宠幸，根忒木尔以及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在 1682 年）被准许到莫斯科来觐见沙皇。这次长途跋涉所需要的一切，都由沙皇国库供给根忒木尔。^①年老的根忒木尔會長死于途中，殡仪是很光采的。他的儿子帕维尔·根忒木洛夫在莫斯科所获荣耀远过于其他部落的受洗的鞑靼小贵族，按照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敕令，对这些小贵族只是每人賜给十卢布、一段呢绒和一段塔夫绸而已。^②帕维尔·根忒木洛夫被准许吻沙皇的手，这被认为是恩宠特深的表示。^③他获得了价值四十一卢布的公家衣服；由武器库发给他两把贵重的军刀，一杆矛枪和两副铠甲。政府封帕维尔·根忒木洛夫为莫斯科小贵族，年俸三十卢布、六十俄石粮食和六普特食盐。此外还命令尼布楚将军以公款在尼布楚为帕维尔·根忒木洛夫建造上等的住宅和庄院。^④其后又下令免收根忒木尔全族的贡賦，把帕维尔·根忒木洛夫和他的儿子切库拉依-瓦西里列入會長名册。^⑤尼布楚将军还奉到指示，必须使會長帕维尔·根忒木洛夫得到这样的待遇，即“对他保持礼貌，不让他受到任何人的丝毫欺侮，不让他纳税，不让他蒙受任何耻辱”。^⑥所有这些都执行了，因而对吸引更多的缴纳毛皮实物稅者加入俄罗斯国籍起了一定的作用。

① 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在叙述尼·格·斯帕法里（即我国史籍中的尼果赖，亦作尼果贵或尼果来。——译者）前往中国所经的路线时，曾把加齐木尔河称为“根忒木尔河”。见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的《外交文件汇编》，第 27 页。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 1355 卷，第 1 部分，第 106 张。

③ 同上，第 74 张。

④ 同上，第 427 卷，第 1 部分，第 53 张。

⑤ 同上，第 2 部分，第 267 张。

⑥ 同上。

波亚尔科夫和哈巴罗夫关于阿穆尔河富源的报告在莫斯科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和兴趣。沙皇阿列克谢显然很想借助于军队把自己在阿穆尔河的统治权巩固起来。

1652年，伊·伊·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奉命做率领军队三千前往阿穆尔河的准备。韦尔霍图尔斯克的将军接到了为这支军队造船八十只的命令。^①为了更清楚地知道关于阿穆尔河的消息，谨慎的沙皇在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出发之前又急忙派遣莫斯科小贵族德米特利·齐诺维耶夫率领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前往阿穆尔河，命令他不断地详细报告关于达呼尔地区的一切新消息。^②

德米特利·齐诺维耶夫本来有责任对伊·伊·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远征的准备工作进行检查。在赴阿穆尔地区途中，齐诺维耶夫发现，农民听说这个边区资源丰富以后纷纷力图离开西伯利亚到新地方去。甚至本应在伊利姆斯克连水陆路为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部队建造船只的木工也擅自逃往那里。许多农民与木工一同从勒拿河开了小差。这个农民到阿穆尔河去的运动吓坏了沙皇的行政当局。于是将军们就以武力阻止擅自行动的移民了。德米特利·齐诺维耶夫于1653年抵达阿穆尔河，在结雅河河口遇到了哈巴罗夫，把因他征服阿穆尔河有功而颁发的沙皇金质奖章授给了他。齐诺维耶夫指示哥萨克在阿穆尔地区开辟耕地，在结雅河河口、乌尔卡河河口以及达呼尔的阿尔巴扎酋长的小城所在地建立城堡，然后返回莫斯科，并把哈巴罗夫带回。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留下来充当他那五百人队伍的队长。

根据哈巴罗夫的陈述和齐诺维耶夫的报告，莫斯科方面第一次获悉清朝的博格德汗对阿穆尔河有野心，甚至派了军队到那里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427卷，第1部分，第53张。

② 同上，第2部分，第267张。

去。在莫斯科，对中国这个国家和它的潜力还没有实际的认识，但在对阿穆尔河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显然考虑到了这些消息。

可是俄罗斯实际上不可能积极推行它对阿穆尔地区的政策。因为那时国家西部边境所出现的局势对这是不利的。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重新合并引起了对波兰的持久战争；与土耳其和瑞典的关系日益尖锐化。这种情况要求把国家的军用物资和经济富源大大集中起来，并把颇大数量的军队集中于西方和南方。因此，伊·伊·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远征没有实现。^①

但是俄罗斯政府仍然严密注视着“达呼尔人”那里的情况，并且一再向它的将军们发出坚定的指示：以和平手段把阿穆尔河掌握在俄罗斯手里。

1654年，叶尼塞斯克将军阿法纳西·帕什科夫奉命率领三百名军职人员前往外贝加尔地区，“并在达呼尔地区遵照敕令办君主的事”：在新合并的地区修建城堡和开辟耕地，并以“怀柔”手段吸引达呼尔居民加入俄罗斯国籍。^②沙皇阿列克谢亲自做出了以“怀柔”手段对待“达呼尔人”的范例。当1654年德米特利·齐诺维耶夫把阿穆尔河上的尼福赫人和达呼尔人的七名俘虏带到莫斯科时，沙皇正在他的设在维亚兹马的作战大本营，但是仍然从那里送来一道特别训令：“从德米特利手中把达呼尔的外国人接过来，安置在适当的庄院，给他们每人十卢布的沙皇赏赐，每人每天十坚加^③伙食费”。^④后来沙皇又命令除供“伙食”以外，用公家大马车把“达呼尔人”送回他们的故乡，释放他们去见亲人。这一个别的

① 伊·伊·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于1653年奉派作为大使到波斯国王阿巴斯那里去了。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453卷，第43—46张。

③ 价值半戈比的铜币。——译者

④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453卷，第43—46张。

事例表现了沙皇政策的典型特点，其目的就是要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居民中间树立威信。

就在那时候，阿法纳西·帕什科夫将军遵照训令从叶尼塞斯克抵达了阿穆尔河上游，并沿石勒喀河的支流建造了尼布楚堡，这个城堡不久以后成为整个俄罗斯达呼尔地区的行政中心，即成为被俄罗斯人合并过来并动手加以开发的外贝加尔和阿穆尔河沿岸一切地区的行政中心。除尼布楚而外，一队军职人员同时还遵照帕什科夫将军的命令在阿穆尔河左岸（大约在石勒喀河河口和结雅河河口两者的中间）建立了阿尔巴津堡，这个城堡后来成为阿穆尔河沿岸所有俄罗斯居民点的中心。^①阿尔巴津是阿穆尔河航线上的咽喉要地。

俄罗斯政府正跟波兰作战，所以不愿使因阿穆尔河而引起的武装冲突激烈起来，但同时也鼓励哥萨克以自己的力量抗击满洲军队的进攻。1655年，一封沙皇诏书送到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那里，其中赞扬了哥萨克的勇敢，表示沙皇的宠信，并重新提到必须对被引导到“君主统治下”的阿穆尔河流域各族人民多采取怀柔手段，少采取严厉手段，不要使他们负担过重的贡赋。诏书指示哥萨克们要保护阿穆尔河流域居民不受敌人的侵犯，但也不要和中国的博格德汗的臣民发生纠纷。^②

莫斯科方面既没有向阿穆尔河派遣援军，也没有运送火药和粮食。因此阿穆尔河的哥萨克正在挨饿，需要火药和铅弹。1658年夏，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的队伍在松花江被满洲军队所消灭。从这时起，阿穆尔河的贡赋收入就停止了。但俄罗斯人并没有离

^① 关于修建阿尔巴津的时间问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尤·巴尔捷涅夫认为阿尔巴津是哈巴罗夫建的（参看《俄罗斯文献》，1899年，第1卷，第306页）。谢·弗·巴赫鲁申说，阿尔巴津是尼基福尔·切尔尼戈夫斯基于1655年所建（参看《哥萨克在阿穆尔河上》，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20页）。

^② 《俄罗斯文献》，1899年，第1卷，第308页。

开阿穆尔河,而是开始了对它的经济开发。

俄罗斯对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的开发

东西伯利亚以其产量丰富的猎貂场所,以及银矿、铁矿、云母、硝石、矿物颜料和盐产地等种种天然富源吸引了俄罗斯。外贝加尔和阿穆尔河一带的广大地区是特别富庶的。

在十七世纪,石勒喀河流域、额尔古纳河流域以及阿穆尔河流域中上游这一片广大地区合起来被称为达呼尔地区。达呼尔地区的经济和行政是由尼布楚来管理的。尼布楚县本来只包括外贝加尔东部地区,即色楞格河、乌达河^①、涅尔查河、音果达河一带以及贝加尔湖东南沿岸。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与外贝加尔东部地区的一部分在十七世纪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这个边区在十七世纪中叶已经对俄罗斯有了很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因为这是个适于建立粮食供应基地的地区。

农民向西西伯利亚的移殖,到十七世纪末基本上解决了那里的粮食问题。但东西伯利亚则要由俄罗斯的索利卡姆斯克、卡伊戈罗德、维亚特卡、乌斯丘格、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威姆-亚连斯克、切尔登斯克诸县的黑耕农^②供应粮食。这种国家赋税和徭役的负担导致了北方沿海地区农民的破产和大批逃往西伯利亚。

饥饿常常使俄罗斯人开发人烟稀少的荒野边区的一切努力等于零:正是饥饿注定了斯捷潘诺夫和哈巴罗夫的部队 1658 年在阿穆尔河的失败和覆灭。

因此,俄罗斯行政当局和全体俄罗斯人不屈不挠地调查在东西伯利亚建立当地的粮食基地的可能性。最初几批俄罗斯队伍到阿穆尔河去,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听到缴纳毛皮实物税的鄂温克人

① 这条乌达河(Уда, р.)是色楞格河右岸支流。——译者

② 耕种皇地上地的农民。——译者

和蒙古人说,阿穆尔河是“粮食河”,那里可以发展农业。

沙皇政府在 1653 年派往阿穆尔河的第一个代表德米特利·齐诺维耶夫,不仅给哈巴罗夫的队伍运去备用的火药和铅弹,而且还运去了大镰刀、小镰刀、铁铧以及在阿穆尔地区创立俄罗斯农业所必需的一切物品。^①

军事行动不允许俄罗斯人在到达阿穆尔河的最初时期就致力于农业。俄罗斯人在十七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对阿穆尔地区不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手段以后,在向贝加尔湖以南和以西、色楞格河和乌达河两岸以及阿穆尔河上游的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流域各地进行殖民方面,取得了不小成就。俄罗斯人毫不懈怠地在新领地上寻找适宜于农业的地方。

在外贝加尔地区寻觅新土地并且定居于这些地方,主要是当地的军职人员和志愿人员所主动,莫斯科当局只是鼓励西伯利亚居民的这种行动,并没有给以实质上的物质援助。

在这方面,色楞格斯克的历史是有代表性的。1666 年,叶尼塞斯克的八十五名哥萨克和志愿人员在加夫里拉·洛夫佐夫率领下自己出资“在达呼尔地区附近,即边界地方”建造了色楞格斯克堡。在城堡附近建造了二十九座小木房,沿着色楞格河在城堡的下游地方开辟了耕地,找到了咸水湖,号召当地的鄂温克人和蒙古人缴纳毛皮实物税,向他们征收了三捆^②又十六张貂皮的贡赋。莫斯科接到关于这些情况的报告后,给色楞格斯克的建造者送来了奖赏:几年的沙皇薪给,铅弹和火药,并指示他们研究和记录可耕地和新建城堡附近的一切农业用地。还须查明,“……什么人在色楞格斯克附近游牧,从这个城堡到中国去大约有多少路程,通过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 4 卷,第 53 号,第 145 页。

② 四十张为一捆。——译者

什么途径，旱路或水路？”^①

1668年，大贵族之子伊凡·佩尔菲利耶夫从叶尼塞斯克奉派到色楞格斯克去，他记下了城堡和郊区，绘制了平面图。这些都加紧送往莫斯科。三年后，即1671年，色楞格斯克总管伊凡·波尔申尼科夫把“试种的谷物：小麦、大麦和燕麦”送往叶尼塞斯克，他报告说，在距离色楞格斯克不远的地方，哥萨克利用咸水湖的水用锅煮盐，并靠这些盐来“维持生活”。叶尼塞斯克将军基里尔·亚科夫列夫命令把盐从色楞格斯克送往伊尔库次克堡和安加拉河的（勃拉次克的）各堡，“给军职人员作每年应领的薪俸。”^②

同是在1671年，色楞格斯克向莫斯科送去了三捆又十一张貂皮的贡赋。亚科夫列夫将军报告说，可以把一百农户迁移到色楞格斯克附近去扩大那里的耕地。色楞格斯克人请求给他们增派军职人员，以抵御邻近的蒙古台沙^③对城堡的侵犯，这些台沙甚至还常到尼布楚堡附近去强迫俄罗斯的臣民鄂温克人向他们缴纳毛皮实物税。缴纳毛皮实物税的鄂温克人请求尼布楚将军防止“蒙加人”^④的迫害。将军在信里说，“……缴纳毛皮实物税者无人保护，因为我的三个城堡里的军职人员为数很少，一共只有四十六人，而且他们在这些城堡里为蒙加人围困着，饥饿得奄奄待毙了。”^⑤俄罗斯人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地位所以巩固起来，并不是由于增派了更多的军职人员，主要是由于农业移民人数的增加，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变成了军职人员，同时还由于当地的部落有一部分转到俄罗斯方面来。

在十七世纪的七十至八十年代，蒙古诸汗对俄罗斯诸堡的进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70卷，第1—2张。

② 同上，第4张。

③ 台沙(тайша)是封建时代蒙古的爵位，我国史籍中称“台吉”。——译者

④ 即蒙古人。——译者

⑤ 《历史文献补编》，第4卷，第133号，第327页。

攻变成经常的现象，因而在外贝加尔地区造成极其紧张的局势。1672年，叶尼塞斯克将军米哈伊尔·普里克隆斯基向莫斯科告警说，塔布努特人的蒙古台沙率领许多军队正向色楞格斯克和安加拉河的各堡进发。但在贝加尔湖地区的俄罗斯一切城堡中，军职人员为数很少；叶尼塞斯克没有人可以派到那些地方去，因为叶尼塞斯克的哥萨克有很多被派出去执行临时的任务，叶尼塞斯克只剩下了二十人。

同时普里克隆斯基还报告，他在得到叶尼塞斯克县有遭受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军事进攻的危险的消息以后，招募了新的军职人员。新招募的免税哥萨克有五十名，他们在卡马河新建了克姆斯克堡，并在该堡附近建立了两座二十户的哥萨克村。哥萨克被分给了土地，“他们在这些土地上耕田自给，因而为国家服军役。”^①

由于没有向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派遣大量兵力的可能，俄罗斯政府在这些地区，跟在整个西伯利亚一样，实行了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方针就是使俄罗斯农民定居于新的地区，尽可能建立更多的设防城堡来巩固俄罗斯的统治权，利用各种优待办法吸引当地的部落加入俄罗斯国籍。

俄罗斯政府遇到清政府和某些蒙古汗对它的殖民政策的武装对抗后，就开始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设法同中国和蒙古建立和睦关系。

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兵力的不足，促使沙皇俄罗斯在远东实行坚定的和平政策。同时俄罗斯也力求确保已经征服的地区为自己所有。

沙皇给将军们的训令和将军们给各城堡的总管们的指示总是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75卷，第36—37张。

吩咐对缴纳毛皮实物税的人采取“怀柔”手段，^①首先是通过举行“舍尔齐”(即宣誓——译者)和规定君主的赏赐来保证当地部落的贵族加入俄罗斯国籍。征收毛皮实物税的工作逐渐由当地的酋长和舒林加^②去执行；这样就正式承认了他们对同族人的统治权。

毛皮实物税是以珍贵的皮货为主。在十七世纪的达呼尔地区，贡赋的范围还不很大。但除此之外，征收的贡赋中还有鱼类、野果、啤酒花、布袋、皮带和牲畜，并有向俄罗斯行政当局供应载重马车的义务。最后，当地居民还要为自己的酋长尽各式各样的义务，因此他们在经济上处于很艰苦的状况。

俄罗斯政府十七世纪在东西伯利亚实行的基督教化政策是很谨慎的。在那里，洗礼纯粹是自愿实行的。那时只要实行洗礼，就给以君主的礼物：兀鲁思人给以长衫、帽子、衬衣、皮靴，酋长有时给以五个卢布之多，每人两段上等呢绒、一件衬衫、一双皮靴。^③这种礼物以及对于缴纳贡赋和履行其他义务的优待，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缴纳贡赋的当地居民信奉了东正教。

伊尔库次克将军伊·鄂·伏拉索夫在 1681 年利用礼物使得许多布里亚特人接受了洗礼，但当没有礼物时，他就无法继续给人施洗了。^④

伏拉索夫在他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如果有了赠给受洗者的礼物，就可以为色楞格斯克、巴尔古津、伊尔库次克、尼布楚、勃拉次克的很多缴纳贡赋的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举行洗礼。^⑤但

① 《历史文献》，第 5 卷，第 240 号，第 431—432 页。同前，第 4 卷，第 209 号，第 443—454 页。

② 部落贵族的称号。——译者

③ 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俄罗斯的国家权力和西伯利亚的非俄罗斯人》，载于《伊尔库次克国立大学论文集》，伊尔库次克 1921 年版，第 85 页。

④ 同上。

⑤ 《历史文献补编》，第 8 卷，第 89 号，第 312 页。

是关于慎重对待缴纳贡赋者的指示，往往成为一纸具文。实际上，沙皇的将军们往往残暴专横，征收苛捐杂税以饱私囊，种种暴行无所不有。在这方面，尼布楚将军帕维尔·舒利金在1675—1677年的活动是很有代表性的^①。

尼布楚的哥萨克和工商业区居民与缴纳贡赋的尼布楚鄂温克人联合向叶尼塞斯克将军伊·姆·鲍里亚京斯基公爵呈递状纸告发了帕维尔·舒利金。他们控诉舒利金及其幕僚贪污受贿，向军职人员的和工商业区的俄罗斯人以及缴纳毛皮实物税的鄂温克人征收非法的苛捐杂税，唆使俄罗斯人反对鄂温克人和布里亚特人，借以勒索敲诈。他们控诉舒利金强奸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的妇女，用储备的公粮酿酒，并用酒投机倒把。

值得注意的是，告状的俄罗斯人公开为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做辩护，因为他们双方同样受到了舒利金横行霸道的痛苦。

此外，告状的俄罗斯人一定知道，政府非常重视将军们对毛皮实物税缴纳者实行勒索敲诈的消息。更正确地说，他们认为莫斯科对于告状是会注意的。

叶尼塞斯克将军鲍里亚京斯基公爵在发给派去调查舒利金案件的安德列·斯特罗甘诺夫的训令中^②，指示他要对俄罗斯人和鄂温克人都加以质询，并让证人宣誓（让俄罗斯人依照基督教习惯宣誓，让鄂温克人“按照他们的信仰举行舍尔齐”）。鄂温克的安达尔·卡塔宁等人与俄罗斯人一同出庭作为这个案件的证人。这个案件的“审讯记录”由俄罗斯人在上面签字，缴纳毛皮实物税的非俄罗斯人在上面画押。

1683年又发生继任的尼布楚将军费多尔·沃耶伊科夫违法

①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55卷。

② 同上。

乱纪的同样案件，这个案件也用同样方法进行了调查。

为了维护国库的利益，政府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曾禁止寺院和军职人员把缴纳毛皮实物税的西伯利亚居民变成奴隶，但在西伯利亚人烟稀少以致争夺人力的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这个措施也没有实现。

在封建制度统治着俄罗斯的条件下，对俄罗斯和非俄罗斯居民的封建剥削方式也在西伯利亚发展起来。

寺院是最重要的土地占有者。东西伯利亚的寺院在十七世纪利用了女性人口的不足，购买被掳的布里亚特和蒙古妇女，为她们施洗，然后把她们嫁给俄罗斯的自由“流浪”人，借以从他们那里取得为寺院耕种田地和为寺院尽种种义务的卖身契。

沙皇的将军、总管、商人和富裕的哥萨克，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也利用立卖身契的奴隶以及一部分雇农的劳动来开辟耕地。封建关系也在东西伯利亚的某些民族中间发展起来。在西伯利亚的一切土著居民中间，氏族制度的解体在俄罗斯人影响下进行得更加迅速了，在封建化过程已经初具规模的各族人民中间，已经明白地显露出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是封建贵族，即酋长、舒林加、宰桑、台沙、托颜等等^①，另一方面是兀鲁思贫民，即“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农夫”和替贵族农庄服役的兀鲁思奴隶。

十七世纪东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鄂温克人和亚库特人的酋长、舒林加、托颜、宰桑、台沙，都拥有大量畜群，他们把兀鲁思贫民的毛皮据为己有，用来跟俄罗斯人以及西伯利亚的邻近部落进行以货易货的交易，剥削奴隶和兀鲁思贫民的劳动。为沙皇国库征收毛皮实物税的权力更加强了酋长和舒林加对其本部落人的统治权。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阴暗方面，俄罗斯国家在十七世纪后半期

^① 舒林加、宰桑、台沙、托颜，都是部落贵族的称号。——译者

对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河地区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居民所实行的政策总的说来还是有一定的成就，这表现在归附于俄罗斯政权的当地居民增加了。外贝加尔地区的居民既然成为蒙古诸汗和俄罗斯两者的侵略对象，所以他们想归附于强大的俄罗斯国家以摆脱自己所处的困境并不是偶然的。使得外贝加尔地区居民吃苦受罪的永无休止的封建战争和内讧，引起当地的部落对蒙古诸汗以及他们的宰桑们的反感，促使这些部落加入了俄罗斯国籍。随着农业殖民的加强，俄罗斯居民同土著居民发生了经济文化的联系，从而加强了俄罗斯对外贝加尔地区和达呼尔地区的影响。

1675年春，居住在埃加河畔的布里亚特人向尼布楚请求允许他们向俄罗斯缴纳毛皮实物税，并向派到他们那里去的尼布楚哥萨克十人长菲利浦·斯维奇尼科夫做了关于这个请求的宣誓。^①

1675年夏，还是这个哥萨克十人长菲利浦·斯维奇尼科夫被帕维尔·舒利金派为使者，率同五名哥萨克和一名译员到鄂嫩河上游蒙古的戴-琿台沙那里去，要求释放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布里亚特人，这些人被这个蒙古台沙用武力俘掳，从贝加尔湖和鄂尔浑河一带他们的游牧地区带到蒙古去了。被带走的布里亚特人共“约三千名，他们是自动请求加入俄罗斯国籍的”。“这些亲如弟兄的人向尼布楚缴纳过三年毛皮实物税，但蒙加的戴-琿台沙集结了许多人，用强迫手段把这些亲如弟兄的人从尼布楚堡带到他那里去了……”^②布里亚特人在戴-琿台沙把他们作为俘虏带走后，派了一个由二十个“优秀人物”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尼布楚，请求把他们“仍旧当作永久的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奴隶”。^③舒里京训令他的使者斯维奇尼科夫促请蒙古的戴-琿台沙本人也加入俄罗斯国

①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31卷。

② 同上，第33卷。

③ 同上。

籍,并说明“……他,戴-珲台沙,可以希望获得皇恩,沙皇军队将保护他不受敌人的侵犯,他将可以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强迫和蹂躏”。^①

1677年,蒙古酋长曼古捷伊的使者来到尼布楚,请求允许他的氏族加入俄罗斯国籍,并请求允许到尼布楚县境内游牧。帕维尔·舒利金派叶罗菲·莫古列夫、瓦西利·米洛万诺夫和译员德米特里·苏叶京前往酋长曼古捷伊的位于鄂嫩河上游的兀鲁思,宣布他被允许加入俄罗斯国籍,并且可以到俄罗斯领域去游牧,同时俄罗斯军队将“保护他,曼古捷伊,不受任何贼盗的骚扰……”^②蒙古的小酋长们想利用俄罗斯领地来避免强大的蒙古汗和满洲汗的掠夺。

1677年,居住在邻近满洲的鲍尔津斯基山峰上的鄂温克人向尼布楚请求准许他们加入俄罗斯国籍,并表示愿意缴纳毛皮实物税。

这些鄂温克人(纳米亚新的通古斯人)从前拒绝缴纳毛皮实物税,并且从尼布楚拐走了哥萨克的马匹(二百六十四匹)。但是在满洲压迫的威胁下,这些鄂温克氏族就想请俄罗斯人给以保护了,他们答应归还拐走的马匹,答应以后同俄罗斯人和睦相处。由于感到是自己的过失,鲍尔津斯基的鄂温克人派了一名妇女来到尼布楚,她是一个舒林加的儿媳,丈夫梅特切伊在尼布楚。这个妇女在尼布楚的将军衙门里对帕维尔·舒利金说,“她的公公阿尔基在距离尼布楚堡三天路程的鲍尔津斯基山峰游牧,纳米亚新的优秀人物一托库和他的僚属以及全体兀鲁思人一在他们附近游牧……他们常常命令她,乌尔巴做事情,现在特派她来通知尼布楚派征收毛皮实物税的人员到他们那里去,他们的贡赋已经准备好了……”^③根据

①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33卷。

② 同上,第58卷。

③ 同上,第57卷。

乌尔巴的通知，帕维尔·舒利京派了九名哥萨克去通知这些鄂温克氏族缴纳贡赋，并让他们安心。“从前他们从尼布楚偷去马匹的事将得到宽恕，只要他们归还拐走的牲畜和按时缴纳毛皮实物税”。^①

外贝加尔地区的当地居民转到俄罗斯方面来，是许多蒙古汗对俄罗斯人采取敌对行动的主要原因，这使得第一个俄中条约缔结时的达呼尔地区政治局势大大复杂起来。

在说明十七世纪时西伯利亚各族人民对俄罗斯的态度往往以自愿加入俄罗斯国籍表现出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谈一谈被强迫迁往嫩江的达呼尔人、久契尔人和某些鄂温克人的命运问题。事实表明，他们在那里的处境非常艰苦，所以企图返回他们原先居住的俄罗斯阿穆尔地区。

1675年，达呼尔人从满洲北部的甘河^②到阿尔巴津来，请求哥萨克帮助他们重新迁往阿穆尔地区做俄罗斯的臣民，因为他们在满洲“要缴纳重税，受很大的侮辱和压迫，他们在中国境内无法生存”。^③

阿尔巴津的哥萨克在尼基福尔·切尔尼戈夫斯基率领下由于这个请求而到甘河去过。

鄂温克人和达呼尔人这一要从嫩江区域返回俄罗斯领地的运动使中国的清朝政府大为不安，因此它千方百计不准嫩江居民同俄罗斯人交往。

当1676年尼古拉·斯帕法里经过嫩江地区返回俄罗斯时，嫩江总督率领大批军队把他一直送到俄罗斯边境。当时总督和他的士兵主要是注意不让俄罗斯人同嫩江居民接触，害怕这些居民逃

①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57卷。

② 甘河为嫩江支流。——译者

③ 《历史文献补编》，第6卷，第133号，第395—396页。

往俄罗斯领地。

俄罗斯使节团的商队被严禁在有居民的地点停留，鄂温克人中与根忒木尔氏族有亲属关系的塔尔加钦部落整个被预先迁往嫩江的偏远地区。后来清政府决定把所有原先的阿穆尔河居民都移往中国内地。这样一来，结果是被强制迁移的达呼尔人开始普遍渴望离开清朝领地转而加入俄罗斯国籍。

1682年，阿穆尔地区许多氏族的代表达拉尔纳——鄂温克人的巴雅吉尔氏族酋长迪波吉的亲戚——到尼布楚来见将军伏耶伊科夫，说“童顿氏族酋长阿尤希及其亲属以及他的兀鲁思人共一百余人，达呼尔氏族酋长洛斯秋多依及其氏族共一百余人，又达呼尔氏族酋长加尔加普察及其氏族共九十余人，达尔加钦氏族酋长达拉尔纳及其氏族共一百余人”从嫩江派他到尼布楚来，“命他，达拉尔纳，叩求大君主，请大君主开恩容许他们，即阿尤希和他的伙伴们以及他们的兀鲁思人，归附于大君主独裁沙皇的最高统治之下，做永远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奴隶，并请大君主令尼布楚派遣大君主自己的军队，以使他们，即阿尤希和伙伴们，能从嫩江安全脱离博格德的人到尼布楚堡去……”^①

原先的达呼尔酋长们所以自愿转入俄罗斯国籍，是由于“他们以及他们的亲属和兀鲁思人无法在博格德的人那里生活，因为博格德的人驱赶他们这些酋长，想把他们，即阿尤希及其伙伴们，连同他们的妻室孩儿从这些游牧地区带到他们的博格德汗的国家去。由于博格德的人对他们的压迫，所以阿尤希和他的伙伴们派达拉尔纳到尼布楚堡来叩求大君主”。^②除了请求加入国籍外，达呼尔的酋长们还让达拉尔纳报告尼布楚将军说，“博格德汗准备了大批的粮食储备，正在集中大量兵力，想要派到集依斯克堡去打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尼布楚将军衙门档案，第9件，第28—29张。

^② 同上，第29张。

死君主的人们和摧毁城堡，并把自己的大批人移居到那里去”，而且还要掳抢归附俄罗斯的“缴纳毛皮实物税的非俄罗斯人”。^①当伏耶伊科夫听取阿穆尔地区原先的酋长们要求加入俄罗斯国籍的请求时，“在场的不仅有两个秘书和两个译员，而且还有酋长根忒木尔，这显然是因为根忒木尔和被移到嫩江去的各部落有着一定的联系。”^②

缴纳毛皮实物税者转到俄罗斯方面来，是清政府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原因之一。

十七世纪达呼尔地区的俄罗斯移民

沙皇政府对达呼尔地区的政策是由它的阶级本性和十七世纪俄罗斯的经济情况所决定的。

十七世纪在俄罗斯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关系，在达呼尔地区也形成起来。

就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来说，阿穆尔地区的一切居民如同在整个西伯利亚一样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封建的压迫者阶级（将军、僧侣、总管）。俄罗斯商人和土著部落贵族是他们的亲密的附庸。这一类是为数无几但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第二类是农民（不论他们是由于什么缘故而来到阿穆尔地区的）。地位与农民相近的是普通哥萨克、火枪兵^③、市郊自由村和城堡的手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居民以及土著居民的基本群众。农民、哥萨克和一般土著占居民的绝大多数。

在俄罗斯人新去安家落户的边区，生活条件也有某些特点。在十七世纪，达呼尔地区与俄罗斯中心地区在生活方面的主要不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尼布楚将军衙门档案，第9件，第29张。

② 同上。

③ 也就是步兵。——译者

同之处是：达呼尔空地很多，而劳动人手和生产资料很少，所以组织农业生产的条件比较困难。在达呼尔地区，凡是想要得到土地并且能够耕种土地的人，都可以得到而且得到了不受数量限制的土地。在达呼尔地区没有农奴制和发展农奴制的条件，因为这里没有小贵族土地占有制。但是封建关系在达呼尔地区也形成起来了，因为这种关系在俄罗斯是占统治地位的。达呼尔地区的全部土地都被看作是沙皇的财产。

凡是在这个地区从事农业、各种行业或市郊手工业的人，都要因为利用封建国家的这份财产而向沙皇国库缴纳封建赋税，服封建徭役。将军们正是根据这种理由而向西伯利亚和阿穆尔地区的土著征收毛皮实物税，要他们履行修建城堡和供应载重马车的义务的。

移往达呼尔地区的农民取得土地的条件是，必须耕种规定数量的《君主的什一税耕地》，把收获的粮食缴给国库。农民耕地的多少在十七世纪并没有确切的规定。只要开个收据并有其他农民为新来的移民做保，谁能开垦多少土地就拨给他多少土地。当时认为一个农民可以有可耕地三十俄亩^①，每区^②十俄亩。^③一个农民有了这么多的全部土地时，应当耕种三俄亩“君主的什一税耕地”，每区一俄亩。但是移民们往往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人手来耕种这么多土地，所以那时拨给他们的土地是每区五俄亩或者更少，因此把什一税耕地面积也规定为每区半俄亩甚或四分之一俄亩。总管们要求首先耕种和收割什一税耕地的庄稼。农民认为在“君主的什一税耕地”上的不自主劳动是个包袱，所以耕种质量很差。由于这个原因，随着西伯利亚农民在农业上的提高，沙皇

① 一俄亩等于 1.09 公顷。——译者

② 那时俄罗斯农业是采取三区轮作制的。——译者

③ 1676 年让农民移居阿穆尔地区时，就是拨给了他们这么多的土地。参看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 28、55 卷。

当局以实物代役租(“加过工的粮食”)代替了耕种“君主的耕地”。

从什一税耕地征收的粮食必须发给西伯利亚各城守军作粮食俸给,每年都需一定的数量,但由于西伯利亚务农居民的增加,尽管什一税耕地的绝对数字增加了,某些农民的个人定额有时却从一俄亩减到了四分之一俄亩。

在十七世纪,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的什一税耕地面积并不大,因为在1680年以前,尼布楚县的土地被认为是不适合于农业的,直到八十年代才进行了最初的农业实验,并获得了成功。在阿穆尔地区,一般说来,直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能够强制农民甚至流刑犯耕种“君主的什一税耕地”,因为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沙皇的将军们在阿穆尔地区的统治权是不稳固的。在那里,哥萨克和农民曾联合起来反对尼布楚将军的总管们,不让“……开辟君主的什一税耕地”。^①另一方面,阿穆尔地区居民的总数并不多,而空地则很多,所以尽可以在尼布楚的总管们权力所不及的遥远地区去开辟耕地。

在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地区,所有移民的土地都由当局拨给;但在阿穆尔地区,当局在拨给土地方面所起的作用多半只限于统计移民占有了哪里的土地和什么样的土地而已。在这个地区,实际上只是被流放的移民才由当局拨给土地。

经当局准许到阿穆尔河来的移民以及流刑犯,由公家“补助”^②铁铤、修理这种铁铤用的钢材、马匹、种籽和安家立业用的每人两个半卢布的现款。最初时期可以享受减少什一税耕地定额或完全不种什一税耕地的优待。擅自行动的移民公家不给以这种贷款,所以他们或是自己携带用具、牲畜和种籽,或是出具卖身契似的借据向尼布楚和阿尔巴津的富有哥萨克以及总管、商人和寺院

①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28卷。

② 同上。

借债这一切。在十七世纪,所有移到阿穆尔地区的农民都要缴纳自己全部耕地的实物代役租,缴纳新割的禾捆五捆、六捆以至十捆。

除耕地的赋税以外,十七世纪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的农民还要缴纳收割干草、捕鱼、猎貂、制盐、提炼树脂、酿酒的代役租。农民出售自己的谷物要缴纳商业税。农民还负担许多其他义务:他们要修建城堡、将军衙门、公家的酿酒作坊、制盐场、酒馆、教堂;为将军、总管和寺院采办和运送木柴,尽赶大车的义务。^① 总管们和将军们的贪污和专横使得农民忍无可忍。

除农民以外,军职人员,即大贵族之子和哥萨克,也有耕地。他们不缴代役租,不种什一税耕地,但他们的“君主的粮食俸给”就以利用可耕地相抵,在超过他们的粮食俸给定额的多余部分中,每十个禾捆应缴公一捆。^②

达呼尔各城堡的一般军职人员,即哥萨克骑兵和哥萨克步兵,其服役所得的粮、盐和现金俸给是很微薄的。

一般军职人员全年的粮食俸给定额是“黑麦粉五俄石一奥西米那^③以及谷粒和燕麦粉各一俄石”。^④

在十七世纪,当局对于缴纳“多余部分”(即额外部分)的粮食代役租的要求,总是引起阿尔巴津的哥萨克的反抗。

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的工商业区居民^⑤要向国库缴纳实物的和货币的捐税:工商户的代役租是每年二卢布。这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条件下是很重的捐税。十七世纪工商业区居民的几种劳动报酬数额可以具体说明他们负担的捐税之重,^⑥例如:

① 弗·库德里亚夫采夫:《十七世纪东西伯利亚的农民、工商业区居民和哥萨克的起义》,伊尔库次克 1939 年版,第 18 页。

②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 71 卷。

③ 一俄石等于 209.99 升,一奥西米那等于半俄石。——译者

④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 41、28 卷。

⑤ 那时的工商业区位于郊外,工商业者都住在那里。——译者

⑥ 弗·库德里亚夫采夫:《十七世纪东西伯利亚的农民、工商业区居民和哥萨克的起义》,伊尔库次克 1939 年版,第 18 页。

造船木工年薪为五、六卢布；铁匠制造一把大镰刀或小镰刀所得为一阿尔坦（即三戈比）；木工（可惜人数不详）为将军建造一幢新屋所得为六卢布。

除论年按户的代役租以外，工商业区居民还缴纳各种行业和割草场地的捐税，店铺、磨坊、打铁坊、澡堂、客店的代役租以及一切商品的什一税（一卢布抽一格里夫那^①）。而且沙皇的税关对出售粮食、鱼类和牲畜征收现金税，对珍贵皮货、古象牙、金银和中国商品则征收实物税。此外，工商业区居民还要到公家的酿酒坊、磨坊等处去做各种临时性的工作。

外贝加尔地区的工商业区居民对捐税的繁重表示不满，所以常常为了“逃”税而跑到阿穆尔地区去，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那里的生活是比较自由的。

尽管在沙皇给将军们的诏书和训令中总是说必须开辟和扩大耕地，把国有农民移到各城堡附近去定居，但是十七世纪沙皇政府在达呼尔地区的移民工作是相当不景气的。实际上政府对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的移民进行得很缓慢，规模也有限。限制自由迁徙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着俄罗斯，是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沙皇政府重视国库收入的利益，所以没有特别鼓励国有农民和工商业区居民的迁移。政府竭力想使纳税人固定于他们的永久居住地上。同时政府机构还要保卫地主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地主是反对农奴到西伯利亚去的。

在政府送到达呼尔地区去的移民中，有军职人员，即哥萨克和大贵族之子，还有国有农民，但最大部分是沙皇法庭判处永远流放的犯人，其中有许多是由于参加了1648—1650年和1662—1666年的城市起义以及斯·季·拉晋所领导的农民战争而被流放到达呼尔地区的。

^① 一格里夫那为十戈比。——译者

把判罪的刑事犯和政治犯流放到达呼尔地区的“耕地”去的办法，在整个十七世纪期间一直在实行着。在这类被流放的人们中间有乌克兰的盖特曼^①捷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他在达呼尔地区为俄罗斯忠实地效了力。将军们的报告证明，在整个十七世纪期间是把流刑犯作为国有农民迁往尼布楚县和阿穆尔地区定居的。

1675年，尼布楚来了七名流刑犯：“伊凡科·斯图坚金，伊帕其耶夫修道院的仆役斯捷潘·齐诺维耶夫，以及普斯科夫人伊凡·基里洛夫和他的妻室子女”。^②

同年，尼布楚将军帕维尔·舒利金和阿尔巴津的哥萨克阿达曼^③，即总管尼基福尔·切尔尼戈夫斯基之间，在被流放“到耕地去”的农民莫伊谢伊·费奥多罗夫“及其一伙”的强制移居问题上发生了长时间的争论。^④这些农民从尼布楚被发往额尔古纳河河口下游的拉夫卡耶夫草地定居，责令他们耕种“君主的什一税耕地”，但这些流刑犯既无种籽，又无农具和牲畜。舒利金将军报告说：“那些国有农民出于自己的意图和阿尔巴津哥萨克的教唆，向阿尔巴津递送呈文请求定居于阿尔巴津堡。”切尔尼戈夫斯基根据全体阿尔巴津人的一致要求，允许了这些流刑犯居留于阿尔巴津，并打算把他们编入哥萨克队伍。舒利金要求让他们居住到指定的地点去作为国有农民，甚至派了尼布楚的军职人员纳杰伊·伊凡诺夫去执行他关于莫伊谢伊·费奥多罗夫“及其一伙”以及其他流刑犯的命令，因为他们“自由居留，不耕种君主的耕地，并在阿尔巴津哥萨克的纵容下耕种自己个人的土地，播种了相当多的庄稼”。当纳杰伊·伊凡诺夫来到阿尔巴津时，阿尔巴津的全体哥萨克集

① 哥萨克的选任领袖。——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尼布楚将军衙门档案，第4件，第10张。

③ 阿达曼是哥萨克军队首领的称号。——译者

④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28卷。

合到一起“不让”把那些流刑犯交出来“送到君主的耕地去”。舒利金将军二次又下令调流刑犯去耕种“君主的什一税耕地”，并派尼布楚的大贵族之子舍斯塔克·阿法纳西耶夫去传达这个命令，阿法纳西耶夫带到阿尔巴津去的舒利金公文里面说：“……如果你们有什么原因不能交出那些流刑犯，你们应该立刻用书面报告尼布楚堡，因为大君主有令，应把阿尔巴津的整个耕作组织情况以及君主的其他一切事务都呈报莫斯科大君主。”将军舒利金还指出：遵照沙皇训令曾经从尼布楚送了四十七名国有农民到阿尔巴津去，但是连这些农民也是“……直到现在没有耕种君主的耕地”，却耕种自己的土地，虽然“……你们自己也知道，阿尔巴津堡的国有农民和你们哥萨克为了耕地都是从尼布楚堡领到种籽，一切生活资料 and 君主的现款的”。舒利金根据这个理由劝阿尔巴津人不要阻碍舍斯塔克·阿法纳西耶夫划拨最好的土地作为“君主的什一税耕地”，并要同意让流刑犯成为实际的国有农民。此外，舒利金还向阿尔巴津人说：“……尽管堡与堡之间发生了争吵，但你们彼此之间所传仿佛尼布楚堡把君主的阿尔巴津国库收入，即你们征收的贡赋，与君主的尼布楚国库收入混在一起，那是不知哪个歹人和叛徒胡说的。”^①舒利金向阿尔巴津人保证，他们所征收的毛皮实物税在尼布楚是用阿尔巴津铃记封好，与尼布楚所征收的毛皮实物税分别开来送往莫斯科的。同时舒利金也向莫斯科报告了阿尔巴津人和尼基福尔·切尔尼戈夫斯基的“放肆行为”。舒利金命令在把国有农民移居于阿穆尔河沿岸的拉夫卡耶夫草地时“……在一区中划一俄亩为君主的什一税耕地，两区照此类推，一区中划十俄亩为他们自己的耕地，两区照此类推”；如果其他农民愿意按照这种条件移居拉夫卡耶夫草地，总管对他们也应“……照此分给，把土地划为君主的什一税耕地和他们自己的土地”。阿尔巴津

^①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28卷。

人沒有“交出”被流放的人们。将军舒利金对阿穆尔地区的君主的什一稅耕地总搞不好非常忧虑，所以一再嘱咐总管舍斯塔克·阿法纳西耶夫说：“你要为君主的什一稅耕地效劳，认真地照料，不要像过去的总管们那样。”^①由此可知，阿穆尔地区在1676年以前实际上是沒有君主的什一稅耕地的。只是在1676年以后费多尔·沃耶伊科夫将军的时期，才开辟了君主的什一稅耕地。

除了机关之间的爭吵以外，在文件中还载有关于遥远的阿尔巴津的低级军职人员对总管们的压迫进行阶级斗争的那些事实的消息。

1676年，以哥萨克十人长米哈伊尔·萨波日尼科夫和叶夫多基姆·格里戈里耶夫为首的一群阿尔巴津军职人员来到审判所，对受贿和放高利贷的总管加弗里拉·弗罗洛夫进行了审判和惩处。^②

1677年，尼布楚来了二十七户被流放的分裂派教徒和“叛逆分子”，他们是免除死刑后流放到达呼尔地区来定居充当国有农民的。这些流刑犯当中有工商业区居民瓦西利·阿尔捷米耶夫及其子女，火枪兵和普通士兵萨瓦·卢基扬诺夫、瓦西利·拉斯科塞、伊万·叶麦利扬诺夫、谢苗·费多托夫、费多特·亚科夫列夫，莫斯科炮兵叶菲姆·费奥多罗夫和妻子，农民费多尔·科索伊、叶里斯特拉特·吉洪诺夫，失去圣职的教士维库拉·捷米多夫，教士的儿子捷米德和孤身赤贫的农民伊凡·费奥多罗夫。^③

在遣送这一大批流刑犯的同时，还遵照沙皇命令由叶尼塞斯克给阿尔巴津堡送去了开辟耕地用的一百二十九把斧头，一百一十具犁铧、二百把短把大镰刀、二百把小镰刀，所有这些东西一部

①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55卷。

② 同上，第28卷。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尼布楚将军衙门档案，第6件，第70—72张。

分是在俄罗斯中心地区购买的，一部分是在叶尼塞斯克制造的。^①

1682年，波克罗夫斯卡雅自由村和阿尔巴津一些新垦地的去当农民的移民流刑犯向沙皇递送呈文，陈述他们的困苦生活。^②他们于1675—1676年间到达阿穆尔河，“被安置到只有树墩和木头的耕地上”；不给与贷款，只给与“老马和仔驹，既不适于驾犁，也不适于拖耙，许多人由于穷困把它们转卖了出去，犁铧也都是陈旧的和损坏的”，也不供应他们种籽和食粮，而被流放的人们自己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无法安家立业。

被流放的移民以奴役性的条件向阿尔巴津商人赎购价值奇昂的马匹(十二卢布)和犁铧(三卢布)。这种奴役性的盘剥往往使他们彻底破产。

编为军职人员的流刑犯，其地位稍好一些。达呼尔地区的俄罗斯居民人数很少，军职人员不足，城堡和城市中的劳动人手问题太紧张。所以将军们就不计危险，自己负责把流刑犯编为哥萨克或者允许他们居住在城郊。莫斯科方面也知道这种情况，但不得不予以容忍。

1677年，尼布楚将军帕维尔·舒利金“由于受了重大的贿赂”把两名流刑犯(格里戈里·萨莫霍夫和罗季昂·费多谢耶夫)留在尼布楚编入哥萨克队伍，尽管他们是被判移送到阿尔巴津县去做国有农民的。^③如果流刑犯在达呼尔地区“被编入”军职人员的行列，他们立刻就与其他军职人员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而军职人员比起国有农民来是处于比较享受优待的地位的。

正如已经指出的，在十七世纪俄罗斯向达呼尔地区的移民中，占第一位的并不是政府的移民活动，而是“逃亡”的农民迁移到这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尼布楚将军衙门档案，第6件，第89—90张。

② 《历史文献补编》，第10卷，第57号，第204—206页。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尼布楚将军衙门档案，第4件，第90张。

些地区去的自由的、无组织的殖民行为。

在波亚尔科夫和哈巴罗夫远征阿穆尔河以后，达呼尔地区盛产粮食的消息飞也似地传遍了整个西伯利亚。所以在 1653—1655 年间开始了农民和工商业区居民从西伯利亚擅自前往达呼尔地区的自发运动，关于这个地方流传着几乎神话般的故事。这个运动直到十七世纪末一直在发展着。在 1655 年，这种擅自前往达呼尔地区的移民已达一千五百人以上，^①其中大多数是携带家眷、财产和牲畜的农民。他们一到就耕种起来。擅自前往阿穆尔河的移民有时同企图阻止他们的城市驻军进行了武装斗争。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韦尔霍连斯克、雅库次克、伊利姆、伊尔库次克以及其他城市的将军们，在 1653—1655 年间不断抱怨哥萨克军职人员、各行业居民和国有农民擅自到阿穆尔河去。

1655 年，以阿达曼米哈伊尔·索罗金为首的五十三名哥萨克军职人员从韦尔霍连斯克堡逃往达呼尔地区。沿途又有各式各样“流浪的俄罗斯人”，甚至“异族人”加入了索罗金的队伍，因此共达三百人之多。^②

1662 年(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的“铜币暴动”^③被镇压以后)，从俄罗斯逃往达呼尔地区的自由移民特别多。1665 年，以尼基福尔·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首的八十四名哥萨克军职人员从基廉斯克城逃到了阿穆尔河，切尔尼戈夫斯基后来成为阿尔巴津哥萨克的头目。

韦尔霍土里耶当局无法制止主要来自北方沿海地区的自由移

① 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 56 页。关于 1653—1655 年农民和哥萨克逃往阿穆尔河的情形参看伊·叶·菲舍尔著的《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 1774 年版，第 611 页。

② 恩·恩·奥格洛勃林：《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案卷和册籍一览》，第 1 卷，莫斯科 1898 年版，第 195 页。并参看伊·叶·菲舍尔的《西伯利亚史》，第 611 页。

③ “铜币暴动”即 1662 年 7 月 25 日的莫斯科起义。——译者

民，所以只注意向他们征收到西伯利亚去的关税，^①“流浪者每人征收四分之一卢布，工商业区居民每人征收半卢布”，即多一倍。所有“流浪者”都对税关说，他们到西伯利亚去是为了“工作”，他们离开家乡是“由于缺粮”。^②

1670年有二千零五十一人从北方沿海各城市经韦尔霍土里耶到西伯利亚去。大概其中许多人都是到达呼尔地区去的。

西伯利亚向莫斯科发出了怨言和质问，因为君主的耕地由于农民逃往达呼尔地区而荒废了。根据大贵族杜马的决定，向西伯利亚各城市发出了沙皇的诏书，命令不得让擅自“到达呼尔人那里去的移民过去”，并且要让他们回去，但是在整个俄罗斯都在进行尖锐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这个敕令难以实行。到达呼尔地区去的运动继续着。1671年，叶尼塞斯克将军基里尔·亚科夫列夫请求尼布楚将军不要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逃亡者放过去。^③雅库特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的沙皇的将军们企图用武力阻止农民擅自跑到达呼尔地区去。1671年，叶尼塞斯克向莫斯科报告说，伊利姆斯克和安加拉关卡截获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窃贼^④和贼首”，即逃亡的军职人员彼尔乌什卡·麦尔基宁、阿列什卡·涅普里帕索夫、阿列什卡·普雷特科夫、奥西库·阿拉坦诺夫等共十七人。

这些被捕获的“窃贼”经拷问后招认，他们聚集了許多人，现在要逃往达呼尔地区……他们并带走了为运送君主的粮食储备而建造的皇家船只……在他们的窃贼队伍中，彼尔乌什卡·麦尔基宁是阿达曼，阿列什卡·普雷特科夫是叶萨乌尔^⑤。聚集的窃贼人

① 恩·恩·奥格洛勃林：《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案卷和册籍一览》，第2卷，莫斯科1898年版，第50页。

② 同上，第3卷，第76页。

③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5卷。

④ 当时把一切罪犯都称为窃贼。——译者

⑤ 叶萨乌尔是哥萨克军队中的职衔，相当于大尉。——译者

数已经很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韦尔霍连斯克还有许多军职人员想要参加到他们里面来。据阿列什卡·涅普里帕索夫说，“红亚尔的三百名军职人员说，如果不发给他们君主的薪饷，他们三百人将全部到达呼尔人那里去”。^①

1683年再次发出不准擅自行动的移民通过韦尔霍土里耶的命令，^②但是这个命令仍旧没有能执行。农民到西伯利亚（以及达呼尔地区）去的运动，随着他们在俄罗斯所受奴役的加深而日益扩大。为了寻求自由和“合用的地方”，俄罗斯农民忍受着饥寒，在从来没有人迹的原始森林深处开路。乘着粗笨的木筏在石滩重重的河流中航行，随身拖带着自己的家俱什物和幼年子女。到达目的地之后，他们把森林中的树木统统连根拔掉，开荒，耕地，开闢割草场，繁殖牲畜，从事各种手工业，在当地为没有人居住过的边区的艰苦生活制造一切必需品。

早在1656年，阿尔巴津附近就出现了许多新垦地和乡村，居民从事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阿尔巴津自由村^③也发展起来。1671年，总管伊万·奥霍尔科夫从叶尼塞斯克被派往阿尔巴津，同年，阿尔巴津附近设立了斯帕斯克修道院，它在最初几年里就搞起了规模相当大的农业生产。修道院附近建立了孟纳斯梯尔希纳自由村，居住着依附于修道院的农民。

1672年，尼布楚的若干户农民迁往阿穆尔地区，他们建立了索尔达托沃村。在以后几年里，阿穆尔地区又出现一系列俄罗斯人的乡村和自由村：伊格纳希诺、奥泽尔纳雅、波加达耶瓦、波克罗

①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13卷。

② 恩·恩·奥格洛勃林：《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案卷和册籍一覽》，第3卷，第78页；弗·库德里亚夫采夫：《十七世纪东西伯利亚的农民、工商业区居民和哥萨克的起义》，第35页。

③ 自由村（слобода）是从十四世纪起俄罗斯各种移住地的名称。土地占有者组成自由村，享有暂时的所谓“自由”的优待，即免除徭役。——译者

夫斯克(在阿尔巴津的下游)、潘诺沃(距阿尔巴津五十到六十公里)、安德留什金纳(距阿尔巴津一百四十公里)。在十七世纪的七十年代,俄罗斯移民在结雅河及其各支流沿岸建立了若干小城堡和过冬地:上结雅堡、谢林宾斯克堡、多伦斯克堡、吉留依斯克过冬地。^①这些地方的土地都特别肥沃,所以各城堡周围都有了耕地。

十七世纪的八十年代,阿穆尔地区的俄罗斯居民更加增多。从石勒喀河到呼玛尔河阿穆尔河沿岸出现了新的俄罗斯城堡和村镇:伊利因斯克村、申加洛夫自由村、上孟纳斯梯尔斯克自由村、乌斯季-额尔古纳克自由村以及一系列新垦地。所有旧有的和新兴的城堡和自由村周围都很快地出现了许多新垦地、过冬地和村落。由于被流放的,但主要是自由的移民源源而来,各城堡和各自由村的居民日益增多。

在1689年,仅仅阿穆尔河沿岸的波克罗夫斯克自由村一处就居住着七十户被流放的农民以及若干户自由农民。伊利因斯克村、潘诺沃村、安德留什金诺村也居住着被流放的以及自由的移民。所有这些都是相当大的村庄。阿尔巴津附近在1689年居住着约五百农户。^②

目前还没有可能统计出十七世纪阿穆尔地区俄罗斯移民的确切总数,但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认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俄罗斯农民人数到1689年已经相当可观。这里的土地经农民以顽强的劳动耕种后,收获量很高。到1680年,阿尔巴津地区的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而且已经能够以粮食供应外贝加尔地区。1681年,尼布楚新任将军沃耶伊科夫曾在阿尔巴津采购粮食以支付新建的额尔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12卷,第2号,第2—3页、5—6页;第10卷,第57号,第204—206页;第8卷,第109号,第345—346页。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55—56页。

^② 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63—64页。

古纳堡和尼布楚的军职人员的粮食俸给。^①

因此阿穆尔河成为外贝加尔地区和整个西伯利亚东部的粮食基地。在同清朝进行军事斗争的条件下，俄罗斯政府十分重视这个基地的巨大意义，所以力图加以扩大和巩固。将军沃耶伊科夫的活动特别表明了这一点。

沃耶伊科夫于1680年被派往尼布楚任将军，并奉命集中和加强达呼尔所有各城堡的驻军，储备一旦清军实行军事进攻时所需要的粮食。沃耶伊科夫还奉命调查适于耕种的新地区，采取一切方法协助农民迁移和开辟“君主的什一税耕地”。所采取的方法应详细呈报西伯利亚衙门。^②

沃耶伊科夫遵照命令派了特别的军职人员队伍在阿穆尔地区和整个尼布楚县境寻找和记载适于耕种的新地区；沃耶伊科夫本人并在阿穆尔河和尼布楚县的新土地上进行试种。他请求遣送新的移民到尼布楚县和阿穆尔地区来，以便使他们到耕地去定居。在详细研究了外贝加尔地区的农业条件以后，判明这个地区也有很多良好的可耕地。

在色楞格河和乌达河的河谷地区，俄罗斯的耕种早自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发展起来。色楞格河畔出现了大规模的农业居民点：卡班斯克堡、伊利因斯克自由村、特罗伊次克—色楞格斯克修道院，修道院周围是依附于它的农民居住的小规模乡村和自由村。色楞格斯克堡和乌金斯克堡附近有哥萨克、工商业区居民和农民的耕地。按照将军沃耶伊科夫的命令，1681年在尼布楚县进行了黑麦、大麦、豌豆和大麻的试种。庄稼的收成很好。沃耶伊科夫于1682年命令在涅尔查河和石勒喀河沿岸开辟耕地。1682年，沃耶

① 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59页。

② 《历史文献补编》，第8卷，第109号，第345—346页。

伊科夫派往阿穆尔河的瓦西利·米洛万诺夫部队对许多适于耕种的阿穆尔地区提出了相当详尽的报告。^①这支部队建立了新的额尔古纳克堡，驻守的军队在那里开辟了耕地。^②

米洛万诺夫在他的土地视察报告中说，最适于耕种的地是在阿穆尔河左岸和结雅河左岸的托米河河口和谢利姆巴河河口之间，那里可以建立大规模的农业居民点。根据调查队的情报和试种的结果，将军沃耶伊科夫一面在阿穆尔地区极认真地开辟“君主的什一税耕地”以建立公家的粮食后备，一面于1682年竭力向西伯利亚衙门陈说，尼布楚县的涅尔查河、石勒喀河以及额尔古纳河沿岸的土地跟阿穆尔河沿岸一样是十分适于耕种的，但人手的缺乏阻碍了这些地方的“君主的什一税耕地”的发展。同时，尼布楚粮食不足，这在与满洲军队发生冲突时是个重大的危险。沃耶伊科夫报告说，他在1682年一共只安置了二十七户流刑犯在尼布楚县当“国有农民”，虽然每一个地方就有安置五十到一百户的可能。他本人是鼓励擅自行动的移民到阿穆尔河去的。

为了劝说西伯利亚衙门采取认真的措施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移民，沃耶伊科夫举出了这个地区获得丰收的具体数字。他报告说，1681年在沃耶伊科夫自己的试验田里，一普特黑麦种籽生长了十三普特黑麦，而且这些黑麦跟草原地带最好的俄罗斯土地所生长的黑麦一样。1681年尼布楚大贵族之子尼基弗尔·谢诺特鲁索夫在乌尤尔加河畔播种了二十普特黑麦，收获了四百五十普特去皮粮食；小麦一普特种籽出产十一普特，大麦一普特种籽出产十二普特，燕麦也是一普特种籽出产十二普特；大麻一普特种籽出

^① 格·斯帕斯基：《俄罗斯人对十七世纪阿穆尔地区的报道》，载《俄罗斯地理学会通报》第7卷，第39页。并参看《历史文献补编》，第7卷，第74号，第368—371页及弗·奥戈罗德尼科夫的《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62页。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尼布楚将军衙门档案，第12件，第112张。

产十一普特；豌豆一普特种籽出产十普特，荞麦一普特种籽出产三十普特，“芜菁生长得极好”。^①到1682年，尼基弗尔·谢诺特鲁索夫仍在乌尤尔加河畔种了十一俄亩黑麦和八俄亩各种春播作物，“……一切庄稼的生长都比上一年好得多……”^②

沃耶伊科夫的试种和谢诺特鲁索夫已经正式进行的农作证明，俄罗斯人在一来到阿穆尔河的初期就广泛地发展起农业来。

莫斯科对尼布楚将军沃耶伊科夫关于移民到达呼尔地区的报告颇为注意。从1683年起，政府开始经常地遣送官方迁移的农民前往阿穆尔地区：1683年送去了二十三户农民，他们定居于涅尔查河，除耕种自己的田地以外，每户还耕种八分之一俄亩“君主的耕地”。

沃耶伊科夫将军贷给这些移民种籽，1683年他们开垦了四俄亩左右“君主的耕地”和十二俄亩自己的耕地，每俄亩君主的耕地播种了五普特黑麦，在自己的耕地上种了春播作物。

继沃耶伊科夫之后任将军的伊·伏拉索夫继续向前扩展了尼布楚县的耕地。1684年他请求政府遣送五百户农民到尼布楚来。伏拉索夫坚决说，五百新农户移居于尼布楚县之后，这里的农业就将增强到“不仅可以供应达呼尔各城堡军职人员的粮食俸给，即使大君主下令调派大军抵御中国人对达呼尔地区的侵犯，那些国有农民都能……耕种出足够的粮食”。^③

在1685年，阿尔巴津县哥萨克和农民播种的，以及各个官吏加种的各种作物共一千多俄亩，君主的耕地上播种了五十俄亩春播作物。^④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8卷，第109号，第34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1卷，第21号，第73—74页；参看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的《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62页。

④ 《历史文献补编》，第12卷，第12号，第113页。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一直有擅自行动的移民到阿穆尔河来。甚至在1685年阿尔巴津被康熙的几千名军队围困的时候，还有四十个俄罗斯移民携带妇孺乘木筏沿阿穆尔河抵达阿尔巴津，他们不愿向康熙的将军们投降做俘虏，在战斗中牺牲了。在1689年条约签订之前，尼布楚县和阿尔巴津所有的俄罗斯人，包括一般人和将军们在内，始终确信俄罗斯能够保有阿穆尔河沿岸地区。1684年6月，将军托尔布津只有哥萨克、农民和工商业区居民三百五十五人，而满洲军队则有一万名，所以在进行了十天的顽强保卫战之后被迫放弃阿尔巴津退往尼布楚，但将军伊凡·伏拉索夫不准阿尔巴津人到任何其他地方去，并命令他们回到阿尔巴津去把它重新修建起来。莫斯科并没有训令伏拉索夫这样做。后来他向政府解释自己的措施说，他是希望“不失去君主的达呼尔地区，不留下从尼布楚逃走的丑名”。^①

在阿尔巴津人返回阿穆尔河之前，伏拉索夫派别依顿的骑兵团先去保护阿尔巴津的庄稼，并在收割粮食时帮助阿尔巴津人。伏拉索夫利用尼布楚县居民补充了阿尔巴津的驻军和人口。

捷列姆宾斯克堡在伏拉索夫的命令下为阿尔巴津人赶造了犁铧、小镰刀、大镰刀。伏拉索夫严厉地命令托尔布津督促人们在全部旧耕地和新耕地上及时种上庄稼。托尔布津对阿穆尔地区必将属于俄罗斯具有充分的信心：阿尔巴津人及时收割了庄稼，耕了地，播了种，在寒冷的冬天里已经把阿尔巴津重新修建起来，而且比过去又大又好。1686年春，阿尔巴津人播种了五百多俄亩的各种作物，把牲畜繁殖了起来。但由于康熙军队对阿尔巴津长达十个月的再度围困（围困从1686年7月延续到1687年5月），阿尔巴津人没有能收获这批粮食。这一次清朝军队把俄罗斯人所种的

^① 《历史文献补编》，第12卷，第12号，第111页。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81页。

庄稼焚毁和踏平了。

但是阿尔巴津人即使在被围后也没有失去阿穆尔河必将属于俄罗斯的信心：在 1687 年 5 月的停战时期，阿尔巴津将军别依顿曾经跟康熙的都统们磋商，要他们不要阻碍俄罗斯人在阿尔巴津附近翻耕土地和播种庄稼，但康熙的都统们拒绝照办，直到八月已经不能播种春播作物的時候，他们才从阿尔巴津撤退。俄罗斯人利用这个机会又进行了秋耕和秋播。将军伊凡·伏拉索夫从尼布楚给他们送来了种籽和耕畜。俄罗斯人播种的各种作物达二千普特之多。清军不让他们收获这些粮食，他们破坏了停战条件，在 1688 年 7 月重又来到阿尔巴津，把所有庄稼都踏毁“无余”，然后退往阿穆尔河下游。^①

伊凡·伏拉索夫重新给阿尔巴津送去了食粮、种籽和牲畜。阿尔巴津人以惊人的顽强精神在 1689 年春天又翻耕了土地，播种了作物。阿穆尔河边的这最后一次收成，俄罗斯人还是没有得到手，因为按照尼布楚条约的条件，阿穆尔河沿岸的颇大一部分包括阿尔巴津在内让给了中国。康熙的都统们遵照他们皇帝的命令拆毁了阿尔巴津以及俄罗斯人的所有村庄和新垦地，摧毁了耕地，使肥沃的阿穆尔地区成为一片荒野。

上面列举的种种事实证明，俄罗斯的农业移民不怕巨大的灾难和困苦，对开发产粮的阿穆尔地区具有不可抑制的渴望。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重新又建立了农业经济，把手工业以及各种行业发展起来。俄罗斯政府竭尽一切办法鼓励移民发展农业、手工业以及各行各业。十七世纪俄罗斯农民在阿穆尔地区的活动促进了这个边区的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

在十七世纪，所有迁往达呼尔地区的俄罗斯农民，其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因为他们还不十分熟悉阿穆尔地区自然界的特点。

^① 《历史文献》，第 5 卷，第 169 号，I、II、III，第 296—298 页。

1682年，农民在他们的呈文里诉苦说：“庄稼生长得跟其他城市不一样，庄稼一连三年不能成熟，生锈病，闹虫灾”，1681年大雨倾盆，“以致不能储存干草，不能二次翻耕土地，所有庄稼都被淹没”，1682年，“干草又被大水淹没和冲毁”。

在十七世纪，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的城堡和郊区自由村的居民分别从事农业、商业和各种手工业。^①铁匠打造犁铧、小镰刀、大镰刀和刀子；铜匠制作铜锅、铜铃以及其他器皿；工商业区居民制作皮子以及皮制品，熬炼肥皂和食盐，做木器，酿酒，磨粉，采集做窗户用的云母和矿物颜料，染布。在阿穆尔地区的各行各业中，占首位的是猎捕毛皮兽，其次是蒸馏树脂和捕鱼。手工业者出售他们自己的制品，卖给迫切需要这一切手工业产品的移民。

在十七世纪，莫斯科的“巨商”^②把商品运到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来出售，他们的代理人跟随着移民深入到新兴的俄罗斯村镇。“巨商”的代理人们以奴役性的条件贷款给移民。^③

处于艰苦条件下的十七世纪俄罗斯农民，依靠自己的顽强劳动在阿穆尔河一带建立了在那时说来颇为可观的农业经济。他们在幅员广大的处女地上实行轮作制，并采用了自己的耕作方法：用铁铧犁地，用耙松土。俄罗斯人在阿穆尔地区首次实行三区轮作制，因而保证收获量比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在俄罗斯人来阿穆尔河以前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耕种一个短时期的收成高得多。农民所采用的一年耕种两次的方法（春秋两季）也提高了收获量，这在阿穆尔地区也是一种新的办法。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使用小镰刀收割庄稼，俄罗斯人则同时使用大镰刀，因而可以比较迅速地收割，这在变化无常的阿穆尔地区的自然条件下具有重大的意义。

① 谢·弗·巴赫鲁申：《学术论文集》，第3卷，第1分册，莫斯科1955年版，第222—250页。

② 这里指享有特权的被称为“гость”的大商人。——译者

③ 谢·弗·巴赫鲁申：《学术论文集》，第3卷，第1分册，第222—223页。

俄罗斯农民来到阿穆尔地区以后,农作物的品种大大增加了。当地居民只知道上面提到的“六谷”:大麦、燕麦、黍稷、荞麦、大麻和豌豆。俄罗斯农民利用阿穆尔地区的自然特点开始播种了春黑麦和春小麦,它们在这里接种得非常好。割晒干草,修建粮库,安装达呼尔地区居民过去所不知道的水磨^①,以及用陷阱和鹿砦的更完善的打猎方法,这些都是新事物。

所有这些都给阿穆尔河流域各部落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明显的烙印,这些部落渐渐接受了比较高的俄罗斯文化。

阿穆尔地区俄罗斯农民受压迫的处境,使他们与鄂温克人、布里亚特人、达呼尔人以及其他受沙皇政权剥削的部落中的一般群众接近起来。同俄罗斯人的来往,加速了土著氏族制度的解体。在十七世纪,在阿穆尔地区如同在整个西伯利亚一样,俄罗斯农民和毛皮实物税缴纳者在土地权方面地位大致是相同的。

1684年,对尼布楚县土地进行了调查的伊格纳季·米洛万诺夫向将军伊凡·伏拉索夫报告说,适于耕种的土地非常多,所以发展农业“……不会排挤毛皮实物税缴纳者,因为那些毛皮实物税缴纳者不是在接近那些可耕地的地方放牧的……”^②

在十七世纪,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确实是空地很多。因为人口很少,所以俄罗斯人定居于这里并不会把土著居民从他们的游牧地排挤走。这里很少发生因土地而冲突的情事。当地部落同沙皇当局的冲突,是由于征收毛皮实物税以及将军和总管们勒索“礼物”而发生的。鄂温克人的某些氏族跑到蒙古去游牧,但那里有可汗们的更加沉重的压迫和内讧所造成的破坏等待着他们;他们返回了俄罗斯领地。

^① 例如,阿尔巴津附近的斯巴斯克修道院中就安置了这种水磨,用来磨谷子,磨米粉。其他俄罗斯村庄中也有这种水磨。

^②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73卷。

以康熙为首的清政府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发展阿穆尔地区的生产力,而且残酷地掠夺和蹂躏了这块地方。

* * *

在总结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的殖民活动时,必须指出,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贝加尔湖东南方和阿穆尔河流域左方的俄罗斯领地已经同西伯利亚联系起来。

在把阿穆尔地区和俄罗斯连接起来的道路之中,一条是水路。这条路是从阿尔巴津沿阿穆尔河和石勒喀河上行至尼布楚,从尼布楚到贝加尔湖,过贝加尔湖后沿安加拉河、叶尼塞河前进,然后通过连水陆路沿鄂毕河支流克特河航行,再经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①而抵达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最大中心托波尔斯克城。1689年由费·柯罗文率领去中国进行谈判的俄罗斯使节团,就是由这条路到达尼布楚的。

另一条路是从阿尔巴津前往鄂霍次克海:沿阿穆尔河以及格尔夫必齐河,然后沿斯塔诺夫山脉北至乌第河^②河口和乌金斯克堡,这个堡是鄂霍次克海沿岸一系列俄罗斯村镇的中心。从阿穆尔河到雅库次克也是走这条路。这条路是漫长而艰苦的。但这条路经常被利用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塞契夫斯基^③根据他搜集的当地资料和地方老居民的报告,详尽记载了从阿尔巴津前往雅库次克的途径。在十七世纪,这条道路过了斯塔诺夫山脉的山口以后,在纽格齐亚河及其支流的沿岸有许许多多过冬地、独院小农庄、码头和粮栈。

① 亦称伊尔的什河。——译者

② 乌第河即现在地图上流入鄂霍次克海的那条乌达河。——译者

③ 《关于中国边界的历史笔记》(特罗伊次科-萨夫斯克边境公署参事塞契夫斯基1846年编辑),古代文件档案馆,档案第181号,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总库图书馆赠本室,第874件,第1卷,第25—28页。载于《历史和俄罗斯古迹皇家协会讲座》,1875年,第2卷,第7—142页。

第一个过冬地是在拉卡列耶瓦河(纽格齐亚河支流)河口,在它相距三十俄里^①的耶洛夫卡河(也是纽格齐亚河支流)上游地方,有大规模的粮店,这些粮店的粮食是由雅库次克经勒拿河、奥廖克马河和纽格齐亚河运去的。

第二个过冬地位于距离这些粮店二十俄里的耶洛夫卡河右岸。接着在距离这个过冬地二十四俄里的纽格齐亚河左岸,有一个大码头,从这里沿纽格齐亚河到奥廖克马河,又沿奥廖克马河到勒拿河,然后沿勒拿河上行到库塔河,再经连水陆路而达雅库次克。此外还有其他道路。

在十七世纪的八十年代,俄罗斯政府认为达呼尔地区是自己的合法领地,并认为蒙古诸汗国和中国觊觎达呼尔地区是妨碍俄罗斯的合法权利。

在评价十七世纪俄罗斯在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河流域的殖民活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时,必须说明,沙皇俄罗斯所征服的许多部落在以前是绝对不曾依附于邻近的任何大国的。把俄罗斯在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进行殖民的整个复杂过程只归结为掠夺,只指出达呼尔地区合并于俄罗斯的过程的暴力方面,是与历史不符合的。认为俄罗斯征服东西伯利亚的惊人迅速只是由于鄂温克人、亚库特人、布里亚特人以及其他各族人民没有火器所致,是完全不正确的。

既不应低估十七世纪俄罗斯沙皇政权对西伯利亚的封建的沉重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压迫,也不应忽视西伯利亚当地的诸部落渴望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给以保护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

俄罗斯政府在十七世纪要扩展自己在东西伯利亚的领地,所以力图使更多的土著居民缴纳毛皮实物税。俄罗斯的军职人员不是以屠杀西伯利亚各族人民为目的。定居于东西伯利亚新地区的

^①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

主要是俄罗斯的劳动群众——农民。这就给殖民地地区带来了和平的经济开发。所以俄罗斯人和当地居民之间一般都取得了相互的理解。加入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就等于保证了东西伯利亚各族人民和部落的相对安全,使之免于接连不断的外患和内争。

俄罗斯与蒙古诸汗国的关系

在十七世纪,俄罗斯与蒙古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远东的国际事件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蒙古介于满洲帝国和沙皇俄国之间,所以不能不受到俄罗斯和满洲之间的矛盾的影响。这些矛盾的存在有利于蒙古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①

十七世纪俄罗斯对蒙古的政策,其主要内容决定于这样一个意图,即搞好同蒙古诸汗国的商业关系,获得经过蒙古把商品运往中国并从中国运回商品的可能性。^② 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的国籍问题,在俄罗斯和蒙古的关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七世纪时,蒙古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封建汗国和酋长国,这些汗国和酋长国之间经常为了牧地、牲畜、缴纳毛皮实物税的臣民,以及通往中国、俄罗斯和中亚细亚的商业道路的统治权而发生战争。蒙古诸汗不仅自己互相残杀战斗,而且同相邻的西伯利亚各族人民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人、鄂温克人,以及正在开发西伯利亚并把西伯利亚各部落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的俄罗斯人作战。

蒙古诸汗彼此之间以及同邻近各族人民间经常进行的封建战争,为蒙古人民^③和西伯利亚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其有害的后果。这些战争使蒙古的劳动人民群众倾家荡产,加深了封建剥削,阻止了国家的发展,把国家变为在当时强大起来的满洲诸汗的便于侵

①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莫斯科 1954 年版,第 149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131 页。

略的对象。为了压制被压迫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蒙古诸汗利用了有利于封建剥削的喇嘛教。

南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的民族和部落直接受到蒙古诸汗的奴役威胁，苦于永无宁日的毁灭性袭击。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殖民固然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沙皇政权的民族压迫，但却在颇大程度上使西伯利亚避免了蒙古诸汗的侵袭。

这就是西伯利亚当地居民自愿接受俄罗斯国籍的原因之一。

蒙古北部的劳动群众在十七世纪就为了逃避诸汗的封建的残酷内讧而跑到俄罗斯领域去，其原因也在于此。满洲诸汗利用诸汗^①的内讧、仇恨和蒙古的割据状态，在十七世纪初先后征服了蒙古南部以及蒙古东部的诸汗国，把称为察哈尔的这些地区并入满洲国家的版图。

察哈尔蒙古的被征服加强了满洲人的力量，帮助他们在十七世纪中叶征服了中国。

1636年满洲人征服蒙古南部和东部(察哈尔)以后，北蒙古(喀尔喀)和西蒙古(准噶尔)两汗国还保持着独立。^②它们分布于喀尔喀河^③、克鲁伦河、土拉河、鄂尔浑河、伊犁河诸流域以至巴尔喀什湖。喀尔喀和准噶尔的领域与俄罗斯领地接壤，所以它们在对抗满洲诸汗的斗争中利用了与俄罗斯接壤的地位。

喀尔喀封建酋长国是俄罗斯与之建立联系的最初一些蒙古酋长国之一。它被称为“黄金汗”国或阿勒坦汗国。它的领土位于乌布苏诺尔地区。^④十七世纪的俄罗斯商队一般都是经过这个汗国到中国去的。

① 指蒙古的。——译者

②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144—145页。

③ 即哈勒欣河。——译者

④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150页。恩·恩·奥格洛勃林：《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案卷和册籍一览》，第1卷，莫斯科1898年版，第212页。

俄罗斯与蒙古诸汗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早在十七世纪初就已开始，但经常性的联系则是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领地达到了叶尼塞河、色楞格河、鄂嫩河、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的时候开始的。托木斯克的将军们与阿勒坦汗的国家发生关系最早，在1632年就派遣了由大贵族之子卡里亚金率领的使节团到那里去“探听前往中国的道路”。后来也有这种使节团到阿勒坦汗，到各台沙和准噶尔汗那里去。

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案卷中保存有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派到蒙古汗那里去的这种使节团的出使报告二十三份。^①蒙古诸汗也派使节前往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各城市，后来并派使节前往莫斯科，请求准其加入俄罗斯国籍并把兵器和金银之类的“沙皇恩赐”送到他们那里去。在1640和1641年间，由托波尔斯克大贵族之子小列麦佐夫率领的使节团留在了准噶尔。使节团的目的是把沙皇礼物赠送给准噶尔的巴图尔琿台吉^②和了解这个汗国。1646年，彼得·萨班斯基从托波尔斯克到准噶尔去监督请求加入俄罗斯国籍的准噶尔酋长科卡宣誓。在十七世纪的整个期间，经常有俄罗斯使节到准噶尔“去探听消息”：1649年有哥萨克瓦西里·布尔纳绍夫，1652年有大贵族之子伊凡·巴伊加乔夫，1658年有哥萨克斯·维亚特金和德·科培洛夫，1665年有哥萨克瓦西利·利塔索夫，1668年有哥萨克瓦西利·贝林以及其他等人等。^③

蒙古人偷偷把俄罗斯人的牲畜赶走，蒙古汗抢劫缴纳毛皮实物税的俄罗斯臣民，即外贝加尔地区的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也往往是俄罗斯组织使节团的原因。

① 恩·恩·奥格洛勃林：《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案卷和册籍一览》，第1卷，莫斯科1898年版，第212页。

② 巴图尔琿台吉，或作巴图尔洪台吉，是准噶尔汗的名字。——译者

③ 恩·恩·奥格洛勃林：《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案卷和册籍一览》，第1卷，莫斯科1898年版，第211页。

1660年，蒙古台沙对俄罗斯的巴拉干斯克堡进行了侵袭和劫掠，并掳走了许多布里亚特人。^①因此派了使节团到蒙古去提出抗议。1673年，尼布楚将军帕维尔·舒利金派哥萨克波里斯·洛日金“及伙伴们”带着俄罗斯沙皇的礼物和抗议书到雅拉文斯克草原去会见塔布努特的斡齐赉汗，抗议斡齐赉汗的臣民抢劫俄罗斯的臣民。^②

1674年，舒利金又派尼布楚的军职人员格里果利·隆沙科夫和伊格纳季·米洛万诺夫到“蒙加的各兀鲁思”去购买牲畜。^③他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自从1666年俄罗斯哥萨克建立了色楞格斯克堡之后，有许多当地的布里亚特和鄂温克部落前来加入俄罗斯国籍，因此从那时起，俄罗斯和喀尔喀诸汗的关系开始有了敌对的性质。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喀尔喀境内存在着几个汗国，以斡齐赉赛音汗（契罕多尔济）^④及其两个兄弟巴图尔琿台沙^⑤和喇嘛教首领格根呼图克图^⑥的领地为最大。喀尔喀诸汗是外贝加尔地区俄罗斯人的近邻，所以他们对色楞格河及其各支流一带俄罗斯领地的扩张是十分警惕的。

1673年，斡齐赉赛音汗和巴图尔琿台沙派他们的使臣谢库恰和扎鲁克塔带着公文前往莫斯科，他们在公文里请求沙皇派遣沙皇的使节带着沙皇国书到他们那里去，并在国书中表明俄罗斯军

① 列宁格勒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第一届西伯利亚委员会，案卷第2件，第120张。

②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22卷。

③ 同上。

④ 斡齐赉赛音汗即土谢图汗，契罕多尔济在《清史稿》中为“察”罕多尔济。——译者

⑤ 在《清圣祖实录》中为西地西里巴图尔台吉。——译者

⑥ 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清圣祖实录》中为“译卜尊丹巴胡土克图”。——译者

队将同蒙古诸汗和睦相处，而不同他们作战和“寻衅”。汗们慎重地询问，色楞格斯克堡是否是沙皇命令修建的，能不能把它移往别处。汗们以个人名义说，他们同色楞格斯克堡的居民“……相处得很友好，双方都没有受到任何委屈，今后如果不受到什么委屈，他们仍将与他们友好相处，保持和睦，但如果他们做出坏事，如果他们与他们吵架不和……”^①

斡齐赉音汗通过他的使臣传达口信说，如果沙皇派遣特使、专使或“商人”到中国去，他将供给他们饭食、大车和向导，直到中国为止。“阿察赉汗^②同中国有交谊和来往，从他们那里到中国的行程约一个月。”^③

蒙古使臣在莫斯科得到的答复是，“请阿察赉汗同所说的那些大君主的人们和睦友好地相处，亲善，交往……色楞格斯克堡的建立，居民居住于该堡，使者到阿察赉汗那里去，都是奉大君主之命，并不是自作主张，色楞格斯克今后仍旧不动，但将命令色楞格斯克居民与蒙加人和睦友好地相处。”^④

但俄罗斯领地和俄罗斯影响在外贝加尔地区的扩展，引起了蒙古诸汗的对抗：他们时常攻击毛皮实物税缴纳者，常有偷着赶走牲畜的事情。

1678年，尼布楚将军阿列克谢·托尔布津派遣以阿夫杰依·萨马拉为首的哥萨克使节团代表自己到额尔古纳河去会见蒙古的达尔浑琿台沙，抗议赶走牲畜和抢劫俄罗斯人的问题。^⑤

派遣阿夫杰依·萨马拉到达尔浑琿台沙那里去，是因为尼布楚的哥萨克斯捷潘·波兹尼扬科夫和费多尔·苏克列姆斯基诉苦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2张背面。

② 即斡齐赉汗。——译者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2张背面。

④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59卷。

⑤ 同上。

说，他们得到帕·舒利金将军的允许到“蒙加的兀鲁思”去购买牲畜并同额尔古纳河附近呼伦池一带的蒙古人进行贸易，但后来达尔浑珲台沙的人们袭击他们，把所买的全部牲畜都赶走，哥萨克们几乎被杀死。

同是在 1678 年，缴纳毛皮实物税的鄂温克人向尼布楚将军诉苦说，“蒙加人带着中国货物”来到他们的石勒喀河，“在缴纳毛皮实物税之前把毛皮实物税缴纳者的东西廉价买光……”^①

由于这种控诉，哥萨克和译员奉派去把蒙古商人带到尼布楚来。蒙古人与哥萨克见面之后退还了“不正当地”买去的貂皮，但本人则跑掉了。俄罗斯使者只得遵照将军的命令去对戴-琿台沙说，今后他仍可以让自己的人“贩卖各种中国货物”和牲畜，但是要让蒙古商人到尼布楚来进行贸易，那里将准许他们自由贸易，并由俄罗斯给以保护，以便“那些蒙加商人不受任何委屈”。^②俄罗斯当局关心发展同蒙古诸汗国的和睦关系，还因为从俄罗斯到中国去最著名的道路是通过蒙古的。

清朝皇帝康熙巧妙地利用了喀尔喀诸汗对俄罗斯在外贝加尔地区加强地位的不满，利用了喀尔喀军队以减少俄罗斯在阿穆尔河的兵力。1676 年，清朝的使节团带着康熙的厚礼去到斡齐赉赛音汗、巴图尔珲台沙和格根呼图克图那里。使节团争取到清朝与喀尔喀诸汗订立了反俄军事同盟，这个同盟在 1689 年以前是起了作用的。当 1684 年康熙的军队围攻阿尔巴津时，新的清朝使节团又来到喀尔喀，它用厚礼进一步巩固和明确了军事协定的条款。康熙的使臣和喀尔喀诸汗约定；当俄罗斯军队到达达呼尔地区时，蒙古人将以“军事方式”进攻“乌金斯克堡和色楞格斯克堡”，并将扣

①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 59 卷。

② 同上。

留俄罗斯人和洗劫缴纳毛皮实物税的臣民。^①

1688年，伊凡·伏拉索夫和费奥多尔·柯罗文接到过许多起对蒙古台沙杀人越货的控诉。尼布楚的哥萨克报告说，蒙古汗“……杀死尼布楚的哥萨克骑兵菲利卡·德沃梁宁诺夫，屠杀了十九座帐篷的通古斯毛皮实物税缴纳者，掳去他们的妻室子女，赶走他们的畜群”，^②不久后这些台沙“又在鄂嫩河摧毁十座通古斯人的帐篷，掳去他们的妻室子女，其他的人全被杀害，从捷列姆宾斯克堡赶走了哥萨克的一百三十四马。”^③

尼布楚将军伏拉索夫派鄂温克酋长根忒木尔的儿子帕维尔·根忒木罗夫率领一支由三百名哥萨克和鄂温克军职人员组成的队伍前往鄂嫩河，命令蒙古人归还牲畜和俘虏。问题是以战斗解决的，在战斗过程中，帕维尔·根忒木罗夫的部队击溃了蒙古军队。

柯罗文派遣他的使者到格根呼图克图以及塔布努特的某些台沙那里去，提议和平解决冲突、归还赶走的牲畜和俘虏、停止侵袭俄罗斯的城堡。但这些尝试没有成功。蒙古的可汗们和台沙们依恃中国的满洲统治者的支持，对俄罗斯的居民点一再进行掠夺性的侵袭。塔布努特的台沙埃尔杰尼不仅不归还赶走的哥萨克马匹，而且命人痛打俄罗斯的使者塔拉斯·阿法纳西耶夫。^④其他的可汗和台沙则否认自己的人参加了强盗式的袭击，虽然俄罗斯人以事实证明的确有其事。^⑤例如，呼图克图甚至在俄罗斯使者的马匹被赶进他的大本营时，还向使者们保证说袭击不是他的臣民所为。

为了保证外贝加尔地区后方的巩固，为了保护俄罗斯哥萨克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730张背面—731张。

② 同上，第13件，第90张。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10件，第313张背面，364张。

⑤ 同上，第298张背面。

以及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不受蒙古人的抢劫，柯罗文在 1688 年夏天向色楞格河的支流大希洛克河和小希洛布河一带塔布努特诸台沙的游牧所在地实行了军事远征。在这次军事远征中，俄罗斯人和鄂温克人都参加了。他们在战斗中击溃了八个塔布努特台沙的军队，迫使他们在承认自己是永远缴纳毛皮实物税的俄罗斯臣民的条约上签了字。诸台沙应允一定“……不受中国汗、蒙古汗以及格根呼图克图的统治，不向俄罗斯城堡发动袭击”。^①

与此同时，布里亚特和蒙古的十个舒林加“自愿地”来到尼布楚，要求率同他们的各族“约两千人”加入俄罗斯国籍。他们说他们到尼布楚来是因为害怕与准噶尔人作战所带来的毁灭，^②他们报告说，准噶尔的噶尔丹汗击溃了喀尔喀军队，喀尔喀军队的残部逃往中国边境去了。为了寻求保护，蒙古、布里亚特和鄂温克的许多氏族离开了蒙古到俄罗斯境内来游牧。^③

康熙皇帝力图利用分裂方法来征服整个蒙古，他煽动了准噶尔和喀尔喀诸汗之间的仇恨。1688 年，准噶尔进攻斡齐赉、巴图尔珲台沙和呼图克图的领地。

准噶尔的珲台吉噶尔丹利用蒙古军队被调去围攻俄罗斯城堡（乌金斯克和色楞格斯克）的时机，开始了对斡齐赉赛音汗和呼图克图的领地以及喀尔喀全境的进攻。准噶尔汗国在十七世纪后半期由于征服邻近的吉尔吉斯诸部落和夺取了阿勒坦汗的一部分领土而强大起来。俄罗斯使臣柯罗文在搜集了关于蒙古诸汗国的一切情报以后报告莫斯科说，在 1688—1689 年间，“……卡尔梅克人（即准噶尔人——作者）在军事上比蒙加人强大得多，他们拥有许

① 《国书和条约汇编》，第 4 卷，莫斯科 1828 年版，第 596—599 页。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9 件，第 578 张。

③ 同上，第 579 张。

多从布哈拉人那里得来的火器”。^①

准噶尔的琿台吉噶尔丹及其后继者力图征服蒙古全境，跟清政府进行了顽强斗争，但结果准噶尔于1757和1758年间为满洲皇帝的军队所摧毁，被扫荡一空。

在这次斗争的过程中，敌对双方都力图预先取得俄罗斯的支持。噶尔丹希望同俄罗斯保持和睦关系，希望俄罗斯同中国的矛盾尖锐起来。1689年秋，加入了俄罗斯国籍的塔布努特的台沙们报告柯罗文说，噶尔丹汗击败了斡齐赉赛音汗和格根呼图克图，占据了蒙古全境。斡齐赉汗和格根呼图克图逃到中国边境去了。^②噶尔丹在征伐喀尔喀时诡称是奉沙皇之命与俄罗斯人一同作战的。^③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不反对侵占加入俄罗斯国籍的蒙古人的土地，并且劫掠了俄罗斯的商队，截夺了俄罗斯的柯罗文使节团在和平谈判准备时期与北京交换的信件。

康熙皇帝深恐噶尔丹如果得到俄罗斯的支持，就将更加强大大起来，所以派了由一百人组成的特别使节团到他那里去探听俄罗斯人是否与噶尔丹军队联合了起来，他对俄罗斯和准噶尔汗之间没有订立同盟的消息很是满意。^④

噶尔丹汗也不反对暂时与中国达成协议，以便巩固自己在蒙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616—617张。

② 耶稣会教士迪·哈尔德：《中华帝国和中国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附各该地区全图和分图以及西藏、朝鲜全图和分图）》（法文版），第4卷，1736年第284页。（以下只引其中的《张诚日记》部分，简称《张诚日记》）（这是法国人迪·哈尔德关于中国史地的著作，其中搜集有许多在远东传教的传教士的回忆录，《张诚日记》为其中之一。张诚法国人，康熙时来华传教，很快学会满语，尼布楚订约时与另一传教士徐日升一同担任译员，据解放前夏译《清朝全史》称：“……康熙二十八年复引耶稣教士徐日升、张诚、白进、安多等于内廷，使日日轮班，进讲西学，彼等皆能深知满洲语言，故教授测量法算学天文人体解剖物理等学不觉困难，其中张诚则帝或旅行必命随从或每日或隔日必命进讲……”。——译者）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714张背面。

④ 《张诚日记》，第150—151、161页。

古的地位。他听到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消息后，派了一个大规模的使节团到那时正在蒙古(似乎是为了“射鹿”)的康熙那里去，对俘虏了博格德汗的一些臣民表示歉意。^①

俄罗斯人在外贝加尔地区只有很少的军队，所以不能与蒙古发生军事冲突。柯罗文深恐如果卡尔梅克人“……同蒙加领主们以及中国汗……商妥……以战争方式来进攻臣民(俄罗斯的——作者)和缴纳毛皮实物税的非俄罗斯人以及达呼尔地区和贝加尔地区的城堡”^②，那时俄罗斯人在达呼尔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由于人少是没有办法而且也不可能”防御的。因此，柯罗文以他个人名义给噶尔丹送去了一封亲切的书信以及礼物；他建议进行“亲善的通信”。并通知一切有关“蒙加的消息”，但没有谈缔结同盟的问题。

1691年，噶尔丹派使节团到莫斯科提议缔结军事同盟。这时托波尔斯克将军也派了大贵族之子马特维·尤金到噶尔丹汗那里去了解准噶尔统治者对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俄罗斯领地的真正意图。尤金询问噶尔丹为什么掠夺已经宣誓加入俄罗斯国籍的蒙古台沙们。噶尔丹汗相当狡猾地回答说，蒙古人是他的敌人，也是俄罗斯人的敌人，喀尔喀地区是他的领地，他准备把历来属于蒙古人而不属于满洲皇帝的阿尔巴津让给俄罗斯沙皇。^③

由此可见，噶尔丹采取了两面政策，他企图在统一蒙古的斗争中使俄罗斯站到自己方面来。但形势不是有利于这种企图的。

俄罗斯当局力图同全蒙古和中国保持和睦的关系。

① 《张诚日记》，第160页。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733张。

③ 勃·格·库尔茨：《十七至十八世纪俄罗斯和中国的殖民政策》，载《新东方》1927年第19号，第197页。

第二节 俄罗斯同中国的外交和 贸易关系的发生

同东方各国的贸易，自古以来就在俄罗斯的对外关系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在东方市场上销路很广的皮货是俄罗斯向这些国家出口的主要物品。能赚外汇的珍贵皮货是由沙皇国库垄断的，政府从不放松对扩大皮货销售市场的关心。沙皇给西伯利亚各地将军的敕令总是责成他们“访查新的民族和国家”，同他们进行贸易，并搜集有关同这些国家往来的交通路线的情报。

很久以前，可能还是在十三世纪俄罗斯王公们前往蒙古汗大本营的时候，在俄罗斯就知道有中国的存在。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的时候，俄罗斯同中国已经通过布哈拉^①和伊朗发生了贸易关系。^②

恩·姆·卡拉姆津根据他所发现的手写本出使报告断定，早在1567年就有阿达曼伊万·彼得罗夫和布尔纳什·亚雷切夫二人经蒙古到中国去搜集关于这个国家的情报。^③不能排除确有其事的可能，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关于俄罗斯人这次到中国去旅行的原本档案文件。^④

① 旧称不花剌。——译者

② 克里姆林宫中发现有属于十五世纪末或十六世纪初的中国豆青陶瓷杯。十六世纪末的商务书籍中载有称为“中国绸”的丝织品；伊凡四世的征衣清单中列有用中国黄缎做的无领袍。见姆·弗·费赫涅尔著的《十六世纪俄国同东方诸国的贸易》，莫斯科1957年版，第75、76、94页。

③ 恩·姆·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的历史》，第9卷，第6章。

④ 某些历史学家对卡拉姆津的这个说法有不同意见。例如，弗·伊·波克罗夫斯基对这个问题写过一部专书叫做《1618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万·彼特林的蒙古和中国之行（阿达曼伊万·彼得罗夫和布尔纳什·亚雷切夫1568年的旅行是虚构的）》，圣彼得堡1914年版。但这本书只证明了出使报告是彼特林的，而不是伊万·彼得罗夫和布尔纳什·亚雷切夫的，没有驳倒卡拉姆津的论断。

十七世纪初，托木斯克将军勃·弗·沃伦斯基在搜集关于邻近地区和远方地区的资料时，从吉尔吉斯人那里探听到，在距离托木斯克一个月路程的南方，是黄金帝国，即阿勒坦汗的蒙古帝国，在距离托木斯克三个月路程的地方，是富饶的中国，它与许多国家进行着贸易。1608年，沃伦斯基派托木斯克的哥萨克骑兵伊万·别洛戈洛夫、马特维·库季茨和费奥多尔·霍杰金出去探听前往黄金帝国和中国的道路。他们跋涉到蒙古的西部边界，但被迫返回，因为那时蒙古同黑卡尔梅克人发生了战争。^①

1616年，托波尔斯克将军伊·斯·库拉金奉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之命派遣塔拉城的哥萨克阿达曼瓦西利·丘麦涅茨和十人长伊万·彼得罗夫·捷库季耶夫到阿勒坦汗那里去，目的是要探听前往中国的道路和解决向俄罗斯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吉尔吉斯人、卫拉特人^②和铁勒乌特人^③遭受阿勒坦汗袭击的问题。使节们去到设在乌布苏诺尔北岸附近的阿勒坦汗大本营，在帐篷的喇嘛庙中受到汗的隆重接待。

阿勒坦汗当着两个使臣的面举行了参拜佛教诸神的仪式，而两个使臣则误以为是向俄罗斯沙皇宣誓。但阿勒坦汗当时非常强大，所以是不会加入俄罗斯国籍的。^④

瓦西利·丘麦涅茨留在阿勒坦汗大本营的时候，遵照对他的指示详细询问了中国情况，打听了这个国家的居民和他们的宗教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蒙古事务档案，1616年，缺号案卷，《派遣瓦西利·丘麦涅茨去见阿勒坦汗》，第1—15张。并参看弗·伊·波克罗夫斯基著《西伯利亚哥萨克伊万·彼特林的蒙古和中国之行》，圣彼得堡1914年版，第5页。

② 卫拉特元称“翰亦刺”，明称“瓦刺”，清称“卫拉特”或“额鲁特”、“厄鲁特”。——译者

③ 南部阿尔泰人的一支。——译者

④ 阿勒坦汗接待瓦西利·丘麦涅茨使节团的情形载于案卷《派遣瓦西利·丘麦涅茨去见阿勒坦汗》的第16—31张，并参看恩·普·沙斯京纳所写学位论文《莫斯科同阿勒坦汗最初的往来》的内容提要，列宁格勒1950年版，第10—11页。

信仰以及中国人的一些贸易关系和“作战方法”。^①

瓦西里·丘麦涅茨回到莫斯科后报告说，中国位于海边，距离蒙古有一个月的路程，是个强大国家，统治者是居住在高大的砖城中的台本皇帝^②。中国人制造的产品有丝绒、绸缎和各种丝织品；国中富于金银。中国的军事力量是强大的，武器为弓和矛，但也有火枪和大炮。

莫斯科对瓦西利·丘麦涅茨和伊万·捷库季耶夫的旅行结果非常满意；参加旅行的人获得珍贵的赏赐，并蒙赐给大贵族之子的称号。

阿勒坦汗在山专使送往莫斯科的国书中答应向导俄罗斯人经过蒙古领土到中国去。他请求沙皇给他带回银器、珍珠、二十支火枪和两把军刀。专使们是随同瓦西利·丘麦涅茨一起来到莫斯科的，沙皇殷勤地接待了他们，赠与了礼品，并像对待加入俄罗斯国籍的臣民那样给了阿勒坦汗以沙皇的恩赐。^③

1618年，将军库拉金派遣伊万·彼特林、安德列·蒙多夫和彼得·基齐洛夫前往中国，并且拨给了他们购买中国商品的资金。^④

四个月之后，他们与阿勒坦汗所派陪伴他们的人拉伯依·塔尔罕和比利特库一同到达北京。在北京，俄罗斯人被安置在舒适的宾馆里，被允许进行交易，但没有被允许谒见万历皇帝（1573—1620），因为他们没有沙皇的国书和礼物，“他们没有东西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蒙古事务档案，缺号件，第20—31张。

② 瓦西利·丘麦涅茨出使时的1616年为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台本”疑为“大明”的音讹。——译者

③ 弗·伊·波克罗夫斯基：《西伯利亚哥萨克伊万·彼特林的蒙古和中国之行》，第26页。

④ 古代文件档案馆，蒙古事务档案，1618年，第1件，第1—4张。并参看弗·伊·波克罗夫斯基的《西伯利亚哥萨克伊万·彼特林的蒙古和中国之行》一书，第28页。

带去见皇帝”。^①彼特林和他的同行者在北京勾留了一个多月，取得一封明朝^②万历皇帝致俄罗斯沙皇的国书之后，被打发回国。国书的内容是：“中国皇帝万历。有二人自罗斯来。朕谕此二罗斯人曰：既为贸易而来则贸易可也，去后仍可再来。在人世间，尔为大君主，朕为大皇帝，朕与尔之间并无阻隔，可常相往来。尔如贡珍品，朕亦将赐以上等绸缎。今尔等即将归去，再来时如系奉大君主之命，应携带大君主之国书，届时朕亦将报以国书。尔等如携国书，朕即命以上宾相待，朕不便遣使访大君主，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身为皇帝，基于本国之信仰，既不便躬赴国外，亦不允使臣及商人出国。”^③

1619年春，伊万·彼特林和安德列·蒙多夫回到托波尔斯克，呈交了他们此行的出使报告，其中详细叙述了通往中国的道路和他们在俄国勾留的情况。彼特林和蒙多夫的主要结论的内容是：从俄罗斯至中国路途遥远，而且非常艰难，因为要经过非臣属于俄罗斯的许多“不和气的”蒙古汗国。

由于没有译者，中国国书的内容在很长时间里未为俄罗斯人所了解。一直过了五十六年，即直到1675年^④尼古拉·斯帕法里使节团前往中国的时候，才在托波尔斯克和北京先后把它翻译出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蒙古事务档案，1618年，第1件，第1—4张。并参看前面提到过的弗·伊·波克罗夫斯基的著作，第28页。参看《伊万·彼特林的出使报告》（载于《西伯利亚公报》1812年第2期）和伊·伊·斯烈兹涅夫斯基的《关于人们知道不多的或完全不知道的文献的介绍》，圣彼得堡1874年版。

② 明朝是汉族的，满洲人推翻它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清朝政权。

③ 这封国书的译文保存在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3件，第218张背面，219张。并曾发表于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的《俄中两国间的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版，第7页。（1618年为明神宗四十六年，明史中查不到关于此事的记载，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俄罗斯部分有“明时阻于朔漠未通中国”之语，关于这个文件，只能根据俄文译出，还有待进一步的查考和证实〔张星烺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曾提到这个文件，但也是以外国著作作为根据的，见该书第2册，第529页〕。——译者）

④ 1675年为康熙十四年。——译者

来。从历史方面来说，这封国书值得注意的是它证明了俄罗斯同中国最初的关系是在互相关切的基础上发生的。

伊万·彼特林的使节团没有导致建立直接的外交和贸易关系。俄罗斯人没有能由于这个使节团而获得实际的利益，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与中国之间阻隔经常互相敌对的蒙古汗们的广大领地。

因此，1620年莫斯科有令给托木斯克，如果没有沙皇命令，今后“不要同阿勒坦以及其他蒙加领主或中国有任何往来，因为这些国家距离遥远，商人们的旅途漫长”。^①

外交事务衙门的案卷中还保存着一件1649年的早期中国国书，内容是这样的：“中国万历汗之子朱汉继。^②先皇帝在位时，大君主之商民时来通商，今日我处则无大君主之商民前来。先皇帝在位时，大君主之商民来此者皆睹天日。朕今在位，尔国商民竟无来此者。彼等若来此，必将与天空之明月媲美。尔国民到来，朕必快慰而予以恩赐。尔今献鹿角一双，朕赐汝绸缎七百匹。尔进献珍品，朕必加倍赐还。兹携去玉杯三十二盞赐与尔大君主。尔大君主之使者来此者三人，朕已命三千人恭送尔国之大君主使者一日之程直至大江矣。”^③

这封国书的内容，在俄罗斯也是直到1675年才为人们所了解。

史料中一点没有谈到这封国书送达莫斯科的情况，所以不知

① 勃·格·库尔茨：《十六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俄中关系》，哈尔科夫1929年版，第26页。

② 朱汉继（Джу-ханди）为译音。查我国历代皇帝没有名朱汉继者。《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969年，莫斯科版）一书的人名索引有如下注释：“朱汉继即思宗，明朝皇帝，年号崇禎”。显然，朱汉继为“朱由检”之音误。但朱由检为万历帝（朱翊钧）之孙，死于1644年。——译者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3件，第219张。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外交文件汇编》，1882年版，第7页。

弊。到十七世纪初，封建制度把国家引上了经济和政治的深刻危机的状态中。

明代中国的军事力量是由雇佣军所组成，军队纪律极坏，装备落后，指挥人员很差，舰只是陈旧的。

同时，中国在十七世纪初面临西欧各国进攻的威胁。在国家的北部，满洲人的进攻已经开始。

在十七世纪以前，满洲南部属于中华帝国的版图。十七世纪初期，在满洲中部松花江流域居住着从事于畜牧的满洲人诸部落，他们那时正经历着原始公社关系瓦解和封建关系形成的时期。满洲贵族把这些部落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并建立了规模相当巨大的军队，这支军队由天然的猎人所组成，对明朝皇帝们的腐化军队来说成为一种危险的武装敌人。

利用明代中国的日益衰弱，新兴的满洲国家征服了整个满洲和蒙古南部，并从1618年起开始与中国作战。中国同满洲人的战争是持久性的，因而暴露了明帝国的腐朽和军事弱点。战争使中国农民破了产，使封建压迫更加严重，更加尖锐起来。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群众在1628—1645年间进行了反抗封建剥削的顽强斗争。在那时，中国的封建制度还没有失去作用，所以农民战争不能消除封建关系，但农民的胜利给他们带来了暂时的轻松。李自成的起义政府对封建贵族和官吏采取了严厉的恐怖手段，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并把土地分给农民。于是以指挥明朝军队与满洲人作战的吴三桂为首的封建主承认自己是满洲王公的臣民，并与之订立了以共同镇压农民战争为目的的同盟。背叛的吴三桂为满洲人开放了进入万里长城的道路，并与他们一起战败了农民军。1644年夏，满洲人占领了北京，宣告成立自己的大清政权，接着在十七世纪的几乎整个后半期里进行了征服中国的斗争。

满洲人的发展水平远较他们所征服的中国人民为低，因此他

们不曾，也不可能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加以重大的改变。但是满洲人所建立的新朝代是依靠强大的军队和同中国封建主的同盟来统治的，因而巩固了因农民战争而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清朝开始恢复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在其中塞满了满洲人，把中国的国家土地分给满洲贵族以及卖国的中国封建主。苛刻的捐税制度逐渐制定起来。人口调查更加深了对农民的奴役。

农民战争的失败和满洲人的征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整个十七世纪期间，中国人同满洲人进行了顽强的武装斗争。反满运动直到1683年，即征服者侵入四十年之后才被镇压下去。但即使在这以后，斗争也没有停止，而以各省的分散的起义形式表现出来。清朝利用了中国的变节封建主及其军队残暴地惩治起义者。满洲当局在国内实行了血腥的屠杀，毁灭了数十座城市和数百座乡村。

在反满人民斗争接连不断的情况下，清朝采取了行政措施以巩固它在中国的政权。清朝的第二个皇帝康熙(1662—1722)为了巩固满洲对中国的统治，开始实行缓和中国和满洲的矛盾的政策，其方法是采取某些行政和财政措施与中国贵族和解。从1669年起，康熙确定了在整个帝国内征收捐税的固定范围。这种政策使国内局势有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并使清朝的政权巩固起来。

满洲人是落后民族，所以受到高度发展的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康熙皇帝是以保护文学和艺术而知名的，他是孔子哲学的崇拜者，这就促成了他与中国贵族的接近。

康熙的对外政策可以归结为征服相邻的国家和地区以扩张中国领土。同朝鲜、日本和西欧的贸易相当活跃。在被征服的蒙古、西藏、朝鲜以及其他地区，清政府实行了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政策。但中国在若干被吞并的地方的殖民，也跟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殖民一样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因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中国人民对

被征服的各族人民的发展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帝国对邻国俄罗斯的政策不是在任何方面和任何时候都相同的。清政府根据它本身对于加强和扩展满洲的需要，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力图巩固自己在阿穆尔河的地位，但在那里与俄罗斯的影响发生冲突，因而采取了隔离政策，阻止俄罗斯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

费多尔·贝科夫所率领的第一个俄罗斯正式使节团在1655年^①到达北京的时候，正值清政府侵占阿穆尔地区，同时为了对抗俄罗斯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影响而采取强迫那个地区居民移居满洲嫩江这种侵略手段之时。因此贝科夫关于建立友好关系的建议遭到敌视和拒绝。在此后的二十年间，清朝逐渐加强自己在阿穆尔河右岸的地位，1669年为了这个目的在满洲修建的城堡有：宁古塔、墨尔根和齐齐哈尔诸城以及阿穆尔河畔的瑯珺城，后者成为争夺达呼尔地区的军事基地。^②在康熙统治下的十七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清朝在阿穆尔地区的侵略政策更趋活跃，甚至表现为对俄罗斯城堡的军事进攻。

十七世纪中叶，俄罗斯已经牢固地掌握了西伯利亚，俄罗斯的哥萨克和农民又占据了阿穆尔河及其左岸各支流一带的土地并开始加以开发，俄罗斯领地已经接近清帝国的边界，所以从那时起，俄罗斯就积极而一贯地争取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

到十七世纪，俄罗斯在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来往上已经有了固定的一套形式，俄罗斯政府严格要求遵守规定的程序，最主要的是要求各邻国承认沙皇的称号。称号问题实质上是国家威信问题。俄罗斯外交家最重视的是，凡与俄罗斯发生关系的外国国家都要

^① 顺治十二年。——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总库图书馆编本室，第874件，第29张。

承认俄罗斯沙皇是“全罗斯独裁者”。

在十七世纪，俄罗斯的使臣分为三级：1. 全权大使，2. 公使，3. 信使。大使只能由杜马大贵族^①充任，有时也可以由内大臣^②充任；公使由内大臣或御前大臣^③充任，有时也由大商人充任；信使派秘书和司书充任^④。信使不能决定任何问题；他们的任务通常只限于传递沙皇的国书。使臣被授与沙皇的全权证书，并被授与秘密的或公开的详细训令（指示），在其中规定进行外交谈判的程序和方式。

在十七世纪，俄罗斯对于在本国接待外国使臣也有完全固定的习惯：还在国境时就由皇家的军职人员迎接，然后在将要到达首都时由更高级的官员迎接。沙皇在庄严的气氛中按照规定仪式亲自接待外国使臣；为了对派遣使臣的国王表示尊敬，沙皇在使臣问候他的健康和朗读祝词时从宝座上站立起来；然后沙皇把自己的王冠稍稍举起，并亲自向使臣问候他们国王的健康；沙皇站着接受使臣的全权证书和他们国王的国书，然后坐下让使臣及其随员吻自己的手，并向使臣说，他将吩咐为他们预备酒饭以及一切必需用品。使臣向沙皇致谢，然后退出。^⑤当使臣离开俄罗斯时，又重复一次同样的仪式，如果通过使臣传递国书，则由沙皇亲自把国书交给他。

俄罗斯使臣在前往其他国家时，应当要求所到的国家遵守同

① 沙皇有一个由宫廷大贵族组成的会议，称“大贵族杜马”，杜马大贵族是被指派参加该会议的大贵族。——译者

② 内大臣(окольничий)是地位仅次于大贵族的杜马参加者。——译者

③ 御前大臣(стольник)是参加大贵族杜马的地位较低的贵族。——译者

④ 十七世纪俄国的各衙门(即中央行政机关)是以大贵族为首脑，下有一个或两个秘书(лъяк)，也可以说是办公厅主任为其助手，秘书之下有若干司书，衙门的日常事务就由司书(подьячий)们在秘书领导下办理。秘书和司书都不是出身于贵族，但衙门的事务实际上是操在他们手里的。——译者

⑤ 弗·瓦林京斯基：《十七世纪的俄罗斯使节团》，圣彼得堡 1860 年版，第 18—24, 33—34 页。

样的仪式,这种仪式甚至在条约中做了规定,并且被认为是如此重要的事情,不遵守它往往会使某些问题的谈判完全中止。

俄罗斯政府对于中国也丝毫没有改变自己在外交上所规定的准则。但是封建的中华帝国也有其自己的传统观念和接待其他国家使臣的习惯,而这些习惯当然是与俄罗斯习惯不同的,所以最初在这方面发生了不少误会。由此可以明了,为什么在第一个俄中条约里俄罗斯使节团坚决要求以专门的条款来规定以后接待使臣的办法。

初期派往中国的俄罗斯使节团

第一次派俄罗斯使节团到中国去是在 1653 年,主要是为了贸易,因此派的不是使臣,而是信使,他的外交使命只是向中国皇帝递交沙皇的“亲善”国书。信使选择了托波尔斯克大贵族之子费多尔·伊萨科维奇·贝科夫,因为他是个精通商业的人,并且能够经得住到中国去的遥远而艰苦的路程。使节团的组织和派遣工作是由大国库衙门办理的,它给贝科夫拨了五万卢布作为购买货物之用,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款项。还在 1652 年,贝科夫就奉派偕同几个宣誓公务员^①从莫斯科到托波尔斯克去向西伯利亚的“内行人”切实探询,到中国去最好走哪条路,在俄罗斯各城市和西伯利亚最好购买哪些货物。贝科夫奉命以俄罗斯货物交换中国货物,现款则用以购买金银珠宝以及绸缎丝绒。在从托波尔斯克出发前,贝科夫就在当地购买了按照莫斯科价格共值一百四十一卢布六阿尔坦的中国白银和丝绸以及二百零六普特大黄,并把这些商品连同自己的报告一齐送往莫斯科。^②

① 宣誓公务员(целовальник)是由地方上推选的经营银钱财物的公职人员,就任前要举行吻十字架的宣誓仪式。——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1,85,86 张。

这一事实表明，在第一个俄罗斯使节团被派到中国去以前，俄罗斯同中国的贸易早就在进行着，这种贸易是在双方毗连的领地由布哈拉商人居间进行的。贸易达到这样的规模，在1653年已经能够在西伯利亚购进相当大批的中国商品了。沙皇俄罗斯力求扩大贸易范围并在中国市场上直接进行贸易，这是很自然的。

1653年3月，以贝科夫为首的使节团奉派前往中国。它的目的是向博格德汗递交沙皇的“亲善国书”和出售官方的货物。

在贝科夫携往中国的沙皇国书中，详细说明了俄罗斯诸君主渊源于恺撒^①奥古斯都和留里克大公^②的古老而高贵的出身，赞美了俄罗斯诸沙皇的祖先在“一切负有盛名的地区和国家中”的业绩，然后谈到俄罗斯与所有邻国都有书信往来，但同中国皇帝直到现在却还没有。因此俄罗斯不知道中国的博格德汗的称号，但如果博格德汗通过俄罗斯使臣或自己的使者答复俄罗斯沙皇，那末在以后写给博格德汗的国书中就将“正确”写出他的名字和称号。此外国书中还说明，俄罗斯君主愿同中国的博格德汗“建立牢固的友谊，实行亲善和通信，因为你们中华帝国同我们沙皇陛下领地的边疆城市是接壤的”。^③国书在末尾请求允许俄罗斯使臣从中国返回俄罗斯，不加留难。

贝科夫奉有详细的训令，这个训令起草时考虑到了俄罗斯已经知道的关于中国的情报。在那时，俄罗斯的外交家们知道，中国朝廷的大部分人相信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广大，更强盛的国家，它

① 罗马皇帝的称号。——译者

② 据传说，留里克于九世纪中叶建国于诺夫哥罗德城。——译者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4件，第19—20张，又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1663卷，第21张。国书内容在第二次派遣阿布林和佩尔菲利耶夫出使时，又重复过一次（参看中国事务档案，第2件，第2—5张）。这封国书曾由普·伊万诺夫（《国家级档案馆志》，莫斯科1842年版，第387—429页）以及恩·恩·斑蒂什-卡敏斯基（《……外交文件汇编》，第7页）发表过。又参看勃·格·库尔茨著《十六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俄中关系》，哈尔科夫1929年版，第32页。

位于大地中央，因此所有各国人民都应当向他进贡。俄罗斯人还听说中国强迫一切外国人不仅要向博格德汗本人行礼，而且要向他的宫殿的墙壁和门坎以及石头偶像行礼。从伊万·彼特林的报告中已经知道“磕头”的习俗，这种习俗实际上就是责令一切外国人必须向博格德汗的名字及其宫殿和宝座行三跪九叩礼。履行了这个仪式的人就算是承认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是博格德汗的藩属了。

给贝科夫的训令严厉命令他无论如何不得损害君主的体面。贝科夫必须把沙皇国书呈交博格德汗本人，不得向任何门坎和宫殿行礼，不得吻博格德汗的脚（但吻手是可以的）。其次应说明，中国到莫斯科去的使臣和商人可以免税通过，并将允许他们在俄罗斯全境自由贸易。此外还命贝科夫详细探听中国接待使臣的办法、军队、国库、居民、商品、税收、出入中国的道路以及与中国相邻的民族和领地。特别提到要探询博格德汗是否愿同俄罗斯建立持久的贸易关系。

为了预先通知自己的使节团的到来，贝科夫派遣托波尔斯基的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森林和托波尔斯基的鞑靼族头目彼得·亚雷什金带了一部分公家货物在他之前先去中国。他们在中国受到很好的接待：他们出售了货物并且获得了礼品，但在回国途中与贝科夫错过，以致贝科夫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①

贝科夫既不通汉语，也不通蒙古语，又没有文化。^②没有派司书跟随他，因此后来根据他口述所写的贝科夫出使报告，其内容只是枯燥地列举了使节团在前往北京的艰苦途程中所经过的居民点，简短地记述了城市、地势以及与中国官吏的会见。从这简略的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535卷，第8—14张。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4件，《派遣费·贝科夫前往中国和他的出使报告》，第97张。贝科夫奉命要把训令的各点“背下来，以便记住它的全部内容”。

叙述中知道,贝科夫是于1653年4月从托波尔斯克乘船出发,沿额尔齐斯河到达塔拉城,然后向额尔齐斯河上游航行,抵达白水^①后花了四个星期时间等待卡尔梅克的阿布赉台沙派车辆来,他派来了四十头骆驼和五十匹马。^②贝科夫的车队从白水沿额尔齐斯河左岸向阿布赉台沙的兀鲁思进发,直到1653年11月22日才抵达那里。俄罗斯人在路上看到卡尔梅克人那里有种地的布哈拉人的村庄,他们住的是土屋,种的是小麦、大麦、黍稷和豌豆。^③阿布赉台沙把俄罗斯使节团就是安顿在他那种地的布哈拉人的村子里的,这些人居住在一条叫做卡拉布盖河的小河附近,与阿布赉台沙的过冬地相距有一天的路程。俄罗斯人把沙皇礼物献给了阿布赉台沙,在他的领地过了冬;1654年春天,阿布赉台沙亲自带领俄罗斯人从卡拉布盖河进抵别什卡河,那时他正为自己在哪里兴建两座石头宫殿,“建造宫殿的工匠是由中华帝国派来的”。^④在这里,阿布赉台沙把俄罗斯人留住了五个多星期,然后使节团就继续向基兹尔巴什湖前进,经过蒙古诸台沙的领地到达额尔齐斯河的发源地,由此以达中国边境。后来贝科夫坚决地说,从俄罗斯经过卡尔梅克人的地区到中国去是困难的,因为在那个地区“食物和水都很缺乏”。^⑤直到1655年1月,他才好容易到达第一座中国城市科科坦^⑥,俄罗斯人在那里看到许多店铺和大规模的贸易,“店铺里的商品有他们中国的各色花缎和棉布,丝绸也很多,他们的耕种方式跟俄罗斯一样,生长的庄稼有小麦、黍稷、大麦、豌豆、燕麦、亚麻、大麻以及各式各样的大量蔬菜。有种种森林:橡林、桦林、松

① 白水(Белые воды)为额尔齐斯河的小支流。——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4件,第25—97张。

③ 同上,第107张。

④ 同上,第108张。

⑤ 同上,第107张。

⑥ 科科坦(Кокотан)即呼和浩特,旧称归化城。——译者

林,也有雪松林、菩提林、云杉林,但没有雪……。”^①贝科夫特别指出,他在中国没有看到种黑麦的田地。^②

从科科坦城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贝科夫是假道于蒙古人民居住的地区,1655年2月10日他抵达了第一道“关卡”,即中国本部的边境城市卡普卡^③。但清朝的都统在没有奉到“圣旨”以前不允许俄罗斯人进城达十天之久。其后来了四名官员,陪着使节团到北京(汗八里^④)去,贝科夫抵达时是1655年3月3日,即“大斋期的第三周”,亦即从托波尔斯克出发后的两年。将要到达中国的京城时,有两名满洲高级官员迎接俄罗斯使臣,“一个是蒙加事务衙门^⑤的官员,另一个是中国事务衙门的官员”。^⑥他们让贝科夫在一座喇嘛庙附近下马,并让他跪下朝着庙门行礼。贝科夫不肯行跪拜礼,他说俄罗斯人向自己的沙皇是站着行礼的,只是要脱帽而已。清朝的两位大官“代表本国皇帝”以奶茶招待贝科夫,但贝科夫不肯饮茶,理由是按照俄罗斯的信仰,斋期是不能动荤的。^⑦

中国的大官们生气地说,贝科夫既然被派到博格德汗的地方来,就应当依从他们的习俗。贝科夫接过了他们的一碗奶茶,但立即还给了他们。结果大官们满意了,于是把俄罗斯人带进京城,把他们以及与他们一起从卡尔梅克地区来的布哈拉人一同安置在一幢特殊的寓所里,每天供给每人一只羊,一坛酒,两条鱼,三碗面粉,两碗大米和一碗奶茶。^⑧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4件,第110张。

② 同上,第126张。

③ 卡普卡(Капка)即张家口。——译者

④ 汗八里——蒙古语,据解放前冯译《多桑蒙古史》附录一说:“汗八里汉语为‘中都’”,又据今译《早期中俄关系史》第154页译者注:“……释义为可汗之城,亦即帝都,见《元史》”。——译者

⑤ 大约是指理藩院说的。——译者

⑥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4件,第115张。

⑦ 同上。

⑧ 同上,第117张。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有官员们来向贝科夫索取沙皇赠给博格德汗的礼物。贝科夫声称，他将按照俄罗斯本国的习惯，在把沙皇国书递博格德汗之后呈献礼物。对此官员们回答贝科夫说，按照他们的习惯，使臣应当先献礼物，或是先行贸易，如果是派来贸易的话。^①

贝科夫表示不同意说，他是派来“向你们的皇帝递交他的君主关于通好、友爱、和睦的亲善国书的……并非为了贸易”。^②

博格德汗的官员们声称，既然如此，他们奉有从使臣这里强取礼物的命令。贝科夫指出，皇帝左右的人抢夺使臣是不相宜的，对此官员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抢夺他的公家财物，只是取走沙皇本来赠给博格德汗的礼物。^③在这两天之后，俄罗斯使臣被通知把沙皇国书带到理藩院去交给博格德汗的近臣。贝科夫拒绝说，他是奉派来见博格德汗本人，而不是来见他的官员的。此后俄罗斯使节团就与阿布资的布哈拉商人被分开来，于1655年4月1日搬到另一所宾馆去住，在那里一直被拘留到1655年8月底，不过有权同前来宾馆的中国人进行贸易。

从8月12日起，清政府的官员访问了贝科夫许多次，劝他到衙门去递交国书。但是贝科夫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我没有见到你们的皇帝，不便到衙门去。”^④官员们威胁说，博格德汗对使臣的不服从要杀头的。对此贝科夫回答说，即使把他粉身碎骨，“不见到皇帝的面，他也不去见衙门的人，不递交君主的国书。”^⑤

争论很久也没有取得协议。于是那些从贝科夫那里强迫取走沙皇礼物的官员于1655年8月31日把那些礼物送到他的寓所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4件，第117张。

② 同上，第119张。

③ 同上，第120张。

④ 同上，第120张。

⑤ 同上，第121张背面。

来，并说博格德汗命令退还礼物，因为使臣不听博格德汗的旨意，不向衙门递交沙皇国书，不“跪倒”行礼，而所有其他各国的使臣都是不见到博格德汗就向他行礼的。^① 退还礼物之后，官员们命令贝科夫准备迅速离开北京。1655年9月7日，贝科夫离开了中国，带回沙皇的“亲善”国书，没有完成他的旨在交换函件和礼物的外交使命。

清朝的中国政府不供给贝科夫归途的车辆；而且陪同贝科夫到边境的警卫队不准俄罗斯人在中国城市和乡村购买牲口。

贝科夫在归途中不得不克服巨大的困难，忍受饥渴与严寒。因此直到1656年6月他才好不容易返抵托波尔斯克。^②

对前往中国的贝科夫使节团说来，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汉语译员；同中国官员的一切谈判都是这样进行的：先由代表阿布赉台沙跟随贝科夫同去的布哈拉人伊尔基·穆拉把汉语译成蒙古语，然后由托波尔斯克的哥萨克骑兵彼得·马利宁把蒙古语译成俄语。^③ 经过这样两重的翻译，不正确性和不相宜的废话在所难免，而这是无助于达成协议的。阿布赉台沙的代表布哈拉人伊尔基·穆拉对俄罗斯人的态度可能不十分忠实，所以这个事件过去不久之后，俄罗斯商人抱怨布哈拉人在中国为他们制造了巨大障碍，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俄罗斯访问中国的使节团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在阿穆尔河所形成的某种政治局面，这种政治局面引起了清帝国和沙皇政府的竞争。

贝科夫在他的报告中也指出了这一原因。^④

西伯利亚的将军们在贝科夫还没有回国以前就曾经向莫斯科报告说，贝科夫在中国的被扣留看来是与哥萨克远征阿穆尔河有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4件，第122张。

② 同上，第123张。

③ 同上，第122张。

④ 同上，第5件，第9张。

关的。

贝科夫的久去不归使俄罗斯政府非常不安，它担心交他带去的沙皇财物。为了探听贝科夫的消息，托波尔斯克将军阿·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于1655年派遣托波尔斯克大贵族之子伊凡·杰德科夫、哥萨克骑兵亚科夫·弗罗洛夫和鞑靼军职人员乌拉兹·马麦托夫带着沙皇礼物去访问卡尔梅克的阿布赉台沙。1655年12月，三个使者回来了，还有阿布赉台沙的两个使者带着覆信一同前来，覆信里报告消息说，在中国，“中国皇帝不信任”费多尔·贝科夫，扣留他是因为他带的礼物少，而且不把沙皇国书交给博格德汗的近臣。阿布赉的使者对贝科夫的命运表示担心。^①

为了营救贝科夫和他所带去的公家货物，决定从托波尔斯克二次派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布林带着内容与第一封完全相同的新的沙皇国书到中国去。^②其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建立互利的贸易关系和和平解决达呼尔地区争端的建议。国书在结尾中请求放还费多尔·贝科夫及其全部财物。^③但是谢伊特库尔·阿布林还不曾出发，贝科夫本人已经回到托波尔斯克，带来了有关自己的使节团情况的更确实的消息。从贝科夫的报告中首先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到中国去必须寻找更适当的道路。贝科夫证实了中国有很多丝绒、绸缎、宝石、珍珠、白银和香料的消息，所以同中国进行贸易对俄罗斯是有很大吸引力的。^④

贝科夫报告说，欧洲各国有很多传教士居住在中国，自由宣传他们各自的信仰，这也是使俄罗斯人感到兴趣的。^⑤

1655年夏季，荷兰的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使节团抵达北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535卷，第17—20张。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2件，第4张。

③ 同上，第5—7张。

④ 同上，第4件，第123—135张。

⑤ 同上，第132—133张。

京，他们同俄罗斯人一样也被关在一座特殊的寓所里，不准到任何地方去。某些俄罗斯人见到了这些荷兰人，但由于语言不通没有交谈。^①

贝科夫报告了有关中国的政治情况的许多消息。据他说，满洲人占领中国只有十三年，他们在全国人数不多，走路带着武器，他们的权力只及于全国的四分之一地区。在其他各省，满洲人还在与汉人作战，而且那些地区还是由“汉族皇帝”统治着。在北京以及其他城市，所有官吏都是满洲人，在全国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多半从事于商业和干粗活。^②

贝科夫发现满洲王朝在中国不受欢迎是正确的。俄罗斯使臣在北京被扣留了一整个夏天，很可能是因为那时在中国东南地区进行着以国姓爷^③为首的汉人对满洲人的斗争^④，清政府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不肯同俄罗斯发生争吵，可能甚至还希望同它达成协议。但后来它放弃了这种希望，于是就粗暴地把贝科夫驱逐出北京了。

贝科夫在他的叙述中特别指出中国人善于修建石桥和铺设石头路面的城市街道。中国的水果和蔬菜之丰富使俄罗斯人吃惊。^⑤

如果说贝科夫的外交使命完全失败了，但在贸易方面，他的中国之行尽管由于卡尔梅克各兀鲁思的道路艰难、旅程漫长，而且归途缺乏车辆，以致开支浩大，却仍然给沙皇国库带来了一定的利益。

贝科夫所派的彼得·雅雷什金和谢伊特库尔·阿布林把中国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4件，第122张。

② 同上，第127—128张。

③ 郑成功赐姓朱，所以有国姓爷之称。——译者

④ 南京在1654年被围，而且斗争继续不断。

⑤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5件，第10—11张。

货物运到了俄罗斯。1656年3月，他们带回来博格德汗赠给沙皇的礼物十六俄尺^①丝绒，一百零五俄尺各色丝绸，一只银杯，一副贵重的鞍辔，三张海狸皮，三张灵豹皮，三张海豹皮。此外，博格德汗还对沙皇的礼物回敬了十七俄尺丝绒和一百零四俄尺丝绸。雅雷什金和阿布林以公款在中国购买了二百四十俄尺各色丝绸。^②所有这些商品估计共值五百零六卢布二十七阿尔坦二坚加。^③贝科夫回到托波尔斯克后，把没有用掉的沙皇款项四万一千卢布交给了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将军，并取得了收据。^④此外，贝科夫还派人把在俄罗斯很是贵重的六百零七普特多的大黄根送往莫斯科，并于1658年把在中国用公款购买的货物，“按照莫斯科价格共值一千九百六十九卢布十九阿尔坦半坚加的丝绒、绸缎、波纹绸、银器、银锭、宝石、各种药材、本色和染色的生丝”亲自送往莫斯科。^⑤贝科夫没有把带往中国的俄罗斯货物全部售出，因此把它们运回俄国，后来作为沙皇的恩俸发给西伯利亚的军职人员了。^⑥显然，不管怎样，贝科夫的中国之行并没有使沙皇国库受到损失，此行不仅没有使人对于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意图感到失望，反而倒提高了沙皇政府对中国的贸易兴趣。

俄罗斯政府决定从贝科夫使节团的失败中汲取某些教训，派一个更能干的信使，授与他更广泛的权力，再次进行同中国建立关系的尝试。

在1656年贝科夫刚一回到托波尔斯克，就决定派遣塔拉的大贵族之子“土耳其人”伊万·佩尔菲利耶夫作为信使到中国去。谢

① 一俄尺等于0.71公尺。——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535卷，第9—12张。

③ 同上，第87张。

④ 同上，第78张。

⑤ 同上，第88—89张。

⑥ 同上，第174—175张。

伊特库尔·阿布林作为助手(“副使”)随他同去。1657年,佩尔菲利耶夫领到沙皇的国书,内容与为谢伊特库尔·阿布林所准备的那一封相同。当然,在这封国书中已经没有请求释放贝科夫的一点了。有关达呼尔地区的词句也删去了。国书写了两份,一份是俄文的,一份是鞑靼文的。^①由佩尔菲利耶夫给博格德汗送去的礼物更加丰富:他领了二百卢布,奉命以这笔款项在莫斯科购买上等呢绒和镜子,在西伯利亚购买四十件貂皮,十三件玄狐皮以及银鼠皮大衣。^②因为佩尔菲利耶夫必须经过卡尔梅克的各兀鲁思,所以给了他五十卢布和三普特烟草用来给卡尔梅克的阿布赉台沙送礼。^③佩尔菲利耶夫从大国库衙门领了五百卢布作为在中国采购货物之用。^④

佩尔菲利耶夫奉到外交事务衙门的训令,命他迅速前往北京,并仍设法遵守俄罗斯的外交习惯把沙皇国书面交博格德汗本人,但如果不能做到,那就把沙皇国书交给博格德汗的近臣们,请求对沙皇关于友好、通使和贸易的国书给以书面的答复。^⑤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于1658年出发前往中国,于1662年回国,带回了赠给沙皇的礼物和按照莫斯科价值达一千零五十七卢布的各种中国货物。^⑥

在归国途中,俄罗斯商队受到阿海台沙和戴青台沙的部队的袭击,他们以武力夺取了公家的一部分银两和伊凡·佩尔菲利耶夫的私人财物。^⑦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从中国带回一封国书,其中说博格德汗接受了“俄罗斯沙皇的进贡,因此给以赏赐和恩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2件,第30张。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535卷,第89张。

③ 同上,第90张。

④ 同上,第89张。

⑤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2件,第18张。

⑥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535卷,第93张。

⑦ 同上,第94张。

典”。^①由此可以断定，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在中国一定是履行了“磕头”仪式，在汗的宫殿和宝座前高呼他的名字跪倒行了礼的。国书是交给官员们的。但是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虽然如此迁就，仍然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博格德汗对俄罗斯政府关于互派使节和进行贸易的具体建议没有答复。伊万·佩尔菲利耶夫所带回的国书复文的侮辱涵义，俄罗斯人在1675年以前一直是不了解的。

伊万·佩尔菲利耶夫的中国之行跟贝科夫那次一样也失败了。看来失败的原因跟过去是相同的，即清政府对俄罗斯在达呼尔地区的居民点的不断增加感到担心和不满。然而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到底建立起来了，所以俄罗斯政府力图继续扩大它。

1668—1672年谢伊特库尔·阿布林的中国之行，对于俄罗斯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直到目前，这次旅行的经过在历史文献中还没有详细的记载。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写道，关于这次旅行“毫无所知，不知道他（阿布林）奉派带了些什么到中国去，也不知道他从中国带了些什么回来”。^②的确，外交事务衙门的案卷中没有关于此行的消息。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案卷中则有非常值得注意的详尽资料，证明俄罗斯国家和清政府双方对于建立和扩大彼此的贸易关系都是关心的。

阿布林此行的成果是派遣尼古拉·斯帕法里使节团前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1664年，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命令已经熟悉中国贸易条件的托波尔斯克的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布林估计中国市场的需要，用公款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和其他俄罗斯城市采办各种货物，并在西伯利亚收集公家的贡赋皮货，做好以这一切到中国去出售和易货的准备。^③谢伊特库尔·阿布林努力

① 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版，第13页。

② 同上，第14页。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535卷，第110—144张。

完成沙皇赋予的任务之后，请求允许他本人作为商队队长到中国去。^①

最初，莫斯科想派“一名干练的托波尔斯克小贵族”带着谢伊特库尔·阿布林所采办的公家货物到中国去，“并派几个托波尔斯克的俄罗斯人和鞑靼人随同前往……此外并交给这个小贵族一封与费多尔·贝科夫 1653 年前往中国时所带去的同样国书”。^②

但是后来决定不派递交沙皇国书的信使，以免给阿布林的贸易活动增加麻烦。

1667 年 12 月，沙皇的敕令送达托波尔斯克，规定把公家货物以谢伊特库尔·阿布林和其他俄罗斯商人的私人货物的名义运往中国，谢伊特库尔·阿布林作为商队队长的通行证也一同送了来。沙皇命令派一些“可以相信的”托波尔斯克工商业者随同阿布林前往，并吩咐拨派一队俄罗斯军职人员和托波尔斯克的鞑靼人共二十六名护送货物，在整个旅行期间都发给护送队薪饷，“不使有所缺乏”。^③

托波尔斯克的工商业区居民遵照将军命令推举了瓦西利·基里扬诺夫、彼得·瓦西利耶夫和德米特里·佩列科缅多夫作为宣誓公务员随同谢伊特库尔·阿布林到中国去，托波尔斯克的布哈拉人推举了拉赫米努拉·努鲁莫夫。^④谢伊特库尔坚决主张商队要等卡尔梅克台沙的使者到来后再从托波尔斯克出发，以便与他们一同起程，因为这样可以更稳妥地保护“君主的财物不受各台沙的卡尔梅克人的劫夺”。^⑤

在派遣谢伊特库尔·阿布林带着公家货物到中国去的沙皇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 535 卷，第 100、144 张。

② 同上，第 141 张。

③ 同上，第 144 张。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 137 张。

诏书中说,带去的货物“共值四千五百卢布”。阿布林应在中国把这些货物“出售或交换莫斯科国家所需要的当地商品,并尽量为大君主谋取利益”。^①阿布林在西伯利亚事务衙门中得到指示,命他暗中了解中国的商业状况和俄罗斯同中国今后的贸易远景。

1668年7月13日,谢伊特库尔·阿布林的商队由托波尔斯克经水路向亚梅什湖出发。

由谢伊特库尔·阿布林运往中国的货物种类繁多:各种呢绒一千零八十二俄尺,在俄罗斯值一千九百九十一卢布二十八阿尔坦,红珊瑚珠二十俄磅^②,价值三百六十九卢布,镜子四面(十二卢布),红色柔革三百九十七张(四百五十七卢布),德国望远镜十架(四卢布),铜自鸣钟一座(十五卢布),镀金皮革六十张(六十卢布),列奇纳呢(粗呢)两块,价值八卢布二十七阿尔坦。但主要的大宗商品是皮货:银鼠皮三千五百七十四张,白狐皮一千七百一十九张,灰鼠皮一千五百张,灰獐红狐皮七百八十八张,玄狐皮二张,狼皮二张,水獭皮一百六十三张,兔皮八十张。^③

谢伊特库尔·阿布林是经过卡尔梅克的各兀鲁思,沿着额尔齐斯河左岸的各支流以达它的发源地去中国的,也就是循着过去贝科夫所走的道路去中国的。^④

阿布林于1669年6月抵达北京,^⑤在路上花了四十八个星期又三天,即十一个月左右。在北京附近,一个官员迎接了他的商队,把他们带进北京,并把他们安置在一所石造的迎宾馆里,这座宾馆方圆一百五十俄丈^⑥,有三座大门,“宾馆中有两座石造的大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535卷,第144张。

② 一俄磅等于409.51克。——译者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535卷,第173—176张。

④ 同上,第194—195张。

⑤ 1669年为康熙八年。

⑥ 一俄丈等于三俄尺,即2.134米。——译者

厅,三十座石造的小房子”。^① 阿布赉台沙所派随同谢伊特库尔·阿布林前往的布哈拉人被留在城外,安置在布哈拉人公寓,那里只有石头围墙,“没有大厅和小房子”。^②

俄罗斯商队的到来引起年轻康熙的极大兴趣,当他获悉俄罗斯商人给他带来沙皇的厚礼,而且跟以前的使臣不同,并不反对遵从“磕头”的习惯时,皇帝想要在他的御花园中亲自见一见他们。

谢伊特库尔·阿布林由五个同伴陪同进见博格德汗,他先把沙皇礼物(两幅呢子和价值三百八十卢布的皮货)交给官员们^③,然后见到了康熙皇帝,皇帝坐在铺着毯子和坐垫的宝座上。康熙没有起立;“不是由他自己,而是由他的左右”问候俄罗斯沙皇的健康。博格德汗吩咐赠给俄罗斯沙皇的礼物有:银环,丝绒,绸缎和茶叶,按照莫斯科价格共值一千零五十五卢布。^④

他还允许俄罗斯人自由出售带来的货物。显然这种贸易对博格德汗的国库是有利的。

在接见之后,谢伊特库尔·阿布林以及他的商队全体人员还被邀请在御花园中吃过三次饭,“在这三次宴会上,阿布赉的布哈拉人”以及卡尔梅克其他台沙的使者和商人也一同在座。博格德汗本人没有出席这些宴会。^⑤

俄罗斯商队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月,以带来的货物进行了自由贸易,但博格德汗派了一名译员,两个高级官员,十个低级官员和商人们一起把交易结果详细记了下来。

在启程之前不久,谢伊特库尔·阿布林及其随行人员被请到主管蒙古事务的机关去,那里的官员们向他宣称,博格德汗荣幸地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 535 卷,第 192—193 张。

③ 同上,第 195—205 张。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 195 张。

⑥ 同上,第 197—198 张。

接受了俄罗斯君主的礼物，希望今后看到俄罗斯沙皇的使臣和商人再来中国。博格德汗吩咐转告他们，在中国“将供应他们伙食和保护他们的一切”^①。此外，官员们还声称，博格德汗要求归还一百七十名投奔俄罗斯沙皇的毛皮实物税缴纳者。^②

此后不久，谢伊特库尔·阿布林就获允启行了。供给了他的整个商队两个月伙食，并被护送到“石墙”。^③

谢伊特库尔·阿布林商队的归途是不顺利的。还在中国时，他就接获阿布赉台沙的兀鲁思被准噶尔人粉碎的消息，因此路过蒙古的旅程为时很久。阿布林的商队直到1672年10月11日，即离开托波尔斯基的四年后才返回托波尔斯基。^④

1673年1月，谢伊特库尔·阿布林到达莫斯科，向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报告了他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情况。他报告说，在他运去的价值四千五百卢布的全部货物中，他在中国售出的总计为三千四百八十四卢布三十一阿尔坦，不过这些货物是按照中国价格出售的，价款是一万一千五百零七两七钱。^⑤又据谢伊特库尔·阿布林说，中国的两与俄罗斯的卢布具有同等的购买能力。^⑥同时谢伊特库尔·阿布林以出售俄罗斯货物所得的价款购买了各种中国商品如下：大、中、小各号绸缎二千三百五十四科霞克^⑦，按照莫斯科价格值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九卢布二十六阿尔坦四坚加，宝石二千五百五十二颗，丝绒一百四十四俄尺，中国棉布三万三千俄尺，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535卷，第198张。

② 同上，第205张。

③ 石墙(Каменная стена)，疑为万里长城。——译者

④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535卷，第201—205张。

⑤ 同上，第205张。

⑥ 同上，第205张，但费·伊·贝科夫于1656年曾说，两比卢布小，就重量而论，一两等于中国的十钱，俄罗斯的九钱，参看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4件，第109—110张。

⑦ 科霞克(косяк)是某种长度的匹头单位。——译者

生丝五普特，八角苗七普特，还有丝线等等。^①阿布林在 1672 年带回的中国货物，按照莫斯科价格估计为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一卢布。^②因此，沙皇国库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由于贸易任务的顺利完成，谢伊特库尔·阿布林被赏赐一个银罐、五十卢布、呢子和绸子各一块，^③参加旅行的托波尔斯克人各被赏赐“中国货物中的中号花缎一科霞克，以酬劳他们担任出使中国的职务”^④。

从商队的这次旅行了解到，同中国发展贸易是具有广大的可能性的，而且同中国的贸易在经济上对沙皇国库是有利的。

俄罗斯政府开始研究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具体计划了。为了这个目的，西伯利亚事务衙门对旅行的全体参加者进行了详细的质询，从而了解到不必把颜色鲜艳的上等贵重呢绒大量运往中国，因为那里气候温暖，对这种商品的需要量不大。列奇纳呢之类较薄的俄罗斯纺织品在中国市场上可以受到欢迎。但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应该是价格不高的皮货（兔皮，水獭皮，狐皮，价格低廉的貂皮）。从中国比较便于向俄罗斯进口而且比较有利的是珍珠、黄金、宝石、生丝、染色丝线以及丝织品。^⑤

沙皇政府力图以正式条约把俄罗斯同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和贸易条件固定下来，因此在 1673 年命令外交事务衙门和西伯利亚事务衙门为派遣新的尼古拉·斯帕法里使节团到中国去准备材料。^⑥为了这个目的，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着手搜集关于通往中国的道路的资料，并统计从毛皮实物税缴纳者征收来的公家皮货集中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 535 卷，第 207—213 张。

② 同上，第 213 张。

③ 同上，第 239 张。

④ 同上，第 217 张。

⑤ 同上，第 232—233 张。

⑥ 同上，第 236 张。

在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库存数字,以便把其中一部分运往中国出售。^①不久后西伯利亚事务衙门向沙皇报告说,从俄罗斯前往中国,除了费多尔·贝科夫和谢伊特库尔·阿布林走过的道路以外,还有其他道路可走,那就是经过达呼尔地区,由尼布楚堡乘马到额尔古纳河,再到根河和海拉尔河,从海拉尔河经过蒙古的各兀鲁思到扎顿河^②,然后循山路以达嫩江,即通过满洲。此外还可以从尼布楚循水路到阿尔巴津,再从阿尔巴津循陆路直接进入中国领土。^③至于西伯利亚各城市现存的贡赋皮货,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报告沙皇说,可以把总值一万零一百六十三卢布的皮货运往中国。^④

给沙皇写报告的人甚至对派遣新商队可能获得的利润做出了估计;他认为在中国出售皮货的情况如果跟谢伊特库尔·阿布林那次一样,可以指望获得利润三万四千五百九十三卢布二十三阿尔坦。^⑤

谢伊特库尔·阿布林在北京受到的良好接待,并不妨碍康熙政府积极从事同俄罗斯争夺阿穆尔河的准备。康熙政府派遣了扮做商人模样的间谍到阿穆尔河去,例如,1669年在尼布楚郊外捕获了四个这种“商人”。尼布楚将军达尼拉·阿尔申斯基给了他们很好的招待,并给了他们路上的食物。^⑥1670年4月15日,以沙兰代^⑦为首的这几个中国人又来到尼布楚,并带来了博格德汗致阿尔申斯基将军的函件。来函对阿尔巴津的哥萨克在1668年对达呼尔人和久契尔人进行远征提出了指控。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535卷,第245—246张。

② 我国史册及地图中没有与扎顿河(Залун, р.)读音相近的河名,按照路线推测,疑为嫩江支流诺敏河。——译者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535卷,第250—254张。

④ 同上,第885卷,第81张。

⑤ 同上,第89张。

⑥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1卷,第1—2张。

⑦ 沙兰代(Шарандав)是译音。——译者

与这几个使者同来的还有九个中国商人，他们在尼布楚进行了贸易。根据博格德汗的来信，达尼拉·阿尔申斯基下令禁止阿尔巴津人向阿穆尔河下游进行远征，同时以自己名义派遣伊格纳季·米洛万诺夫、瓦西利·扎哈罗夫、瓦西利·米洛万诺夫、安顿·希列夫和格里戈里·科比亚科夫为到博格德汗那里去的使者，并给了他们一道“训令”，命他们口头传达，现有“许多国家的君主和国王接受沙皇陛下的最高统治，大君主重视他们，一概加以沙皇仁慈的爱护；他，博格德汗，也应当争取……沙皇陛下的仁慈和恩典，接受沙皇陛下的最高统治”。^①达尼拉·阿尔申斯基命米洛万诺夫同博格德汗磋商，允许俄罗斯同中国进行自由的贸易。

阿尔申斯基将军的使者是按照下述道路骑马从尼布楚到达北京的：越过额尔古纳河、根河、海拉尔河和扎顿河后，朝扎顿河上游的山地前进，接着由山地抵达嫩江，在那里有“博格德皇帝的两位大贵族和一位秘书率领军职人员四十名迎接了俄罗斯人”^②。清朝的官员“急忙用有弹簧装置的马车”^③把俄罗斯人从嫩江带到北京，在北京把他们安置在一所特别的宾馆里，关了大门，派了人守卫，但对俄罗斯人的“饮食”供应得很好。^④过了一星期，伊格纳季·米洛万诺夫及其随行人员被召往外交事务衙门^⑤，询问“他们到博格德皇帝这里来有什么事？”俄罗斯人回答，他们的将军达尼拉·阿尔申斯基派他们来传达训令中所说的事情。清廷的一个高级官员命令俄罗斯人自己把训令朗读一遍。司书读了以后由译员翻译出来，中国官员把译员所说的记了下来。其后，中国的高级官员不顾俄罗斯人的抗议，拿走了“盖着阿尔申斯基的达尼拉名章的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3件，第162—163张。

② 同上，第171张。

③ 同上，第172张。

④ 同上，第175张。

⑤ 大约就是理藩院。——译者

训令原件”。他解释说，“训令不能还给他们，因为博格德皇帝致大君主的公文”将以这个文件为依据，所以这个文件应当留在中国。^①因此，仅供俄罗斯使者自己遵循的尼布楚将军训令就归到清廷官员的案卷里面去了^②。尼布楚的军职人员（伊格纳季·米洛万诺夫和同伴们）在同清廷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初次谈话以后又被送往宾馆，在那里在监视下住了五个多星期。但是康熙皇帝想见俄罗斯人一面，所以甚至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茶会。^③康熙先是默默地观望了俄罗斯人整整一个小时，后来又问他们每个人多大年纪。

在当天，为了向俄罗斯君主致敬，康熙宣布赦免许多判了罪的犯人。^④俄罗斯人在皇帝接见之后被允许随同卫兵周游北京城，然后赠以丰盛的礼物（每人一匹鞍鞯齐全的马、一件绸衫、一顶帽子、一根腰带、五块绸子、八块大红布、一把刀），备了大车和食物放他们返回俄罗斯。

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⑤对米洛万诺夫受到如此良好的招待和如此幸运地离开北京所做的解释是正确的，即中国的大臣们没有敢把从俄罗斯人手中抢过去的训令的真正涵义禀报博格德汗，否则就是充任译员的耶稣会教士隐瞒了能使傲慢的北京朝廷感到气愤的文件内容。此外，康熙暂时还不愿使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紧张起来。

1670年夏天，嫩江都统孟格德与米洛万诺夫一同来到尼布楚，把博格德汗的国书交给阿尔申斯基，请他转往莫斯科。国书中提出了停止征服达呼尔地区和交出根忒木尔，然后“和睦而愉快地相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3件，第176号。

② 王之相、刘泽荣编译的《故宫俄文史料》中载有这个文件的俄文原文和译文，参阅该书第121—123、267—269页。——译者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3件，第182张。

④ 同上，第183张。

⑤ 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外交文件汇编》，第18—20页。

处”的要求。^①孟格德并对阿尔巴津人的劫掠行为向尼布楚将军提出了口头控诉。此后，他又到尼布楚来过三次，探听是否接到了莫斯科的答复。每次都有中国商人与他同来，并在尼布楚顺利地进行了贸易。

莫斯科决定不交出根忒木尔，也不给中国任何答复。达尼拉·阿尔申斯基由于对博格德汗的无礼态度，被罢免了尼布楚将军的职务，这证明沙皇政府是不愿同中国起纷争的。

要扩大贸易，必须就领土划界问题达成协议并解决过去的一切争端。为了解决这一切问题，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于1675年特别周密地组织了一个前往中国的新使节团，团长是外交事务衙门的翻译官，原籍摩尔达维亚的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尼古拉的随员共一百六十人。尼古拉带了很贵重的礼品去中国，用以分赠有力的人物和卡尔梅克的台沙们。此外，还拨给尼古拉价值一千五百卢布的貂皮，用以购买中国货物。^②

按照命令，尼古拉必须把沙皇国书交博格德汗本人，只有在最不得已时才交给博格德汗的亲信。国书中先写俄罗斯沙皇的全衔，然后写博格德汗的名字，接着对由于路途遥远以致与博格德汗没有通函以及俄罗斯没有人通晓中国语言以致引起许多误会表示遗憾，博格德汗以前送来的国书未能阅读的原因也在于此。尼古拉奉命用口头方式表明俄罗斯沙皇希望与中国和好、亲善和通信的心意，如果博格德汗的称号写得不对就表示歉意，要商定以后可以用哪种文字通信，并请耶稣会教士协助把从前送来的国书翻译出来。

他还奉命更确切地了解中国的博格德汗的称号。使臣的主要任务是争取以下几点：释放或赎回在达呼尔地区被俘的俄罗斯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3件，第165—166张。

^② 同上，第126—130张。

人，^①派遣由“真正的中国人”担任的中国使节前往莫斯科，允许在中国购买“每次一千、二千、三千以至更多普特的白银以及宝石和绸缎运往俄罗斯。尼古拉奉命用一切方法探听利用西伯利亚诸河流从中国前往俄罗斯的水路，并尽量劝说中国商人带着货物到俄罗斯去，“以君主的恩典来鼓舞他们”。^②

尼古拉于1675年3月4日乘二十辆马车从莫斯科出发。他沿途经过彼列亚斯拉夫耳扎列斯基、雅罗斯拉夫、沃洛格达、托特马、乌斯丘格、卡伊戈罗德、索利卡姆斯克、韦尔霍土里耶、秋明，跋涉了两个月到达托波尔斯克。同年5月，尼古拉从托波尔斯克乘三只平底木船启程，经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克特河达叶尼塞斯克。从这里，他让伊格纳季·米洛万诺夫先到中国边镇去通报他的使节团的到来。嫩江都统孟格德把米洛万诺夫送往北京，在那里先是对他进行仔细的盘问，把他拘留了一个月，后来释放了他并赠以礼物，告诉他俄罗斯使节团将受到隆重的欢迎。

尼古拉从叶尼塞斯克经叶尼塞河、安加拉河航行到伊尔库次克，在那里，年老的鄂温克酋长根忒木尔前来会见他，询问是否将他引渡给博格德汗，并且声称他将自尽，不能活着落到博格德汗手里。尼古拉向根忒木尔保证不把他交出去。

尼古拉从伊尔库次克渡过贝加尔湖，沿着色楞格河航行，然后取道陆路，乘骆驼和马匹到尼布楚，再从尼布楚到嫩江，在那里，有由二百人组成的满洲侍卫队迎接了俄罗斯的使臣们。尼古拉在那里等待前往北京的许可。

清廷官吏对待使臣的态度很是粗暴，要求立刻出示沙皇国书并说明是否将交出叛徒根忒木尔。嫩江都统激烈地控诉了阿尔巴

^① 康熙非常重视俄罗斯的战术，用俄罗斯战俘建立了一个特种连队，下令在中国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3件，第37张。

津人的残暴行为。

尼古拉拒绝把国书拿出来给博格德汗以外的任何人看。他以自己的名义通知阿尔巴津，绝对禁止再进行远征，因为那样只能妨碍他的外交使命的成功。

前往北京的许可得到了，尼古拉于 1676 年 5 月 15 日抵达北京。他同清廷的大臣们争执了二十天之久，不肯把沙皇国书交给他们。直到尼古拉把沙皇国书连同关于他自己的使命的书面说明一并呈到博格德汗的殿上之后，他才被允许觐见康熙。

博格德汗给了使臣以优渥的接待，请他与自己同桌进餐。但后来对他的态度恶化起来，因为尼古拉对交出根忒木尔的问题推托不知，不解决这个问题，康熙也就不愿进行任何谈判了。尼古拉拒绝聆听宣读国书的复文，因此根本没有把这个复文交给他。所带货物的交易受到百般阻难，使节团本身始终被拘禁着。

1677 年 9 月 1 日，尼古拉被逐出北京；于是这个由俄罗斯国库付出了很高代价的使节团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是清政府在阿穆尔河的军事行动开始了。但尼古拉使节团对俄罗斯有着巨大的意义，因为它补充了关于中国和中国市场的情报。^①

十七世纪的俄中贸易

从十七世纪初到 1689 年，尽管处于令人不安的战争环境中，但阿穆尔河流域和外贝加尔地区的俄罗斯居民同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人自己并不到俄罗斯来，而是通过鄂温克人和蒙古人把他们的商品运往俄罗斯的边境城堡阿尔巴津和尼布楚，那里有许多军职人员和工商业区居民整批地收购这些货物，然后在达呼尔地区作生意并运往西伯利亚，更从西伯利亚运

^① 尼古拉的出使报告曾由尤·阿尔先耶夫刊登在“俄罗斯地理学会会刊”上，第 10 卷，第 1 期，1882 年。并参看尼古拉的《关于中国的记述》，喀山 1912 年版。

往俄罗斯。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托波尔斯基的十七世纪税关记录表明,在前半世纪,即在第一个俄罗斯使臣贝科夫访问中国之前很久,就有颇大数量的中国货物,首先是纺织品运到托波尔斯基市场。满洲的入侵中国,使俄中贸易遇到了困难,缩小了它的规模,但没有使之断绝。贝科夫使节团促使在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前很久就已达到颇大规模的贸易关系获得了调整和扩展,例如:1655年有九百匹中国棉布从中国运到托波尔斯克来;1657年一千五百二十四匹,1668年五千六百六十四匹,1680年三千五百五十五匹,1683年运进了三千六百三十多匹各种中国纺织品。^①但是做中国货生意的,主要是莫斯科巨商的代理人。他们经常住在伊尔库次克、尼布楚、阿尔巴津以及其他俄罗斯城堡。^②

在七十年代,乌沙科夫、波谢利斯基和纳里齐内-穆萨托维三家商人^③在阿尔巴津定居下来,大规模地买卖从俄中两国运来的商品。商人和服军役的达呼尔人做了居民自己直接组织的俄中贸易的居间人。尼布楚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就成为俄中贸易的根据地,当时那里曾为买卖中国货物的商人修建了专用的商场。^④

在尼布楚将军衙门的案卷和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关于商人”的大批案卷中,都有资料表明俄罗斯人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就同中国经常进行贸易,在1689年以后贸易规模更加扩大。1653,1657,1658,1666—1675各年份的这类案卷都还保存着。^⑤

① 以托波尔斯基税关记录为根据的托波尔斯基市场上的中国商品数字,经作者奥·恩·维尔科夫允许引自他的手稿《十七世纪的托波尔斯基市场》。

② 在谢·弗·巴赫鲁申的《巨商尼基京在西伯利亚和中国的贸易》一文中,关于巨商尼基京在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大规模贸易有丰富的实际材料,参看《学术丛刊》,第3卷,第1分册,1955年,第222—250页。

③ 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63页。

④ 同上,第64页。

⑤ 恩·恩·奥格洛勃林:《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案卷和册籍一览》,第3卷,第195页。

1674年有一大队俄罗斯商人和军职人员带着许多货物从色楞格斯克到中国去。色楞格斯克的总管伊凡·波尔申尼科夫也参加了这次远行,后来他报告说,抵达中国后人们问他,“他们到他们的帝国去做什么,他们有没有大君主致他们的博格德汗的公文。他,伊凡说,他是由色楞格斯克派到中国来的,没有携带公文,但是他们有训令,他只是奉命探听从色楞格斯克到中国去的道路”。^①伊凡·波尔申尼科夫在报告中又写道,他在中国“以君主的貂皮换得生丝”,返回色楞格斯克后他把这些生丝交给了总管加夫里拉·洛夫佐夫,加夫里拉·洛夫佐夫又通过叶尼塞斯克把生丝送往莫斯科。

托波尔斯克将军普·姆·萨尔蒂科夫在回答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查询时证实,叶尼塞斯克将军米哈伊尔·普里克隆斯基于1674年曾写信告诉他,“总管洛夫佐夫”于1674年从色楞格斯克“给君主国库送去了用贡赋貂皮在中国购买的六普特半白生丝和黄生丝以及六匹中国花缎,加夫里拉·洛夫佐夫还送去了向到中国去的商人征收的关税三十六匹花缎和大号花缎衣料三段”^②。

沙皇国库同擅自到中国去的商人进行了斗争,因为他们逃避缴纳商业税,并且在中国市场上同国库竞争皮货的贸易。1677年,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有一封特别诏书送到叶尼塞斯克,命令截留从中国经过达呼尔地区回来的,但去时“没有大君主的命令和证件”的一切西伯利亚居民和来自俄罗斯各城市的“各色人等”,并把他们的一切货物:“宝石、金银、花缎连同其他中国、俄罗斯或西伯利亚的商品以及貂皮和一切皮货”“扫数”没收,交沙皇国库。^③嗣后只允许持有沙皇通行证的人到中国去。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75卷,第137张。

② 同上,第138—139张。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尼布楚将军衙门档案,第6件,第85张。

1678年，巨商安德列·卢津的代理人伊万·马克西莫夫率领商队从莫斯科前往中国。叶尼塞斯克税关检查了他所携带的货物品种，并向他征收了什一税。根据他在尼布楚登记的通行证可以知道，他携带的“巨商安德列·卢津和他自己的俄罗斯货物计有：二千五百俄尺厚麻布和五百俄尺普通麻布，一百俄尺本色粗呢，二普特立陶宛蜡，二令书写纸，五件羊皮袍，一幅呢绒，一普特红铜锅和钵，半普特青铜锅，二十把小斧子，一普特多枝铜烛台，三十科涅次^①染色麻布，按照叶尼塞斯克税关的估计，他携带的这些俄罗斯货物共值二百八十九卢布十阿尔坦，税关向他的这些货物征收了大君主的捐税”。^②

此外，马克西莫夫还携带了自己的货物：“五十张中号和小号红色油性革，五普特啤酒花，十五个小桶”，共值二百零五卢布。

这些关于在签订第一个条约以前所出现的俄中贸易的片断资料，证明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对两国居民有着经济上的重大利害关系。康熙政府在发动了争夺阿穆尔河的武装斗争以后，对于同俄罗斯贸易的问题采取了极端消极的态度。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和俄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清政府的对俄贸易政策有了实质上的改正。

1683—1689年满洲军队和俄罗斯

哥萨克在阿穆尔地区的冲突

在全中国的农民战争被镇压下去以后，康熙在阿穆尔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的侵略政策便积极起来。

1681年，博格德汗命都统郎谈和彭春^③以到达呼尔地区和满

① 科涅次(копей)是一定长度的匹头单位。——译者

②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60卷。

③ 在我国有关的史料中，郎谈亦作郎坦，彭春亦作朋春。——译者

洲去射鹿为名前往阿穆尔地区,其实是“为了察看和记住俄罗斯人的所在地”。康熙在他们出发前召见他们,吩咐他们侦察阿尔巴津城及其工事和居民的情况,他自己则派信使前往尼布楚通知说,郎谈和彭春要去射鹿。临别时,康熙把自己身上的狐皮袄以及弓箭赐给郎谈。^①

郎谈到达阿穆尔地区后向北京报告说,他花了十六天时间行抵阿尔巴津,阿穆尔河沿岸的陆路很难走,沿阿穆尔河航行比较容易到达;阿尔巴津筑有木头工事,俄罗斯人从尼布楚向阿尔巴津运送粮秣和弹药是困难的,俄罗斯人为此要花去一个半月的时间。郎谈还说,没有荷兰炮是不能攻取阿尔巴津的。他认为至少必须先把二十尊这种炮运到阿穆尔河的松花江口。按照他的意见,除松花江已有的四十艘大船和二十六艘小艇以外,应该再增加五十六艘小船,扩充嫩江的军队数目和军需物资,到那时再开始进攻。

郎谈建议水陆两路并进,不宣而战地突然袭击俄罗斯城堡,以出其不意地捕获敌人。^②

但是,俄罗斯人注意到了清朝都统们的作战准备。1681年3月,尼布楚将军费奥多尔·沃耶伊科夫写信给西伯利亚事务衙门说,满洲的都统们率领大批军队从嫩江来到阿尔巴津附近,要求阿尔巴津人出城到旷野去同他们“谈判”。但阿尔巴津人没有出去,只派了五名哥萨克去了解问题。清廷的都统们要求解释俄罗斯人为什么修建结伊斯克堡,并声称这座城堡有碍于他们,因为那个地方有他们的渡口,他们是通过这个渡口到他们的毛皮实物税

^① 译自中国的对俄作战日志。这个日志的满洲语和拉丁语文本现存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K-2号)。译文载于《俄罗斯文献》,1899年,第1卷,第329—336页。(这个所谓日志多半就是《平定罗刹方略》,该书中有这样的话:“一面遣人赴尼布楚谕以捕鹿之故,一面详视陆路近远沿黑龙江行围轻薄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情形”,又说,“谕毕赐郎坦册春御衣弓矢”。——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K-2号,第3—5张。

缴纳者那里去的。^①

尼布楚将军沃耶伊科夫委派大贵族之子尤里·拉巴率领一队哥萨克到嫩江去向康熙的都统们说明，沿结雅河设置城堡是“为了耕种庄稼”，又因为“结雅河沿岸居住着许多向俄罗斯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各种非俄罗斯人”，他们必须在结伊斯克堡缴纳毛皮实物税。^②

1681年6月，军职人员尤里·拉巴、译员德米特里·苏叶青和伊格纳季·比留茨基、司书阿列克谢·科列涅夫以及哥萨克叶弗列姆·基里洛夫、涅斯托尔·马特维耶夫、格里戈利·马克西莫夫和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夫遵照将军沃耶伊科夫的命令从尼布楚前往满洲(嫩江上的奇恰加尔斯克村)会见了清朝的都统们。

谈判是在野外特设的帐篷中举行的。哥萨克十人长尤里·拉巴正式通知清朝的都统们说，“结伊斯克堡是奉大君主敕令所建，是永久性的”，俄罗斯人将不予拆毁。^③接着他又声明，俄罗斯人并没有妨碍博格德汗的人摆渡结雅河，今后也绝不会加以妨碍。他坚持说结雅河沿岸的全部土地在俄罗斯移民到来之前是“无主”的，从来不是属于博格德汗的，既然俄罗斯人首先定居在这里，所以它现在应当属于俄罗斯。

清朝的都统们回答哥萨克们说，他们将把这一切报告博格德汗，但在奉到覆旨以前，俄罗斯的使者居住在嫩江应受“卫兵”保护。过了两天，都统们又把俄罗斯人召往先前的那座帐篷，声称结伊斯克堡是设立在博格德汗的土地上，所以必须把它拆除。在进行这次谈话时，帐篷附近有许多“军事”人员，“百人长、五十人长以及十人长等达四百人”。^④最后，满洲的都统们派了信使到北京去。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尼布楚将军衙门档案，第9件，第3—6张。

② 同上，第1—9张。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20张。

他们强迫俄罗斯人等待博格德汗的答复几达一个半月。在那个期间，有一个官员从北京来到嫩江登记存粮和人口。八月间，另外一个官员来到嫩江，把俄罗斯人召往帐篷，命他们跪下听取博格德汗对他们关于结伊斯克堡所做声明的书面答复。

尤里·拉巴反对说，俄罗斯人将依照自己的信仰站着听取博格德汗的答复。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中国官员只得让步。博格德汗的答复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拆除结伊斯克堡，否则的话，康熙以战争相威胁：“结雅河与伏洛加河一带，自古以来皆我版图，在彼处修建农舍，系尔等之过。尔必须令尔民迁走。如若不迁，在边境地区必将发生纠纷与武斗，在发生纠纷与武斗后，我大军将毫不留情逐走尔民。届时勿怪。”^①

尤里·拉巴一行于1681年10月初带着这令人不安的消息回到尼布楚。

1681年10月间，将军沃耶伊科夫在将军衙门召集尼布楚的全体哥萨克，向他们说明了1680年在结雅河的谢利姆巴河口建立城堡的经过，并告诉他们博格德汗以战争相威胁，要求拆除这个城堡。将军命尼布楚的军职人员们“彼此考虑一下并提出建议，是否放弃结雅河畔的这个城堡”，并做记名的书面回答，因为在沙皇的敕令中指示同中国“不得发生任何争吵”。^②

尼布楚的军职人员在递给将军的“签呈”中回避直接作答，只说结伊斯克堡是阿尔巴津的哥萨克所建，尼布楚的哥萨克不知其究竟，是否放弃这个城堡，“听君主和将军定夺”。^③

将军沃耶伊科夫询问阿尔巴津总管雅科夫·叶夫谢维耶夫，他派阿尔巴津的哥萨克格里戈里·梅利尼克率领十五名哥萨克于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尼布楚将军衙门档案，第9件，第14张。

② 同上，第19张。

③ 同上，第20张。

1680年到结雅河的谢利姆巴河口去建立结伊斯克堡是奉谁的命令，“是根据君主的诏书还是根据叶尼塞斯克的大贵族鲍里亚京斯基的训令，或者是由于阿尔巴津哥萨克的呈请”。^①雅科夫·叶夫谢维耶夫报告说，他允许建立结伊斯克堡是由于原来建立该堡的阿尔巴津的哥萨克们，即格里戈里·梅利尼克及其一伙的呈请，并不是根据阿尔巴津全体哥萨克的决定，也不是根据诏书。^②

1681年夏天，嫩江都统孟格德率领满洲军队一千人来到阿尔巴津附近，从四面八方察看了阿尔巴津，但诡称此来是为了搜寻嫩江的四名逃犯。阿尔巴津人没有交出逃犯，于是孟格德的军队离开了阿尔巴津。

来投诚的人和阿尔巴津人自己都绝对相信，孟格德的目的在于侦察阿尔巴津的防御工事和守军情况，为不久以后的军事进攻做准备。阿尔巴津人抱怨他们人员少，武器少，没有东西用来自卫，并要求援助。沃耶伊科夫给西伯利亚事务衙门写信说，在尼布楚堡、额尔古斯克堡以及达呼尔所有的俄罗斯城堡中，“军职人员人数甚少，只有二百零二人，而且这些军职人员分散在各城堡。大炮、火药和铅弹都少，因此没有物资和人员接济阿尔巴津；在尼布楚堡和阿尔巴津堡将没有人手来防御博格德的军队，现在居住在尼布楚等堡非常担心，白刃战武器如盾牌、战斧、长矛和马刀都没有，在围城时将无以防守”。^③沃耶伊科夫埋怨阿尔巴津的哥萨克仍旧一点不听命，请求叶尼塞斯克将军给以指示和帮助。

另一方面，在1682年，都统郎谈所指挥的一万军队和船舰遵照康熙命令从松花江口向新建的城堡瑗琿移动。瑗琿的军队不准俄罗斯哥萨克前往阿穆尔河下游，并向人数不多的哥萨克队伍进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尼布楚将军衙门档案，第9件，第20张。

② 同上，第22张。

③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64卷。

攻，俘虏了哥萨克。

康熙通过俄罗斯俘虏向阿尔巴津提出了离开阿穆尔河并交出根忒木尔酋长和一切逃人的要求。同时璦琿的康熙军队还进攻了由格里戈里·梅利尼克、加弗里拉·弗罗洛夫和伊万·塔拉索夫率领的少数阿尔巴津哥萨克部队。一部分哥萨克逃脱了，一部分被击毙或被俘。逃脱的哥萨克给阿尔巴津带来了令人恐慌的战争消息。满洲军队摧毁了沿布列亚河、哈蒙河、结雅河和谢利姆巴河的许多俄罗斯城堡，^①并在阿穆尔河左岸布防，他们现在把自己的全部兵力集中于俄罗斯最大的城堡阿尔巴津附近，阿尔巴津是俄罗斯整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咽喉要地。

俄罗斯政府获悉满洲军队在阿穆尔河展开军事进攻的消息后，开始试图以武力保卫自己的达呼尔领土。1682年任命了经验丰富的伊尔库次克将军伊凡·鄂斯塔斐耶维奇·伏拉索夫为尼布楚将军以代替优柔寡断的沃耶伊科夫。他被授与不通过叶尼塞斯克而直接同莫斯科联系的权利。^②叶尼塞斯克将军谢尔巴迪公爵和伏拉索夫奉命“以军队保卫达呼尔地区和贝加尔地区的一切城堡”。^③

同是在1682年，阿穆尔领地从尼布楚县被划分出来成为单独的阿尔巴津将军管区，并任命了在达呼尔地区的哥萨克和居民中间享有威信的尼布楚将军之子阿列克谢·托尔布津为阿尔巴津将军。^④托尔布津到达自己的新任所后，立刻报告说清军对阿尔巴津的进攻已迫在眉睫。^⑤据他说，阿尔巴津城内一共只有三百五十名军职人员和工商业区居民，此外各乡村还有九十七名国有农民，^⑥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819卷，第19张。

② 同上，第1355卷，第1部分，第168张。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913卷，第1部分，第54张。

⑤ 同上，第1355卷，第1部分，第56张。

⑥ 同上，第57张。

也就是说,共有四百四十七人。弹药也不足(十六普特火药,十普特铅弹)。但康熙在阿穆尔河则拥有军队一万五千人之多。^①

沙皇的1683年4月20日特别诏书命令“急速”在托波尔斯克、叶尼塞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征集哥萨克一千名派往达呼尔地区。规定对新招募的哥萨克每人发给沙皇的恩俸五卢布。命令由沙皇国库拨五千卢布和五百只枪(火绳枪)给这支达呼尔部队,在叶尼塞斯克,粮食俸给由“叶尼塞斯克所种的”粮食和专为供应新征哥萨克而“购买的储备粮里”拨发。^②

首先从托波尔斯克派了六百名军职人员到达呼尔地区去。他们在中途发生了暴动,抢劫了将军们和总管们,威胁要把他们抛到水里去。他们的不满是由于武器和食粮的供应不善。由于行军组织的不良,队伍到达呼尔地区的行程很迟缓,因而没来得及在清军围攻阿尔巴津时到达。^③西伯利亚的将军们所答应的四百人一般都没能在限期内征集起来,其理由是“人少”。^④叶尼塞斯克将军写信给莫斯科说,1683年叶尼塞斯克的军职人员共仅二百三十三人,装备只有五门炮和二百八十发炮弹,一百四十四只火绳枪,五十杆战斧,四十八普特铅弹和三十普特火药。因此,将军认为叶尼塞斯克不仅不能派人去援助达呼尔地区,而且没有武器和人员保卫叶尼塞斯克县城以抵抗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侵犯。^⑤

西伯利亚事务衙门于1683年根据各将军的报告编造了关于现存武器和弹药的材料;整个达呼尔地区计有:二十一门炮,四百八十五只火绳枪,一百八十二普特火药,一百四十三普特铅弹,军职人员约二千人。^⑥托波尔斯克则共有四十六门炮和四千一百三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913卷,第1部分,第352张。

② 同上,第353张。

③ 同上,第1315卷,第1部分,第167—206张。

④ 同上,第913卷,第387张。

⑤ 同上,第391张。

⑥ 同上,第913卷,第2部分,第410张;第1355卷,第1部分,第322张。

十九发炮弹，二百四十四杆战斧，九百二十六普特火药和三千四百五十一普特铅弹，一千七百一十九名军职人员，此外在韦尔霍土里耶、秋明、彼累姆、土林斯克和塔拉还有一千六百人左右。俄罗斯在西伯利亚所拥有的军力共约四千至五千人左右。^①

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根据列夫·波斯科钦编造的人丁册统计了国有农民及其子孙中可以充当战斗人员的后备力量。1683年的这种后备人力在托波尔斯克有八千二百零三人，在韦尔霍土里耶有五千一百零二人，共计是一万三千四百一十七人。^②

在西伯利亚事务衙门中，没有关于土林斯克、秋明、彼累姆和塔拉的国有农民和代役租农民及其子女和亲属的材料。

在讨论了在达呼尔地区作战的可能性以后，沙皇向叶尼塞斯克以及达呼尔所有各地的将军们发出了训令，命他们防备中国军队和蒙古军队的进攻，但自己“对所有地区的外国人都不要有任何争吵和挑衅的举动”。^③ 决定不向叶尼塞斯克派遣增援部队，但命令叶尼塞斯克将军在西伯利亚居民中就地招募新的哥萨克，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并拟由莫斯科派熟练的军事人员充当教官。由大国库衙门拨发了五千卢布给已经派往达呼尔地区的一千名新征哥萨克作为 1684 年的薪饷。^④

沙皇的这封诏书决定了此后俄罗斯对达呼尔地区的政策的方向：估计了自己的兵力和军备以后，俄罗斯政府得出了不能为了达呼尔地区而进行战争的结论。

但是，不但拥有兵力上的显然优势，而且因为作战地区与中国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 913 卷，第 2 部分，第 459—460 张。

② 同上，第 462 张。（实际共计应为一万三千三百零五人，此处原书误。——译者）

③ 同上，第 465—466 张。

④ 同上。

相近而具有战略优势的康熙，已经开始在阿穆尔河压迫俄罗斯人退出他们的领地了。1684年，清军逼近阿尔巴津，掳去所有留在防御工事外的俄罗斯人。封锁状态延续了几个月之后，围城部队决定实行猛攻来占领阿尔巴津。

1685年，康熙军队在郎谈指挥下乘坐一百艘布萨^①开到阿尔巴津附近，每艘三十至五十人。骑兵“一千人，战炮一百门和攻城大炮四十门”^②也从陆路到达。

阿尔巴津在1685年能够拿起武器的有四百五十人，炮有三门，炮弹只有四发。满洲的弓箭手向阿尔巴津发射的箭枝跟雨点一般，康熙军中的改换了服装的“德国人”（外国人）以排炮轰击。

军舰占领了从阿穆尔河通往阿尔巴津的要冲，以使俄罗斯守军无从获得增援。但哥萨克击退了满洲人的猛攻，而且几次冲出反击。

于是都统郎谈决定火烧阿尔巴津。满洲人在俄罗斯城堡周围堆起木柴来纵火焚烧。被围者蒙受了重大损失，因而不能再留在燃烧中的阿尔巴津。将军托尔布津与郎谈进行了让城条件的谈判。他要求放他和全体人员携带武器到尼布楚去。

根据康熙的指示，郎谈放了俄罗斯人。阿尔巴津人退往尼布楚时“……光着脚，无衣无食，以草皮和树根充饥”^③。阿尔巴津被彻底摧毁了。

在这以后，郎谈退往瑗琿。康熙命令郎谈的军队留在瑗琿附近长期驻扎下去，以便与俄罗斯人进行斗争。郎谈获得三百两银子的赏赐。^④

① 在河中行驶的容积颇大的船只。

② 《俄罗斯文献》，1899年，第1册，第320页。实际上没有这么多炮。

③ 恩·恩·奥格洛勃林：《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案卷和册籍一覽》，第3卷，第271页。

④ 《俄罗斯文献》，1899年，第1册，第335—336页，一两等于俄罗斯的九钱，参看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4件，第110张。

尼布楚将军伏拉索夫详细地写信告诉奉派前往中国边境的费·柯罗文说，阿尔巴津被满洲军队攻占后，阿尔巴津人退到了尼布楚，但他让他们回去了，“以免丧失达呼尔地区和留下从尼布楚逃走的丑名”；此外，他还派了七十人的尼布楚哥萨克部队到阿穆尔河去侦察敌情和捕捉敌方的“舌头”^①。侦察队报告说，满洲人离开了阿尔巴津，阿尔巴津人播种的庄稼依然完整。俄罗斯人收割了庄稼，并重新在田地上播下了种籽。在原址建立了新的阿尔巴津，四周筑了高一俄丈半的土墙，“不能筑得更高，因为土已冻了”。^②土墙糊以烂泥，铺上草根土，以防城堡发生火灾。新建的阿尔巴津城中掘了水井，只是由于严寒才没来得及把塔楼盖成。储备了粮食以备围困。

1685年11月中旬，还在阿尔巴津第一次被围的时候，因被俘而到过中国的俄罗斯哥萨克亚基姆·伊万诺夫和格里戈里·弗明把康熙皇帝致俄罗斯沙皇的国书带到了莫斯科，康熙在国书中表示了他对俄罗斯的要求和对阿尔巴津哥萨克的不满，并建议在确定边界的基础上缔结和约。^③康熙邀请派遣俄罗斯使节团到边境地区去缔结这个和约。同时清军又试图第二次占领阿尔巴津。

1686年7月6日，满洲军队“乘坐布萨携带着火器和攻城器”逼近阿尔巴津，大批骑兵也从陆路到达。^④康熙的军队杀死了许多哥萨克哨兵，并把阿尔巴津包围起来。侦察队向尼布楚报告说，阿尔巴津城下一共来了五十艘布萨，每艘载有三十至四十名满洲兵，还有“不少被强迫工作的没有枪的尼堪人（汉人）”；“他们的轻武器是弓箭，火绳枪不多，炮四十多门”。^⑤岸上来了三千多匹马。

① 即可供了解敌情的俘虏。——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7件，第2，50张。

③ 同上。

④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78卷。

⑤ 同上。

被满洲人俘虏后奉派给阿尔巴津递送信件的俄罗斯农民阿克先·费多谢耶夫向尼布楚报告说，他在做俘虏时听到中国人说，康熙军队在攻占阿尔巴津后将开到尼布楚堡来，即使攻不下阿尔巴津也不撤退，他们想要毁掉阿尔巴津人所种的庄稼，所以带了镰刀来。^①

将军伏拉索夫向费·柯罗文报告说，阿尔巴津“共有军职人员、工商业区居民和国有农民八百二十六人；一共只有铜炮八门，城防枪三挺，臼炮一门及其所用铁榴弹三十发，手榴弹一百四十发，铁炮弹五发，手用的和大炮用的火药一百一十二普特三十六磅半，铅弹一普特二十六磅半……”^②也就是说，比从前稍多一些，但为了防卫是十分不够的。

尼布楚一共只有军职人员三百名，炮七门，铅弹七十七普特三十六磅，火药六十六普特。将军伏拉索夫向莫斯科报告说，“……因为人少，我无从从尼布楚派人去援救阿尔巴津，并请求援助”。^③

1686年7月19日，伏拉索夫把奉派前往中国边境的使臣费·柯罗文启程的消息通知了阿尔巴津将军托尔布津，并告诉他随柯罗文同“去达呼尔的有军队四千人、莫斯科火枪兵五百名、炮四十余门、火药和铅弹很多”。伏拉索夫命托尔布津召集全体阿尔巴津人向他们宣布这个消息，以便“他们确信大君主的恩典”。^④

满洲人用许多小炮和一门大型“龙炮”向阿尔巴津射击。俄罗斯人不止一次进行了出击，并还击了许多炮。

都统郎谈命令他的军队在夜间向阿尔巴津猛攻，但他们没有能把城堡攻下。

郎谈的军队中会使用火器的人不多，大部分人都使用弓箭，俄

①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78卷。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77卷。

哥萨克部队实行军事歼灭。但这种政策证明是无效的。

沙皇俄罗斯在达呼尔地区没有庞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实行这样的政策：利用俄罗斯的哥萨克、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移民来对边区进行经济开发，并把毛皮实物税缴纳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俄罗斯人对阿穆尔河流域的经济开发，在十七世纪的七十至八十年代促使达呼尔的大部分土著居民转到俄罗斯方面来。俄罗斯一方面在欧洲实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一方面也注意扩大东方贸易，所以在到达阿穆尔河后与强大的中国发生冲突时，它就争取一方面巩固自己已经开发的土地，一方面同中国建立和平的政治和贸易关系。但是清政府力图进一步侵占达呼尔地区，所以反而跟俄罗斯对立。最初清廷的对立表现在外交方式上：它拒绝与俄罗斯使节团解决他们到中国去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同时还要求俄罗斯人交出从中国领土投奔俄罗斯的达呼尔居民，并要求俄罗斯人自己也离开阿穆尔河。后来当俄罗斯在阿穆尔地区的殖民显示了卓著的成效时，清政府就以达呼尔的诸部落纷纷改入俄罗斯国籍为借口挑起军事冲突。当时，清政府方面在军事力量上拥有颇大的优势，这就决定了沙皇俄国的易于让步。

第二章 尼布楚条约的酝酿和签订

第一节 使节会议的准备, 双方使节团 的人员、权限和所奉的训令

俄罗斯使节团

1686年, 俄罗斯为了同中国缔结和约派了一个“大全权使节团”到阿穆尔河去。

这个决定是莫斯科在获悉清军围困阿尔巴津的初步消息后做出的。莫斯科对康熙军队的数量和武装没有可靠的资料, 但根据从阿尔巴津和尼布楚得来的情报, 知道清军人数很多, 配备有大炮。

阿尔巴津、尼布楚、伊尔库次克、叶尼塞斯克以及几乎所有西伯利亚东部城市的将军们都向沙皇诉说守军人少, 缺乏大炮、火药和铅弹。这些地方与俄罗斯的中心地区距离遥远, 所以没有在短期内把充分兵力调派前来的实际可能性。军职人员的粮食供应, 由于交通梗阻、冬季严寒以及西伯利亚地广人稀,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沙皇政府首先注意的是巩固西部边界的斗争和对克里米亚鞑靼人与土耳其的斗争。它在当时没有大量兵力来保卫达呼尔地区。俄罗斯在派遣全权使节团时赋与了它一个艰巨的任务, 这就是在清政府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的情况下, 尽管没有充分的武装力量也要以可以接受的条件同中国签订持久的和约, 并保持住俄

罗斯在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地区的领地。由于使节团同政府缺少经常的联系，所以任务就更加复杂了。

预先为外交谈判做出指示是困难的，因为俄罗斯不了解中国在外交上的习惯和准则。这就要求使节具有高度的机智，并在万一军事冲突不可避免时具有组织能力。

任命同中国缔结和约的使节团成员的工作，是由当时主持同波兰缔结和约的重大工作的十七世纪杰出外交家瓦·瓦·戈利津公爵负责的。戈利津明了俄罗斯使节团在达呼尔地区所将遇到的困难，所以在遴选使节团的成员时考虑到了这些困难。戈利津显然不是根据未来大使必须出自名门贵胄的原则，而是以他们的才干的高低为标准的。

御前大臣和将军费·阿·柯罗文被任命为第一大使。尼布楚将军伊·鄂·伏拉索夫被任命为第二大使。^① 秘书谢苗·克尔尼茨基奉派为第三大使。^②

使节团的随员有一些年轻的小贵族(阿列克塞·西尼亚文、费奥多尔·乌沙科夫、斯捷潘·科罗文、瓦西利·卢托文诺夫、拉里昂·西尼亚文)和三名司书(谢苗·瓦西利科夫、阿列克谢·克利曼托夫、基里尔·谢尔格耶夫)。还给使节团派了一个叫做安德列·别洛鲍茨基的拉丁语译员。

使节团团长费·阿·柯罗文虽然年轻(1686年他三十五岁)，但已经以学识渊博和精明强干著称。^③ 柯罗文是大贵族、将军阿·普·柯罗文的儿子，其父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和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时代是非常靠拢政府的，后来又是彼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6张背面。

② 同上，第140张。

③ 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彼得大帝时代的著名统帅和大臣们的业绩》，第1卷，莫斯科1812年版，第12页。弗·斯·马梅舍夫：《陆军元帅、海军上将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柯罗文伯爵》，圣彼得堡1910年版，第5页。

得一世的拥护者。未来的大使在父亲的庇荫下曾在宫中供职。1681年，他们父子一同到了阿斯特拉罕将军管区，在那里，年轻的柯罗文显示了他是一个十分勇敢而谨慎的人。由于在阿斯特拉罕的服务，他获得了御前大臣的官衔。^① 由于被任命为到中国边境去的大使，他被赐与了内大臣和勃良斯克总督的高贵官衔。^②

第二大使伏拉索夫^③是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来到俄罗斯后就为它忠实服务了。他是个有学问有经验的人物。伏拉索夫作为叶尼塞斯克将军的助手在西伯利亚供职很久，后来充任色楞格斯克^④和伊尔库次克将军，1683年任命他这个经验丰富的人为尼布楚将军就是因为那里发生了战争危机的缘故。伏拉索夫在被任命为使节团的成员时被赐给了御前大臣和伊拉脱穆斯克总督的官衔。^⑤ 伏拉索夫熟悉在达呼尔地区形成的具体局面。谢苗·克尔尼茨基也熟悉西伯利亚的生活，在被任命为使节团的成员以前，他在叶尼塞斯克将军手下充当秘书，从尼布楚和阿尔巴津来的一切情报都是集中到叶尼塞斯克将军那里的。

既然清军在阿穆尔地区已经行动起来，康熙皇帝对和平问题的态度又不很明确，所以俄罗斯政府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援助自己的达呼尔守军并保护自己的使节团。费·柯罗文奉命在西伯利亚招募和成立哥萨克军队，充分供给他们所需要的弹药和粮秣，然后把他们调往阿穆尔地区。

1685年12月，大使的父亲大贵族阿·普·柯罗文被任命为托波尔斯克将军。^⑥ 这一任命后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使大使

① 斯·克·鲍戈亚夫连斯基：《十七世纪的衙门长官》，莫斯科1946年版，第222页。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45张背面。

③ 在《中外旧约章汇编》所载的尼布楚条约译文中作“乌拉索夫”。——译者

④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伊尔库次克档案，第3—4卷。

⑤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515张。

⑥ 阿·普·柯罗文于1690年卸去了托波尔斯克将军的职务，与其子一同返回莫斯科。

费·阿·柯罗文从托波尔斯克顺利地、“迅速地”获得了忠实的助手、勇敢的侦察员和士兵以及在西伯利亚很难得到的一切必要装备：平底小木船、船帆和缆绳。

在准备使节团的出发时，西伯利亚事务衙门奉命编造关于达呼尔的一切城堡和城市的详细调查表，要求注明修建日期、守军人数以及每一城堡各自征收的毛皮实物税的数额。特别注意的是阿尔巴津。要求注明这些城堡距离中国边境多远。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调查表表明，阿尔巴津每年解交大君主国库的貂皮为四十至五十索洛克^①（年值七一九千卢布），^②关于达呼尔的其他城堡没有这样确切的资料。

此外，这个调查表中还说明，“根据对西伯利亚人的询问，从尼布楚堡到中国的嫩江乡村要走三星期，从阿尔巴津需要两星期”^③。

为了保护使节团，由莫斯科拨了五百零六名莫斯科火枪兵给费·阿·柯罗文，其余由柯罗文自己在西伯利亚各城市招募，以凑成一个人数一千四百名的哥萨克步兵团。这也就是他实有的，而在戈利津致中国边防都统彭兴^④的信件和沙皇致康熙的国书中号称“无数的”全部兵力。

关于使节团的随从人员和办公人员所需要的小贵族、司书和译员，柯罗文奉命由他自己酌情遴选。但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许多人对于在酷寒中前往毫不了解的中国边境这种遥远而危险的旅程非常害怕，在费·阿·柯罗文所选择的官员中，有些人企图以种种借口来规避这种危险的旅行。这就甚至稍稍延误了使节

① 四十张为一索洛克。——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26张背面。

③ 同上，第12张。

④ 在我国的有关记载中未见彭兴(Пунхен)其人，疑指1681年与郎谈一同奉命前往黑龙江的都统彭春。——译者

团的组成。^①

由于任务的复杂，达呼尔地区距离莫斯科的遥远以及西伯利亚的将军衙门的不完善，不仅必须赋与费·阿·柯罗文以外交上的全权，而且必须赋与他以行政上的全权。索菲亚公主的政府^②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派柯罗文到达呼尔地区去虽然只带少数军队，却使他有很大可能来表现主动精神和当机立断的能力。

任命内大臣费·阿·柯罗文为到中国边境去的大使的沙皇敕令分别通知了西伯利亚所有的将军，其中指示对他不得有任何阻挠和留难，否则就有失去沙皇宠信的危险。

柯罗文所以必须有行政权，还因为沙皇的特别敕令责成他采取措施重建被清军摧毁的城堡。这个敕令指示柯罗文说，“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攻占、破坏和焚毁了阿尔巴津以及其他一些城堡，他应当在那些地方重新设置和修建那些城堡，让先前居住在这些城堡中的军人和居民回去居住，并应耕种一切作物，以便这些城堡和贡赋的征收仍旧为大君主和大君主的国库带来很多利益。即使中国人不让他那些地方修建城堡，他也应当想尽办法来达到目的”。^③

在从莫斯科启程时，柯罗文领取了外交事务衙门和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训令以及赴任国书，这个国书赋与了使节团以“……进行协商和做出有利于两国的决定……”的广泛全权。国书中保证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96张背面及103、124张。不肯去的有司书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借口有病）。译员斯塔赫·戈扎洛夫斯基也躲避了。被任命为译员的服军役的外国人安德列·别洛鲍茨基则逃出自己的家门，藏匿了四昼夜来躲避外交事务衙门的警官，不肯到中国边境去。但结果他还是被迫前往，不过他要求预发四年薪金，硬说否则他“无从鼓起劲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服务”。

② 当时俄罗斯的皇帝年幼，由公主索菲亚摄政。——译者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15张。

俄罗斯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履行使节团所商定的一切条件。^①

外交事务衙门的训令中指示，要坚决声明是博格德汗向俄罗斯非法地不宣而战。此外大使们还应当宣布，为了对付进攻俄罗斯城堡的中国军队，沙皇政府下令派遣了自己的“无数强有力的军队以及大量武器弹药”前往达呼尔地区，^②只有在接到也提出停战建议的博格德汗的国书时才能同意进行停战谈判。俄罗斯的使节们受权在边境领地之内签订条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在中国境内进行谈判。

使节团应坚持中国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归还俄罗斯的一切城市和领土，应尽量设法做到缔结关于和平、贸易和边界的条约。训令中规定了在条约中俄罗斯政府可以同意的一般条件，并规定了使节团对于对方可能提出的要求所做答复的大致内容。训令中说，如果康熙的使节团要求让出整个达呼尔地区，并硬说俄罗斯城市阿尔巴津和尼布楚是属于博格德汗的，那时俄罗斯使节应当坚持说军事行动是清朝皇帝首先开始的，俄罗斯人建立阿尔巴津和尼布楚以及其他城堡的地方“从来不是博格德汗殿下^③的领地，居住在那些地方的是毛皮实物税缴纳者”，而他们是向俄罗斯沙皇缴纳毛皮实物税的。^④此外还规定要坚持俄罗斯和中国以阿穆尔河为界，因为任何其他国界都不能保障持久的和平。

重要的是要记住，大使们奉命“一切按照上述命令行事，但千方百计寻求和平解决，而不诉诸战争”。^⑤

训令的补充条款指示说：

① 柯罗文使节团赴任国书的本文参看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106张背面和107、108张以及本书附录三。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53—54张。

③ 俄国对清朝皇帝最初称殿下，后来才改称陛下。——译者

④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57—58张。

⑤ 同上，第83张背面，84张。

(1) 如果清使不愿以整个阿穆尔河流域为界,那末要经过“长久而广泛的谈判”至少争取到以到其支流布列亚河和结雅河为止的阿穆尔河为界。如果连这个条件也不接受,那就“在最后的条约中”同意以阿尔巴津为界,但得在阿穆尔河、布列亚河或结雅河沿岸从事渔猎等业。^①

(2) 如果连这个条件也不接受,那时“大使就应当按照大君主的敕令和西伯利亚事务衙门对他们所做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办理”^②,即试图签订停战协定,然后做好准备,进行战争。

(3) 还预先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俄罗斯使节到达色楞格斯克后不见博格德汗的使节到来;那时柯罗文应当把自己的到达和权能写信通知最邻近的中国边境城市,要求皇帝(指中国的——译者)派遣他的使节前来。如果中国使节团不来,也不归还俄罗斯城市,那时大使就必须按照西伯利亚事务衙门关于军事措施的指示采取行动。^③如果能够缔结和平和以阿穆尔河为界的条约,那时就应当达成这样一些协议:毫无阻碍地互相贸易,彼此交换俘虏和逃人,按照“承认每一君主自命的称号”原则彼此承认称号,只是不能承认中国的博格德汗自称为“全世界的统治者和采取以上对下的语气行文”^④。

还应当达成今后互派使节团和中国恰如其分地接待俄罗斯使节的协议。使节们应当指出中国对尼古拉·斯帕法里的那种不尊敬是不能容许的。鉴于尼古拉·斯帕法里使节团失败的经过,致柯罗文的训令中指示说,对交出投奔俄罗斯的鄂温克酋长根忒木尔及其族人的要求应予拒绝,并告诉他们根忒木尔及其族人已叛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87张。

② 同上,第88张背面。

③ 同上,第93张。

④ 同上,第70张。

依东正教，而自己的教友是不能引渡的。^①

在签订和约后，使节们应当采取措施在阿穆尔地区“比从前更好地修建起一切被毁的城寨，让人们去居住”。^②

俄罗斯使节团所奉训令的全部内容，证明俄罗斯肯定是力求与中国缔结和约并建立持久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不过在训令中还是把与中国建立广泛而自由的相互贸易问题放在主要的地位。俄罗斯重视自己在阿穆尔地区的领地，所以责成它的使节团坚决设法争取到承认以阿穆尔河为界。但是领土划界问题对俄罗斯使节团来说在那时是次要的。在既已形成的不利于俄罗斯的条件下，俄罗斯对于立刻划分领土界限并没有兴趣，因为它不能拨出大量兵力来保卫它在阿穆尔地区所开发的自由土地。为了迅速建立持久的和平和调整贸易关系，俄罗斯不仅肯在对自己不利的条件下划分国界，而且还同意对领土做出重大的让步。俄罗斯使节团还在出发时就得到许可，作为万不得已的措施，可以同意不以阿穆尔河的整个流域为界，而以从俄罗斯城市阿尔巴津的所在地开始的阿穆尔河流域为界，^③即把阿穆尔河下游沿岸的领土让与中国。

在组织使节团时，俄罗斯政府认为搞好与蒙古诸汗的友好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们的领地邻接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东部的边界。为了努力取得与蒙古的和睦关系，俄罗斯不干涉蒙古诸汗的内战和他们与准噶尔的战争。

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死后，同蒙古(喀尔喀)诸汗没有经常的书信往来，所以在1686年莫斯科不清楚他们对俄罗斯的态度。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64张。

② 同上，第63张。

③ 同上，第87张背面。

一封由沙皇写给最大的蒙古统治者之一斡齐赉赛音汗^①的国书交给了大使费·阿·柯罗文，其中以沙皇名义提起斡齐赉赛音汗的祖父和父亲对俄罗斯沙皇的真诚友好的誓言，号召他忠于这个誓言；国书中通知了派俄罗斯大使到中国边境去同中国缔结和平条约的消息，并表示希望斡齐赉赛音汗给使节团以协助。

1686年1月26日，费·阿·柯罗文使节团率领由二百七十辆满载弹药、货物和粮食的大车组成的庞大车队在严寒中从莫斯科启程。^②柯罗文急于赶到托波尔斯克，他需要在那里以西伯利亚的军职人员充实他的部队。

使节团从莫斯科途经彼列亚斯拉夫、雅罗斯拉夫、沃洛格达、乌斯丘格、索尔维契戈次克、卡伊戈罗德、索利卡姆斯克、韦尔霍土里耶、土林斯克和秋明，于1686年3月24日，即历时两个月，到达托波尔斯克。在冬季条件下，这是一个很短促的时间。柯罗文竭力遵守沙皇的“迅速行动，毫勿迟延”的敕令。1686年3月到5月间，柯罗文在托波尔斯克从事充实部队的工作，因为人数不足，而又急需完成，他把“适于服役的”国有农民，甚至政治流刑犯和刑事流刑犯都编为服役的哥萨克。1686年5月底，费·阿·柯罗文“率领全部军职人员携带公家的火药、榴弹、现款”和大炮，乘坐二十三只平底小木船从托波尔斯克“沿额尔齐斯河向鄂毕河”顺流而下。^③他经过萨马罗夫斯克村（位于鄂毕河的额尔齐斯河入口处附近）、苏尔古特城、纳雷姆堡、克特斯克堡，沿鄂毕河支流克特河航行到克特河上游的马科夫斯克堡。在这里，柯罗文下了船，再经陆路而抵达叶尼塞斯克。

行程是艰苦的，不惯于划桨和行船的莫斯科火枪兵远远地落

① 即土谢图汗。——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4张。

③ 同上，第11张背面。

后于使节团，所以柯罗文不得不在苏尔古特停下来。

继续启程之后，柯罗文于1686年9月底抵达雷布诺耶堡（在安加拉河上），并在那里开始过冬，因为早来的冬天使河水结了冰，前进已不可能，而且“许多木船在急滩和浅滩的石头上……撞碎了……”，船帆和缆绳破损了，在叶尼塞斯克没有获得后备的船具，因为在公家和商人那里都找不到。^①由于船具的缺乏，路上有了耽搁。

1687年5月15日，春天刚一到来，柯罗文就急忙从雷布诺耶堡动身，但又遇到巨大的困难。因为安加拉河沿岸“有很厚的积冰，无论拉纤或撑篙，行船都异常吃力”，但桨手很少，只有四十九名流刑犯，其中许多是残废的，而要向河流上游做正常的航行，据柯罗文自己估计，必须有三百多人才行。柯罗文让火枪兵充当了桨手（以前他是避免这样做的），这才克服了困难。

在渡过贝加尔湖之初，暴风摧毁了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所乘的四艘船。沉没了八百普特辛辛苦苦搜罗来的宝贵粮食，但人们幸免于难，改搭了其他的船只。后来渡湖比较顺利，柯罗文于1687年9月11日抵达乌金斯克，这里已经是达呼尔地区了。

大使到达乌金斯克后首先关心的是寻找粮食，居住在达呼尔地区的俄罗斯军职人员本来缺粮，大批军队到来之后就有饥饿的危险了。

柯罗文立即派中尉瓦西利·沃洛申宁率领一百名火枪兵从乌金斯克返回伊尔库次克去弄粮食。他们设法买到了粮食，并运到了离尼布楚不远的乌金斯克。

柯罗文在乌金斯克停留了一个时期，因为必须为进一步的行动做好准备。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314张。

柯罗文对使节会议的准备活动

费·阿·柯罗文使节团的主要任务是同中国缔结条约，但从他在离开莫斯科启程时所奉的训令、指示和表册中，他对双方在达呼尔地区的力量对比和康熙政府的真正意图不可能得出一个清楚的概念。因此在经过西伯利亚前往达呼尔地区的一路上，柯罗文对搜集关于中国和蒙古诸汗国的情报一直毫不松懈地给以最大的注意，同时并同他的副手尼布楚将军伏拉索夫进行详尽的通信。例如，当1686年8月还在叶尼塞斯克停留时，柯罗文就从伏拉索夫那里接到报告说，1686年7月初，清朝的舰队和大军开到了阿尔巴津附近。康熙军队第二次^①围了城。伏拉索夫报告说，阿尔巴津人争取到在第二次进攻之前建成了新的堡垒，并在城堡附近播种了五百俄亩庄稼，阿尔巴津城堡内的粮食足够被围者一年之用，“水也不缺乏”，^②但武器、大炮、弹药和人员很少。据传清军准备在攻下阿尔巴津后就向尼布楚各堡进发，并带有许多被强迫来的中国民夫和镰刀，以便收割阿尔巴津人所种的庄稼。^③伏拉索夫请求柯罗文急速派遣“军职人员到尼布楚来增防”。消息是令人不安的。俄罗斯使节团必须立刻准备作战。柯罗文立即从叶尼塞斯克派了由新募哥萨克组成的部队携带大炮、火药和铅弹前往尼布楚，并给伏拉索夫送去一道命令：迅速秘密地给被围的阿尔巴津将军阿列克谢·托尔布津^④送信，使阿尔巴津人确信俄罗斯军队正在前往“援救达呼尔地区和阿尔巴津堡”^⑤。命令伏拉索夫除送去

① 第一次围城是在1685年。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202张背面。

③ 同上，第204张背面。

④ 《平定罗刹方略》中作“额里克谢”，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中作“图尔布奇”。

——译者

⑤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218张背面。

这封信以外，并以自己名义写信给中国都统提出在达呼尔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因为俄罗斯的使节不久就将到达边境来进行和平谈判。

当柯罗文不得已而在雷布诺耶过冬时（1686—1687），他从信使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的信中获悉康熙皇帝同意开始和平谈判和从阿尔巴津撤军。柯罗文并不相信康熙的诺言是真诚的，因为从尼布楚继续传来并没有撤围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到1687年春天才知道，皇帝的军队仅仅是从阿尔巴津城外撤到阿穆尔河岸边，并且把他们的大炮放在瞄准城堡的位置上。

清朝的军事领袖拒绝进一步撤退，借口是他们的船冻结在河里了。康熙皇帝显然是在等待；有必要猜度他的计策。柯罗文的怀疑不久就由回到雷布诺耶向他复命的信使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的报告以及派往蒙古诸汗国的侦察队证实了。

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向柯罗文报告说，在路过蒙古各地时，蒙古诸汗对他们的态度是不友好的。斡齐赉赛音汗早就要求不要接受他的人加入俄罗斯国籍，并要求把居住在贝加尔湖附近以及在色楞格斯克和其他城堡里的向俄罗斯沙皇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布里亚特人送还给他。^① 斡齐赉赛音汗对俄罗斯的敌对态度在蒙古诸汗集会之后开始表现出来。^② 柯罗文派了自己的人到蒙古的宗教领袖格根·呼图克图的大本营去探听这次集会的目的。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在路过蒙古各地时获悉康熙皇帝所派的中国使节团携带着礼物来到蒙古会见呼图克图和诸汗，劝说他们“以他们的军队帮助中国人”，让他们进攻俄罗斯的色楞格斯克、伊尔库次克、勃拉次克和巴拉甘诺夫斯克诸堡，以使俄罗斯人不能把这些城堡的守军调往阿尔巴津。^③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274张。

② 同上。

③ 同上。

康熙希望利用挑唆蒙古人的政策来转移俄罗斯人对阿尔巴津和整个阿穆尔地区的注意力和兵力。担任侦察的哥萨克到雷布诺耶来报告柯罗文说,许多蒙古汗和台沙对康熙的提议“很有接受的倾向,他们正在协商”,但斡齐赉赛音汗的兄弟格根·呼图克图主张与俄罗斯人联合,劝阻汗和台沙们同俄罗斯作战。^①柯罗文没有把沙皇的国书送给斡齐赉赛音汗,但以自己本人的名义给格根·呼图克图送去一封信,请求他“继续友好”(同俄罗斯——作者)和通知有关中国的消息,^②随信并送去了贵重的礼物。

蒙古诸汗要进攻工事不坚固、装备很差的达呼尔诸堡的威胁使柯罗文深感不安,因此他急于赶到乌金斯克。

柯罗文从乌金斯克派信使斯捷潘·科罗文去通知中国他已来到边境,并请求中国派使节来缔结条约和消除彼此的纠纷。会议地点请博格德汗指定,但提出一个要求,即中国和俄罗斯的使节要在“使节和军职人员都人数相等”的条件下举行会晤。柯罗文允许科罗文,如果对方要求的话,他可以到北京去进行这个谈判。

柯罗文在到达达呼尔地区的头几天就派托波尔斯克人伊万·卡察诺夫去请康熙的都统们转达这样一个建议,即使节会议应该“双方人数相等”,每方不超过五百人。卡察诺夫应当“切实探听”康熙的使节是想和还是想战,清朝的都统们在阿穆尔河有多少军队,“在军事行动中有些什么习惯”。^③同时并向阿尔巴津将军贝顿发出严厉的命令,命阿尔巴津人“绝不要同博格德汗的人发生争端和向其寻衅”。柯罗文命伊万·卡察诺夫在返回乌金斯克时“把中国俘虏戈维杰克^④带来”。^⑤这个俘虏还是在围城时被阿尔巴津人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274张。

② 同上,第484张。

③ 同上。

④ 戈维杰克(Говедейк)是达呼尔人名的译音。——译者

⑤ 关于这个俘虏,是伊凡·伏拉索夫向柯罗文报告的。

俘获的，柯罗文想派他到北京去传递关于使节团会晤地点的信件。

柯罗文向莫斯科报告说，从俄罗斯的达呼尔地区到中国去，经过蒙古诸汗的兀鲁思最为近便，最好是在色楞格斯克召开使节会议，但不知北京方面是否愿意这样做。^①

柯罗文由于他的“办事努力和探明消息”，在乌金斯克已经接到沙皇送来的第三封嘉勉国书，但是尽管他在写给莫斯科的一切报告中说明了来自博格德汗以及蒙古诸汗的战争威胁，还是没有给他派来必要的军队。

派到中国去的斯捷潘·科罗文迟迟不归。他取道蒙古的诸兀鲁思（那时诸汗的战事还没有开始）和库伦（格根·呼图克图的大本营），这些地方对他的态度很粗暴，不供应他车辆和向导，并对通过他们的领地索取高昂的代价。格根·呼图克图的态度也完全一样，从1687年12月7日到1688年2月2日把科罗文扣留在他的兀鲁思几达两月。到了交界地方，中国官吏向科罗文宣称，如果他不前往北京，就让他回去而不做任何答复。其实是那时康熙不愿进行和平谈判，他在等待蒙古诸台沙进攻俄罗斯人的结果。科罗文同意了到北京去。由于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柯罗文向政府请示，万一清使不来会晤如何处理。^②在当时形成的局面下，这种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柯罗文看出康熙所做迅速缔结和约的提议不是真诚的，实际上他是采取战争政策的。在围攻阿尔巴津失败后，康熙宣布从该城撤退他的军队，但他本人并没有放弃用计占领城堡的希望，皇帝的都统们也正是试图这样做的。清朝的军事领袖们决定了解清楚俄罗斯守军的数目。

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通知阿尔巴津将军贝顿说，“他们的汗怜悯阿尔巴津人，派了两名医生来，并让他开一个病人的名单。贝顿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494张。

② 同上，第285张背面。

明了是诡计，回答说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很健康，不需要医生；^①但请求放信差到尼布楚去。

清朝的都统们拒绝了这个请求，并向贝顿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说明俄罗斯使节在哪里。贝顿回答说，俄罗斯大使在安加拉过冬，现在正赶到达呼尔地区来。

从猎人和逃人口中探听到俄罗斯使节团即将到来后，清朝的都统们遵照康熙命令于1687年5月6日从阿尔巴津向阿穆尔河下游撤退了五俄里。在新的驻防地点修建了安装有大炮的土工事，因为康熙的都统们担心俄罗斯军队进攻。^②

斡齐赉获悉只有少数军队随同柯罗文到乌金斯克来之后，于1688年再次向俄罗斯使节提出他的坚决要求：把贝加尔湖一带的毛皮实物税缴纳者交出来作为他的臣民。柯罗文加以拒绝，并宣称这些地方和这些人从来不隶属于斡齐赉赛音汗，他们向俄罗斯缴纳毛皮实物税已经五十多年了。^③

1688年1月初，斡齐赉赛音汗在呼图克图的同意下发动了战争。他率领大军进抵色楞格斯克和乌金斯克，包围了这两个城堡。同时赛音汗的兄弟巴图尔琿台沙也派他的军队直趋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后的伊尔库次克，以夺取所有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布里亚特人。^④

但是柯罗文率领自己的五百零六名莫斯科火枪兵和一千四百名新募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在乌金斯克和色楞格斯克把蒙古诸汗击退，使他们不能趋向贝加尔湖。从俘虏口中柯罗文得知“大炮和许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289张背面。

② 同上，第490张背面。这些工事由二十名外国人帮助康熙军队修建的。参看同上档案，第473张。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外交文件汇编》，第53页。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527张。

④ 同上，第528张。

多小型火枪”是博格德汗送到台沙们这里来的。^①

康熙显然没有放弃他的夺取俄罗斯达呼尔地区的计划，但他决定暂时把他的军队撤离阿尔巴津，试图借助于蒙古诸汗的军事力量来削弱俄罗斯人，引诱他们离开阿穆尔河。

当俄罗斯使节在色楞格斯克被围时，柯罗文所派的斯捷潘·科罗文到达了北京，但是康熙不接见他。科罗文从1688年3月14日到4月18日，即正当蒙古诸汗同俄罗斯人作战的时候，在北京一直被拘禁着，直到判明柯罗文击败了蒙古诸汗时，皇帝才接见了斯捷潘·科罗文，付与他一封致柯罗文的信，并在口头上保证说他将派自己的使节去进行和平谈判。科罗文“体面地”被释放了。康熙同意以色楞格斯克附近为会议地点。关于使节随带的军队人数，皇帝接受了俄罗斯人的主张（双方各五百名）。^②还在科罗文回来之前，柯罗文接到贝顿的报告说，1688年7月11日清军又进抵阿尔巴津。率领军队的都统力称他们只是护送他们的使者，准备驻扎在阿尔巴津附近，直到使者们从尼布楚回来。贝顿在信中对柯罗文说，他在阿尔巴津“提心吊胆，因为他们人少，粮食储备不足”。^③

到了1688年8月1日，清廷使节的先行信使终于来到色楞格斯克会见柯罗文，^④清廷的使节通知说，他们从北京启程到色楞格斯克来参加使节会议已经行抵中蒙边界，但由于蒙古诸汗同准噶尔的噶尔丹发生战争，不得不返回北京，所以请俄罗斯使节把自己的建议交人带回，约定新的会晤日期，但不要在本年，因为季节已晚，可在来夏。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529张。

② 同上，第626张背面。

③ 同上，第472张。

④ 柯罗文从乌金斯克移往色楞格斯克，以等待使节的会晤。

柯罗文在写给莫斯科的信里报告说，博格德汗“毫无必要地拖延时间”，以拖延使节会议的举行。他表示他恐怕其原因在于康熙企图与蒙古诸汗去商议。柯罗文在接见清廷的信使时说，如果博格德汗长期拖延着不派自己的使节，而他的军队又驻扎在阿尔巴津附近，践踏俄罗斯人所种庄稼，欺侮当地居民，那末俄罗斯人可能重新开战，其责任将由博格德汗来负。^①

随后柯罗文把一封很客气的^②复信交给信使，很好地招待了他们之后放他们回去，供给了路上所必需的一切。柯罗文在他的复信中重新提出和平建议，同意在边境等待一个冬天，请清使明确决定来夏他们愿意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会见。

柯罗文怀疑这是诡计，所以在信使们动身后就通过自己的侦察人员和蒙古逃人来了解中国使节是否确实离开过北京。他没有能够充分弄清楚这一点。从耶稣会教士张诚的日记^③中得知，使节团确实从北京动了身，但遵照康熙的命令故意走得很慢，而回去时却走得很快，采取了最近便的途径。

中国使节在回去时已经获悉康熙皇帝派了自己的军队进入蒙古，并且仿佛是为了打猎而亲自来到距离蒙古最近的地方。此外，蒙古的格根·呼图克图也派了他的亲信来欢迎途中的中国使节，在这个时期他与中国朝廷是不断有信使往还的。^④

还在这信给柯罗文通知改在来年举行会议之前，清政府就知道准噶尔的噶尔丹汗已经匆匆离开了他所占领的蒙古，因为鞑靼人向他自己的领地进攻了。^⑤但是清廷的使节团仍旧返回了北京，并不急于同俄罗斯使节会晤。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654张。

② 这是张诚的评价。参看《张诚日记》，第162页。

③ 《张诚日记》，第147—150页。

④ 同上，第150—161页。

⑤ 同上，第160页。

由此可见，蒙古和准噶尔的战争只不过是推迟使节会议的借口而已，其实还别有原因。康熙既然唆使诸汗进攻俄罗斯的城堡，所以就采取观望态度，不派自己的使节团前往，尽管他亲自指定了使节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柯罗文派了自己的人到阿尔巴津去，要求康熙军队按照博格德汗的诺言撤离城堡。向尼布楚的伊万·伏拉索夫发出命令，如果清军进抵该城“并采取军事行动，(那时——作者)他，伊万，求上帝保佑，应当对他们进行抵抗”。^①俄罗斯在达呼尔地区的兵力是很单薄的，但柯罗文决定以这个显然是不得已的措施来对付不肯妥协的博格德汗。

柯罗文在知道1688年不能同清廷的使节团会晤后，于1688年8月底偕同他的全部军职人员和辎重从乌金斯克乘坐从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布里亚特人(布拉特人)那里要来的大车前往尼布楚。随同柯罗文前去的共一千一百六十人。此外，过去已派了二百二十人到尼布楚去。留在乌金斯克的守军为一百二十人。色楞格斯克和各新垦地有一百六十四名军职人员。保卫尼布楚和阿尔巴津的守军为数是很少的。总之，柯罗文在整个达呼尔地区拥有的兵力共只二千五百至三千人。1688年夏天，柯罗文从贝顿那里获悉，清军又出现在阿尔巴津附近，但在收割和践踏了播种的全部庄稼以后撤退了。

柯罗文决定返回乌金斯克过冬，以防“蒙古诸汗破坏贝加尔湖地区的各城堡”，也免得“尼布楚的军职人员过早挨饿……”^②

同时，柯罗文接到了莫斯科对他请示如果康熙不派使节前来时如何处理的冗长批示。

由于克里米亚远征完全失败的影响，莫斯科方面日益坚决而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575张。

② 同上，第709张。

明确地力图尽速同中国缔结和约，克里米亚远征耗尽了国库，引起了小贵族对索菲亚公主的反对，促使宫廷集团争夺政权的斗争更趋尖锐。外交事务衙门以沙皇和“掌玺大臣”戈利津公爵的名义把同中国进行谈判的新条款给柯罗文送到了乌金斯克。

这些条款基本上是重申先前那个规定了缔结和约的条件的训令，这就是：

(1) 争取承认阿穆尔河为俄罗斯和中国的国界，如果不同意，可以以到布列亚河^①或结雅河为止的阿穆尔河来划界；^②

(2) 如果中国使节团对此也不同意，那就尽一切可能争取以阿尔巴津为界，但俄罗斯得在阿穆尔河、布列亚河或结雅河沿岸从事渔猎等业，双方都不得闹事，违者处以死刑；^③

(3) 如果中国对这还不同意，那就声明“大君主为了同可汗殿下保持最牢固的友谊和亲善，依照他，可汗殿下的愿望”，同意今后双方在阿尔巴津取消城堡、居民点以及军队，俄罗斯的阿尔巴津堡迁移，军队撤去，但“军职人员和缴纳毛皮实物税的俄罗斯人得在阿尔巴津一带以及上述各地安分守己地从事渔猎等业”；^④

(4) 最后，如果清使对这也不同意，那就商请延迟到两国君主同意互派使节团的时候再行解决问题。大使们应当促使博格德汗的代表同他们按照第一条订约，“必要时按照第二条，不得已则按照第三条，除非他们极明显地表示了不友好和无礼进攻，绝不要发动战争和流血”。^⑤

新训令的送来是为了最后一点，因为以前的训令中指示，如果清廷方面不愿以阿尔巴津为界，就“按照指示采取军事行动”。俄

① 布列亚河即牛满河。——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361张。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362张背面—363张。

⑤ 同上，第365张。

罗斯人肯于同意放弃阿尔巴津来对中国做新的重大让步，只是想要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迅速缔结和约。

对柯罗文请示如果博格德汗不派使节到边界来，而要求俄罗斯人前往北京时如何处理一节，俄罗斯政府接派遣柯罗文使节团出发时的精神同样坚定地作了回答：在边境内争取和平或停战，而不要到北京去。^①

同时，莫斯科还建议柯罗文以厚礼赠送蒙古的格根·呼图克图，敦促他亲自到北京走一趟，劝康熙同俄罗斯缔结和约并为此而派使节到边境来。

莫斯科很不了解达呼尔地区的实际局势，以致当真相信仿佛呼图克图会同意为了俄罗斯的利益而到中国去，而中国也会重视他。沙皇给格根·呼图克图写了一封新的国书，并派了特使秘书伊万·尤金送给他；命令柯罗文从西伯利亚各城市的沙皇国库中提取“在蒙古的兀鲁思认为是贵重的东西”，把这些厚礼给格根·呼图克图送去，请他协助搞好俄国和中国的关系。^②

莫斯科方面已经肯于放弃阿尔巴津了，但仍指望缔结以阿尔巴津为界的和约或停战协定。因此指示柯罗文利用坚固的土城来加强阿尔巴津的防御，在那里储备必要的物资，把由西伯利亚军职人员组成的军队留在该堡。即使当他率领部队“到达达呼尔各城堡，而中国人在他到达以前已经撤离阿尔巴津，以致无从与任何人协商”时，上述一切他也应当照办。^③

如果清廷的使节前来开会，但不愿以俄罗斯比较可以接受的条件缔结和约或停战协定，并且自行中止使节的谈判，那时柯罗文应向清方声明，“大君主沙皇陛下愿以阿穆尔河为界，沙皇陛下的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365张、407张、414张背面。

② 同上，第383—388张。

③ 同上，第400—401张。

俄罗斯军职人员和毛皮实物税缴纳者从现在起就不到阿穆尔河去从事任何行业，但也不准他们中国人到阿尔巴津这方面来”，如果此后发生任何纷争和流血事件，那将由清方“自己负责”，也就是说，那是他们的过错，但“阿穆尔河沿岸的达呼尔地区历来就属于俄罗斯君主……”并且今后仍将准许像根忒木尔那样的领主加入俄罗斯国籍。^①在向清廷的使节团交代了这些话之后，柯罗文可以率领莫斯科火枪兵返回莫斯科。

俄罗斯政府发出这样的指示，意味着它完全不了解在达呼尔地区形成的复杂局势。政府的训令表现了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军事力量的薄弱。

后来，索菲亚公主的政府在贵族、商人以及俄罗斯的一切社会阶层中间越来越不受欢迎，所以在达呼尔问题上又开始做新的让步，不再坚持只在边境之内，而不在北京缔结条约的主张，派了秘书伊万·洛基诺夫把几个不同的条约方案给柯罗文送去。指示柯罗文派洛基诺夫到北京去签订和约。柯罗文本人则不得到北京去。

俄罗斯使节团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实际支持，所以只能由它自己来克服一切困难，它不仅距离首都太远，而且距离西伯利亚各大城市也太远。使节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深知即使派出增援部队，由于西伯利亚道路的梗阻也很难期待它的到来。柯罗文明了，只能靠现有的微薄力量勇敢而谨慎地行动。对形势和自己方面的可能性的清楚认识，有助于柯罗文对蒙古诸汗的作战，而且他在尼布楚谈判中的成功也是与这一点有密切关系的。他不屈不挠地设法使清廷的使节团前来，他深刻了解他没有力量以军事方法解决达呼尔地区的纠纷，但认为在外交谈判中则有获得成功的希望。沙皇的敕令指示柯罗文立即派伊万·洛基诺夫到北京去缔结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415张。

条约。但是柯罗文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行动，在沒有得到关于使节会议的答复和沒有明了同蒙古诸汗的关系以前，暂且不派洛基诺夫前去。^①

1688年9月，柯罗文亲自远征蒙古的各兀鲁思，以平定敌对的诸汗。在距离乌金斯克二百俄里之处，柯罗文与塔布努特的(蒙古的)诸台沙相遇于希洛克河，在战斗中击溃了他们，从而保证了外贝加尔地区的后方不再遭受新的进攻。

柯罗文加强了乌金斯克的防御工事，留下人数不少的守军，于是启程前往康熙皇帝指定的外交谈判地点尼布楚。^②

俄罗斯使节团的处境由于击溃敌对的蒙古诸汗而有所好转，但这种好转是暂时的。柯罗文从归附俄罗斯的缴纳毛皮实物税的蒙古人那里探听到，幹齐赉赛音汗、格根·呼图克图以及其他到中国去游牧的诸汗正在养精蓄锐，准备借清朝的军事援助返回自己的领土，预料他们在返回后有进攻俄罗斯城堡的可能。^③

康熙获悉俄罗斯军队战胜了蒙古人之后，“就命令把他的大批军队集中起来，做好在春天开往俄罗斯的边区城市色楞格斯克和尼布楚的一切准备。同时命令他们的中国大使们要带着大批军队和武器弹药前往参加使节会议，只是分两路前往，一路去色楞格斯克，一路去尼布楚”。^④

柯罗文猜中了康熙的计谋，他很有说服力地写信告诉莫斯科说，他担心满洲军队恐怕会同蒙古人联合起来同时从两面向尼布楚和色楞格斯克进攻。^⑤柯罗文表明，俄罗斯人的数目少，防守两条战线将是不可能的。从这种考虑出发，柯罗文于1689年1月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612张。

② 《张诚日记》，第194页。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742张。

④ 同上，第747张。

⑤ 同上，第741张背面、747张。

派伊万·洛基诺夫前往北京,交给他三种条约方案以备万一,他应该首先试图按照第一种方案在北京签订和约(永久和约,边界沿阿穆尔河至松花江为止,也就是说,达呼尔地区的阿穆尔河沿岸领地几乎仍旧全部属于俄罗斯),其次按照第二种方案(和约,以阿尔巴津为界),不得已时按照第三种方案(和约,以阿尔巴津为界,但阿尔巴津堡拆除)。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洛基诺夫在必要时还可以再做让步,但柯罗文没有把表示割让达呼尔地区的第四种方案交给洛基诺夫,^①而命令他在北京一般地不要急于进行签订和约的谈判,对签订和约事严守秘密,主要应探明康熙的意图和计划以及他的军事力量。如果探明康熙仍旧派遣了他的使节团到边境来进行谈判,那就根本不谈在北京签订条约的问题,但坚持使节团不带大批军队随行,并按照以前的约定“以相等人数”与俄罗斯使节在会上相见。^②

洛基诺夫只有在他确信康熙皇帝不愿派遣他的使节并准备发兵征服达呼尔地区时,才得在北京签订条约。

当洛基诺夫把条约方案带到尼布楚请伊万·伏拉索夫签字时,这位尼布楚将军只在两种方案上签了字,他同意把边界划到阿尔巴津堡为止,但拒绝在规定阿尔巴津堡应予拆毁的第三种条约方案上签字。尽管困难重重,但俄罗斯达呼尔地区的地方工作者伊万·伏拉索夫甚至不愿考虑丧失阿尔巴津的问题。^③

送礼给官员们,使洛基诺夫从中国边境起就得到良好的招待,并且获悉康熙确实要派他的使节前往边境。洛基诺夫于1689年5月到达北京,在北京他从康熙手下的贪图礼物的高级官员和耶稣会教士那里证实使节团确实很快就将到来,于是他切实地执行了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746张。

^② 同上,第746—787张。

^③ 同上,第778张背面,伊万·伏拉索夫拒绝在关于割让阿尔巴津的第三种条约方案上签字。

柯罗文的命令。洛基诺夫对于条约文书的问题一字未提。他说明其他国家没有以大批军队在场来进行外交谈判的，并且坚持使节要在双方人数相等的情况下相见。

洛基诺夫通知柯罗文说，康熙有意缔结和约，他的使节团不久就将到来，他指定尼布楚为谈判地点，^①使节团将随带大批军队和一切军需品出发。洛基诺夫^②还报告说，博格德汗愿意缔结以割让或拆毁阿尔巴津堡为条件的和约。^③

柯罗文接到这些消息后，就率领自己的人们和辎重从乌金斯克向尼布楚进发。“过分泥泞”的道路很难走。辎重和哥萨克在路上落后了整整两天之久。沿途柯罗文不断接获阿尔巴津和尼布楚传来的警报，说驻在阿穆尔河的清军在清廷的使节团到来以前早已由水陆两路经过阿尔巴津开往尼布楚，故意要切断外界与阿尔巴津的联系。清廷的都统们向俄罗斯人诡称，他们到俄罗斯的达呼尔地区来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使节团的。

清军的到来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新的不安和忧虑。

到各处去侦察的阿尔巴津哥萨克菲力普·拉普希诺夫报告柯罗文说，博格德汗的军队“乘坐一百二十艘布萨船，每艘搭载三十多人，弹药很多，炮四十五门”。拉普希诺夫曾经被俘，清廷的都统们向他讯问“阿尔巴津和尼布楚的缴纳毛皮实物税的通古斯人的情况，讯问他们居留的游牧区在什么地方”。这个哥萨克尽管受到拷问，仍然顽强地推说不知道缴纳毛皮实物税的俄罗斯臣民鄂温克人确实在哪里游牧。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785张。

② 张诚在他的日记中关于洛基诺夫写道，这位二十三岁的柯罗文的使者在北京给大家以很好的印象。他很有礼貌，善于辞令，精通法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耶稣会教士们不相信洛基诺夫是俄罗斯人，认为在他们面前的是个荷兰人或英国人（参看《张诚日记》，第194页）。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786张。

知道清廷的使节企图唆使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居民反对俄罗斯人以后，柯罗文派了译员和一个叫做班巴盖依的舒林加到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那里去。最初柯罗文想法使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居民在使节开会期间离开尼布楚远一点，到捷列姆宾斯克堡和雅拉文斯克堡去游牧。但后来柯罗文开始进行另外的尝试。他再次派他的人到鄂温克人和布里亚特人那里去，劝他们不要为清朝的诺言所诱惑，自己这方面则答应给他们以重大的沙皇赏赐。让鄂温克人把家搬到离尼布楚远一点的地方去，但让他们自己骑马到俄罗斯使节团的地方来。^①柯罗文指望以这个方法加强尼布楚的守军。这个计划得到了部分的成功。后来鄂温克人的队伍来到柯罗文这里同俄罗斯人采取了共同的行动。

在等待落在后边的警卫队和辎重队时，柯罗文派遣他的信使瓦西利·卢托文诺夫^②往迎清廷的使节团，并带了一封信质问为什么使节们来时不预先通知并且带了这么多军队。柯罗文方面并建议清军停留在石勒喀河口，等候谈判的结束；使节团相会时，双方到场的警卫队应该数量相等，每方不超过五百人。

1689年7月28日，瓦西利·卢托文诺夫回来报告柯罗文说，清使向他保证说他们希望缔结和约，但借口仿佛其他地方没有可供他们的马匹和牲口利用的牧场，拒绝把军队从尼布楚撤往石勒喀河口。同时，清使还要求俄罗斯使节赶紧到尼布楚来，否则将不等待，将动身回去而不谈判了。于是柯罗文前往尼布楚，不再坚持清军撤离该城。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814张背面。

② 耶稣会教士张诚记述说，瓦西利·卢托文诺夫看样子大约是二十三岁，但他跟洛基诺夫一样也给人以很有学问和很有信心的印象，他迅速而清楚地回答了清廷使节的一切问题，并且坚定地陈述了他奉命传达的一切（参看《张诚日记》，第223页）。

清朝的使节团

在1689年以前，中国没有同外国进行过谈判，也不曾派遣过使节团到国外去（清朝害怕欧洲人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所以坚决拒绝欧洲国家想与中国缔结条约的尝试）。

康熙皇帝对外实行广泛的征服政策，要把邻近的亚洲国家都归并于中华帝国的版图。在十七世纪的八十年代，清政府整个对外政策的中心迅速转移到征服蒙古诸汗国的斗争上。这一斗争成为清朝皇帝在十七世纪和差不多整个十八世纪期间对外活动的主要内容。康熙有一个征服包括准噶尔在内的整个蒙古、俄罗斯达呼尔地区和东西伯利亚的远大计划。他期待迅速而不太费力地征服阿穆尔地区，因为那里的俄罗斯居民为数很少。

但是，康熙军队对阿穆尔地区的人数有限的俄罗斯守军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得到所期待的迅速成功。与此相反，这种军事行动需要庞大的支出，并引起了同俄罗斯长期作战的危险，这不但与皇帝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相左，而且恶化了清政府的财政状况。

由于通过军事行动迅速占领阿穆尔地区的企图失败，康熙开始愿意考虑俄罗斯屡次提出的缔结条约的建议，因而于1685年向莫斯科发出国书，表明他对阿尔巴津和通古斯逃亡分子问题的要求。但博格德汗同时还说他同意与俄罗斯进行关于和平和边界的谈判。^①康熙期待俄罗斯使节会像过去那样到北京来。如果俄罗斯使节在北京固执己见，那就可能像过去对待贝科夫和尼古拉·斯帕法里一样，让他们毫无所获地离开中国。清政府策动谈判无非是打算赢得时间而已。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822—828张。康熙的国书除由在阿尔巴津被俘的俄罗斯哥萨克亚基姆·伊万诺夫及其一个同伴递来一封之外，并由荷兰人带来了一封，内容完全相同。

俄罗斯政府于 1686 年通过它的信使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通知康熙同意进行谈判,但谈判地点不在北京,而在边境地区,因此引起皇帝宫廷的失望和强烈不满。

康熙和他的大臣们对是否派遣使节团到国外去的问题非常踌躇。俄罗斯信使在离开北京时不能断定这个问题将怎样解决,因此柯罗文在 1689 年以前对同清朝使节会见的现实性始终有所怀疑。为了彻底了解这一点,另一个俄罗斯信使斯捷潘·科罗文于 1688 年前往北京。同样,对他提出的要求还是俄罗斯使节团立即到北京来。^①但斯捷潘·科罗文坚决声明,俄罗斯使节将不到北京来,请求康熙派他的使节到色楞格斯克或皇帝所选择的其他边境地点去相会。^②

清政府在 1688 年不能不考虑俄罗斯的这个要求,因为在围困阿尔巴津的博格德军队中发生了饥馑和流行病,不可能把这些军队继续留在阿穆尔地区了。

俄罗斯军队向达呼尔地区移动的消息在中国引起严重的不安,这在科罗文带回的清政府复信中明白地表达出来。信中请求说明,是否“你们的俄罗斯白帝^③确有与我们和好相处的愿望……”^④科罗文在北京获悉,皇帝决定派“自己宫廷中的高级人物”为他的使节,^⑤但派谁还不知道。^⑥科罗文带回的复信表明了康熙愿与俄罗斯和好。

由此可见,在 1688 年春天以前,博格德汗是一直没有打算派使节去与俄罗斯人会见的,而是在北京等待着他们。康熙所以迟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9 件,第 632 张。

② 同上。

③ 白帝是对俄罗斯沙皇的尊称。——译者

④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9 件,第 641 张。

⑤ 同上,第 640 张。

⑥ 同上,第 636 张。

迟不派使节，因为他指望在蒙古诸汗削弱了俄罗斯人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力量以后，俄罗斯使节无论在会见地点问题上或在谈判本身的过程中都将容易妥协一些。

1688年5月终于任命了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使节团。这个首次任命的中国使节团是由贵族人物和国家大臣所组成。第一大使是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①。第二大使是内大臣都统一等公国舅佟国纲。第三大使是都统郎谈。大家都知道，郎谈曾于1685年和1686—1687年间率领皇帝军队进行过对阿尔巴津的作战。由于在阿穆尔地区的活动，郎谈于1688年获得了“固山额真”^②的高级官衔。他熟悉达呼尔地区的情况，奉命在使节谈判时指挥部队做军事演习的也就是他。

使节团的随员中还有高级官员和将领。他们是理藩院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黑龙江将军萨布素^③、理藩院郎中温达、副都统阿尤希^④。

谈判时，清朝使节向俄罗斯人宣称，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参与过同尼古拉·斯帕法里的一切谈判的，他知道当时所谈到的一切。^⑤耶稣会教士跟着说这就是阿尤希。

① 关于中国使节团成员的资料引自下述文献：1. 俄罗斯使节团出使报告。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159张；2. 关于缔结尼布楚条约的中国日志（可能就是《平定罗刹方略》。——译者）的译文。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K-2件，第1—27张；3. 《张诚日记》，第103—105页。（译文中索额图的官衔是以我国史料为根据的。按照原文应译为：“公爵索额图，‘多尔吉按班’，即大国务参赞和贵族，国务大臣，近卫军长官”，这里的“多尔吉按班”为满语，“多尔吉”的意思是内閣〔见清朝文献通考职官部分〕，“按班”的意思是大臣〔见辞源〕。——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K-2件，第19张背面。（“固山额真”为满语，固山译成汉语为旗，其长官称“固山额真”，译成汉语为旗主，顺治17年定汉名为都统。——译者）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K-2件，第14张背面。

④ 阿尤希（Аюси）是译音，我国史料中未及此人。——译者

⑤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048张。

在康熙宫廷供职的两名耶稣会教士被任命为拉丁语译员，一个是西班牙人徐日升^①，那时他在中国已居住了二十年，^②一个是法国人张诚，他是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到中国来的四名“皇家数学家”之一。^③在尼布楚进行谈判时，耶稣会教士张诚代表清朝使节向俄罗斯人声称，这样高贵身分的使节团从来没有派遣过，今后也绝不会再派遣。

据俄罗斯的使节们说，耶稣会教士在1689年的行动是与俄罗斯人敌对的，他们力求引起清朝使节团对俄罗斯人的反感。但是另一方面，耶稣会教士又企图以谄媚和奉承来掩饰自己对俄罗斯人的真正态度；他们表示鄙视所有的中国人民，其中也包括中国使节，扬言他们是俄罗斯人的朋友，力称他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柯罗文和他的使节团缔结一个可以接受的条约。文献中长期地流行着一种意见，认为俄罗斯同中国的尼布楚条约是由于耶稣会教士们，特别是张诚的努力而缔结的。而且认为柯罗文馈赠给耶稣会教士的礼物（或者说贿赂）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使节谈判过程中的具体事实驳倒了这种所谓徐日升和张诚起作用的说法。与这相反，所造成的印象是，耶稣会教士们，特别是张诚^④在尼布楚的行动是

① 这是他在中国所用的姓名，俄文名是 Томас Перейра，译音应为托马斯·佩列伊拉。关于他的国籍，说法不一，有的书上说他是葡萄牙人。——译者

② 这是耶稣会教士自己在尼布楚说的。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56张。

③ 姆·普·阿列克谢耶夫：《外国旅行家和作家所报道的西伯利亚》，伊尔库次克1941年版，第475页。张诚（1654—1707）从1686年到1707年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奉康熙之命到蒙古去过八次，记述了他的一切见闻。

④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1185卷，第42张。这件档案里记述了1688年法王路易十四派耶稣会教士西·阿列姆送给康熙的那份国书的内容。法王在国书里说，他给康熙再派六名学识丰富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以表示对他的敬意和友谊。这封国书在结尾时说：“利用这种方法（通过耶稣会教士——作者）我将获得关于一切非常事件的报告和见证……最后我祈求上帝为陛下您扩展疆土，赐与您美满的结局。1688年8月7日于玛尔里”（玛尔里，村名，路易十四的别墅所在地。——译者）。

旨在破坏谈判的。

中国使节 1688 年从北京的出发

1688 年 5 月 29 日，康熙皇帝为使节们正式送别。他同索额图、佟国纲和郎谈进行了单独的谈话。随员和耶稣会教士没有被允许参加这次谈话。^① 皇帝赏赐三个主要使臣每人一匹马，一柄镶宝石佩黄带的军刀、一张弓、两件绣花边金纽扣的上等锦缎龙袍。按照礼法，这种衣服只有皇帝和帝王血统的王公才有权服用的。^②

耶稣会教士苦苦请求康熙接见他们，但康熙命大臣向他们传话，祝他们随同使节团一路平安。

1688 年 5 月 30 日为使节团的启程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仪式。作为特别崇高的荣誉，康熙派他的长子主持赐茶仪式：首先由皇子接过茶来，然后递给使节和随行的七十名各级官员。饮茶完毕，全体参加者朝着皇宫行三跪九叩礼。于是使节团动身上路。^③ 在走出北京城门时，御林军持旗排列在道路两旁。

使节团由骑兵队护送，并有庞大的辎重队运载小铜炮八门以及大批粮食储备。使节团走得很慢，使节们沿途以打猎、捕鱼、与耶稣会教士谈天为消遣。刚刚到达蒙古境界，由于喀尔喀和准噶尔诸汗的开战而命他们返回北京的皇帝旨意就到了。显然，在 1688 年春天的时候，康熙是不急于同俄罗斯进行谈判的。

但是，那一年已经出现了促使清政府力求加紧同俄罗斯缔结和约的条件。其原因就是噶尔丹战胜了蒙古的喀尔喀诸汗。

1688 年，卡尔梅克的准噶尔国把西蒙古和北蒙古并入了自己

① 《张诚日记》，第 104 页。

② 同上，第 105 页。

③ 据清张鹏骧撰《奉使俄罗斯行程录》记载：“……行二十里抵清河，上遣皇长子赐茶，列坐饮毕，望阙谢恩乃行。”清钱良择著《出塞纪略》说：“……命皇长子骑行二十里至清河慰劳诸臣，宜赐乳茶。”以上均见清何秋涛撰《朔方备乘》。——译者

的版图,它的实力的增长使清朝害了怕,使他们征服蒙古的政策受到严重的打击。康熙还看到准噶尔和俄罗斯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对自己的强盛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噶尔丹散布流言说,他同俄罗斯已经结成联盟,有俄罗斯的军队和武器援助他。^①

这个消息使清政府感到不安,1689年它通过俄罗斯使者伊万·洛基诺夫请求俄罗斯不要同噶尔丹结盟。^②

康熙把被准噶尔人击败的喀尔喀蒙古诸汗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在1688年已经开始准备同准噶尔作战了。在这种条件下,清政府必须尽速同俄罗斯缔结和约。

1689年5月,洛基诺夫把柯罗文的一封信送到北京,俄罗斯人在信中坚决请求康熙派他的使节前来会晤,强调俄罗斯人真心愿意同中国建立牢固而持久的和平。^③

康熙现在迅速派出了他的使节。1689年6月3日,原班人马的清廷使节团再度从北京出发。中国使节团决定要让俄罗斯人感到意外地抵达尼布楚,以造成做好了作战准备的印象。中国的信使在把中国使节即将到来的消息正式通知伊万·伏拉索夫时态度非常粗暴,仿佛他们是给俄罗斯人下战书似的。^④

为了使本国的使节和军队能够突然出现在于尼布楚,清当局对在中国境内途中的俄罗斯使臣伊万·洛基诺夫留难不放,以致他直到8月1日,即直到皇帝的使节们到达两星期后才回到额尔古斯克堡。同时伊万·洛基诺夫也没有可能把关于自己的消息通知柯罗文,而柯罗文在没有得到他送来的消息以前就不能下决心到尼布楚去开始谈判。^⑤从北京到尼布楚的距离是二千六百二十一

① 弗·普·瓦西利耶夫:《中国的发现》,圣彼得堡1900年版,第68页。

② 同上,第69页。

③ 《张诚日记》,第193页。

④ 同上,第223页。

⑤ 同上。

华里或一千一百俄里，清廷使节团以相当短的时间，即四十七天^①（从1689年6月3日到7月19日）达到了目的地。为了加速推进，信使们走在使节团前面，用长竿在自己后面标上道路性质和所行距离。信使后面跟着一队士兵清扫道路，用树枝铺平坑洼。^②

这次使节团走的是从北京到尼布楚的最近途径：经蒙古领土向呼伦池至阿穆尔河。蒙古诸汗给了皇帝使节们以大力协助。

康熙的使节们于1689年7月20日乘坐装备大炮的七十六艘大战船抵达尼布楚。每艘船（布萨）上载有三十至四十名兵士。在舰队到达的同时，陆路的大军也到达尼布楚，后面跟随由四千头骆驼和五千匹马组成的辎重队，其后还有畜群和马群。军队的总数大约是一万五千人。军队是在夜间开到的，驻扎在涅尔查河注入石勒喀河之处的牧场上。在只有破旧的木桩围墙的小小俄罗斯城尼布楚面前，一夜之间整个一座城似的无数清军营帐忽然平地而起了。共只六百人的尼布楚守军实际上从使节团刚一到达的时刻起就被包围了起来。破天荒第一次赴会的康熙使节们把缔结和约看做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张诚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使节们“对外交人员的权利没有任何观念，他们不能信任俄罗斯人，顾虑本国人员的安全，因此违反协议带了较多的士兵到会见地点去”^③。俄罗斯使节柯罗文到1689年8月初才抵达尼布楚附近（8月9日才进入尼布楚），也就是说，他的到达比清朝使节团晚得多，因此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和历史家^④对他颇有责难，认为他的迟到是俄罗斯使节

① 《张诚日记》，第217—220页。

② 同上，第221页。

③ 同上，第228页。

④ 恩·恩·斑蒂什-卡敏斯基责备柯罗文延误了到达尼布楚的时间，他认为如果柯罗文早些到达那里，是能够以阿尔巴津为界的。

恩·恩·斑蒂什-卡敏斯基：《……外交文件汇编》，第61页。

弗·普·瓦西利耶夫也责备柯罗文，认为尼布楚条约是“可耻的”。参看弗·普·瓦西利耶夫：《中国的发现》，第69页。

团失败的原因。但是，实际的力量对比未必能因为柯罗文比康熙的使节团早到尼布楚而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的。

使节团的会见环境加深了原来就存在的彼此不信任和顾虑。为了尽可能掩盖尼布楚的真实情况，柯罗文不在城内而在城外附近接见清使派来的信差，为在那里特别设立了两座大帐篷，帐篷左右排列了十二门炮和一百二十名火枪兵守卫。^①

清使方面虽然在军事力量上拥有显然的优势，但他们仍然恐怕俄罗斯人方面玩弄什么诡计，因此在询问他们愿意在哪里会见时，他们回答不愿在尼布楚的木头房子里进行谈判，而希望在石勒喀河岸边的田间相会，不过后来同意在距离岸边远一些的牧场相见。^②同时清朝使节团还坚持双方不是各五百人，而是各只二百人，并且卫队不得带任何武器。他们勉强地同意了卫队只带军刀。^③在得到俄罗斯人的同意后，清使又保留了把他们的三十艘船停泊在会见地点对面的权利。他们借此来使自己得到船上大炮的掩护。^④商妥警备队双方各五百人，但在使节团应该相见的第一天，清朝的都统们就破坏了这个协议，把七百名士兵运过石勒喀河，到尼布楚来隐藏在树林里。^⑤

不知道清廷的使节是否奉有书面指示，但根据俄罗斯使节团所记录的康熙使节提出的各项要求，可以判明这些指示的主要目的。^⑥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35张。

② 同上，第940张。

③ 同上，第941—942张。

④ 同上。

⑤ 据解放前夏译《清朝全史》：“……会见条件如次：1. 会见所设于尼布楚与什耳喀之中央。2. 会见之日两国使节各带随员四十人。3. 两国皆出兵五百，俄列阵于城下，清则列阵于河岸。4. 两国使节之护卫兵各以二百六十人为限，除刀剑之外一切武器均不许携带。解放前萧著《清代通史》亦从其说。——译者

⑥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000—1100张。

在中国使节团 1689 年的工作日志^①和张诚的日记中,对俄罗斯方面关于谈判过程的资料有宝贵的补充。

清朝使节团的主要任务是同俄罗斯缔结持久的和约,从而保证同准噶尔的斗争获得有利的条件。如果说俄罗斯力求与中国缔结和约首先是为了建立彼此的贸易关系,那末清政府坚持和平主要是为了一旦在蒙古作战时有一个可靠的后方。

为了建立一个隔离(俄罗斯)的地带,康熙力求把已经居住了俄罗斯人的地区划归中国。

为了实行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因而也与俄罗斯隔绝开来的政策,清政府于 1689 年不仅对与俄罗斯通商的问题不感兴趣,而且正相反,它力图阻碍贸易的发展。

康熙的使节团很勉强地进行了贸易条件的讨论。当俄罗斯人指出贸易会给双方带来利益时,清使回答说中国商人没有到俄罗斯去的必要,但如果俄罗斯人愿意到中国来贸易,那末只要俄罗斯使节肯在边界问题上实行让步,就可以允许他们前来贸易。^②当和约条件已经取得一致意见时,博格德汗的使节又拒绝把关于贸易的条款列入条约文本,硬说“这是小事情”,没有条约也能进行,仿佛在条约中列入这一条将是对他们的“侮辱”。^③

康熙要求俄罗斯让出的领土范围,是随着他的武装力量的情况而有所改变的。在 1688 年以前,清政府拥有颇为可观的武力和财源,因此这些兵力和财源就开始被用来征服俄罗斯人在阿穆尔地区所开发的一切土地。那时多半考虑过不仅夺取阿穆尔地区,而且夺取其他地区的计划。清使在谈判开始时向俄罗斯人提出的,就是这种过分而不现实的要求。但在 1689 年,这种要求可以说是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K-2 件,第 1—27 张。

② 同上,第 10 件,第 1049 张。

③ 同上,第 1039 张。

为了获得缔结和约的最有利条件而有意提出的最高方案。到 1689 年,康熙本人已经明了,企图实现这种侵占,只有使用武力,但他的武力又有别的用途。到 1689 年,博格德汗对于改变边界已经有了另外的计划。现在他想获得阿穆尔河流域毗连阿尔巴津堡的全部土地和毛皮实物税缴纳者。这种要求也是不现实的。清使长时间地不断试图以使用武力来威胁俄罗斯人同意这种条件。

清朝使节团用以与俄罗斯人缔结和约的最后条件,是要求把阿穆尔河流域的土地划归中国和拆毁康熙的都统们无论用武力或诡计都没能攻下的阿尔巴津城。

关于缔结尼布楚条约的中国日志里说,在派遣使节团从北京出发去与俄罗斯人相会时,康熙皇帝给了他们一道秘密旨意:“圣上谕令他们在会议中间,如果情势需要的话,不要放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为此谕令赐给他们八面绣着巨龙的大旗。”^①

清朝使节团切实执行了他们皇帝的以尼布楚为界的指示,他们在获悉俄罗斯人甚至不愿讨论割让阿穆尔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建议以后,就从树林中放出了高举八面大旗的军队,命他们在树林附近的草地上和小谷中来往行进。^②康熙还命令使节们,如果军队的这种演习还不能使俄罗斯人让步,就采取最强硬的手段对他们施加压力,即停止谈判并包围尼布楚。清使十分坚决地要求只以阿穆尔河和到其河源为止的额尔古纳河为界,对进一步划界并没有很坚持。这是因为从额尔古纳河的发源地起以及该河以西都是喀尔喀蒙古诸汗的领土,他们在 1689 年还不是中国的藩属;清朝皇帝一方面实行征服喀尔喀的政策,一方面也顾虑俄罗斯对蒙古的影响。在边界谈判中,不仅是在讨论阿尔巴津命运问题时所发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K-2 件,第 22 张。

② 康熙关于这一点的训示参看中国日志的记述,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K-2 件,第 24—25 张。

生的困难，就是在俄罗斯和相邻的蒙古诸汗领土的边界问题上所发生的困难，都与这个因素有关。

中国使节试图使俄罗斯人承认中国对蒙古诸汗国的权利，但是遭到激烈的反对，没有能坚持他们的主张。

与力求迅速缔结相互有利的和约以保证贸易的俄罗斯相反，康熙皇帝的政府只是由于他们在阿穆尔河的军事失利和因准噶尔势力的增长而引起的顾虑才肯于在 1689 年进行缩约谈判的。

第二节 俄中两国在尼布楚的谈判

1689 年 8 月 12 日使节们的第一次会议

柯罗文抵达尼布楚(1689 年 8 月 9 日)后，两国使节团很快就商定不在城内，而在田野间会见，这是清朝使节团所选择的“会晤”地点，距离尼布楚半俄里，位于石勒喀河和涅尔查河之间。^① 双方应当各以五百人担任使节团的警卫。8 月 12 日举行使节的第一次会见。双方的帐篷面对面设置得距离很近，以便两国使节团彼此的视听能够毫无阻隔。整个俄罗斯帐篷都覆盖着一层鲜艳的土耳其毛毯，里边摆着桌子和圈椅，圈椅上也铺着豪华的毛毯。桌上陈设着美观的时钟和金质的墨水瓶。^②

清使的帐篷是用朴素的麻布制的，一张普通桌子后面摆了一条宽板凳，板凳上铺着毡子。在商定会见仪式的一切步骤后，康熙的使臣们乘坐三只船渡过了河，同来的士兵有八百名，五百名列在岸边，三百名作为使节团的警卫。使节们骑上预先备好的马，徐徐走向帐篷。他们穿着颜色鲜艳的绣龙的绸缎衣服，颈上挂着红白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10 件，第 938、956 张背面。

② 同上，第 960 张。

两色的珊瑚朝珠，头上戴着嵌大珍珠的草帽。^①捷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②向柯罗文通报，清朝使节团即将到达会见场所了。俄罗斯使节也立刻“……按照使节的惯例穿戴起来”，从尼布楚起身前往帐篷。以上校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和西多尔·鲍加蒂列夫为首的三百名莫斯科火枪兵列队走在使节团前面。火枪兵没有携带火枪，只是持着军刀、战斧和长矛，“但为了预防危险，那些火枪兵暗中携带了手榴弹”。^③火枪兵奉命停留在帐篷附近靠尼布楚的一侧，以便万一对方终于决心进攻时掩护本国的使节团。二百名小贵族、司书和军职人员骑马跟在俄罗斯使节后面一直走到使节团的会见场所。^④警备队后面跟随有一队训练有素的军乐队，奏着战斗进行曲。《张诚日记》中有一段描写了俄罗斯使节在这初次会见时刻的仪表和举止。他们的仪容是外表镇静而尊严的，虽然整个局面颇似战斗开始前的暂时的寂静。两位俄罗斯使臣体态端正，外貌庄严，衣饰豪华，穿着金黄色的锦缎长袍以及同样是金黄色的斗篷，斗篷上“装饰着过去从未看到过的（指张诚——作者）墨色的美丽貂皮”。^⑤费奥多尔·柯罗文身材高大，有点肥胖，但具有极其健康而结实的外表，“能够无须做作就自然而然地显示出自己的身分”。^⑥俄罗斯使节的一切豪华装饰都是旨在证明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强大而富有的国家。两国使节团同时到达，同时下马，并且同时进入各自的帐篷，同时在桌子后面就坐；俄罗斯使节柯罗文和伏拉索夫坐在圈椅上，谢苗·克尔尼茨基坐在板凳上，随从的军职人员站在他们身后。清使按照他们的东方习惯大家一起盘腿坐在一条宽板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64、984—985张。

② 过去是乌克兰的盖特曼，这时被流放在西伯利亚。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62张。

④ 同上，第963张。

⑤ 《张诚日记》，第229页。

⑥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62—963张。

凳上。文武官员和其余随从站在他们身后构成一个半圆形。耶稣会教士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①依照双方的协议,谈判以拉丁语开始。^②

经过相互寒暄以后,柯罗文请清使审查他的全权证书(授权的国书),并要求他们也出示自己的全权证书。但是他们拒绝看柯罗文的证书和出示自己的文件,理由是他们被授予了缔结永久和约的全权,他们有皇帝的图章,并且出示了这个图章。^③于是柯罗文开始进行谈判,申诉博格德汗的不宣而战使俄罗斯人遭受了重大损失。俄使提议停止一切边界纠纷,要求归还从俄罗斯居民夺去的财产并赔偿损失。清使加以反驳,并提出相对的申诉,指出俄罗斯的哥萨克(哈巴罗夫等人)未奉沙皇命令擅自来到博格德汗的领土并建立阿尔巴津,使博格德汗的毛皮实物税缴纳者受到损失,因此博格德汗派兵到阿尔巴津来惩罚俄罗斯人。在阿尔巴津城被攻下后,曾以永不复返为条件释放全部俄罗斯人及其将军返回俄罗斯。可是俄罗斯人又回来并重新建立城堡,所以博格德汗二次围攻阿尔巴津。在获悉俄罗斯的大使即将到来以后,康熙就命令自己的军队撤离该城了。

博格德汗的使节固执地硬说俄罗斯人所定居的整个达呼尔地区早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④和成吉思汗时代起就是属于皇帝的。^⑤俄使证明说,达呼尔地区从来不曾成为中国博格德汗的领地,而且达呼尔地区的居民很久以来就是向俄罗斯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即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64张。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974张背面。

④ 古希腊的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译者

⑤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73—974张、977张背面。(这可能是外籍译员的任意翻译,《平定罗刹方略》说:“……索额图以鄂嫩尼布楚系我国所属茂明安诸部落旧址,雅克萨系我国人阿尔巴西等故居后为所窃据细述其原委开示之因直斥其侵犯之非……”。——译者)

使康熙有时向这些地区征收了毛皮实物税，那是非法的行为，是利用了这样一个情况，即俄罗斯幅员广大，所以不能时时刻刻在遥远的达呼尔边区防范博格德汗的贡赋征收者去征收毛皮实物税。柯罗文再次重申，现在必须缔结永久的和约并停止这种侵权行为。^①

争论持续不已；双方都是几次三番重复自己的观点，完全不接受对方的反驳。于是柯罗文决定把谈判转移到比较具体的问题上去。他宣称，当前主要的问题在于缔结和约和划定边界，并提议“以阿穆尔河直到海滨为界”；阿穆尔河左侧^②的地区属俄罗斯；右侧属中国。

他为他的建议提出的理由是，俄罗斯很久以来就占有阿穆尔河左岸，而阿穆尔河流域的其它一切达呼尔土地的合法占有者根忒木尔酋长则自愿加入了俄罗斯国籍。此外，“汗的亲信”曾对尼古拉·斯帕法里和俄罗斯的信使们“说过，关于阿尔巴津、尼布楚以及沙皇陛下方面在哪里建立了城堡和哪里有什么居民点，关于这一切，他们的汗和他们中国人都问”。^③清使以激烈的语调做了反驳，不止一次地重弹那关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的老调，仿佛清朝皇帝是他们的后裔似的，并要求让出阿穆尔河流域的土地以及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布里亚特人、鄂温克人和蒙古人。^④中国使节认为，在以这样的条件确定国界后，必须在边界树立石碑，刻上拉丁语、俄语和汉语的条约全文，照他们的意见，这样就会永久地奠定边界的牢不可破性了。但俄罗斯首先应当交出逃人，即根忒木尔氏族的鄂温克人。

这样，在第一次会中就明确了解到，清使要求俄罗斯让出整个达呼尔地区，即让出早就由俄罗斯农民和哥萨克牢固占有的土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70—971张。

② 即黑龙江北岸。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873张；第10件，第977张。

④ 同上，第10件，第976张背面。

地。他们为要求这样重大的领土让步所援引的论据是，所有这些土地当初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时代起就是中国的，后来属于成吉思汗。既然满洲人的清朝把自己看成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所以清人也就认为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同时，博格德汗的使节还坚决说，在中国，“……在他们那里，那些地方的酋长们现在还活着，他们是那些土地的占有者。”^①

俄罗斯使节没有料到他们会有这么高的要求。他们推测这是出于耶稣会教士对清政府的影响。

柯罗文断然拒绝了这种利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来把这些土地同中国联系起来的理由，他宣称这些土地过去不是中国的，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游牧者过去根本没有向任何人缴纳过毛皮实物税，但后来就开始向俄罗斯缴纳毛皮实物税了，所以俄罗斯既不会让出这些土地，也不会让出自己的毛皮实物税缴纳者。^②同时，柯罗文还指出，不能以逃亡的酋长还在为理由来划分边界，因为在俄罗斯也有许多来自中国方面的逃亡者。^③俄罗斯人请求提出关于边界的切实建议，并说关于界碑问题应在确定边界以后再谈。他们要求中国把俄罗斯的“固有臣民”，即在阿尔巴津和阿穆尔河一带的其他俄罗斯城堡被围时被俘的俄罗斯人以及自动逃往中国的俄罗斯人交还俄罗斯。^④清使回答说，除了以这种条件来确定边界的提议以外，他们现在没有其他方案，将来也不会有。

谈判拖延下来，夜色已经降临，两国的使节团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散会。

俄罗斯使节在第一次会见中没有能摸清中国使节会同意怎样的边界。柯罗文向莫斯科报告说，第一次会见的经过由于充任译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79张、982张背面。

② 同上，第979—980张。

③ 同上，第983张。

④ 同上。

员的耶稣会教士的阻挠而失败了，而清使又不愿以蒙古语进行谈判。^①

1689年8月13日使节们的第二次会议，使节谈判 的破裂和尼布楚的被围，通信的谈判

次日，即1689年8月13日，中国方面没有作再度举行会见的任何表示。俄罗斯人派小贵族瓦西利·卢托文诺夫到中国大营去请使节们就在当天相会，希望能在傍晚以前把问题讨论完毕。使节们同意了。又重复了一次同时走向帐篷，同时下马和同时进入帐篷的仪式。俄罗斯人的帐篷左右排列着二百人，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排列着三百人。清使的警备队至少多一倍。

使节们互相作了寒暄。于是柯罗文请求博格德汗的使节切实说明究竟想要怎样划界，因为前一天对这问题没有做出答复，因此“没有得出任何结果”。他请求他们宣布“自己对边界的真正意图”。

但是清使仍然坚持请俄罗斯人“对边界先提建议，而他们对边界要说的仍旧和昨天一样”，也就是说，仍然主张那个割让达呼尔地区的边界。俄罗斯人再次申述这个提议是不能接受的。柯罗文吁请清使更现实地对待谈判，“停止其他不必要的谈论……着手于确定边界”。^②柯罗文一再证明整个达呼尔地区很久以来就属于俄罗斯而不是博格德汗的领地，并再次提议以阿穆尔河为界，因为“沙皇陛下方面在这条河沿岸的许多地方建立了城堡，多年以来这条河流就是由沙皇陛下方面占有的”。^③皇帝的使节又证明说，达呼尔地区是属于博格德汗的，所以边界必须在它之外，如果俄罗斯使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85张。

② 同上，第987张。

③ 同上，第988张。

节根本不曾奉有考虑这种边界的指示，那也就不必谈什么了，让俄罗斯沙皇派其他使节到北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谈判显然濒于破裂了。

柯罗文怕清使退席，非常有礼貌地说，在第一次会上谈判是以非常友好的方式进行的，他对使节们的亲善和理智感到满意；他对他们在第二次会上“改变了态度”，如此粗暴地进行谈判表示不解。柯罗文朝着康熙的使节们说：“难道他们，大使们，奉本国君主之命前来，不是为了缔结永久的和平条约和划分边界吗？”力图破坏谈判的耶稣会教士代表使节们对俄使的亲善言词回答说，除以前所谈的边界外，他们不曾奉有拟定其他边界的指示，所以与柯罗文及其同人不必再谈。如果沙皇不派其他使节前来，而柯罗文又不同意边界划在达呼尔地区以外，那末博格德汗将自行规定这条边界，“现在派到阿尔巴津来的军队是很多的”。^①

俄罗斯人对这种威胁镇静地反驳说，“在使节会商时以战争相威胁是不常见的”，如果博格德汗的使节想要作战，那就请他们明言好了。谈到自己方面，俄罗斯人宣称他们是不害怕军队的，清朝“使节一定也确实知道这一点”。柯罗文在这里直接地暗示：康熙军队以优势兵力围攻了阿尔巴津十个月，但也沒能把它攻下来。柯罗文接着宣称，俄罗斯不愿无谓地流血，他与他的同僚被派到边界来是被授与和中国缔结和约的全权的，因此俄罗斯将不会派任何其他使节到北京去。如果清使确实愿意缔结和约，那就应当放弃威胁手段，而代之以提出自己方面关于边界的令人可以接受的提议，至于军队，那末俄罗斯是并不感到缺乏的。

柯罗文懂拉丁语，在注意地听取张诚的翻译之后，发现他显然歪曲了自己的发言，因而怀疑张诚也会歪曲清使的发言，而添枝加叶。他决定把自己的发言译成蒙古语来考验这一点，他的怀疑被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90张背面。

证实了。

康熙的使节们听了译成蒙古语的柯罗文发言后说，“他们命耶稣会教士谈的只是边界，绝没有命他们谈到军队”；接着他们彼此说了一些满洲话，据俄罗斯使节说，^①他们显然是“在责备（即鄙视——作者）耶稣会教士”。清使说的是什么，俄罗斯人无从知道，因为他们没有人通晓满洲语。当发现耶稣会教士显然在阻挠谈判的成功后，俄罗斯人曾试图不让他们参加使节的会谈。但是清使不敢违背康熙皇帝的命令。耶稣会教士依然是译员。不过虽然使用了蒙古语，使节们仍然没有提出与先前不同的其他边界建议。为了使会见不致于“未能缔结条约”而散，^②俄使用蒙古语提议以布列亚河为界，^③同时坚持中国赔偿阿尔巴津及其他被毁城堡的居民的损失，并遣返俘虏和逃入。^④清使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后，通过徐日升以拉丁语提议以尼布楚为界，石勒喀河北岸仍为俄罗斯所有，沿石勒喀河南岸直到鄂嫩河以及沿鄂嫩河直到音果达河的土地划归中国。这就是说，俄罗斯丧失整个阿穆尔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大部分。俄罗斯使节团没有理由接受这样的建议。争论继续下去。双方各执己见。

康熙的使节要求俄罗斯人，如果他们不愿以尼布楚为界，可以对此写一封信说明自己方面的意见。他们可把这封信呈送到博格德汗那里去，这样使节团也就可以散会了。^⑤显然，接受这个提议就意味着俄罗斯使节团应对谈判破裂负责。条约的缔结会无限期地搁置下去。柯罗文对于这个提议回答说，如果博格德汗的使节缔结了和平条约，他们会因此而永远扬名于世界，但是如果他们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92张。

② 同上。

③ 在十七世纪，布列亚河俄罗斯人称为“贝斯特拉亚”河。

④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92张背面。

⑤ 同上，第994张。

不愿这样做，那末必须双方同时交换散会的信件，而且要预先通知信件的内容，并由所有的使节签字盖章。俄罗斯使节不无根据地认为，博格德汗的使节可能是想以武力迫使他们接受和约条件。他们在自己的日记和出使报告中都记述了这一点。

索额图拒绝了俄罗斯人关于双方互换散会信件的提议，他不肯提出自己方面关于散会的信件，坚持要俄使考虑在尼布楚附近划界，至于清使方面，他们硬说他们是希望和平的。接着又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柯罗文一再试图促使康熙的使节提出可以接受的边界建议都没有获得成功。清使沉默了好久，最后示意他们想赶快起身了。俄罗斯使节看到这个情况，又提出了新的建议，即沿阿穆尔河支流结雅河来划界，从结雅河开始，阿穆尔河左岸属俄罗斯，右岸属中国。^①

但是连这个提议清使也立即拒绝了，他们宣称“除尼布楚外，他们不再提议其他边界，没有什么可再谈的了”，^②同时并补充说，连尼布楚也在博格德汗境内，博格德汗所以把尼布楚让给俄罗斯，是为了使俄罗斯人能够从那里来同中国进行贸易。柯罗文以讽刺语调对清使对尼布楚的这种善意表示了“谢意”，因为俄罗斯人被允许在自己的家里休息。清使借口夜已降临准备起身。他们答应作书面的答复。两国的使节团客气地道别而散。

这样，第二次会见也没有成功。俄罗斯使节深信谈判失败的责任在于耶稣会教士。这一点在使节团的出使报告中有明白的记载：看到“清使们对缔结永久和约的种种反对和阻难多半是由于耶稣会教士的缘故，所以我们命安德列·别洛鲍茨基^③跟耶稣会教士进行了密谈，允许给他们以大君主的恩典和赏赐”，^④即珍贵礼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97张背面。

② 同上，第998张背面。

③ 俄方的译员。——译者

④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99张。

物。耶稣会教士欣然同意为了贿赂而为俄罗斯人效劳，但是说清使并不信赖他们，他们将在传递信件时报告必要的消息。^①

在第二次会议后的夜间，清使下令把他们的帐篷从会议地点拆走了。对俄罗斯人的质询回答说，除以尼布楚为界外，他们“不曾奉有博格德汗的其他敕令”，既然俄罗斯人不同意，那末“此后他们就无须再行考虑和会见了，所以他们下令从会议地址拆除自己的帐篷”。^②但是清使并非决心毫无转圜地拒绝继续谈判。他们通知说，如果俄使想同他们交换函件，他们愿意回答。

在1689年8月14日到8月27日的整整两个星期间，两国使节团一直没有会见，但是通过自己的译员进行了谈判，译员们一天中在两营之间往返好几次。俄罗斯人方面是安德列·别洛鲍茨基以及几名司书，清使方面是张诚和徐日升，但总有清方的军人跟着。

耶稣会教士在第一次进入尼布楚时就瞒着他们的护送者送来一封信，要求柯罗文在适当的时机给他们送去貂皮、银鼠皮、玄狐皮、上等酒、母鸡以及较多的牛油。对此耶稣会教士答应提供关于康熙使节团的意图的情报。

俄罗斯人虽然不信任耶稣会教士，但仍然给他们送去了所要的东西，以免失去这个虽然是可疑的情报来源，因为猜出清使的真正意图是极端重要的。从这个观点来说，耶稣会教士所报告的消息可能是有几分值得注意的。

清军包围尼布楚

1689年8月14日到27日，尼布楚被真正包围了起来。在清使从会议地址把他们的帐篷拆走后，柯罗文通过安德列·别洛鲍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999张。

^② 同上，第1001张。

茨基再次请他们或者同意以阿穆尔河为界，或者交换散会函件并签订停战协定而散会。但是索额图说，如果俄罗斯人送给他内容可以接受的散会函件，他接受，但他自己不送散会函件，“因为不知怎样写，而且永远也不写”。^①关于俄罗斯的俘虏和逃人问题他通知说，博格德汗同意把他们送还俄罗斯，但对此俄罗斯应将其“居住在阿尔巴津和其他城堡附近的毛皮实物税缴纳者以及他们的土地”交还中国。^②

清使以这种方式表示了他们一定要获得阿穆尔河一带土地和阿尔巴津的愿望。柯罗文在同一天，即1689年8月14日，派哥萨克们到阿尔巴津去向贝顿传达命令，要他“严加戒备，并下令认真收割所种的庄稼，因为中国的大使们在谈判阿尔巴津问题时态度固执”。^③

在8月15日以前，博格德汗的使节们坚持以尼布楚为界，后来又提出新的建议：以绰尔纳河（石勒喀河左岸支流）、石勒喀河以及额尔古纳河至其水源为界。^④他们力图通过进一步的军事威胁来实现这个提议。^⑤

俄罗斯人预料不仅会进攻阿尔巴津，而且会进攻尼布楚；从这种顾虑出发，把城郊各自由村附近的哨兵增加到三百人。用大木头在城堡周围设置了障碍物，把牲畜从郊外赶进城里，以备长期的围困。为了不让耶稣会教士发现这一切准备，柯罗文不在尼布楚城内接待递信人员了，而在尼布楚城墙边面对城堡的广场上设置了帐篷来接待他们。^⑥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004张。

② 同上，第1004张背面。

③ 同上，第1005张。

④ 同上，第1015张。

⑤ 同上，第1005张背面。

⑥ 同上。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因清军包围尼布楚而采取的，清军把他们的哨兵分布在尼布楚周围，除了清方的递信人员外不准任何人出城到任何地方去。

正如柯罗文的出使报告所说的，尼布楚“从8月14日到27日被封锁起来了”^①。尼布楚没有干草储备，因此柯罗文在达呼尔地区为他的辎重队和军职人员好不容易弄到的牲畜(骆驼和马匹)开始倒毙了。在条约已经签字之后，柯罗文曾向莫斯科报告说，他从尼布楚到乌金斯克“一路上非常困难，因为官兵都是步行，由于缺乏马匹，粮食和军需品都是自己背着，我们的许多骆驼和马匹……在中国进攻时都饿死在圈里了”^②。8月16日得到消息，在尼布楚地区游牧的布里亚特族和温科特族的一些舒林加背叛了俄罗斯，他们相信了清使的诺言，答应参加包围尼布楚，已经率领他们的队伍到尼布楚来。

当尼布楚被围时，“在尼布楚附近游牧并一向知道向尼布楚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布拉特族^③和温科特族的两千尼布楚兀鲁思人，离开了尼布楚，并且加入了中国军队。这支民兵使尼布楚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在尼布楚城中，他们，即使节们，拥有的军职人员、工商业居民共只有一千四百五十人。在那次围城时，中国人率领他们的为数甚众的军队多次来到尼布楚城下。尼布楚城中所有君主的战士都做好了抵抗和战斗的准备，并且多次出城直到障碍物之外，但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战斗”^④。

清使千方百计想要吓倒俄罗斯人，以迫使他们同意在尼布楚附近划界，即割让几乎整个的达呼尔地区。应当注意到，包围尼布楚不仅是示威，清军的领袖认真讨论了包围和攻取尼布楚的计划，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914张背面。

② 同上，第844张—844张背面。

③ 即布里亚特族。——译者

④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914张背面、915张。

以便在攻下尼布楚后迫使被俘的俄罗斯使节签订康熙所希望的条约。例如，仍旧忠于俄罗斯的舒林加奥罗尔和他的妻子在1689年8月16日报告俄罗斯人说，清使的人们多次来访布里亚特和温科特的舒林加，谈论了共同对尼布楚实行军事进攻的问题。^①

只有一部分布里亚特族的舒林加背叛了俄罗斯，但这些封建贵族以武力强迫一般的布里亚特人向尼布楚进军；布里亚特族的许多舒林加和鄂温克族的一切代表都不同意与清军采取一致行动，但叛变的舒林加以恐吓手段唆使他们叛变。俄罗斯使节在出使报告中写道，许多“缴纳毛皮实物税的通古斯人，帐篷达三百座，停留在离尼布楚很远的地方，防备那些叛变分子侵犯那个地方，害怕他们到自己的帐篷里去”，^②但他们也忧虑博格德汗军队的进攻，因为当清军向尼布楚移动时，“背叛俄罗斯的温科特人和布拉特人屡次以毁灭恐吓通古斯人”。^③

8月17日，忠于俄罗斯的舒林加班巴盖依报告柯罗文说，清军的船只从许多地点把背叛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和温科特人运过石勒喀河，集中兵力于尼布楚。清使派人向布里亚特人和鄂温克人宣称，他们将“重赏捕获了根忒木尔族人并将被捕者解送他们的通古斯人或其他人”。^④此外，班巴盖依还报告说，清使命令布里亚特族和温科特族的叛变了的舒林加赶走尼布楚附近的马群和有角牲畜。^⑤

柯罗文派舒林加班巴盖依去劝导布里亚特人，“要他们不要背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012张。舒林加奥罗尔和他的妻子于8月16日报告柯罗文说，清廷的“大使们屡次派人到他们的布拉特人和温科特人那里游说，而温科特人和布拉特人也完全愿意背叛大君主，答应同中国人一起对尼布楚采取军事行动”。

② 同上，第1014张。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1027张。

⑤ 同上。

叛独裁大君主的统治，不要受任何迷惑，大君主对此将给他们以特大的恩典”。^①

柯罗文在等待着对尼布楚的进攻，所以不能派人去镇压那些叛变的舒林加，但竭力借助于仍旧忠于俄罗斯的舒林加来制止他们的叛变。柯罗文派捷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去把布里亚特人的“舌头”捉来。捷米扬经过战斗捉了三个布里亚特人，他们在回答审讯时说，他们是布里亚特舒林加莫尔达雅和波果尔迪的奴隶，他们是这两个舒林加派到尼布楚来的，至于来干什么他们不知道，“因为上等人是不允许任何下等人参加开会的。宰桑和舒林加那些上等人不断前往中国的大营。中国人也常常到他们的兀鲁思来居住，购买各种牲畜，有时也用武力抢夺”^②。

1689年8月16日，清军的领袖把由布里亚特的舒林加组成的大约二千名马队运过石勒喀河，集中到尼布楚附近，这队骑兵占据了尼布楚上游涅尔查河上的一个地方，与同时逼近了尼布楚的清军会合。俄罗斯人从四面八方报告说，“中国哨兵在原有的之外又增加了许多人”。^③根据一切看来，康熙的都统们决心发动猛攻来夺取尼布楚了。

尼布楚的防御工事是不坚固的，城墙许多处的木桩都已腐朽，土墙也倾塌了，骑兵不必费力就能一跃而过，对准城堡的大炮不必费力就能把城墙打个缺口。围城的一万七千人拥有许多大炮，骑兵，充足的粮秣和弹药，而俄罗斯的一千五百名火枪兵和哥萨克则已经被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和困难生活弄得精疲力尽，被围困在沒有坚固工事的尼布楚城内，弹药不足，大炮很少，沒有马匹，也毫无任何方面前来援救的希望。实力的对比太悬殊了。俄使明了处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027张。

② 同上，第1056张背面。

③ 同上，第1057张背面。

境的异常复杂性，但并不张慌失措。柯罗文和伏拉索夫在慎重地考虑和衡量了一切之后，选择了在俄罗斯使节团的处境下唯一可能采取的决定：如果清使的一切军事准备只是用来恐吓人，那就必须向他们表明俄罗斯人不是胆小之辈，而且只有他们的坚定精神和镇静态度才能促使康熙的使节回过头来对和约与边界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谈判。万一康熙的都统和使节们真要进攻不宜坚守的尼布楚，那末尽管实力悬殊，俄罗斯人决心作战，宁在实力悬殊的战斗中牺牲，也不沦为俘虏去接受强迫的缔约条件。

柯罗文命令尼布楚的守军和全城居民在伏拉索夫领导下负责坚守城堡，本人则率领他的火枪兵部队和哥萨克骑兵于8月18日排列成战斗队形，背着火枪，端着长矛，举起飘扬的军旗，走出尼布楚准备战斗。^①但是清朝的都统们那天并没有下决心进攻俄罗斯人。

柯罗文看到清方没有动静，于是派司书潘克拉特·巴巴耶夫去见康熙的使节，请他们解释包围尼布楚的原因。他还询问，康熙的使节为什么中断和约谈判并怂恿俄罗斯臣民，即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布里亚特人和温科特人叛变。他们回答说他们并不妨碍谈判的进行，“设置岗哨是为了自己的安全”，^②对俄罗斯军职人员从尼布楚前往他们所必须去的地方不加禁止，但只限于白天，夜晚不在此例。

由于俄罗斯人的主动，停战条件的谈判恢复了，诚然，方式是很别致的：通过递信人员进行。

到8月18日，清使提出了新的建议，主张以格尔必齐河、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俄罗斯使节宣称不能接受以格尔必齐河为界的建议，他们把自己方面先前的建议的措词稍加变更，提出沿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057—1058张。

② 同上，第1058张。

阿穆尔河到奥杰康河为止以及沿额尔古纳河到呼伦池^①为止来划界。这也就是说阿尔巴津仍为俄罗斯所有。索额图了解沿奥杰康河到呼伦池划界意味着俄罗斯仍旧保有阿尔巴津。他们回答别洛鲍茨基和瓦西利科夫说，皇帝的使节们永远不会同意这样的建议，并要求俄罗斯人考虑沿格尔必齐河的界线。俄罗斯人拒绝了。于是清朝的都统们从8月20日到23日对猛攻尼布楚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们的舰队驶抵尼布楚城附近。陆军更是兵临城下，后面还有被赶来的马群和畜群。

鉴于这一切布署，柯罗文决定进行通过和平途径来打开谈判僵局的尝试。他通知说他同意以阿尔巴津的所在地为界，阿尔巴津应予拆毁，但在那些地方双方都有权经营各种行业。^②清朝的使节和都统们对这个提议开会讨论之后加以拒绝，也没有提出任何新建议。攻城的准备继续着。8月21日，俄罗斯人提议谈判仅限于确定边界一个问题，把其他一切争端搁起来，并且同意边界从阿尔巴津起沿阿穆尔河，再沿额尔古纳河来划，但额尔古纳河畔的俄罗斯城堡仍留原处。清使对这个提议甚至没有答复，并且离开他们的帐篷回到船上，这意味着完全拒绝谈判了。俄罗斯人在这些天当中把他们的城堡围上了第三道木桩，并在木桩附近掘了壕沟，“大使们亲自率领火枪兵部队全副武装守在木桩之外”，^③等待着清军进攻城堡，准备战斗。两军的距离为一俄里。但是这一次清军的都统们还是没有发动战斗。

8月21日夜晩，清使通知说，他们向俄罗斯人宣布他们对缔约条件的最后建议。这一建议可归纳为下述五点^④：

1. 以格尔必齐河(该河在离绰尔纳河不远处注入石勒喀

① 音译应为达赖湖(озеро Далай)，亦称达赖泊。——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037张。

③ 同上，第1045张背面。

④ 同上，第1046—1049张。

河)以及额尔古纳河(到大加齐木尔河从左方注入该河之处为止)为界。

2. 额尔古纳河的俄罗斯城堡从右岸移往左岸,俄罗斯在额尔古纳河不再建立村镇。

3. 拆毁阿尔巴津,其居民及其全部财产撤往俄罗斯,俄罗斯人在这个地方不得有任何居民点和作业场所。

4. 谈判不能仅限于定界问题,应解决一切争端,否则不能缔约。

5. 两国臣民不论为了什么事故都不得越界:中国商人没有前往俄罗斯的需要,至于俄罗斯人,如果和约缔结成功,博格德汗将允许他们到中国来自由贸易。除这些条件以外,清使还宣称,现在他们确实知道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军队,但是也知道,那些军队由于距离遥远和路途困难“不仅从莫斯科,即使从托波尔斯克也不能在两年内到达达呼尔地区”。^①

由于处于被优势兵力包围的困难地位,俄罗斯使节于1689年8月23日决定实行最后的让步,这一步在他们所奉的敕令中是预先规定了的,即放弃阿尔巴津,讨论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及沿斯塔诺夫山脉以至于海为界的问题。俄罗斯人几乎退让了阿穆尔河的整个流域。他们关心的是使俄罗斯保留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有银矿、咸水湖和可耕地的那些地区。^②

柯罗文以提出条约草案的方式通知他同意以格尔必齐河为界,草案中各点的内容如下:

1. 以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至第一条山脉为止)为界。阿尔巴津城拆毁,城中的人及其全部财产撤回俄罗斯,今后双方都不在阿尔巴津将军辖区的地界建立任何居民点。在阿尔巴津地区的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058张背面。

^② 同上,第1063—1065张。

森林中，双方都可以进行各种作业。额尔古纳河的俄罗斯城堡从南岸移往该河北岸。

2. 缔结边界条约后，两国政府应有外交往来，彼此承认对方君主称号的全衔，给使臣以应有的尊重，不对他们施加任何暴力。

3. 两国之间允许互相贸易。

4. 彼此交换逃人和俘虏。

5. 中国把 1685 年第一次围攻阿尔巴津时夺获的俄罗斯大炮和一切武器归还俄罗斯，并对这次破坏俄罗斯城堡所造成的损失给以合理的赔偿。

6. 今后不得因边界纠纷而采取军事行动。

清使对俄罗斯方面提出的条约逐条进行了讨论。他们接受了以格尔必齐河、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的建议，但拒绝边界线之外可以有共同的作业场所，借口关于这一点他们奉有博格德汗的特别敕令。^①

关于称号问题他们宣称，在条约中他们不能写沙皇的全衔称号，因为关于这一点他们不曾奉有他们君主的敕令，他们的写法将是：“我们，神圣的博格德汗殿下的大使们，同沙皇陛下使节们缔结了条约”。将来在致沙皇的国书中博格德汗将写出沙皇的全衔称号。

关于互派使节和商队问题清使宣称，他们“不敢”在条约中列入这种条款，因为关于这种条款他们也不曾奉有博格德汗的敕令。但是他们答应，即使不在条约中列入这种条款，他们的君主也不会禁止贸易，并将派遣使节。

清使同意交换俘虏和逃人，只是俄罗斯人必须交出根忒木尔酋长和他的氏族以及其他“居住在达呼尔地区的缴纳毛皮实物税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10 件，第 1070 张。

的外国人”。^①他们还拒绝赔偿阿尔巴津的损失。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根据俄罗斯人的提议达成了条约本文由双方使节团各缮写两份的协议：俄罗斯使节团缮写一份俄文的，一份拉丁文的，中国使节团缮写一份满文的，一份拉丁文的；双方各在自己的文本上签字盖章，然后在使节团会见时交换这些办妥手续的文件。

这样，谈判就接近于完成了。条约中的条文的主要各点达成协议了。

在这以后，俄罗斯使节就努力于确定使节团见面和在条约上签字的日期。但是清使表现出固执的态度。柯罗文和他的同僚认为耶稣会教士是新争端的责任者。^②

8月24日，耶稣会教士通知柯罗文说，只有俄罗斯人向中国交出所有根忒木尔氏族的鄂温克人和所有缴纳毛皮实物税的俄罗斯籍蒙古人，清使才在条约上签字。他们并且宣称，仿佛蒙古人是中国的臣民。^③要求承认蒙古人是中国的臣民完全是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以前根本没有讨论过。康熙使节在边界问题上也提出了新要求，宣称必须立即在俄罗斯和臣属于中国的蒙古汗的领地之间划定界限。此外，他们又赋予阿穆尔河这条界限以新的定义，把它沿着格尔必齐河和山地一直划到所谓的“圣岬”山（“它远在雅库次克地区的海中”）。^④俄罗斯人推测，这是耶稣会教士看出尼布楚的困难处境，因而示意清朝使节团可以恢复以前关于割地直到勒拿河的要求。^⑤当然，康熙使节方面的这种要求可能是迫使俄罗斯人作出新让步的尝试。因此，拟定条约文句的工作就延搁起来，甚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072张背面。

② 同上，第1085张背面。

③ 同上，第1076—1077、1080各张。

④ 同上，第1093张。

⑤ 同上，第1094张。

至出现了谈判又将破裂的危机。俄罗斯人同意讨论边界问题，但拒绝讨论蒙古人问题，因为蒙古人在 1688 年进攻了停留在色楞格斯科的俄罗斯使节，这是对他的侮辱。柯罗文问博格德汗的使节，蒙古诸汗，即斡齐赉赛音汗等人，在 1688 年是不是皇帝的藩属，他们在俄罗斯使节团应博格德汗本人的邀请而在色楞格斯克等候他的使节到来时进攻俄罗斯使节团，是否奉了博格德汗的命令。^①

清使因为柯罗文揭穿蒙古人围攻色楞格斯克的全部内幕而感到很难为情，所以赶快派人来说，蒙古诸汗在 1688 年不是博格德汗的藩属，进攻俄使是他们“自己搞的”，但在准噶尔的噶尔丹征服了这些汗的领土之后，他们加入了博格德汗的国籍，因此现在俄罗斯使节团应当同意承认蒙古人是皇帝的臣民。

柯罗文回答说，对两个强大国家的全权使节来说，讨论被噶尔丹占据了领土的下落不明的蒙古诸汗的归属问题是极不明智的，也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俄罗斯人拒绝讨论蒙古人问题，指出双方使节团都未经本国君主赋予讨论这个问题的全权。^② 清使让了步。但在讨论阿穆尔地区的边界问题时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如何从格尔必齐河起朝着注入鄂霍次克海的乌第河的方向来划界。从格尔必齐河的发源地有两条山脉走向乌第河。俄罗斯人主张从格尔必齐河的上游沿着离尼布楚较远而离阿穆尔河较近的一条山脉划界，山脉的南侧以及南侧注入阿穆尔河的河流属中国，山脉的北侧以及北向的河流属俄罗斯。清使把直到“圣岬”山为止的两条山脉都划为界限，这就是说俄罗斯不仅要让它出它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全部领土，而且还要让出乌第河流域和鄂霍次克海沿岸新殖民的广大地区。俄罗斯人拒绝讨论这样的建议。谈判破裂的危机再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10 件，第 1076 张背面。

② 同上，第 1080 张。

度出现,因为清使又诉诸军事威胁了。^①耶稣会教士到尼布楚来宣称,康熙本人亲自率领大军来援助他的使节了。^②为了回答这种威胁,俄罗斯使节团向皇帝的使节提出了勇敢的抗议,抗议他们破坏缔结和约和提出极不合理的要求:让出在谈判开始时根本没有谈到的领土。柯罗文指出,两国使节团并没有受权讨论象鄂霍次克海附近乌第河地区这一类的领土问题。他宣称,就自己方面来说,俄罗斯使节已经表现了他们力求缔结和约的真诚愿望。但是,如果清使不愿和平,那末他们将负流血和战争的责任,而俄罗斯人则再次提议缔结和约。至于阿穆尔河河口附近和沿海一带有争论的地方的边界问题,现在不加讨论,等到他日再行解决。对战争威胁,俄罗斯人宣称,他们将进行自卫。^③

这一坚决的抗议引起了清使的不安,因为实际上他们大概并不曾奉有康熙皇帝关于讨论乌第河流域和鄂霍次克海一带领土的训令。他们也跟俄罗斯人一样恐怕谈判因此而破裂。他们在商议之后答复说,他们同意在边界条约中对还有争论的地点不做决定,把问题留到日后再说。俄罗斯人方面则同意条约中关于阿尔巴津的一条不完全依照他们所主张的写上去。俄罗斯人恐怕围城继续下去,因为尼布楚已经没有存粮,而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又必须在达呼尔地区过冬,那就意味着他们的饥饿和死亡。当两国使节团在边界问题上重新取得一致意见以后,耶稣会教士又煽起关于称号的新争论:他们以清使名义不仅不同意在条约中写上俄罗斯沙皇的全衔称号,而且不同意写上简略的称号。他们借这个问题向俄罗斯人勒索礼物,同时利用贸易来占便宜。例如,8月25日耶稣会教士在离开尼布楚时秘密留下一封法文信,再次请求把貂皮、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095张背面。

② 同上,第1097张。

③ 同上,第1102张。

狐皮和食品交给他们的仆人带去，并答应对康熙的使节施加影响作为交换。^① 俄罗斯人给耶稣会教士带去了四十张貂皮，一百张银鼠皮，一张玄狐皮，总值达一百卢布。但是在这以后，耶稣会教士仍然宣称，清使不肯在条约中写上俄罗斯沙皇称号的全衔。^② ③ 同时张诚还把“自己的货物：花缎和闪缎二十四匹”带到尼布楚来，留在一个为俄罗斯服务的法国人手里，委托他用这些货物购买狐皮和貂皮。^④ 俄罗斯人又赠给耶稣会教士二十四张貂皮，但由于对耶稣会教士的不信任，派了蒙古语译员格里果里·库恰去会见清使，提议对边界条约中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条款进行签字，而把有争论的问题搁起来。^⑤ 但清使拒绝用蒙古语进行谈判，并且又派耶稣会教士到尼布楚来。最后终于在两国君主的称号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双方各在自己的文本上把本国君主的称号写在前面。

在进一步的谈判中，贸易问题发生了困难。俄罗斯人要求在条约中列入允许相互贸易的专款。耶稣会教士代表清使宣称，中国对这一点不能答应，因为荷兰使节团已经到博格德汗的国家来过三次，他们同意以纳贡来交换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权利，但荷兰仍然没有被允许在中国进行贸易。俄罗斯人对耶稣会教士的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地反驳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俄罗斯同荷兰相比，因为荷兰希望同中国进行单方面的贸易只是为了私利，而俄罗斯争取的则是同中国的相互贸易，这不仅是为了商业利润，而且是为了巩固两个邻邦之间的友谊。^⑥ 耶稣会教士没有继续进行这一争论，而以自己个人名义请求俄罗斯人准许他们的仆人用他们的货物在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10 件，第 1108 张。

② 同上。

③ 俄罗斯沙皇称号的全衔参看附录三。——译者

④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10 件，第 1120 张。

⑤ 同上，第 1122 张。

⑥ 同上，第 1126 张。

尼布楚秘密进行交易，并答应敦促清使同意在条约中列入贸易条款以为交换。耶稣会教士得到了这样做的许可。8月26日俄罗斯人把自己方面的条约文本送去，并提议举行会见和不再拖延缔约的工作。清朝使节团接受了俄罗斯方面的条约文本，但仍然拒绝在条约中列入贸易条款，理由是这种条款仿佛对他们“有失尊严”，而且这是没有重大意义的。他们同样也拒绝在条约中列入在拆毁阿尔巴津后中国不在那里设立居民点的条款。^①俄罗斯人坚决宣称，不列入有关贸易以及不在阿尔巴津所在地建立任何居民点的条款，他们将不缔结条约。经过又一次的谈判后，这两个争论的问题终于也达成了协议：决定把贸易条款列入条约，关于阿尔巴津不设居民点的条款则不列入条约，但皇帝的使节团答应将对这一点作出特别的誓言。

到8月26日，根据这一协议拟定了最后的条约文本。8月26日整天进行了关于条约签字的手续和使节团重新会见的地点的谈判。

清使表示希望在先前的地点举行会见。这意味着条约将在清军所占据的区域内签字。俄罗斯人指出河水高涨，先前的会见地点已被水淹没，从而拒绝了那个提议，俄罗斯人提议在清军驻扎地和尼布楚之间的中立地带会见。^②此外俄罗斯人又拒绝了耶稣会教士的这一建议，即两使节团各在对方和己方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但不交换文本，而各自保留己方的文本。俄罗斯人坚持要交换条约的文本。他们还拒绝了耶稣会教士所提条约共签六份以及只由俄罗斯使节宣誓履行条约的建议。^③

俄罗斯人通过蒙古译员^④争取到清使对下述办法的同意，即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140张背面。

② 同上，第1158张。

③ 同上，第1148张。

④ 同上，第1158张。

使节团双方各在一份本国语的条约和另一份拉丁语的条约上签字；每方都先写本国君主的称号，后写对方君主的称号；条约签字盖章后，两国使节团交换签字的文本，并按照平等原则由双方宣誓他们的政府将履行条约。

1689年8月27日使节们的第三次会议

1689年8月27日在距离尼布楚防御工事(木桩)五十俄丈的地方又搭起了两个使节团的帐篷，两国使节团举行会见来完成缔约手续。两国使节仍然是同时下马，同时进入己方的帐篷。^①条约签字仪式的进行也没有发生任何枝节。经过互相寒暄以后，译员依次高声朗读两国使节团所应签字的各份条约文本。^②不过俄罗斯人方面没有通晓满文的人，所以他们只得相信耶稣会教士的话，耶稣会教士力称用满文写的条约跟用拉丁文写的完全相同。^③首先由中国方面的译员耶稣会教士张诚朗读满文的条约文本，接着朗读两份拉丁文的，然后由俄罗斯方面的译员安德列·别洛鲍茨基朗读俄文的条约文本和两份拉丁文的。但是中国使节违反预先的协议，要求两国使节团共同在拉丁文的两份上签字，并加盖俄罗斯和中国的印信。^④俄罗斯人虽然没有立即答应，但后来还是同意了这一点，以免因为手续问题而破坏条约的签字，这个条约是好不容易才交涉成功的。接着两国使节团各在本国文的一份条约上签字盖章。但其后中国使节忽又拒绝交换条约文本，宣称在用拉丁文写的两份条约上已经共同签字盖章，因此无须交换了。俄罗斯使节有把握地认为，这种枝节纯粹是由于耶稣会教士的怂恿而发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166张。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1170张。

生的。^①耶稣会教士向清使建议不按照他们本国的习惯，而按照基督教的习惯宣誓来确认条约的成立，以使信奉基督教的俄罗斯人仿佛更加相信他们的宣誓和更好地履行条约。但俄罗斯人明了耶稣会教士的这种建议是企图贬低条约的合法性，所以拒绝了这种异想天开的办法，要求两国使节团各“按己方的信仰和习惯”^②宣誓。

俄罗斯人同样也坚持交换条约的文本，认为这个步骤将使条约具有更大的牢固性和合法效力。

清使对俄罗斯的坚持让了步，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同意了交换条约的文本。两位首席大使索额图和柯罗文把完成手续的条约文本拿在手里，两国使节团各自按照本国的信仰代表本国君主宣誓坚定不移地遵守条约。然后使节们交换条约文本和拥抱。俄罗斯人把清使邀请到自己的帐篷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1689年8月30日，皇帝的使节团率同他们的全部军队和舰队离开尼布楚启程返回北京。俄罗斯的军职人员把清使送到乌鲁姆卡河畔尼布楚尽头的新垦地。清使从途中把他们在尼布楚附近住的帐篷给柯罗文送来作为纪念。^③在军职人员软硬兼施地使在使节谈判期间背叛俄罗斯的温科特族和布里亚特族的舒林加重新向俄罗斯缴纳毛皮实物税之后，柯罗文率领他的军职人员徒步离开尼布楚，好不容易才跋涉到伊尔库次克，然后经过托波尔斯克和索利卡姆斯克前往莫斯科。

阿尔巴津在条约签字后很快就被拆毁，那里的居民和守军撤离尼布楚。额尔古斯克堡按照签订的条约移到了额尔古纳河北岸。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166—1180张。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201—1201张背面。

初期的俄中外交谈判的性质，是由俄中两国政府十七世纪对外政策方针所决定的。由于康熙皇帝对俄罗斯的侵略政策，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是在清政府对俄罗斯使节团施加军事压力的情况下缔结的，俄罗斯使节团为优势兵力所包围，处境极其复杂而困难。康熙政策的侵略性决定了清朝使节团所奉的训令及其一切活动的矛盾性，清朝使节团首先是以威胁和直接诉诸军事行动的方法来办交涉的。

尼布楚谈判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困难，与双方对彼此的国内情况和国际地位没有实际认识有关。这就是在使节会议上提出不现实的要求的原因。这种困难也与两国使节团彼此的不信任和猜疑有关。清使屡次破坏已达成的协议，推翻自己所做的诺言，因而大大拖延和阻碍了条约中的条款的制定工作。

还有一个令人感到困难的问题是，谈判是用清使所不懂的拉丁语进行的，而充任译员的耶稣会教士则滥用自己的地位，朝着破坏俄罗斯和中国缔结和约的方面行事。用蒙古语进行谈判，对双方本来都是极其轻而易举的，何况清使的随员中有许多人还懂俄语。^①

刚一发现耶稣会教士的行动有害于和约的缔结，俄罗斯使节就竭力争取用蒙古语进行谈判，但遭清使的拒绝。耶稣会教士有本领使清使们相信必须有他们参加才行。此外，清使也不敢断然违背康熙皇帝规定的办法，他是把耶稣会教士算做使节团成员的。

康熙皇帝不了解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强弱以及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的实际地位，对于同俄罗斯保持和平和实行联合的意义也估计不足，所以在1689年令他的使节设法向俄罗斯使节团取得最大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201张背面。多次奉派到清使那边去的尼布楚哥萨克报告说，清军大营中有许多中国人俄语说得很好，甚至认得俄文。这个事实显然地证明，尽管清朝对俄罗斯采取敌视政策，但中国居民却同边境地区的俄罗斯居民建立了联系，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是有交往的。

限度的领土让步，其中包括几乎整个的达呼尔地区以及缴纳毛皮实物税的俄罗斯臣民。为了保证使节团解决这个任务，他以庞大的军队和舰队作为使节团的后盾。

俄罗斯使节团的任务是在保持双方各自的领土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条件下同中国建立巩固的和平关系。这一任务是从十七世纪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和对外政策出发的。

俄罗斯使节团所奉训令的内容和该团全部活动的性质都是以和平政策的原则为基础的。俄罗斯使节处于很困难的境地，所以必须表现出巨大的坚定精神和顽强精神才能通过和平途径来达到同中国缔结条约的目的。俄使论证说，不以阿穆尔河划分的边界是不能持久的，但俄罗斯所以做这样的让步是为了和平，而不只是因为缺少军队。在被围的尼布楚草拟条约文本时，居间的耶稣会教士指出清军人多势众，企图以此促使俄罗斯人做更多的让步，那时柯罗文宣称，俄罗斯也能把同样数量的军队调到达呼尔地区来，但俄罗斯不愿也不会破坏同中国的和约。^①必须承认，柯罗文对俄罗斯的能力和政策的估计是相当正确的。因阿尔巴津而发生的短时期冲突是地方性的。正如历史所证明，后来俄罗斯和中国彼此间从来没有战事，两国在尼布楚条约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的关系始终是和平性质的。还有一点也很显然，这就是俄罗斯使节在尼布楚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因为他们在康熙在阿穆尔河拥有巨大优势兵力的条件下缔结了和约。俄罗斯人对俄罗斯的真正实力具有信心，对中国在军事上比较落后的认识（清军大部分以弓箭为武器，而俄罗斯早就牢固地掌握了火器），是促成这种胜利的条件；中俄两国彼此同样需要缔结和约，是俄罗斯人的和平外交战胜清使的黩武精神的历史原因。尽管外交活动的方法不同，两国使节团的主要目的则是相同的，即建立和平关系。因此，双方的政府对缔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187张。

结尼布楚条约一事都非常高兴。

第三节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 条约的内容和历史意义

1689年8月27日^①在尼布楚签订的第一个俄中条约共为七条，据此确立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和平关系，确立了阿穆尔河流域两国领土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边界，以及外交往来和相互贸易关系。

尼布楚条约的许多条款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保持着它们的效力。^②因此，尼布楚条约确实是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的和平关系和相互接近的基础。

尼布楚条约文本具有下述的内容。^③开始是按照平等原则写上两国的君主称号^④和使节姓名。俄罗斯全权大使的姓名是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柯罗文、伊凡·鄂斯塔斐耶维奇·伏拉

^① 在俄罗斯使节的原本出使报告（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158张背面—1165张）中，载有尼布楚条约文本，其签字日期写的是8月23日。但实际上8月23日只是制定了条约文本，由于发生是否承认蒙古人为中国藩属的争论和中国使节不愿把贸易条款列入条约，条约并没有签字。条约是在8月27日签字的，但条约上的日期还是原来的，这显然是抄写人的错误。（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158张。）

^② 尼布楚条约中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具有效力的一些条款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的整个第二条，承认贸易自由的第五条，关于和平和通使的第六条。（姆·伊·文纽科夫：《俄中新旧条约概述》，圣彼得堡1861年版，第30—31页。）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清文抄本及其拉丁文译本保存在苏联外交部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室。

^③ 本章中所论述的条约文本是柯罗文、伏拉索夫和克尔尼茨基三使节的出使报告中所记载的。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158张—1165张背面；第9件，第886张背面—893张。

^④ 俄罗斯沙皇称号的写法是：“俄罗斯国统治大俄、小俄、白俄诸地及东、西、北各方国土封地世袭独裁天佑君主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俄罗斯沙皇当时是兄弟二人同时在位，所以人名是两个。——译者）；清帝称号的写法是：“亚洲国家君主、中国大皇帝”。

索夫和谢苗·克尔尼茨基。条约文本中所载中国方面的大使是索额图、佟国纲、郎谈及其他大臣。

尼布楚条约的前三条完全是关于定界问题的。

第一条是：俄中两国以石勒喀河左岸的支流格尔必齐河为界。然后从格尔必齐河发源地起直至鄂霍次克海以斯塔诺夫山脉的山脊为界：凡在斯塔诺夫山脉南侧流入阿穆尔河的大小河流属中国；凡“此岭另一侧”^①的大小河流属俄罗斯国。

“位于俄国所属乌第河和大清国（即中国——作者）所属靠近阿穆尔河界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的一切土地”^②，因俄罗斯使臣没有划分此等土地的全权应暂行存放，保留到“另外适当的时候”^③，俟两国使臣归国后，由两国君主就此事或互派使臣或互通文书，然后“平心静气地和恰如其分地”来划定。

第二条是：将流入阿穆尔河之额尔古纳河为界：右（南）岸^④所有土地，从河口以至河源，属中国；额尔古纳河左（北）岸所有土地属俄罗斯国。

该河右岸的一切俄罗斯建筑物应迁移左岸。^⑤

第三条是：俄罗斯人应将他们所筑阿尔巴津城尽行拆毁，所有该城居民以及他们的一切财产和武器撤回俄罗斯境内，不使这些俄罗斯人遭受任何损失。^⑥

第四条包括关于逃人的协议如下：所有缔结和约以前越境逃亡的人仍留居原处，无须交换。和约签订以后，双方都不应收留逃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0件，第1159—1160张。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在1689年以额尔古纳河定界时，不是从河源算起，而是从河口算起，因此条约文本中写的是左岸土地属中国，右岸土地属俄罗斯，其实恰恰相反。

⑤ 这一条是规定把额尔古斯克堡从额尔古纳河右岸迁往左岸。

⑥ 条约签订后，柯罗文即命阿尔巴津将军贝顿拆毁阿尔巴津城并将所有人员撤至尼布楚。

人，如有逃入应立即把他送交两国边境将军。

第五条允许缔约双方的臣民相互贸易，条文说，由于两国既已开始友好，允许凡持有通行证的人自由地和自愿地来往两国境内经营自己的业务“和买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①。

第六条规定了解决可能发生的边境争端的办法。这一条的条文说：两国边境居民在和约缔结以前所发生的一切争端从现在起应作罢论，不得报复。和约签订以后如有两国所属的行业人越界作业，“抢劫或杀人”^②，两国边境当局应将这些犯法者捕送其该管边界督军，“依罪严加惩处”^③。

如果犯法者成群结伙地抢劫或杀人，“应将此等胆大妄为之徒捕送边界督军，处以死刑”^④。

不应因边民犯罪而发动战争和发生流血，但双方应将这种争端奏知两国君主，以书信和平议结。

第七条是：中国君主如果意欲根据本界约的条款自行设置界碑，刻写条文，是可以的。这一问题完全听凭中国君主决定。

条约末尾写“创世后 7197 年 8 月 23 日”^{⑤⑥} 订约于俄罗斯达呼尔地区的边境。

条约还补充了一点，即清使以誓言确认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双方在阿尔巴津地方都不得有任何建筑物”^⑦。

尼布楚条约的内容反映了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所形成的俄中两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10 件，第 1161 张。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1064 张。

④ 同上。

⑤ 实际上是 8 月 27 日。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10 件，第 1165 张。

⑥ 创世后 7197 年是按照“拜占庭纪元”算的。这种纪元是从比公历早 5508 年的所谓创世时算起，所以创世后 7197 年也就是公历 1689 年；8 月 27 日是按照俄历算的，按公历为 9 月 7 日。——译者

⑦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 1555 卷，第 7 张。

国的力量对比。谈判是在极其复杂的政治局势下举行的，只是由于俄罗斯外交家的能坚忍，知轻重，谈判才以成功地缔结了和平条约而结束，这个条约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同样是必要的。

十七世纪时，中国拥有广大的领土，其版图包括了该国的中部、西部、北部和南部各省、台湾、内蒙古和喀尔喀（外蒙古）一部分。中国拥有极可观的军事力量，所以它在亚洲大陆的政治权威是很高的。

沙皇俄罗斯在十七世纪先于中国开始把居民稀少的东西伯利亚地区归并为自己的属地。在十七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间，俄罗斯移民已经牢固地定居于鄂霍次克海沿岸、贝加尔湖周围的整个广大地区，到四十年代并定居于阿穆尔河及其左侧支流的左岸。^①俄罗斯的农夫和猎人以他们的顽强劳动促进了移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沙皇政府对勇敢的哥萨克和猎人扩展国家的领地是非常赞许的。沙皇国库首先是通过征收珍贵的皮货，然后通过扩展贸易来从新地区获取巨大的利益。但是国家的封建农奴制决定了政府移民政策的消极性。迟钝的沙皇政府不仅没有设法采取使俄罗斯人移居到新地区去的措施，而且没有设法供给已建的城堡以充分的守军和弹药，以便它们抵御蒙古和准噶尔各封建领主以及清朝皇帝可能的进攻，清朝皇帝继俄罗斯之后已开始对远东进行征服了。

由于阿穆尔河距离俄罗斯中心地区遥远，封建经济的能力有限，所以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政府的远东殖民政策使俄罗斯不能有充分力量来保护它在阿穆尔河的领地。清政府在夺取阿穆尔河土地的斗争中利用了蒙古诸汗的军队，这就使俄罗斯在远东的地位更加困难。

中国依靠它的军事优势阻止了俄罗斯在远东殖民的继续推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定居于阿穆尔河左岸及其左岸支流”。——译者

进。清朝使节在尼布楚迫使俄罗斯人依照康熙政府所能接受的条件缔结了和约。

俄罗斯使节团因政府给它配备的军队为数极少，以致无从以兵力来捍卫俄罗斯对阿穆尔河流域领土的主权，但是为了通过缔结和约来保留俄罗斯人在远东已经开发的土地，并为了争取同中国建立经常的贸易关系，这个使节团表现了巨大的机智和外交才能。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俄罗斯人付出的代价是：同意把大片领土让给中国才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让出了阿穆尔河中游、下游及其左岸各支流的土地，这些土地在缔结尼布楚条约以前已由俄罗斯占有四十年了。

清使方面几乎没有提出过缔约的具体条件，而只是要末拒绝要末接受俄罗斯人提出的条件。所以尼布楚条约的起草者实际上简直就是俄方使节柯罗文、伏拉索夫和克尔尼茨基。俄罗斯人被迫实行领土的让步，所以力图使条约的条款措词较少地损害俄罗斯的利益，并使之将来有可能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改变与中国所订和约的条款。

尽管困难重重，俄罗斯使节在领土让步方面终于争取到比清朝使节团所要求的少得多的条件下同中国缔结了条约。

现在来更详细地讨论一下条约中的条款。

清朝使节在尼布楚长时间地坚持把边界一直划到所谓“圣岬”的地方，这意味着俄罗斯不仅要把整个鄂霍次克海，而且要把堪察加半岛的大部分让给中国。^①俄罗斯使节同意阿穆尔河方面的领土让步，但坚持俄罗斯在贝加尔湖和鄂霍次克海沿岸的土地权利。

俄罗斯使节虽然让出了阿穆尔河流域，但在对俄罗斯如此不

^① 关于这一点，斯·弗·拉古津斯基伯爵于1737年早就在他的秘密情报中提到过。古代文件档案馆，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总库图书馆缮本室，第420件，第26张背面。

利的条件下,对明确地规定疆界并不感兴趣,所以就用最一般的方式提出了边界条约的条款。

边界只对阿穆尔河中游地区做了规定,阿穆尔河以北和以西的土地都仍旧没有划分。

因此尼布楚条约并没有为俄罗斯和中国确定明确的界线,甚至没有解决阿穆尔地区的边界问题,它只是平息了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在阿穆尔河所发生的冲突,这种冲突妨碍了两个已经相邻的大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尼布楚条约中所有谈到边界的条款对于边界的标志都规定得极不明确。例如第一条规定以格尔必齐河为界,然后“沿石头山直达于海”,山脉一侧的河流属中国,另一侧的河流属俄罗斯。其实这里所标志的只是用来确定界线的第一根标竿,这个界线以后是必须进一步确定的。在十七世纪,缔约双方对阿穆尔河流域的地理特点几乎都不清楚。被当做分界线的“石头山”(即斯塔诺夫山脉——作者),从格尔必齐河起到乌第河发源地为止有许多支脉(例如朱格朱尔山脉、亚马林山脉、布列亚山脉等等),而按照尼布楚条约的第一条,并不能断定以哪条支脉为界。俄罗斯使节在尼布楚坚持以位于靠近阿穆尔河的山脉为界,条约中也正是这样规定界线的。

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涅维利斯科探险队调查明白,斯塔诺夫山脉的实际走向是直趋阿穆尔河,在中游地方横穿过它^①。因此涅维利斯科证明了,根据尼布楚条约,阿穆尔河下游以及整个沿海边区都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地。^②此外,在十七世纪,俄国人和中国人对阿穆尔河的线路具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满洲人和中国人把松

① 此处原文如此。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说:斯塔诺夫山脉从奥廖克马河中游起向东至乌第河左岸支流马亚河为止。因此,此山脉的实际走向是从西向东,而不是由北向南,不是“直趋阿穆尔河,在中游地方横穿过它”。——译者

② 格·伊·涅维利斯科伊:《俄罗斯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绩》,海参崴1950年版,第10页。

花江当做阿穆尔河,认为阿穆尔河是松花江的支流,按照他们的观念,阿穆尔河下游是松花江的继续,而俄罗斯人则认为松花江是阿穆尔河的一个支流。

后来在试图明确尼布楚条约所标志的边界时之所以遇到了许多困难,就是由于两国使节团在缔约时没有实际的地理知识所致。例如,关于以格尔必齐河为界的问题也是有争论的,因为原来有两条格尔必齐河:一条格尔必齐河是石勒喀河的左岸支流,另一条则是在离阿尔巴津城所在地不远之处直接注入阿穆尔河的,后来叫做阿马扎尔的那条河。耶稣会教士在图上所标的界线正是后一条格尔必齐河,亦即阿马扎尔河。

尼布楚条约中所规定的沿额尔古纳河“直到河源”的漫长边界也是不明确的,因为额尔古纳河发源于西满洲和东蒙古的交界处。根据尼布楚条约的条款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蒙古东部的颇大部分和满洲的一部分作为位于该河左岸的土地应该划归俄罗斯。

在尼布楚条约中,由于俄罗斯使节的坚持,从斯塔诺夫山脉起直到注入鄂霍次克海的乌第河为止的土地没有划分。条约中的这一点是俄罗斯使节团的最大成就,因为这意味着清军撤出康熙皇帝的武装力量比俄罗斯人的兵力占优势的地区。

俄罗斯的阿尔巴津城是军事冲突的主因,由于它的命运问题而引起的争论也最多。俄罗斯人在清方的优势兵力面前让了步,应允了拆毁阿尔巴津的要求。但俄罗斯使节在做出这种让步之后,也争取到清朝使节团以誓言保证绝不在阿尔巴津地方建立居民点。这样就是承认了俄罗斯对这些土地的权利,俄使期待将来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阿穆尔河左岸的土地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确实始终是几乎渺无人迹的。^①对尼布楚条约中确定边界的条款的

^① 塞切夫斯基:《关于俄中边界的历史札记》,载于《莫斯科大学历史和俄罗斯古史皇家研究会讲座》,莫斯科1875年版,第2卷,第2章,第11页。

分析，证明俄罗斯使节虽然把阿穆尔河左岸的土地和支流让给了中国，但到底摆脱了极其困难的处境，而且获得了最大的成就，这就是为俄罗斯保持住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河上游（石勒喀河沿岸和额尔古纳河左岸）以及斯塔诺夫山脉和流入鄂霍次克海的乌第河之间的土地。

但是，尼布楚条约表明清朝使节团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俄罗斯人被迫离开阿穆尔河，因此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的俄罗斯地区的殖民受到了阻挠。

关于逃入仍旧留在缔约前他们所在地的第四条，是清使的胜利，因为按照这一条，在阿穆尔河的俄罗斯各城堡和阿尔巴津城被攻占时被俘的俄罗斯人仍旧留在中国。诚然，这些非自愿地做了中国皇帝臣民的人后来是有助于巩固和扩大中俄两国人民的文化联系的。

规定发展俄中两国间广泛的自由贸易的第五条，是由于俄使的坚持而列入的，所以这是他们的胜利。但在贸易问题上，俄罗斯人希望做出最确切、最具体的规定，而他们没能达到这个目的。由于中国使节团的反对，条约中关于贸易一点的措词极其笼统，以致在缔约后不久就引起了颇大的困难。清政府逐渐限制和留难俄罗斯人在中国的贸易，禁止中国商人到俄罗斯来。

尼布楚条约签订三年后，俄罗斯就又派伊杰斯·伊兹勃兰特使节团前往中国，其主要目的就是更明确地规定贸易条件。但是他没有获得成功；其后的列夫·伊兹马伊洛夫使节团试图具体地规定贸易条件也没有成功。直到1728年，萨瓦·伏拉迪斯拉沃维奇·拉古津斯基使节团才在新订的恰克图条约中以许多更详细的规定使尼布楚条约中关于贸易的条款比较具体起来，从而使贸易获得了更广泛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如果贬低提出贸易问题这一事实的意义，那将是完

全错误的。

尼布楚条约的第六条，是专谈建立和平关系和规定和平解决边界误会（这种误会确实常常发生^①）的办法问题的，因此这一条对发展俄罗斯和中国的长期和平关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一条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主要是注意于防范“盗匪”，所谓盗匪是指一切破坏国家秩序的分子而言，因为缔约双方共同规定了不得越界的制度，所以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人都以“盗匪”论。很可以说，俄罗斯是相当坚定地履行了尼布楚条约的。

例如，政府先后在致尼布楚将军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1691年）和萨莫依尔·尼科列夫（1698年）的训令中，规定要严格注意遵守条约中的条款，禁止俄罗斯臣民越过中国边界或同中国人发生任何争端，违者处以死刑；还指示务必也使中国人同样不侵犯边界，如果发生这种情事，应将一切情况报告中国边境当局和莫斯科，不得因边界误会和逃入而起战端和流血，不得在俄罗斯领土收留中国的逃入。^②俄罗斯边境当局不只是把个别一些逃入，而是把整批整批的逃入交给了中国。

所有这一切证明俄罗斯是真正力求同中国保持持久和平的。

关于尼布楚条约的最后一条，即第七条，必须说明，中国方面把它解释为俄罗斯承诺在条约中所标志的边界立石碑是不正确的。其实是俄罗斯人被迫同意了清使的这样一个要求，即允许中国有权在己方领土的边界设置某种标志。

^① 例如，1692年俄罗斯边境当局通知中国说，投奔中国的蒙古人达一千名，他们都是缴纳毛皮实物税的俄罗斯臣民，要求把他们送还，但是没有得到答复（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14件，第73张）。1697年派了阿加皮依·普洛特尼科夫到中国去，控诉1695年中国臣民侵犯边界，隶属于中国的蒙古的达赖·琿台沙劫掠俄罗斯的村庄和毛皮实物税缴纳者。关于这件事得到了索额图的答复，据说对达赖·琿台沙将予以惩处（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1555卷，第19张）。

^② 致尼布楚将军的训令。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1555卷，第7—8张。

在尼布楚条约的基础上建立长期的和平关系，无论对俄罗斯或中国来说都是一桩重要的政治事件。

清政府对于同俄罗斯签订条约这样表示了它的欣慰：它派了一个专使去迎接从尼布楚归国的使节，并通知他们康熙皇帝接到订约的消息异常高兴。^①随后又以康熙名义对使节们表示“对处理此事得力颇为嘉奖”，^②给了重赏。^③博格德汗认为尼布楚谈判是在对清朝使节团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由国库拨款为护送使节团的大批军队举行了盛大宴会，犒劳他们保证使节团的成功。

官方出版的清史一般都把围攻阿穆尔河的俄罗斯城堡以及后来的尼布楚谈判说成是对俄罗斯的重大胜利，仿佛俄罗斯是企图侵占自古就属于中国的领土的。^④

好谄媚的清廷大臣们歪曲了真相，把尼布楚条约中关于边界和贸易的有争论的条款说成是这样：在以格尔必齐河和兴安岭^⑤东侧为界后，尼布楚是距离中国边界最近的地点，其余地方都归中国所有了。格尔必齐河两岸立了石碑，上刻允许俄罗斯人“一年一度到中国来进贡和贸易，从那时起俄罗斯人就没有破坏过所签订的条约”。^⑥

从中国的作战日志中得知，1690年皇帝派参加过尼布楚谈判的使节之一郎谈到阿穆尔河去在额尔古纳河河口立刻有碑文的石碑，并察看俄罗斯人是否履行了界约。郎谈在指定的地方立了石碑，未发现俄方破坏条约的情事。只是在兴安岭附近，郎谈看到几

① 《张诚日记》，第255页。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K-2件，第26张。

③ 姆·普·阿列克谢耶夫：《外国旅行家和作家所报道的西伯利亚》，伊尔库次克1941年版，第5页。

④ 《俄罗斯的历史和地理志（摘自中国地理）》，载于《莫斯科电报》，1825年，第3期，2月份，第220—221页。

⑤ 兴安岭（Хинган, горы），此处似指外兴安岭。——译者

⑥ 同上，并参看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K-2件，第26号。

座俄罗斯人的茅屋及其附近的少数耕地；居住在那里的农民对郎谈说，尼布楚将军早在 1689 年就严令他们迁往尼布楚，但他们由于贫穷暂时没有能够迁往。按照郎谈的命令，俄罗斯人的茅舍被拆毁，庄稼被割掉，俄罗斯农民则退到俄罗斯境内去。^①

清政府把尼布楚条约不仅看作是和平条约，而且看作是同盟条约。例如，1690 年清朝的首席使臣索额图给伊凡·伏拉索夫写了一封信送到尼布楚，信中提起订约后两国使节曾约定应就重要事件相互谘询，因此他通知，现在中国正同准噶尔的珲台吉噶尔丹作战，请俄罗斯记住自己的诺言，“按照永久的和约同中国友好相处，不以军队援助噶尔丹”。^②因为沙皇政府对尼布楚将军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有过切实完全遵守尼布楚条约的严格命令，所以他给索额图写了回信，通知索额图说，噶尔丹确实派他的使者达尔汗到尼布楚来过，请求给以军事援助对付蒙古人，但他的这个请求被拒绝了。^③

尼布楚将军方面则写信给索额图，通知有七十七名俄罗斯商人在阿方纳西·索弗隆诺夫率领下根据条约从尼布楚前往中国，请求允许他们自由贸易。从索额图对尼布楚将军请求准许索弗隆诺夫商队前往中国的复信可以知道，清政府对条约中列入关于自由贸易的特别条款是感到非常不满的。索额图通知尼布楚说，遵照皇帝的敕令，准许俄罗斯这个商队前往中国并自由贸易，但今后请俄罗斯人不必指望与此相同的条件，此外并说清使想同柯罗文重新会晤，以便划定俄罗斯和蒙古的疆界，并就必须必须在边界立界石一事达成协议。^④

从索额图这封信可以显然看出，北京方面对尼布楚条约中涉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K-2 件，第 27 页。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 1555 卷，第 12—13 页。

③ 同上。

④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14 件，第 145—157 页。

及贸易和划界问题的部分是不满的。他们对贸易百般刁难，有时则根本加以禁止，并且坚决要求立刻划定蒙古的疆界和从斯塔诺夫山脉起到乌第河为止的地区的疆界。有时甚至试图以武力侵占没有划界的土地。乌第河过冬站的哥萨克向雅库次克报告说，1690年清朝军队携带着大炮和各种火器抵达土古尔河，并向乌第河过冬站前进，但是不知为什么在还有五天路程的地方退了回去，只在树上刻了一封中文信，哥萨克把它整个砍了下来送到雅库次克。译员们口译了这封刻在树上的信，内容是：贵族奉皇帝之命率军队到此征收毛皮实物税。^①其后直到1728年的恰克图条约签订为止，每次中国都是要求划定蒙古疆界和到乌第河为止的疆界，以为准许俄罗斯商队到北京去的条件。^②

关于康熙皇帝不满边界的具体规定，和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并未忘情于征服俄罗斯的达呼尔地区及其居民这一点，由下述事实可以证明。在1720年，即尼布楚条约签订三十年后，俄罗斯使节伊兹马伊洛夫去到北京，试图商定贸易条件，但清廷的官员不愿谈贸易，要求先划定疆界，并且重新提出了在达呼尔地区以外划界的要求。^③

这样来划界的计划在1720年所以又死灰复燃，显然是由于图理琛使节团曾路过俄罗斯的整个西伯利亚直到伏尔加河，在返回中国后提出了详尽的报告，说明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军事力量很薄弱，^④俄罗斯同瑞典进行的长期战争占用了它的全部兵力。

综合上面对这个问题所叙述的一切，应当着重指出，清政府尽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1555卷，第21张。

② 一直到签订恰克图条约为止，伊兹勃兰特、伊兹马伊洛夫和拉古津斯基三个使节团所遇到的情况都是如此。（古代文件档案馆，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总库图书馆缮本室，第420件，第27—33张。）

③ 同上，第33张。

④ 同上。

管不满于个别一些条款,但对条约内容,即同俄罗斯建立了持久和平,无疑是满意的。

签订条约的索额图在 1690 年写信给尼布楚将军说,皇帝对俄罗斯切实遵守和平条件非常满意。^①

俄罗斯政府对于同中国建立和平与贸易关系一事很是高兴,使节团奉到沙皇传令嘉奖的诏书,柯罗文和伏拉索夫蒙赏赐金质奖章,护卫使节团的军职人员获得升级的奖赏。

但在使节团返回莫斯科,带来关于谈判的详细报告和条约文本之后,对个别方面的不满,特别是对丧失阿穆尔河、阿尔巴津以及其他划归中国的土地的不满就出现了。

在外交事务衙门,对谈判下结论起初是持慎重态度的。这从斯捷潘·科罗文回答质询的谈话可以证明,他是把出使报告,即使节们在西伯利亚的全部活动的详细报告送到莫斯科来的人员。

斯捷潘·科罗文作为目睹者受到严格的讯问,他被讯问谈判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做了让步。科罗文与柯罗文一同经历了这个使节团的一切困难,所以是柯罗文的热烈拥护者,他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使节们在出使报告中所报告的一切:由于中国军队人多势众,尼布楚被围,不割让阿尔巴津以及其他地区是不可能的。^②

在外交事务衙门向沙皇所作的报告中,除相当详尽地叙述了柯罗文和伏拉索夫的出使报告的内容之外,还注意了下述两点:

1. 为什么使节们不把所划的边界图和俄罗斯所让地方的地图送来。

2. 为什么使节们“在己方送去磋商以及议定交换的己方界约条文中先写汗方的称号,后写沙皇陛下方面的称号”。^③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14 件,第 149 张。

② 同上,第 9 件,第 915 张。

③ 同上,第 894 张背面。

柯罗文出使报告的报告拟稿人^①不友好地强调说，根据沙皇给柯罗文的敕令，“他们本应急速前往边境的阿尔巴津与中国人会晤的，但他们没有急速前往该地，没有赶在前头。由于他们在路上的延搁，致使中国使节能够来到尼布楚”。^②

柯罗文的同时代人，外交事务衙门的外交家们，就是这样批评他的。后来有许多写文章的人也对柯罗文做了这种“迟到尼布楚”的谴责。但这种谴责不是严肃的，因为问题终究决定于阿穆尔河军事力量的对比，而这一对比显然不是有利于俄罗斯的。

柯罗文在 1689 年同中国签订的和约尽管是以丧失了阿穆尔河和阿尔巴津为代价，但这个和约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俄罗斯人在十七世纪的整个后半世纪里始终不懈地争取同地大物博的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最后，在 1689 年，俄罗斯由于柯罗文签订尼布楚条约而成为了争取到同中国进行和平而互利的贸易的第一个欧洲国家。

彼得一世的新政府，对柯罗文及其在外交和国务活动上的巨大才能作了正确的评价。

柯罗文从尼布楚回到莫斯科后，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最重要的指导者。他在 1707 年去世之前一直留在这个职位上。

但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所丧失的阿穆尔地区和留在中国的俄罗斯俘虏。1692 年被派到中国去的伊杰斯·伊兹勃兰特使节团就是要去了解俄罗斯在让出阿尔巴津和阿穆尔地区之后是否失去了很多缴纳毛皮实物税的臣民，并以口头方式提出释放和遣返俄罗斯俘虏的问题，伊兹勃兰特同时还奉命不要就介于斯塔诺夫山脉和乌第河之间的地区划界问题进行任何谈判，而且根本不要签订

^① 叶梅里扬·乌克兰采夫。参看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9 件，第 918 张背面。

^② 同上。

霞克上等花缎；少校雅科夫·阿列克谢耶夫运了六张狐皮、两张貂皮、两张松鼠皮、十八科霞克花缎和素缎、十九科涅次中国棉布；大尉瓦西利·列辛运了七段花缎衣料和二科涅次花缎、十科霞克中国棉布；中尉伊万·沃洛申尼科夫运了两张貂皮、八科霞克花缎、两块丝绒、三科涅次中国棉布；^①上校伊万·伊萨耶夫运了三张玄狐皮、四张北极狐皮的被褥、二索洛克貂皮、一张北极狐皮、两张貂腹皮、四百条貂尾、六张青狐皮、四张北极狐仔皮、一千二百张北极狐皮、五千张松鼠皮、两张獾皮、两段中国衣料丝绒、六十九科涅次中国棉布、二百七十七匹花缎；^②上校帕维尔·格拉鲍夫运了二百张北极狐皮、二百条貂尾、八十科霞克花缎；上校安顿·尼斯马雷姆别尔赫和他的儿子格里果里运了一百三十五科霞克绸缎、三十科涅次中国棉布；^③伊万·伏拉索夫只运了三十科霞克花缎，他身边带有一百卢布。^④不知柯罗文运了些什么货物，因为根据沙皇的通行证，他的财物在韦尔霍土里耶税关没有受到检查。^⑤

根据韦尔霍土里耶税关主任的报告，从西伯利亚经常有大批中国货物，主要是各种丝织品和生丝，经过韦尔霍土里耶运往莫斯科。

例如，1690年有二十六个大商人和各式各样的商人从西伯利亚经过韦尔霍土里耶前往莫斯科，其中巨商加夫里拉·尼基京的代理人伊万·鲍热多莫夫和乌斯京·彼得罗夫运了一百五十科涅次中国棉布、九百匹花缎、四十五匹素缎；^⑥巨商阿方纳西·菲拉季耶夫的代理人亚基莫夫运了五百二十五匹各色花缎、六十三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1213卷，第14张。

② 同上，第16张。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22张。

⑤ 同上，第18张。

⑥ 同上，第310—322张。

科涅次中国棉布和五俄磅丝线；^①教会所属的农民瓦西利·扎罗夫尼亚德内也运了五千五百俄尺和十三大包中国棉布、^②四十科霞克花缎和大批各式各样的西伯利亚皮货；秋明城的商人纳扎尔·布雷金^③运了一千七百俄尺中国棉布到莫斯科去。

1691年有四十五个商人和其他阶层的人从西伯利亚经过韦尔霍土里耶前往莫斯科，其中运去中国货物最多的是巨商阿斯塔菲依·菲拉季耶夫的代理人(八百十八科霞克花缎)和谢苗·卢津(五百二十三匹花缎、二百九十一匹素缎、二百零四科涅次以及二千俄尺中国棉布)。^④

1692年有各类商人八十八名经过韦尔霍土里耶到莫斯科去，他们所运的中国货物比上一年还多。例如，巨商阿斯塔菲依·菲拉季耶夫的代理人们运来一千八百匹花缎和素缎、二百零四科涅次中国棉布、价值五十卢布的中国铜器和三普特海象牙制品。^⑤

巨商加夫里拉·尼基京的代理人们运来一千匹花缎和素缎、一百科涅次中国棉布；^⑥乌斯丘格的商人斯莫利尼科夫兄弟运来六十匹花缎和素缎、六百科涅次中国棉布、另外还有六千俄尺中国棉布；^⑦巨商费奥多尔·库里洛夫的代理人运来一千零五十四各色花缎。^⑧

1693年，“商业公会大亨斯皮里顿·梁古索夫及其夥友”的大商队奉派随伊杰斯·伊兹勃兰特使节团前往中国，给了他们大批公家貂皮和其他皮货，用以交换中国商品，或以所售货款购买中国商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1213卷，第310张。

② 同上，第317张。

③ 同上，第316张。

④ 同上，第279—281张。

⑤ 同上，第156—158张。

⑥ 同上。

⑦ 同上，第159张。

⑧ 同上，第142张。

品。中国当局要求俄罗斯商人先把上等皮货廉价售与皇帝的商人石列伊，^① 然后才准其自由贸易。^②

1690至1691年运往俄罗斯的中国货物总计为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三卢布，1691至1692年已达二万三千九百五十一卢布，1693至1694年则达五万零六百八十六卢布。^③

运到中国去的俄罗斯货物在那里获得了广大的销路。

运往尼布楚货物的税关记录，有力地证明俄罗斯同中国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贸易是定期进行的。1698年5月，巨商多勃雷宁的代理人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夫和瓦西利·布尔加科夫从托波尔斯克来到尼布楚。他们运来许多俄罗斯商品和允许私人买卖的皮货：四百九十五张兔皮，三百六十二张银鼠皮，十二万二千三百二十二张松鼠皮，此外还有自鸣挂钟，九幅汉堡呢，七幅列奇纳呢，一百七十科涅次普通麻布，一百三十八科涅次亚麻布，五令书写纸，二普特火药，四十五件长袍，十三科霞克花粗布，三十八张熟山羊皮，八科霞克单色印花布，十五索洛克貂腹皮（“这种貂腹皮是凭大君主的敕令和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公文放行的”），三十俄磅铅以及化学制品小杂货，八张水獭皮，十张油性革，并有在托波尔斯克出售俄罗斯商品所得的货款二十二万卢布，货物的商业税是一卢布征收一格里夫那。^④

1698年8月3日，乌斯丘格商人亚基姆·普罗托波波夫经叶尼塞斯克到尼布楚前往中国，他带来在叶尼塞斯克购买的“一万件适合中国需要的皮货，五百三十七张银鼠皮，一百九十五卢布现款，一千三百六十张北极白狐皮，三千一百张松鼠皮，两张北极狐仔皮

① 石列伊(Шилей)是译音。——译者

②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10件，第41—42张。

③ 谢·弗·巴赫鲁申：《学术论文集》，第3卷，第1分册，莫斯科1955年版，第156页。

④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224, 371卷。

和两张兔皮。^①

不久以后,又有商人萨瓦·波托罗奇诺夫到尼布楚前往中国。他运来的俄罗斯来路货(即从俄罗斯运来的,不是西伯利亚的)有:五十张熟绵羊皮,七千五百俄尺亚麻布,一千二百俄尺毛呢,七把刀,十六张上等的一岁海狸皮,十普特刀刃钢,八件羊皮袍,十普特又二十俄磅蜂蜜,二百五十匹大麻布,二普特又十俄磅铅,二普特又二十俄磅蜡,六令书写纸,十副毛线无指手套,四十五双毛线长袜,一普特铜锅,四普特铜页,三百俄尺染色土布,九百三十四卢布现款。^②

同是在 1698 年,还有一个大规模的车队运载商人米哈伊尔·库尔捷耶夫的货物经叶尼塞斯克到尼布楚来同俄罗斯人和中国人进行贸易。继他之后又来了色楞格斯克的哥萨克之子阿列克谢·布尔达科夫斯基。他运来二千张银鼠皮,二十五张油性革,三十库索克大红布,六百俄尺普通麻布,五科霞克花粗布,三科霞克细纱,五科霞克单色印花布,一千把木勺,十普特蜂蜜,五十口平底锅,一普特半火药,十张熟山羊皮,一普特蜡,三百五十卢布现款。

在他之后经尼布楚到中国去的有乌斯丘格的商人康士坦丁·库兹涅佐夫。他带去了五千张银鼠皮、四千张松鼠皮和其他货物。另一个乌斯丘格商人伊万·列普佐夫斯基是他的夥友,还有一个彼得·诺里增是带着自己的货物同去的。诺里增运往中国的货物有二百十六张北极白狐皮,二十六张北极狐仔皮,四十一件皮袄,四千七百张银鼠皮,五千八百五十张松鼠皮以及其他货物:毛呢、麻布、染色土布、蜂蜜、神香、硫磺、锡器、铜器、本色粗毛呢、羊皮袍、无指手套、皮革、斧头、锅、皮靴。^③

①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尼布楚档案,第 224, 371 卷。

② 同上。

③ 同上。

还是在 1698 年,有大小商人一百六十六名同时从尼布楚前往中国,领队是前阿尔巴津将军的儿子伊万·别依顿。这些商人运往中国的各种俄罗斯商品按照尼布楚价格共值二万五千二百一十卢布,单是从这些货物征收的国库税就达一千一百五十二卢布。^①

1699 年,商业公会大亨斯皮里顿·梁古索夫率领一个公家的大商队并带着自己的货物前往中国。他成功地出售了全部货物并购买了中国的货物,于 1700 年返回尼布楚,税关向他征收的什一税是用从中国带回的黄金缴纳的,共九百五十七所洛特尼克^②。巨商洛金·多勃雷宁的代理人也是用中国黄金缴税的,共一千零三十所洛特尼克。^③

上面所引关于十七世纪末叶俄中贸易的一些材料,当然只是为数不多的例证。要对贸易方面的全部材料进行详尽的分析,是需要做专门研究的。但是这些材料使我们可以断言,俄中两国的贸易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扩大起来了,因而刺激了俄罗斯和中国双方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尼布楚条约具有积极的、进步的历史意义。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 1422 卷,第 2 部分,第 265—270 张。

② 所洛特尼克(золотник)为旧俄重量单位,等于 4.266 克。——译者

③ 古代文件档案馆,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档案,第 1422 卷,第 1 部分,第 57—58 张。

结 论

1689年的第一个俄中条约巩固并扩展了两个相邻民族早在缔约以前很久就已开始的和平关系。中俄两国人民在十七世纪就表现了深刻的相互兴趣，从那时起，两国人民的经济联系就不顾封建统治集团那种狭隘的阶级性的，而且有时是敌对性的政策而成长和巩固起来。

当代作家胡绳在一本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中^①谈到，中国人民对发展同其他国家的贸易有很大兴趣。在十七世纪，这首先指的是唯一与中国签订了贸易条约的欧洲国家——俄罗斯。

从俄罗斯经西伯利亚去中国的道路，是十七世纪公认的一条“最近便”的道路，所以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和平贸易的条件无疑是最有利的。

从康熙开始，中国的满洲人政府实行了使中国与其他国家隔离的政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贸易受到阻碍，但并未能断绝十七至十八世纪的贸易。同俄罗斯缔结的正式条约的存在，使中国的孤立政策难以实行。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因为中国从十七世纪末直到整个十八世纪一直受到西欧国家武装干涉的威胁。根据尼布楚条约而建立的和平关系与边界的确定，平息了阿穆尔地区的军事冲突，消除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性，因而使中国后来便于对来自西欧国家的殖民掠夺做斗争。从1689年起，在两个世纪中，俄罗斯和中国彼此没有作过战，这不是偶然的。

^①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页。

俄罗斯同中国的尼布楚条约是按照平等原则签订的，而其后欧洲国家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对中国来说都是侮辱性的和掠夺性的，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

俄罗斯和中国通过尼布楚条约相互承认了对方的主权，因为写上俄罗斯和中国双方统治者的完全称号就是把这一点固定了下来；双方彼此一致保证维持和平和承认规定的边界。

俄罗斯和中国互相赋予对方同样的贸易上的便利和权利，使在缔约双方境内进行贸易成为可能。

尼布楚条约中没有任何一条损害中国和俄罗斯的主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1689年的第一个俄中尼布楚条约是互利的；对中国来说，这个条约是破天荒同欧洲强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

中国同欧洲各国的关系与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大不相同。在十七、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前半期，西欧列强破坏中国的经济，在中国市场上用比较低廉的西欧商品与本地的手工业产品相对抗。中国由于殖民者的慈悲而失去了自己的海外贸易。

从1842年起，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期，英、德、美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把一系列不平等的、单方面的条约强加给中国，根据这些条约，中国给了外国及其国民种种特权：在中国居留的外国人住宅有不受侵犯的权利，为外轮开放海港，租让企业，开辟租界，包括内河航行权在内的内地自由游历权，并有经营工业、特权商业和放高利贷的权利以及领事裁判权。

这些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人可以破坏中国的国家独立而不受惩罚，可以干涉中国的内外事务。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一个有数千年悠久文化的广大而富饶的国家变成了西欧帝国主义强盗的半殖民地，这些强盗为了高额利润掠夺中国，以鸦片毒害中国的千百万劳动者。

同俄罗斯人民的传统联系，帮助了中国劳动者起来进行反对

封建的和帝国主义的压迫。1905年的俄国革命对中国人民是一堂重要的革命课。

1917年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人民发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鼓舞了中国人民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斗争。

中国劳动人民学习了俄罗斯工人阶级的经验，在对压迫者，即满汉两族的封建主和欧洲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革命毅力，表现了惊人的勇敢精神，在俄罗斯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下打倒了多年来折磨自己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的领导者，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粉碎了帝国主义压迫的锁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罗斯立刻宣告废除沙皇政府在二十世纪初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苏维埃俄罗斯同中国签订了友好的平等条约，从而给束缚着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打击。苏联以始终不渝的兄弟般的支持帮助了中国人民，促成中国人民对敌人的胜利。

目前，热爱劳动的，富于天才的中国人民正在创造性地研究和掌握苏维埃人民的伟大经验，依靠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帮助，在自己的美好的国土上建设着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封建主和帝国主义者为世界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发展所制造的障碍已经消除，而这种友谊就是各国人民和平与安全的坚强支柱。

附录一 中俄尼布楚条约

(1689年8月27日)

俄罗斯国统治大俄、小俄、白俄诸地及东、西、北各方国土封地世袭独裁天佑君主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钦差全权大臣内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柯罗文，内大臣伊拉脱穆斯克总督伊凡·鄂斯塔斐耶维奇·伏拉索夫，教士谢苗·克尔尼茨基；亚洲国家君主、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舅舅佟国纲，都统郎谈等，在尼布楚附近会聚，共同议定各条款如下：

第 一 条

将在绰尔纳河^①附近向下流入石勒喀河左岸之格尔必齐河定为两国之边界。

自此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直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阿穆尔河之大小河流，均属大清国^②。

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罗斯国。俄国所属乌第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穆尔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因钦差全权大臣未得划分此等土地之沙皇旨意，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两国皇帝愿意划分之时，或遣使臣，或行文书，再行议定。

① 绰尔纳河即阿穆尔河上游。

② 大清国即中国。

第 二 条

将流入阿穆尔河之额尔古纳河为界：左岸所有土地直至河源皆属大清国；右岸所有土地皆属俄罗斯国，额尔古纳河南岸所有房舍应迁移至该河对岸。

第 三 条

俄罗斯国所筑阿尔巴津城应尽行拆毁，所居俄罗斯人民及一切军用与他种物品，均应撤回俄境，不得稍有存留，致受损失。

第 四 条

两国订立本和约之前，逃往中国之俄罗斯人及逃往俄罗斯国之中国人，双方不再互相索还。订约之后，所有两国越境者，应立即送还两国边界督军，不得收留。

第 五 条

两国今既永修和好，嗣后两国人民如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准其在两国境内往来贸易。

第 六 条

从前两国沿边人民一切争端概作罢论，不得报复。和好既定之后，如有两国渔猎人等私自越界劫盗、杀人，应即捕送该管边界督军，严加惩处；如聚众合伙劫盗、杀人，务必捕送边界督军，处以死刑。不得因两国边界人民轻起战端和发生流血。遇有此种情事，应行各自奏明，以书信和平议结。

中国皇帝对于此项界约，如欲在国境建立碑碣，刻写条文，以资纪念，亦可任便办理。

创世后 7197 年 8 月 27 日在俄属达呼尔地方订立。^①

盖有中国黑龙江将军四个骑缝红印的满文原本存在莫斯科对外政策档案馆里。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10 件，第 1158—1165 张。本书所载的尼布楚条约文本是柯罗文使节团出使报告中所记录的，这是十七世纪外交事务衙门案卷中唯一的俄文条约文本，因为在尼布楚签了字的俄文条约在两国使节团交换“条约文书”后带到北京去了。

尼布楚条约的俄文本载于《俄华条约集》，圣彼得堡 1889 年版，第 7—10 页，并载于《俄罗斯帝国法律全集》，第 1 卷，第 1346 号。

附录二 费·阿·柯罗文通行证

(1685年1月20日)

大俄、小俄和白俄全境的独裁者沙皇和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训令，自莫斯科起沿途城市——彼列亚斯拉夫耳扎列斯基、雅罗斯拉夫、沃洛格达、托特马、大乌斯丘格、索尔·维彻哥德斯卡雅、卡伊戈罗德·索利卡姆斯卡雅以及西伯利亚各城市、韦尔霍土里耶、土林斯克堡、秋明、托波尔斯克——诸将军、秘书及其他一切官员一体遵照。大君主钦派内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柯罗文为全权大使，前往中国边境办理我大君主的公务，随行小贵族中有御前大臣阿列克谢·西多尔之子·西尼亚文，还有选派的拉里昂·亚基姆之子·西尼亚文、瓦西利·叶里谢之子·卢托文诺夫、费奥多尔·普罗霍尔之子·乌沙科夫、斯捷潘·雅科夫之子·科罗文。

另有一名拉丁语译员小贵族安德列·别洛鲍茨基以及三名掌管文牍的司书：小俄罗斯事务衙门的谢苗·瓦西利科夫，军务衙门的阿列克谢·克列曼托夫，领地事务衙门的基里尔·谢尔格耶夫。

该内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行抵任何城堡时均应放行，并凭驿道旅行证供应车辆，不得稍有阻留。该内大臣自莫斯科携带油性革二百张、兔皮六百张、红色毛呢衣料十一段、黑色毛呢十七俄尺、列奇纳呢十三幅、大中小各号镜子二十五块……桶一百个、貂腹皮五十索洛克、珊瑚珠五十俄磅，任何城市对上开物品均不得检查，不得征税，所到之处均应放行勿阻。该内大臣行抵托波尔斯克时，大贵族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柯罗文将军及所属

该供应该内大臣及其全体人员船只、舵手和桨手,把大君主的所有这些人员送到离色楞格斯克堡的最近便之处。该内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率同大君主的全体人员自中国边境返回色楞格斯克、经西伯利亚各城至韦尔霍土里耶返回莫斯科时,沿途各城的将军、秘书以及一切官员对该内大臣以及大君主的全体人员仍应遵令一律放行,不得阻留,不得检查。

7194年1月20日自莫斯科填发。^①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9件,第128,129,130张。首次发表。

附录三 费·阿·柯罗文 等使节全权证书

(1685年1月20日)

蒙神圣三位一体的光荣上帝造物主护佑的大君主和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各方国土的领主，大俄、小俄、白俄诸地和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哥尔斯克、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尔加利等国的皇帝，诺瓦戈罗德、尼卓夫斯克地方、契尔尼哥夫、里亚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白湖、乌戈尔斯克、奥物多尔斯克、康丁斯克等处的君主和大公，伊维里亚地区、卡特林诸王、卡巴尔达地区、契尔卡斯和果尔斯克诸公侯的君主，许多其他受统治和受保护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赐给和平、保障安谧的强大独裁者，解除困苦、增进福利的和平统治者，基督教君主，上天眷祐，至尊沙皇陛下，钦派全权大使内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柯罗文、御前大臣伊拉脱穆斯克总督伊凡·鄂斯塔斐耶维奇·伏拉索夫、秘书伊万·尤金^①前往会见有贤臣辅佐的大亚细亚洲各地专制独裁君主、人民社会事务的执法者、中国的保护者和光荣，满汉两族的真主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节，如无使节则会见领兵都统彭兴^②，为了增进我大君主沙皇陛下与博格德汗殿下双方的友好亲善的邻国关系而

① 谢苗·克尔尼茨基代替了伊万·尤金。

② 彭兴(Пунг Хен)是译音，疑即彭春。——译者

进行协商并作出有利于两国公务人员的决定；相信我国沙皇陛下的大使在与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节会见后，如无使节则与领兵都统或其他奉派前来办理外交的人员会见后，必将遵照所奉训令进行协商并达成关于友好亲善的决议。该大使等就我国国家事务所商定、所议决以及用文书确认的一切，我国大君主沙皇陛下将坚守不渝。创世第 7194 年，即在位第 4 年 1 月 20 日自伟大皇都莫斯科的皇宫颁发。^①

^① 古代文件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 9 件，第 106、107、108 张。原本。证书用的是中等大小的“绘图纸，边上饰以花纹，神的称呼和大君主的称号是用花体写的，汗的称呼也如此，其余是用黑墨水写的”。首次发表。

参 考 书 目

文 献 和 史 料

- Маркс К.: Капитал, т. I, глава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
- Маркс К. и Энгельс Ф.: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бзоры. Соч., т. VIII, стр. 210—211. (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述评》,俄文版[非中文版所根据的第二版——译者]全集,第8卷,第210—211页。)
- Маркс К. и Энгельс Ф.: Революция в Китае и в Европе. Соч., т. IX, стр. 311—318.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文版全集第9卷,第109—116页。)
- Маркс К.: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прения о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в Китае. Соч., т. XI, ч. I, стр. 139—144. (马克思:《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中文版全集第12卷,第148—153页。)
- Маркс К.: Англо-Кита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Соч., т. XI, ч. I, стр. 145—147. (马克思:《英中冲突》,中文版全集第12卷,第112—117页。)
- Маркс К.: Английские жестокости в Китае. Соч., т. XI, ч. I, стр. 154—157.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文版全集第12卷,第175—178页。)
- Маркс К.: Торговля опиумом. Соч., т. XI, ч. I, стр. 345—352.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中文版全集第12卷,第584—591页。)
- Маркс К.: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Британией. Соч., т. XI, ч. I, стр. 345—357.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中文版全集第12卷,第621—626页。)
- Маркс К.: Нов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война. Соч., т. XI, ч. I, стр. 260—276.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中文版全集第13卷,第568—585页。)
- Маркс К.: Торговля с Китаем. Соч., т. XI, ч. II, стр. 291—294. (马克思:《对华贸易》,中文版全集第13卷,第601—605页。)
- Маркс К.: К критик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Кн. I, отдел I, гл. III. Соч. т. XII, ч. I, стр. 50—17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册,第1篇,第3章。俄文版[非中文版所根据的第二版——译者]全集,第12卷,第1分册,第50—170页。[在中文版全集第13卷里,这篇文章只有两章——译者])
- Энгельс Ф.: Нов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англичан в Китае. Соч., т. XI, ч. I, стр. 158—161.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文版全集第12卷,第186—191页。)
- Энгельс Ф.: Успехи Росси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Соч., т. XI, ч. I, стр. 368—372.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文版全集第12卷,第661—665页。)
- Энгельс Ф.: Письмо к К. Марксу от 23. V 1851 г. Соч., т. XXI, стр. 209

- 212. (恩格斯:《1851年5月23日给卡尔·马克思的信》,俄文版[非中文版所根据的第二版——译者]全集,第21卷,第209—212页。)
- Ленин В. И.: По поводу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вопроса о рынках. Соч., т. 1, стр. 59—108. (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中文版,第1卷,第59—105页。)
- Ленин В. И.: Что такое «друзья народа» и как они воюют против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ов. Соч., т. 1, стр. 111—313.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文版,第1卷,第109—309页。)
- Ленин В. И.: Китайская война. Соч., т. 4, стр. 347—352. (列宁:《中国的战争》,中文版,第4卷,第334—338页。)
- Ленин В. И.: Горючий материал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Соч., т. 15, стр. 159—165. (列宁:《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中文版,第15卷,第156—162页。)
- Ленин В. И.: О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VI Пражская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СДРП). Соч., т. 17, стр. 434—435. (列宁:《关于中国革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中文版,第17卷,第457页。)
- Ленин В. И.: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оч., т. 18, стр. 74—82. (列宁:《移民问题》,中文版,第18卷,第77—87页。)
- Ленин В. И.: Пробуждение Азии. Соч., т. 19, стр. 65—66. (列宁:《亚洲的觉醒》,中文版,第19卷,第67—68页。)
- Ленин В. И.: Отсталая Европа и передовая Азия. Соч., т. 19, стр. 77—78.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文版,第19卷,第82—83页。)
-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з бывшего пекин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дворца. Бейпин, 1936. (王之相,刘泽荣:《故宫俄文史料》[清康熙年间俄国来文原档]。)
- Андреев Г.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Приамурскому краю. Оренбург, 1866. (安德列耶夫:《关于阿穆尔边区的材料》,奥伦堡1866年版。)
- Арсеньев Ю. В.: 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посольства Н. Спафария в Китай, «Записки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82, т. 10, вып. I. (阿尔先耶夫:《尼古拉·斯帕法里使节团出使中国的报告》,载于《俄罗斯地理学会会刊》,1882年,第10卷,第1期。)
- Арсеньев Ю. В.: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сказания о реке Амуре, «Известия им.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82, No. 4, стр. 245—254. (阿尔先耶夫:《关于阿穆尔河的传说的起源》,载于《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通报》,1882年,第4期,第245—254页。)
-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Н.: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 г., составленно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хранящимся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архи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в 1792—1803 гг. Казань, 1882. (班蒂什-卡敏斯基:《1619—1792年俄中两国间的外交文件汇编》[根据莫斯科1792—1803年外交委员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编成],喀山1882年版。)

-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Н.: Деяния знаменитых полководцев и министров, служивших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с портретами их, чч. I—II, М., 1812—1813. (班著什-卡敏斯基:《彼得大帝时代的著名统帅和大臣们的业绩及其画像》,第1—2卷,莫斯科1812—1813年版。)
- Балкашин Н.: Трактаты о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Памятная книжка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Омск, 1882. (巴尔卡申:《俄中条约》,载《西西伯利亚备忘手册》,鄂木斯克,1882年版。)
- Бартенев Ю. П.: Герои Албазина и Даурской земли.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99, кн. I, No. 2, стр. 304—336. (巴尔捷涅夫:《阿尔巴津和达呼尔地区的英雄们》,载于《俄罗斯文献》,1899年,第1卷,第2期,第304—336页。)
-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ткрытие Китая. СПб., 1900. (瓦西利叶夫:《中国的发现》,圣彼得堡1900年版。)
- Венюков М. И.: Очерк старых и новых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СПб., 1861. (文纽科夫:《俄中新旧条约概述》,圣彼得堡1861年版。)
- Васютинский В. О Русских посольствах в XVII в. СПб., 1860. (瓦休京斯基:《十七世纪的俄罗斯使节团》,圣彼得堡1860年版。)
- Гребенщиков А. В.: К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I посольство Н. Г. Спафария в Китай. Пособие к лекциям по маньчжурскому языку, 1911—1912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год.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2. (格列宾希科夫:《俄罗斯和满洲的关系史论述,第一个到中国去的尼古拉·斯帕法里使节团》,满洲语讲义参考书,1911—1912学年,海参崴1912年版。)
- Дю Гальд: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я и китайской Татар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 физическое ..., т. IV. Париж, 1736. (迪·哈尔德:《中华帝国和中国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第4卷,巴黎1736年版。)
- Межов В. И.: Сибирск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Указатель книг и статей о Сибири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 одних только книг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на весь период книгопечатания (и указатели), тт. I—III. СПб., 1891—1892. (麦若夫:《西伯利亚图书索引》[自有印刷术和目录以来的关于西伯利亚的俄文书刊和外文书籍的目录],第1—3卷,圣彼得堡1891—1892年版。)
- Мертваго Д.: Очерк мор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и войн европейцев с Китаем по 1860 г. (с 14 картами и планами). Отпечаток из «Морского сборника» 1883 и 1884. (麦尔特瓦戈:《到1860年为止欧洲人同中国的海上往来和战争的概述》[附地图和平面图14幅]。以1883和1884年《海事论文集》为蓝本。)
- Мялдер Г. Ф.: История о странах при реке Амуре лежащих, когда оныя состояли под Российским владением (выборки из «Сочинений 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х»), 1757, VI, IX, X, XI, стр. 39, 99—130, 195—227, 291—328. (米勒:《阿穆尔河流域各地区隶属俄罗斯时期的历史》[选自《供公务人员使用和消遣的作品集》]1757年,6,9,10,11,第39,99—130,195—227,291—328页。)

- Миллер Г. Ф.: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I, 1935. (米勒:《西伯利亚史》,第1卷,1935年版。)
- Мамышев В. с.: Генерал-фельдмаршал и генерал-адмирал граф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Головин. СПб., 1910. (马梅舍夫:《陆军元帅、海军上将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柯罗文伯爵》,圣彼得堡1910年版。)
-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Подвиги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на край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50. (涅维利斯科伊:《俄罗斯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绩》,海参崴1950年版。)
- Оглоблин Н. Н.: Обзорные столбцы и книг Сибирского приказа (1592—1768). М., 1898, чч. I, II, III, IV. (奥格洛勃林:《西伯利亚事务衙门案卷和册籍一覽》,第1, 2, 3, 4卷,莫斯科1898年版。)
- Оглоблин Н. Н. Бунт и побег на Амур «воровского полка» М. Сорокина («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 январь, 1896, т. 85, стр. 205—212). (奥格洛勃林:《索罗金“贼团”的暴乱和逃往阿穆尔河》,〔《俄罗斯古代》,1月,1896年,第85卷,第205—212页。〕)
- Пуцилло М.: Указатель делам и рукописям, относящимся до Сибири и принадлежащих Московскому главному архив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М., Комиссия печат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грамот и договоров, 1879. (普齐洛:《莫斯科外交部档案总库内有关西伯利亚的案卷和手稿索引》,莫斯科国家文书和条约出版委员会1879年版。)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т. I, No. 1346 (текст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俄罗斯帝国法律全集》,第1卷,第1346号[尼布楚条约文本]。)
- Паршин В.: Поездка 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й край, 2 части. М., 1844. (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之行》,两卷集,莫斯科1844年版。)
- Паркер Э.: Китай, его история, полигика и торговл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Перевод полковника Грулева. СПб., 1903. (帕尔克儿:《中国及其自古至今的历史、政治和贸易》,上校格鲁列夫译,圣彼得堡1903年版。)
- Покровский Ф. И.: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Монголию и Китай Сибирского казака Ивана Петлина в 1618 г. СПб., 1914. (波克罗夫斯基:《1618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伊万·彼特林的蒙古和中国之行》,圣彼得堡1914年版。)
-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1689—1881 гг. СПб., 1889. («俄中两国1689—1881年条约汇编》,圣彼得堡1889年版。)
- Спафарий Н. Г.: Путешествие через Сибирь от Тобольска до Нерчинска и границ Китая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Николая Спафария в 1675 г. Дорожный дневник. СПб., 1882. (尼古拉·斯帕法里:《俄罗斯使臣尼古拉·斯帕法里1675年自托波尔斯克经西伯利亚到尼布楚和中国边界的旅行》。旅途日记。圣彼得堡1882年版。)
- Сычев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записка о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советником Троицко-Савского погранич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Чтения

-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стории и древностей российских», 1875, кн. II). (塞切夫斯基: «关于中国边界的历史笔记, 特罗伊次科-萨夫斯克边境公署参事编辑[载于《历史和俄罗斯古迹皇家研究会讲座》, 1875年, 第2卷。])
- Труевич X.: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XIX в., 1882 г. (特鲁谢维奇: «19世纪前俄国同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 1882年版。)
- Шренк Л.: Об инородцах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т. I—II. СПб., 1883, 1889. (什连克: «阿穆尔边区的异族人», 第1—2卷, 1883, 1889年版。)
- Юзefович Г.: Договоры России с Восто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Пб., 1869. (尤泽弗维奇: «俄国同东方的政治和贸易条约», 圣彼得堡 1869年版。)
- Чулков Е. Н.: Хабаров,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98, кн. I, стр. 179—183. (丘尔科夫: «哈巴罗夫», 载于《俄罗斯文献》, 1898年版, 第1卷, 第179—183页。)

现代著作

- Алексеев М. П.: Сибирь в известиях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и писателей. Иркутск, 1941. (阿列克谢耶夫: «外国旅行家和作家所报导的西伯利亚», 伊尔库次克 1941年版。)
- Андреев А. 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ю Сибири XVII в. Л., 1939. (安德列耶夫: «17世纪西伯利亚的史料学概论», 列宁格勒 1939年版。)
-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изд. 2-е. Л., 1927. (巴尔托尔德: «欧洲人和俄罗斯人对东方进行的历史», 列宁格勒 1927年第2版。)
- Богданов Н. Н.: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ерхнеудинск, 1927, стр. 173—183. (鲍格丹诺夫: «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史概述», 韦尔霍涅乌金斯克 1927年版, 第173—183页。)
- Бахрушин С. В.: Торги гостя Никитина в Сибири и Китае,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М., 1955, т. III, ч. I, стр. 226—252. (巴赫鲁申: «巨商尼基京在西伯利亚和中国的贸易», 载于《学术论文集》, 莫斯科 1955年版, 第3卷, 第1分册, 第226—252页。)
- Бахрушин С. В.: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русской колонизации в связи с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м Якутии к русс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М., 1955, т. III, ч. I, стр. 236—253. (巴赫鲁申: «俄罗斯殖民因雅库季亚归并于俄罗斯国家而获得的积极成果», 载于《学术论文集》, 莫斯科 1955年版, 第3卷, 第1分册, 第236—253页。)
- Бахрушин С. В.: 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 Л., 1925. (巴赫鲁申: «哥萨克在阿穆尔河上», 列宁格勒 1925年版。)
-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 С. К.: Приказные судьи XVII в. М., 1946. (鲍戈亚夫连斯基: «十七世纪的衙门长官», 莫斯科 1946年版。)
- Ефимов Г. В.: Очерки по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М., 1949.

- (叶菲莫夫:《中国近代和现代史概要》,莫斯科1949年版。)
- Кабанов П. И.: Амурский вопрос и его разрешение (Из истори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XIX в.). М., 1948. Рукопись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卡巴诺夫:《阿穆尔河问题及其解决》[摘自《十九世纪远东史》]。莫斯科1948年版。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应试论文手稿。)
- Кудрявцев Ф. А.: Восстания крестьян, посадских и казаков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в конце XVII в. Иркутск, 1939. (库德里亚夫采夫:《十七世纪末叶东西伯利亚的农民、工商业区居民和哥萨克的起义》,伊尔库次克1939年版。)
- Курц Б. Г.: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XVII—XVIII вв.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1927, т. 19, стр. 194—206. (库尔茨:《十七—十八世纪俄罗斯和中国的殖民政策》,载《新东方》1927年第19册,第194—206页。)
- Курц Б. 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XVII и XVIII столетиях. Харьков, 1929. (库尔茨:《十六—十八世纪的俄中关系》,哈尔科夫1929年版。)
- Огородников В. И.: Туземное и русское земледелие на Амуре в XVII в. «Труд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III, 1927, No. 4 и отдельн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7. (奥戈罗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载《国立远东大学论文集》,第3集,1927年,第4号以及单行本,海参崴1927年版。)
- Саввин В. П.: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М.—Л., 1930. (萨文:《沙俄和苏联同中国的相互关系》,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
- Шунков В. 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колонизации Сибири в XVII—XVIII вв. М.—Л., 1946. (顺科夫:《十七—十八世纪西伯利亚殖民史概述》,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年版。)
- Шунков В. 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земледелия Сибири XVII в. М., 1956. (顺科夫:《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农业史纲》,莫斯科1956年版。)
- Шастина Н. П.: Первые снош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 Алтыгханамы Запад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Л., 1950. (沙斯契纳:《莫斯科国同西蒙古阿勒坦诺汗最初的往来》,历史学硕士学位应试论文的内容提要。列宁格勒1950年版。)
- Ху Шен: Агрессия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держав в Китае. М., 1951.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俄汉译名对照表

一、人名

А

Аббас 阿巴斯
Аблай 阿布贵
Аблин Сенткул 谢伊特库尔·阿布林 (旧译阿勃敏)
Август 奥古斯都
Албаза 阿尔巴扎
Александр Македонский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Алексеев М. П. 姆·普·阿列克谢耶夫
Алексеев Я. 雅·阿列克谢耶夫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Алтынхан 阿勒坦汗
Андреев С. 谢·安德列耶夫
Арани 阿尔尼
Арсеньев Ю. 尤·阿尔先耶夫
Артемьев В. 瓦·阿尔捷米耶夫
Аршинский Д. 达·阿尔申斯基
Афанасьев Т. 塔·阿法纳西耶夫
Афанасьев Ш. 舍·阿法纳西耶夫
Ахай 阿哈伊
Аюси 阿尤希

Б

Бабаев П. 潘·巴巴耶夫
Байгачов И. 伊·巴伊加乔夫
Байков Ф. И. 费·伊·贝科夫
Бамбагай 班巴盖依

Банбулай 班布拉依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Н. 恩·恩·班蒂什-卡敏斯基
Бартнев Ю. 尤·巴尔捷涅夫
Батур 巴图尔
Батур-Хун-тайчи 巴图尔汗台吉 (或作巴图尔洪台吉)
Бахрушин С. В. 谢·弗·巴赫鲁申
Бebra 别布拉
Бейтон А. Ф. 阿·弗·别依顿
Бейтон И. 伊·别依顿
Бекетов 别克托夫
Белобочкий А. 安·别洛鲍茨基
Белоголов И. 伊·别洛戈洛夫
Бирюцкий И. 伊·比留茨基
Богатырев С. 西·鲍加蒂列夫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 С. К. 斯·克·鲍戈亚连斯基
Божедомов И. 伊·鲍热多莫夫
Борбой 博尔博依
Борятинский И. П. 伊·普·鲍里亚京斯基
Буйносоев-Ростовский А. 阿·布伊诺索夫-罗斯托夫斯基
Булгаков В. 弗·布尔加科夫
Булыгин Н. 纳·布雷金
Бурдаковский А. 阿·布尔达科夫斯基
Бурнашов В. 瓦·布尔纳绍夫
Былин В. 瓦·贝林

В

- Ван-ли 万历帝
Васильев В. П. 弗·普·瓦西利耶夫
Васильев П. 普·瓦西利耶夫
Васильков С. 谢·瓦西利科夫
Васютинский В. 弗·瓦休京斯基
Венюков М. И. 姆·伊·文纽科夫
Венюков Н. 尼·文纽科夫(旧译米起佛儿魏牛高)
Вилков О. Н. 奥·恩·维尔科夫
Власов И. А. 伊·鄂·伏拉索夫
Воейков Ф. 费·沃耶科夫
Волков И. 伊·沃尔科夫
Волошин В. 瓦·沃洛申尼
Вольнский Б. В. 勃·弗·沃伦斯基
Вэй Юань 魏源
Вяткин С. 斯·维亚特金

Г

- Галдан 噶尔丹
Гантимур 根忒木尔(罕帖木儿)
Гантимуров П. 帕·根忒木罗夫
Гантимуров Чекулай-Василий 切库拉依-瓦西里·根忒木罗夫
Геген-Жутухта 格根呼图克图
Герцен А. И. 亚·伊·赫尔岑
Гильдега 吉尔杰加
Гозаловский С. 斯·戈扎洛夫斯基
Голицын В. В. 瓦·瓦·戈利津
Головин А. П. 阿·普·柯罗文
Головин Ф. А. 费·阿·柯罗文(旧译费要多罗、费岳多罗)
Грабов П. 帕·格拉鲍夫
Григорьев Д. 德·格里戈里耶夫
Григорьев Е. 叶·格里戈里耶夫
Гуйгудар 古依古达尔

Д

- Дан-Контайша 戴-晖台沙

- Дай-чин 戴青
Дарална 达拉尔纳
Дархан 达尔汗
Дассаул 达萨乌尔
Дворянинов Ф. 菲·德沃梁宁诺夫
Дедков И. 伊·杰德科夫
Деншеко 坚谢科
Джу-ханди 朱汉继
Дмитриев М. 米·德米特里耶夫
Добрынин Л. 洛·多勃雷宁
Долгих Б. О. 勃·奥·多尔基赫
Доптыул 多普狄乌尔
Досий 多西依
Дю-Гальд 迪·哈尔德

Е

- Евсеев Я. 雅·叶夫谢耶耶夫
Ежегул 叶热古尔
Емарда 叶马尔达
Емельянов И. 伊·叶麦利扬诺夫

Ж

- Жербильон Ф. 张诚神甫

З

- Заровнядный В. 瓦·扎罗夫尼亚德内
Зарукта 扎鲁克塔
Захаров В. 瓦·扎哈罗夫
Зиновьев Д. 德·齐诺维耶夫

И

- Иван IV 伊凡四世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
Иванов Н. 纳·伊万诺夫
Иванов П. 普·伊万诺夫
Иванов Я. 亚·伊万诺夫
Избрант Идес 伊杰斯·伊兹勃兰特
Измайлов Л. 列·伊兹马伊洛夫

Исаев И. 伊·伊萨耶夫

К

Кан-си 康熙帝

Карамзин Н. М. 恩·姆·卡拉姆津

Карякин В. 弗·卡里亚金

Катанин Андар 安达尔·卡塔宁

Кафаров (Палладий) 卡法罗夫(帕拉季)

Качанов И. 伊·卡察诺夫

Кесарь 恺撒

Кизилов П. 彼·基齐洛夫

Кириллов В. 叶·基里洛夫

Кирьянов В. 瓦·基里扬诺夫

Климантов А. 阿·克利曼托夫

Кобяков Г. 格·科比亚科夫

Коксинга 郑成功

Колпа 科尔帕

Копылов Д. 德·科培洛夫

Коренев А. 阿·科列涅夫

Корницкий С. 谢·克尔尼茨基

Коровин С. 斯·科罗文

Косой Ф. 费·科索伊

Кудрявцев Ф. 弗·库德里亚夫采夫

Кузнецов К. 克·库兹涅佐夫

Куракин И. С. 伊·斯·库拉金

Куртеев М. 米·库尔捷耶夫

Куриц Б. Г. 勃·格·库尔茨

Кутьин М. 马·库季英

Куча Г. 格·库恰

Л

Лаба Ю. 尤·拉巴

Лавкай 拉夫卡依

Лантань 郎谈(郎坦)

Лапшинов Ф. 弗·拉普申诺夫

Ларионов М. 米·拉里奥诺夫

Ленин В. И. 弗·伊·列宁

Литасов В. 瓦·利塔索夫

Ли Цзы-чен 李自成

Лобанов-Росторский И. И. 伊·伊·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

Ловцов Г. 加·洛夫佐夫

Логинов И. 伊·洛基洛夫

Ложкин 洛日金

Лоншаков Г. 格·隆沙科夫

Лотодий 洛托吉依

Лузин А. 安·卢津

Лузин С. 谢·卢津

Лукьянов С. 萨·卢基扬诺夫

Лутовинов В. 瓦·卢托文诺夫

Людювик XIV 路易十四

Лянгусов С. 斯·梁古索夫

М

Максимов Г. 格·马克西莫夫

Максимов И. 伊·马克西莫夫

Мала 马喇

Малинин Г. 彼·马利宁

Маметов У. 乌·马麦托夫

Мамышев В. С. 弗·斯·马梅舍夫

Мангутей 曼古捷伊

Маркс К. 卡·马克思

Матвеев Н. 涅·马特维耶夫

Мази 马齐

Мелкинин П. 彼·麦尔基宁

Мелкиши 麦尔基希

Миллер Г. Ф. 格·弗·米勒

Милованов В. 瓦·米洛万诺夫

Милованов И. 伊·米洛万诺夫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

Многогрешный Д. 捷·姆诺戈格列什内

Моголев Е. 叶·莫古列夫

Монгодей 孟格德

Москвитин И. 伊·莫斯科维京

Мулла Ирки 伊尔基·穆拉

Муцдов А. 安·穆多夫

Мыльник Г. 格·梅利尼克

Н

Нарицны-Мусатовы 纳里齐内-穆萨托维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格·伊·涅维利斯科伊

Нейтер Л. 拉·涅伊捷尔

Неприпасов А. 阿·涅普里帕索夫

Никитин Г. 加·尼基京

Николев С. 萨·尼科列夫

Норицын П. 普·诺里增

Нурумов Р. 拉·努鲁莫夫

О

Оглоблин Н. Н. 恩·恩·奥格洛勃林

Огородников В. И. 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

Олгемез 奥尔盖美茨

Орол 奥罗尔

Охолоков И. 伊·奥霍尔科夫

Очиroy-Сайн 斡齐賚賽音汗(土谢图汗)

П

Пашков А. 阿·帕什科夫

Перейра Т. 徐日升神甫

Перекомендов Д. 德·佩列科缅多夫

Перфильев И. 伊·佩尔菲利耶夫

Перфильев М. 姆·佩尔菲利耶夫

Петлин И. 伊·彼特林

Петр I 彼得一世

Петров Е. 叶·彼得罗夫

Петров И. 伊·彼得罗夫

Петров У. 乌·彼得罗夫

Плотников А. 阿·普洛特尼科夫

Позняков С. 斯·波兹尼扬科夫

Покровский Ф. И. 弗·伊·波克

罗夫斯基

Пляков 波利亚科夫

Пончон 彭春或朋春

Поршеников И. 伊·波尔申尼科夫

Посельские 波谢利斯基

Поскочин Л. 列·波斯科钦

Поторочинов С. 萨·波托罗奇诺夫

Поляков В. Д. 瓦·德·波亚尔科夫

Приклонский М. 米·普里克隆斯基

Протопопов Я. 亚·普罗托波波夫

Прытков А. 阿·普雷特科夫

Пунг Хен (Пунхен) 彭兴(中国边防都统, 疑即彭春)

Р

Рагузинский С. В. 萨·伏·拉古津斯基

Разин С. Т. 斯·季·拉晋

Раскосый В. 弗·拉斯科塞

Ремезов-младший 小列麦佐夫

Репцовский И. 伊·列普佐夫斯基

Ресня В. 瓦·列辛

Романов Г. 格·罗曼诺夫

Россохин И. 伊·罗索新

Рюрик 留里克

С

Сабанский П. 彼得·萨班斯基

Саввин В. П. 弗·普·萨文

Салтыков П. М. 普·姆·萨尔蒂科夫

Самара А. 阿·萨马拉

Самохов Г. 格·萨莫霍夫

Сапожников М. 米·萨波日尼科夫

Сапсу 萨布素

Свечников Ф. 菲·斯维奇尼科夫

Секуча 谢库恰

Сенотрусов Н. 尼·谢诺特鲁索夫

Сергеев К. 基·谢尔格耶夫
Си Арэм 西·阿列姆
Сидоров А. 阿·西多罗夫
Синявин А. 阿·西尼亚文
Синявин Л. 拉·西尼亚文
Симоновская Л. В. 勒·弗·西蒙诺
夫斯卡娅
Скрипичин Ф. 费·斯克里皮增
Смольников 斯莫利尼科夫
Сонгоу 索额图
Сорокин М. 米·索罗金
Софронов А. 阿·索弗隆诺夫
Софья 索菲亚
Спаский Г. 格·斯帕斯基
Спафарий Н. 尼古拉·斯帕法里(旧
译尼果赖)
Срезневский И. И. 伊·伊·斯列
兹涅夫斯基
Степанов О. 奥·斯捷潘诺夫
Строганов А. 安·斯特罗甘诺夫
Суетин Д. 德·苏叶京
Суклемский Ф. 费·苏克列姆斯基
Сычевский 塞切夫斯基

Т

Тарасов И. 伊·塔拉索夫
Тархон-контайша 达尔深琿台沙
Текутьев И. П. 伊·彼·捷库季耶
夫
Толбузин А. 阿·托尔布津
Толбузин И. 伊·托尔布津
Толча 托尔察
Томкони 托姆可尼
Трусевич Х. 赫·特鲁谢维奇
Тули Шен 图理琛
Тун Гун-ган (Кюу-Кису) 佟国纲
(真男)
Туронча 图隆恰
Турчан 图尔昌
Тюменец В. 瓦·丘麦涅茨

У

Украинцев Е. И. 叶·伊·乌克兰
采夫
Ундай 温达依
Уньда 温达
У Сань-гуй 吴三桂
Учурва 乌楚尔瓦
Ушаков Ф. 弗·乌沙科夫

Ф

Фаворов И. 伊·法沃罗夫(旧译宜
番法俄罗斯瓦)
Фансмальмберх А. 安·凡斯马雷
姆别尔赫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费奥多尔·阿列
克谢耶维奇
Федоров Е. 叶·费奥多罗夫
Федоров К. 库·费奥多罗夫
Федоров М. 莫·费奥多罗夫
Федосеев А. 阿·费多谢耶夫
Федосеев Р. 罗·费多谢耶夫
Федотов С. 谢·费多托夫
Фехнер М. В. 姆·弗·费赫涅尔
Филатьев А. 阿·菲拉季耶夫
Фишер И. Е. 伊·叶·菲舍尔
Фомин Г. 格·弗明
Францбеков Д. 德·弗兰茨别科夫
Фукс Ф., 瓦·福克斯

Х

Хабаров Е. П. 叶·普·哈巴罗夫
Хялев А. 安·希列夫
Ходекин Ф. 弗·霍杰金
Ху Шен 胡绳

Ц

Черниговский Н. 尼·切尔尼戈夫
斯基
Чечигин 切奇金

Чжу Юань-чжан 朱元璋
Чингис 成吉思汗
Чуронча 楚伦察

Ш

Шангамон 善加孟
Шарандай 沙兰代
Шастина Н. П. 恩·普·沙斯京纳
Шилей 石列伊
Шилингей 希林格伊
Шульгин П. 帕·舒利金
Шунков В. И. 弗·伊·顺科夫

Щ

Щербатый О. И. 奥·伊·谢尔巴迪

Э

Энгельс Ф. 弗·恩格斯
Эрдени 埃尔杰尼(塔布努特台沙)

Ю

Юдин И. 伊·尤金
Юдин М. 马·尤金
Юзефович Г. 格·尤泽弗维奇

Я

Якимов 亚基莫夫
Яковлев К. 基·亚科夫列夫
Яковлев Ф. 弗·亚科夫列夫
Яльчев Б. 布·亚雷切夫

二、地名

А

Азия 亚洲
Айга, р. 埃加河
Айгун 瑗琿
Албазин 阿尔巴津(雅克萨)
Албазинский уезд 阿尔巴津县
Алдав, р. 阿尔丹河
Амазар, р. 阿马扎尔河
Америка 亚美利加
Амур, р. 阿穆尔河(黑龙江)
Амурская обл. 阿穆尔地区
Ангара, р. 安加拉河
Англия 英吉利
Аргунь, р. 额尔古纳河
Астрахань, г. 阿斯特拉罕

Б

Байкал, оз. 贝加尔湖
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 波罗的海
Балхаш, оз. 巴尔喀什湖

Бешка, р. 别什卡河
Борзинские вершины 鲍尔津斯基
山峰
Брянта, р. 勃良塔河
Бурейнский хр. 布列亚山脉
Буря (Быстрая), р. 布列亚河(亦
称贝斯特拉亚河,牛满河)
Бухара 布哈拉

В

Верхнезейский острог 上结雅堡
Верхоленск, острог 韦尔霍连斯克
堡
Верхогурье, г. 韦尔霍土里耶
Волга, р. 伏尔加河
Вологда, г. 沃洛格达
Вост. Монголия 东蒙古
Вост. Сибирь 东西伯利亚
Вымь-Яренский уезд 威姆-亚连斯
克县
Вязьма, г. 维亚兹马

Вятский уезд 维亚特卡县

Г

Гадзимур, р. 加齐木尔河 (又称根忒木尔河)

Ган, р. 根河(额尔古纳河支流)

Ган, р. 甘河(嫩江支流)

Германия 德意志

Гоном, р. 戈诺姆河

Горбиаца, р. 格尔必齐河

Д

Далай, оз. 呼伦池(达赖湖,达赖海)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远东

Даурья 达呼尔地区(达斡尔地区)

Джугджур, хр. 朱格朱尔山脉

Джунгария (Зап. Монголия) 准噶尔(西蒙古)

Долонский 多伦斯克

Е

Европа 欧洲

Еловка, приток р. Ньюзги 耶洛夫卡(纽格齐亚河的支流)

Енисей, р. 叶尼塞河

Енисейск 叶尼塞斯克

З

Забайкалье 外贝加尔

Задун, р. 扎顿河

Зап. Европа 西欧

Зап. Маньчжурия 西满洲

Зап. Монголия 西蒙古

Зап. Сибирь 西西伯利亚

Зея, р. 结雅河(精奇里江)

И

Или, р. 伊犁河

Илимск, крепость 伊利姆斯克堡

Ингода, р. 音果达河

Индо-Китай 印度支那

Иран 伊朗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次克

Иртыш, р. 额尔齐斯河

К

Кайгород, г. 卡伊戈罗德

Кайгородский уезд 卡伊戈罗德县

Камбалык (Пекин) 汗八里(北京)

Камчатка 堪察加

Капка, г. 卡普卡(张家口)

Карабугай, р. 卡拉布盖河

Кема, р. 卡马河

Кеть, приток р. Оби 克特河(鄂毕河的支流)

Киренск, острог 基廉斯克堡

Кокотан, г. 科科坦(呼和浩特,归化城)

Корея 朝鲜

Красноярск, г.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Кузнецк, острог 库兹涅茨克堡

Кумара, р. 呼玛尔河(库马拉河)

Керулен, р. 克鲁伦河

Кута, р. 库塔河

Л

Лена, р. 勒拿河

Ленинград, г. 列宁格勒

Льюцю, о-ва 琉球群岛

М

Маньчжурия 满洲

Мая, р. 马亚河

Молдавия 摩尔达维亚

Монголия 蒙古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Мэргень, крепость 墨尔根要塞(嫩江县)

Н

Нанкин, г. 南京
Нарым, острог 纳雷姆堡
Наун (Нонни), р. 嫩江
Нерча, р. 涅尔查河(尼布楚河)
Нерчинск, г. 尼布楚(涅尔琴斯克)
Нерчинский уезд 尼布楚县(涅尔琴斯克县)
Нидерланды 荷兰
Нюгзя 纽格齐亚
Нюемка, р. 纽叶姆卡河

О

Обь, р. 鄂毕河
Одесон, р. 奥杰康河
Олекма, р. 奥廖克马河
Онон, р. 鄂嫩河(昔称斡难河)
Орхон, р. 鄂尔浑河
Охота, р. 奥霍塔河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鄂霍次克海

П

Падун, порог 帕东急滩
Пекин 北京
Пелым, г. 彼累姆
Переяславль-Залесский, г. 彼列亚斯拉夫耳扎列斯基(城)
Пермь, г. 彼尔姆(今莫洛托夫)
Персия 波斯(伊朗)
Польша 波兰
Поморье 北方沿海地区
Приамурье 阿穆尔地区
Прибайкалье 贝加尔地区
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 滨海地区

Р

Ракалеева, приток р. Нюгзи 拉卡列耶瓦河(纽格齐亚河支流)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 雷布诺耶(堡)

С

Самаровское, село 萨马罗夫斯克(村)
Сев. Монголия 北蒙古
Селемджа, р. 谢烈姆扎河
Селенга, р. 色楞格河
Селенгинск, г. 色楞格斯克
Селимба, р. 谢利姆巴河
Селинб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谢林宾斯克堡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Соликамск, г. 索利卡姆斯克
Соликамский уезд 索利卡姆斯克县
Сольвыгодск 索尔维契戈次克
СССР 苏联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中亚细亚
Становой, хр. 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旧称石头山,石大兴安岭)
Сунгарн, р. 松花江
Сургут, г. 苏尔古特(城)

Т

Тайвань, о-в 台湾
Тара, г. 塔拉
Тибет 西藏
Тихий океан 太平洋
Тобольск, г. 托波尔斯克
Тола, р. 土拉河
Томск, г. 托木斯克
Томь, р. 托米河
Тотьма, г. 托特马
Тугир, р. 土基尔河
Тугур, р. 土古尔河
Туринск, г. 土林斯克
Турция 土耳其
Тюмень, г. 秋明

У

Убса-нур, оз. 乌布苏诺尔(湖)

Уда, р. 乌达河(色楞格河右岸支流)

Удинск, острог 乌金斯克(堡)

Удь, р. 乌第河(此河注入鄂雷次克海,现称乌达河)

Украина 乌克兰

Улья, р. 乌利亚河

Умлекан, р. 乌姆列坎河(结雅河支流)

Уральский хр. 乌拉尔山脉

Урга, селение 库伦(村镇)

Урка, р. 乌尔卡河

Урумка, р. 乌鲁姆卡河

Урух, р. 乌鲁赫河

Усури, р. 乌苏里江

Устюг 乌斯丘格

Устюжский уезд 乌斯丘格县

Учур, р. 乌楚尔河

Уюрга, р. 乌尤尔加河

Х

Хайлар, р. 海拉尔河

Хайнань, о-в 海南岛

Халха (Сев. Монголия) 喀尔喀(北蒙古)

Хамун, р. 哈蒙河

Хауль, р. 豪利河

Хялок, р. 希洛克河

Хинган, горы 兴安岭(此处指外兴安岭)

Ц

Центральная Сибирь 中西伯利亚

Цицикар, крепость 齐齐哈尔(要塞)

Ч

Чердынский уезд 切尔登斯克县

Черная р., приток р. Шилки 绰尔纳河(石勒喀河支流)

Черное море 黑海

Чичагарское, село на Науне 奇恰加尔斯克(嫩江上的村庄)

Ш

Шантарские о-ва 珊塔尔群岛

Швеция 瑞典

Шилка, р. 石勒喀河

Шингал, р. 申加尔河(松花江)

Ю

Юдома, р. 尤多马河

Юж. Маньчжурия 南满洲

Юж. Монголия 南蒙古

Я

Якутск, г. 雅库茨克

Ямалин, хр. 亚马林山脉

Ямыш, оз. 亚梅什湖

Ярославль, г. 雅罗斯拉夫

Япония 日本

三、民族名

Ачаны 阿善人(或作“阿枪”人,即“赫哲”族人)

Брацкие 布拉特人(布里亚特人)

Буряты 布里亚特人(布拉特人)

Бухарцы 布哈拉人(旧称不花刺人)

Гогоулы 高勾丽人(朝鲜人)

Дауры 达呼尔人(达斡尔人)

Дючеры 久契尔人(即女真族)

Калмыки 卡尔梅克人(即额鲁特人,后称准噶尔人)

Киргизы 吉尔吉斯人

Лалагиры 拉拉吉尔人

Нанайцы 那乃人(指赫哲人)
Нагки 那脱吉人
Нивхи 尼福赫人(即费雅喀人)
Никанские (Китайские) 尼堪人
(即汉人)
Ойраты 卫拉特人(厄鲁特人、瓦剌
人、幹亦剌人)
Онкоцкие 温科特族人
Псковитяне 普斯科夫人

Солары 撒拉尔人
Солоны 索伦人
Табунуты 塔布努特人(即蒙古人)
Татары 鞑靼人
Телеуты 铁勒乌特人(阿尔泰人的一支)
Тундуны 童顿人
Тунгусы 通古斯人
Эвенки 鄂温克人
Якуты 亚库特人